俄罗斯的暗夜

薇拉·妃格念尔著

谢翰如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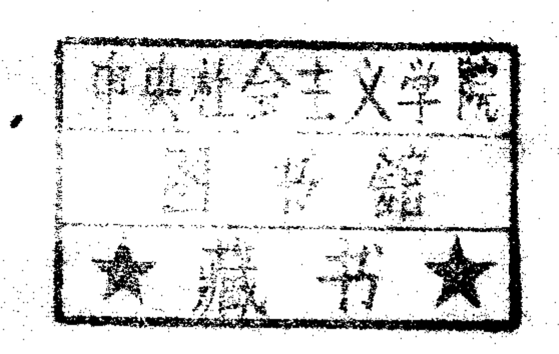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译丛

俄罗斯的暗夜

薇拉·妃格念尔著

谢翰如译





文化生活译丛

中译本前记

薇拉·妃格念尔在军事法庭上说："我常常想：我的生活是否可能走别的道路？它是否可能有别的结局，而不致坐在被告席上？每一次，我的回答都是：不可能！"她，一个贵族地主家庭的长女，聪明、美丽、活泼，受到那时女子极为罕见的高等教育，上流社会的大门为她敞开着，她尽可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但是，她却从二十四岁起完全投身革命，六年的斗争生涯，既有痛苦的探索，也有出生入死的战斗，换来的是在俄国最黑暗的死牢里监禁二十二年！

还在少女时代，她偶然听到一个亲戚对她的评论，说她像墙上挂的红灯笼，外表好看，但贴墙的那一面却是空的。这使她伤心地痛哭了。她自问怎样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呢？她选择了医生的职业。她到民间去，为农民治病。目睹农村的贫穷、落后、愚昧和不公，她越来越感觉到手里的药粉药水是多么的可笑，生活推动着她一步一步地走上反对专制制度的暴力斗争的道路。

在她的性格形成过程中起着奠基石作用的是涅克拉索夫的一首长诗《萨莎》，她从中得到的教育是要言行一致，前后一贯，这成了她终生的座右铭，不论对自己，对别人，都这样要求。她说，"任何真理，既然我承认它是真理，那么对我的意志就具有强制的性质。这是性格的逻辑。"我们今天看来，薇拉当时的一些看法实在十分天真幼稚，但人们不会取笑孩童学步的蹒跚，反而会赞美他跌倒了爬起来再走的执著顽强。岁月冲刷掉他们的幼稚，却更加显露出他们为争取自由和社会公正而奋斗的高尚情操和完整而和谐的性格的光辉。这，也许就是薇拉·妃格念尔能够超越时间和国界，震撼千千万万人的心的力量之所在吧。

巴金在一九二七年就曾写过："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燕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到四十年代末，巴老译出了妃格念尔回忆录第二卷，取名《狱中二十年》。一九九〇年，三联书店重印出版。回忆录第一卷，即本书，巴老曾在《狱中二十年》后记中说："……第一卷还在翻译中。……我决定给它换上一个题名：《俄罗斯的暗夜》"。这部书迄今没有问世。出于对妃格念尔及其回忆的敬仰，对巴金老人的敬仰，

我冒昧地应三联书店之约，将回忆录第一卷译出，并套用巴老原来想取用的书名（本书原名Запечатленный труд，可勉强译为《刻骨铭心》）。全书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的版本翻译，而该版本则是根据作者生前亲自编定的最后一个选本刊印的。译者保留了作者的全部注释并予标明，对编者的注释则有所选择和增删，还补充了一些注释。此外，还编了一份作者生平大事记，附于书末。

第一版序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

在无所事事因而郁郁寡欢的日子里，想到有一件于社会有益的事是我可以做的：出版一部书，把我亲身参加的那段革命运动的经验记录下来。这个想法使我稍感宽舒。

现在，在几经失败和延宕之后，这部书的第一部分终于问世了。

这一部分的中心是一八七六—一八八三年这一时期，也就是秘密团体土地和自由社和民意党这两个组织先后进行活动的时期。这两个组织是有继承关系的，它们代表了我国革命运动继“到民间去”的试验之后的两个新阶段。

我逐一查点了目前还健在的土地和自由社分子和民意党人，我没发现有一个是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一个时期的，每一个人不是缺这一个环节，就是缺那一个环节，要不就是缺其中的几个年头。在这方面，我的情况

是独一无二的：一八七六年我参加制订民粹派纲领，它成为联合成秘密团体土地和自由社的各支革命力量的活动基础；而另一方面，我在一八八三年被捕时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最后一名委员，在那以后，在这个党的进入执委会的创建者中，身在俄国而又未被捕的，已经一个也没有了。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把我的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同志们所走过的道路尽量记录下来，难道不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吗？

我一从席吕塞尔堡出来，朋友们、熟人们，特别是《往事》杂志的创办人弗·利·布尔采夫就一再要我写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力量做这件事。

在坐了二十二年监牢之后，出狱是生活中的一个巨变：身体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受到震动。神经系统已经习惯于安静、孤独和单调不变的环境，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新印象。不要说多少有点强烈的和突如其来的现象和见面，就连最普通的、自由的人根本不注意的事，也会引起我强烈的、近乎病态的反应：使我颤栗、痛苦。

我不得不重新训练自己，使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和条件——二十年来它们已使我不习惯，由于不习惯而感到恐惧；在精神方面，我不得不痛苦地面对一些不能

回避的、由于生活的纷杂而毫不含糊地提出来的问题：我该怎么生活？靠什么生活？为什么生活？

在这里我不准备谈出狱后的这种心理状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几枚金币》一章中，对我当时的情绪有充分的反映。①

不要向后看，应当正视现在，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生活位置。我正视了，寻找了。进入生活、适应生活的一种尝试，我在第二部的那一章里也谈到了。另有两种尝试，可能日后会写。

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一九一三年，我落得一无所有，既没有革命工作，也没有于社会有益的活动，什么也没有。

于是我转向朋友们提过的、我自己也早就想到的工作。我开始写作。

那时，我住在国外，工作条件非常之好：日内瓦湖畔半山腰上一座独立门户的住宅，幽静舒适；苍茫的群山，郁郁葱葱；湖面映印着晚霞，美不胜收；孤独和宁静使人心神专注，更能倾听过去的诉说。

我先概述了一八七二年进苏黎世大学之前的性格发展，在大学里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欧工人运动和社会

① 后来编入回忆录的第三卷《出狱后》。

主义者的学说，我描写了我在国外参加的第一个革命小组，然后是离开大学、回俄国、作为小组积极的一员参加俄国社会主义党派的活动，一直写到一八七九年民意党成立。到这里，我停住了：有什么东西妨碍我谈民意党，谈执行委员会和它与专制制度的斗争。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谈论我们过去的这一光辉的时期。现在我觉得，这个障碍可能是对我脱离生活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革命运动所达到的规模和工人群众登上政治舞台，我感到迷惑，历史的发展使我难于用一个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语言来说话。

我不得不暂时搁下这个题目，一下子跳到执行委员会活动的尾声——写席吕塞尔堡，我选择了其中几个时间，那时的心理状况是在我之前写作的同志们（伏尔铿席太因、潘克拉托夫、诺瓦鲁斯基、阿申布伦纳）很少涉及的。欧战打断了我的写作：我不愿战争期间身处国外，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取道巴尔干国家回国，我没随身带回手稿，我担心如果在国境上被捕，它们会丢失。

真是如此。尽管当时的内务大臣马克拉托夫对我弟弟尼古拉作出我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的保证，我还是在温格内被捕，解送彼得堡。还好在对我进行了讯问并在维堡监狱关了十天之后，允许我定居在下诺伏哥

罗德，交当地警察监视。

要是我随身带回手稿，弟弟可能设法使它不落入警察当局之手。现在事情反而更糟：六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无法把它从国外弄回。实际上等于我前功尽弃，我不得不一切从头写起。

不幸中的万幸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发现了警察总署的密室和司法机关的档案，孜孜不倦地发掘历史文物的布尔采夫在大量文件中找到了我在一八八三年被捕后写的供词。

在一八八三年的那个时候，我的处境和情绪都是异常的。生活结束了：我们所进行的活动使得我以及我的最亲密的同志们休想有出狱的一天。我们一定会死在监狱里。可是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还在耳畔萦绕，对退出舞台的同志们的怀念之情还在心中激荡。

对生活，对当代来说，我们是死了，但是对继往开来的后人，未来在召唤，我想为他们写下我的感受，镌刻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胜利和失败。正是为了未来，我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死寂中写出我的供词。

我可以不受约束地讲，执行委员会活动的实际方面已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而且从一八七九年起，法庭审理了一连串的政治案，超过

七十人——民意党人，其中包括执行委员会的全部精华——被送去服苦役、终身流放，或是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我只讲到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事件为止，接下去的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也不想说。

从写供词至今，时光已过去三十四年。当我收到布尔采夫寄给我的抄件时，我深感满意——我无需为这份供词感到遗憾。我欣喜它能保留下来，它这么忠实地反映了我对革命事业的态度，这么充分地表达了我的感情——不仅是那时的，而且是三十四年之后的今天的感情，使我终于在其中，在这份供词中找到了可以用来叙述民意党的语言——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间我恰恰是因为找不到这语言而不得不搁笔的。手边有了这一份文件，我就可以继续那时中断的工作了。我在可能引用的地方尽量引用供词，而且准确保留供词的文字，但是在过于简略的地方，则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还补写了几章在一八八三年的条件下不便说的事。接着，写我的被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直到向我发出起诉书，把我和我党的其他同志一道提交彼得堡军事法庭。

要是在国外时写的手稿带回来，那我就有一份写好的可供付印的完整的东西了。但是，我没有那部分手稿，而印刷条件一年比一年坏。必须抓紧。为了不

致使工作遥遥无期地搁置起来，我不得不把在瑞士写的自传式的开头部分重新写起，但许多地方简略带过，有的章节完全取消，大学的那几年也只用几页交代一下。由于这一切，现在这个版本要比七年前的简略得多。

至于第二部分，即写席吕塞尔堡狱中的那部分的出版时间，既取决于俄国的一般印刷条件，也取决于我的国外手稿何时能寄来。① 我已经说过，我的狱中生活的几个主要片断，我在瑞士时已写好，在瑞士共和国的一座小城的良好条件下，能够重新再现、体验并以适当的形式描写出当时的一切，而现在则办不到，因为既无必要的情绪，也没有适当的环境。②

---

① 一九二二年，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克拉辛已设法弄到这份手稿并交给我了。——作者

② 薇·妃格念尔这篇序是一九二一年底写的。当时正是苏维埃俄国最艰难的时期——内有反革命叛乱，外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破产，连年饥荒。妃格念尔和大家一样，生活极为困难，此外还因弟弟、妹妹先后去世，只剩她一人而倍感孤单与艰辛。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不可能把精神专注于回顾过去，再现当时的心情的。

目　录

第一章

一、家

我于一八五二年七月七日诞生在喀山省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我的母亲叫叶卡捷琳娜·克里斯托弗洛芙娜，她受过她那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她的父亲库普里扬诺夫是捷秋希县的法官，生前挥霍了万贯家财。除了在捷秋希县的产业之外，他在乌菲姆省还有六千多俄亩① 的地产，但是在他死时，留下的家业是一塌糊涂，他的继承人认为不如拒绝接受遗产更好，因为他的债务简直算不清。

我的父亲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妃格念尔上过中等林务学校，毕业后先在马马德什县、继而在捷秋希县担任林务官，农奴解放后退职当调解官。在这个官职撤销之前，他一直担任这份差事。②

---

① 一俄亩等于一·〇九公顷。

我们家除了两个男孩夭折之外，共有兄弟姐妹六人。父亲和母亲都是精力充沛、十分能干的人，他们体格健壮，意志坚强。在这方面，他们给了我们优良的遗传：我这个大女儿在反专制制度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参加革命运动，被判处死刑，后来成了席吕塞尔堡的囚徒。我的妹妹莉吉亚是一个在产业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成员，在“五十人案”中与巴尔金娜、彼得·阿列克谢耶夫一同受审。这次审讯在当时的青年和自由主义知识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莉吉亚被判服苦役，后来参议院改判她褫夺特权和财产，终身流放东西伯利亚。弟弟彼得是彼尔姆省和乌菲姆省的钢铁厂的采矿工程师，后来担任波戈斯洛夫厂厂长。另一个弟弟尼古拉成了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事业上很有成就，是他第一个对歌剧表演进行改革——不仅唱，而且表演。在二十五年的舞台生涯中，他给了千千万万的人以美的享受。二妹叶夫金尼亚在一八八〇年炸冬宫的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案中受审，被褫夺一切公权，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我的小妹妹奥莉加是个聪明能干

---

② 关于我父亲是一八一二年著名的游击战士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妃格念尔的亲属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我家保存的文书证明我的祖父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妃格念尔，是里夫兰地方(今爱沙尼亚南部和拉脱维亚北部的统称——译者)的人，在任中校时于一八二八年被封为喀山省的贵族。——作者

的人，她很少参加革命活动，在嫁给医生弗洛罗夫斯基之后，跟随着他行政流放[①]到西伯利亚，他们先后在鄂木斯克、雅罗斯拉夫尔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在西伯利亚，莉吉亚和叶夫金尼亚分别和先前的政治苦役犯斯塔赫维奇和萨任结了婚，他们在智力、教养和能力诸方面都是十分出众的人。

二、林　中

我出生后的头几年——六岁之前——不是在城市或乡间度过的，而是在林海……

极目望去，到处是森林，看不见人烟。

北面，一片黑森林伸展到远方，遮住了地平线……　西面，从来看不见夕阳西下的美景。东面，锯齿形的林带随着地势蜿蜒起伏……

只有南面才是一片开阔地，微微隆起，伸向天边，铺着茵茵绿草。

凡是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见的地方，都没有半点人居的痕迹：既看不见炊烟，也听不见狗吠和远处乡村

① 与流放不同的是，行政流放不是由法庭判处，而是由行政机关强制某人不得居住在某地，将其遣送出境，被遣送者有权选择居留地。

钟楼的钟声。

钟声倒是有，那是我们家，林务官的家，院子里的钟声，那声音是幽怨的。这口钟挂在一根高柱上，它从容不迫地哀诉着，像在给人送终；它呻吟着，呼唤着，呼唤那大着胆子走进森林、却在暗无天日的密林中迷失的人快快回家。

即使在开阔地，在视野之内也是一片荒寂，没有人影，也没有人类劳动的痕迹……土地滋养着野草，草地上鲜花怒放，但是从来不见黑麦变黄，荞麦变白。

老奶妈纳塔莉亚·马卡里耶芙娜说："周围四十俄里内一个人也没有！"她说这话时流露出一股子怨气——因为与人接近、为邻和交往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怨气。

老奶妈说的四十俄里可能不对。四十俄里仅仅是离马马德什县城的距离。父亲就是这个县的林务官，负责守护国家财产——一望无际的森林。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不记得这几年里有什么外人进入我们这个森林之家，来找父亲的只有森林巡查员，来向父亲报告采伐情况。

我倒是记得他们：他们带来野兔，奶妈把它们挂在房顶的阁楼里风干，然后做给我们吃。

这个林务官小家庭的生活是奇怪、独特的，因为靠

近森林、远离人间而显得孤单、可怖。我们的房舍就在父亲管辖的一座绵延数俄里的森林的边上。

马厩外面就是茂密的森林。没有菜园，没有花园。

院子围着一道密实的木篱笆，像一个木头匣子；房子是用粗圆木搭起来的，外面没有饰面，里面没抹灰——这一切都表明一点：尽量与“邻居”隔开，防范它的危险的恶人和野兽。

“全区就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家人！森林里住着强盗……森林里有逃犯……森林里有熊瞎子，”——奶妈这么说，女奴卡捷琳娜和杜尼亚莎这么说，九岁的小女奴帕拉莎也嗫嚅地这么说。妈妈听了害怕，我则相信当真……

父亲经常不在家，去巡查森林，一出门就得去好长的时间。他在家时谁都不害怕，大家心里都踏实：父亲书房里有枪。要是父亲不在家，那可怎么办？家里就剩下女人和小孩，不分老少，不由地都有一种莫明的恐惧感。人的力量的唯一体现者就是厨子普罗科菲，若受到“入侵”时，全指望他一个人了。

白天，一般还能克制住恐惧感，到了晚上，那简直是心惊胆战。而黑夜又来得这么早！

母亲是极其胆小的人，又是一家之主，她的情绪影

响全家。晚上九点钟上床前，她举着蜡烛(那是奶妈做的)在女仆的陪伴下，提心吊胆地巡视所有的房间，仔细照照旮旮旯旯，楼梯底下该不会躲着一个人吧？仔细察看沙发底下、床底下，特别是床底下，那是“手提大刀”的可怕的强盗最容易躲藏的地方……她战战兢兢，随时都会由于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晕倒或发出非人的号叫……母亲出于无意识的自私，叫卡捷琳娜横卧在她卧室的门口，这样，强盗如不惊醒她就没法进来。出于同样的考虑，母亲让帕拉莎睡在孩子们床边的地板上，其实帕拉莎和所有的农村姑娘一样，睡得很死。普罗科菲作为最强壮、最大胆的人，为了众人的安全而睡在最危险的地方——大门边的一只大木箱上。大门上了锁，加上钩，下了闩。“森林里有强盗……森林里有逃犯……森林里有熊瞎子……”

是的，有熊瞎子。证据便是母亲那张大床旁边挂着一张带掌的大熊皮。

我相信夜间自有另一种生活。我白天作弄猫，它夜里会报复我，它会跑来用利爪掐着我的喉咙，憋死我。我不小心摔断胳臂和脑袋的布娃娃会活过来，也来同样对待我。至于那张熊皮，不消说，也会活过来，动起来……撑在掌上，而且……

“木头腿，吱吱响……”——童话里的熊瞎子说道。

妈妈说："管它行不行，反正那熊瞎子拖着木头腿走。"

农夫砍下熊腿，拿回家来给妻子。熊瞎子给自己装上木头腿…… 它来到村子里找农妇：

"木头腿，吱吱响，
村里的人全睡了，
只有一个女人没去睡。
她在煮我的肉，
坐在我的皮子上
纺我的毛……
我来了，我来了，我要吃掉你！"

母亲装出一个野兽的嘴脸，张大嘴，咬了一口。

在灯光下看那张熊皮，凝神地看，看着看着，它变了，它动起来了……

至于森林里！森林里的熊瞎子自然知道我们家有一张熊皮。熊瞎子是很精的，它们会嗅出自己的同类，从老远的地方就会嗅出来。这张熊皮会把林子里的熊招来，招到我们家来…… 它们会来…… 会把我们吃掉……

白天，用不着害怕林子里来的熊瞎子，可是蛇，那真是多得不得了！"它们会爬进屋，钻进被褥里！""你刚要躺下来睡觉，天哪，被子里有一条蛇！"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秋千架旁边玩，一条赤练蛇爬上我的膝盖。

在场的人全都跑了——跑去找牛奶，据说蛇看到牛奶就会撂下人去喝牛奶……

这当儿，我吓得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蛇爬下来，爬进草丛里，人们用小碟子拿来牛奶，可是蛇早已无影无踪了。

奶妈马卡里耶芙娜吓唬我们说："千万别到森林里去！"她严加看管着我们，不让我们跑出院子……"千万别去！森林里可怕极了，暗漠漠的，没有尽头，你要是走进去，就出不来了！你以为可以凭太阳找到路回家吗？甭想！那里面见不到太阳。你以为是往回走，朝家走，其实是越走离家越远……你朝右拐，好像那儿有一条路……其实没有！你朝左拐，还是不对头！你就这么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转昏了头，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天黑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森林越来越密，树木越来越粗，三个人也抱不拢。地上枯枝七横八竖，你走都走不过去，你会给树桩绊倒，灌木丛抓破你的皮，树枝划破你的脸，任你怎么钻也钻不过去。事实上，你越走越远，走进森林的深处。好了，那儿有一块林中空地，强盗便住在这里。一伙强盗，还有强盗头目，躺在篝火旁……正在分抢来的财宝。

“要不就是你走啊走啊，慌慌张张地。停住脚，仔细一听，一声吼叫，突然跑出一只大熊……它站起身子，抱住你……”

我记得，只有一次

“森林巨人站在那儿，

浑身披着树叶，

像一堵绿宝石的墙……”

他安详地站在那儿，一点也不吓人，没有强盗和逃犯，没有狗熊和死在密林里的迷路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茂密的森林，是我和它告别的一天。①

帕拉莎牵着我的手，顺着洒着夏日阳光的弯弯曲曲的林边小路走。我们家的左面就是树林。我们走过草场，草长得很高，遍地盛开着野花，太阳高高挂在天上。我觉得我现在还看见那淡蓝色的天空，炽热的阳光洒在树上、草上，烤着我那毫无遮挡的头顶…… 我们走过一个小坡，来到一块林中小凹地，它就像一只小茶碗，眼前是一个圆形的天然蓄水池，水平如镜，清澈见底，水底下全是小石子。

我们站在那儿四处张望。“再见啦！”明天我们就要走了。父亲奉命调到另一个县去。

---

① 在我们搬到捷秋希县的前夕。——作者

在这里我还看到死亡。在水边的树荫里躺着一只红色的小牛犊。它奄奄一息，曲着腿，脑袋枕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死神已在它眼睛里罩上薄纱…… 一只苍蝇正在吮吸眼角的脓汁。

三、奶 妈

我们离开马马德什森林，搬到捷秋希县，在乡下住了下来，从不外出。起先，我们住在外祖父的田庄上——克利斯托弗洛夫加，那是母亲负责抚养两个妹妹时，外祖父送给她的。当妹妹们长大成人、舅舅彼得·克利斯托弗洛维奇退役（他是炮兵军官）回到乡下，参加地方自治局工作时，母亲便把克利斯托弗洛夫加转送给他们，我们全家搬到尼基佛洛沃[1]，这里有母亲分到的一块地产，连同父亲买下的几块地，一共有五百二十俄亩。在这个村子的一块风景并不秀丽的小平地上，有两间厢房和一座房前小花园，园子里清一色长着丁香。这块平地离河一俄里，离森林二俄里。一切不得不重新安排：从克利斯托弗洛夫加把外祖父的老家搬来，新辟的园子要等上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才会绿树成荫。与此

① 又称尼基佛洛夫加。

相反，在我们住了四年多的克利斯托弗洛夫加却有一座美丽的老园子，其中一部分种着果树，紧挨着是一座花园，里面什么都有：陡坡，峭壁，曲径和深谷，谷底有泉眼，池塘里长着茂盛的水草，明亮的林中平地上，疏落的小白桦亭亭玉立，浓密的灌木丛和草丛里，岩悬钩子果实累累，还有美丽的蕨类，据说它们一百年一次在夏至前一天的夜里开花。在园子里和在树林里一样，可以采到蘑菇、浆果、坚果、花楸果和稠李。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大概是童年的环境——先是大森林，后来是迷人的园子——使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感到与大自然交流的需要。克利斯托弗洛夫加的园子是那么令人着迷，我们兄弟姐妹又多，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外出，不需要与其他孩子来往。在森林里的时候，出于无奈而与世隔绝，在克利斯托弗洛夫加，我们同样没有邻居，没有与村里的二十户农民来往。

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奶妈起着巨大的作用。她的容貌，在森林里的那一段，我已记不起来了，搬到克利斯托弗洛夫加之后，则是清晰的。我记得奶妈已经年老，当你问她多大岁数时，她总是说："六十出头啦。"而这"六十出头"好像永远不会到头似的。不论你问多少次，什么时候问，直到她死之前，她都是说"六十出头"。

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后来长大了，中学毕业了，出嫁了，她总是“六十出头”。她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年龄，因此可以认为她确实记不得自己的岁数，要不就是不会数数。

不管怎么说，奶妈还是一个很硬朗、很麻俐的老太婆，不停地为主人干活：做果酱、果汁、果糕，酿啤酒、甜酒，为过冬贮备水果、浆果和蘑菇，钩花边，织袜子——既薄又有花样，任何一个美人见了都会爱不释手。

我现在还记得她微微驼着身子，手里织着一只小袜子的样子。一对淡蓝色的小眼睛，大鼻子上架着一副太大、太难看的铜边眼镜——这眼镜跟她本人一样老。

当俄国开始“文明”（那是从农奴解放时代开始的），并慢慢扩散到各地时，有一次，我们大家一齐劝奶妈出去照张相。她爱旧时代，对一切新事物都抱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们是妖术，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拖到照相馆。在关键的那一刹那，她由于害怕和困惑而瞪大眼睛，紧闭嘴唇，谁见了这张照片都忍不住发笑。

说实在的，奶妈长得并不漂亮，不过她本人可不这么认为，至少不认为年轻时不漂亮。我们稍为长大之后，有时会对她提出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奶妈，你干

吗没出嫁?”奶妈神秘地望着远方，半晌才吐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嗯”字。然后又突然兴奋起来，似乎担心我们会以为她是由于某种不当的原因而当老处女，便说：“我从前可是个美人儿，蓝蓝的眼睛，乌黑的头发，瞧，直到今天还是卷曲的。”接着，她指着自己的腰，“还有胸脯，高高的，”——她一只手比划在离干瘪的胸脯足有半俄尺的地方。最后这个天真的证据是这么有说服力，我们齐声大笑起来，表示同意。奶妈则瞅了我们一眼，半气半嗔地说：“淘气精！”便又埋头织袜子了。但是，不论过去或现在，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她都胜过画上的任何一个美女。

我们常常随随便便地坐在她膝头上，用小手摸她的脖子，搂住她的头，吻遍这张老人的脸——低低的额头，皱巴巴的双颊，没有光采的小眼睛。这是多么愉快的时光啊！

奶妈的声音是很悦耳的。她从不唱歌，至少我不记得她唱过歌。她只讲故事，讲童话。她知道的童话也不多，说实在的，统共只一个，我只记得一个：凶恶的后娘皇后把前妻的儿子变成小山羊，国王不知道这事，吩咐把小山羊杀来下酒，但是王子的妹妹阿列什卡救了哥哥：

“锅里水沸腾，

刀已磨锋利，”
在这紧急关头，她破了妖婆的魔法。

这个故事，奶妈讲得多好啊，非常之好，百听不厌！可能是由于她那老人的嗓音非常真挚和质朴的关系吧。

奶妈还爱讲强盗、逃犯，讲有名的贝科夫干的坏事，讲到处都有的、数不胜数的地下财宝。逃犯和财宝可以说是奶妈的心病，她觉得每座森林、每个峡谷都是他们的隐蔽所和埋藏地。

不过，难道只是故事把我们吸引到奶妈身边吗？她那儿总是为我们准备着好吃的东西：各种甜食，一只珍藏的玻璃缸，里面装着小白乳蘑、黄蘑菇、果子酱；茶炊总是冒着热汽，要是头痛脑热或眼睛不舒服，这里还有悬钩子和薄荷，可以冲来喝…… 此外，还有一只可爱的黄色大箱子，那可是孩子们渴望窥探的宝库，在特别高兴的辰光才让打开。我们看到在箱盖的里面贴着糖纸，那本是我们把糖吃掉后慷慨送给奶妈的，现在重又叫我们感到新奇美丽。箱子里面和过路的匈牙利人的一样，什么都有：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各种花布、呢料，都是外祖父、妈妈和舅舅送给她的，我们都爱听它们的来历；还有各式各样的烟盒、小盒子和其它没有用的废物——孩子们是这么喜欢翻弄它们，只要你准许他们

随便动手的话。

不过这一切全是小事，最主要的是在我们出世以后的头十年里，奶妈是唯一的一个使我们不感到拘束、不打骂我们的人；唯有她一个人尽自己的所能来爱我们，疼我们，而我们也唯有对她一个人能无拘无束地表露我们的爱。

我们的家规很严，非常之严：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冷酷、专制的人，母亲虽然和蔼，但是没有权力，在父亲面前，她不能也不敢疼爱我们、放纵我们，也不敢替我们说话，而无条件服从和强制性的纪律却是父亲的信条。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搬来这套军事作风的，也许是由于他本人就是受的这样的教育，也许是"尼古拉时代"在他的个性和教育观上打下自己的印记，——反正我们可是受罪啦。按时起床、睡觉，衣服老是穿一个样式，就像制服，头发也是固定梳一种发式。不得忘记郑重向父母请安和道别，每顿饭要划十字感谢他们。吃饭时不能讲话，要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候，让大人先吃，不许提要求，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不能多要，不能少要，不能不要；给你多少都得吃下去，不能剩，即使你不爱吃，即使你感到恶心，也得吃完；不能挑肥拣瘦，要从小养成不挑剔的习惯；只喝牛奶不喝茶，只吃黑面包不吃白面包，为的是不使胃变得娇气。要抗冻耐寒……　不经允

许不能乱拿东西，尤其不能动父亲的东西；要是弄坏、打碎了什么东西，或是没把东西放回原处，那父亲就要大发雷霆，闯祸者要受处罚：站墙角，给揪耳朵或者挨鞭子——那鞭子就挂在父亲的书房里，随时可用。父亲惩罚起来是很残酷无情的。在对我的弟弟们执刑之后，沉闷的低气压笼罩全家。任何一件小事都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事都不许瞒着父亲，这是一条家规，要求我们绝对的诚实，母亲带头做出榜样；她明知我们的某一过失会有什么后果，她的心在滴血，但我们的行为没有一点能躲过父亲的严惩。甚至对火、开水不小心，也要受到严惩。如果手给烫了，孩子们淘气，做游戏时跌倒，碰破皮肉了，那么，除了自然的惩罚——疼痛之外，还得受父亲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惩罚。诚然，他不打女孩子。有一次，我才六岁时，在暴风雨中乘平底渡船过伏尔加河，我淘气了一阵，父亲打得我差一点没残废。打这以后他就不打女孩子了。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变得轻松：我们怕他甚过怕火，只要他那冷峻、锐利的目光朝你扫一眼，就足以使你浑身发抖，心理上害怕到极点。软心肠的人的任何一种体罚都要比这种目光的无声的惩罚好受。

在这种兵营式的冷酷气氛中，唯一的温暖，唯一的快乐和安慰便是奶妈，在她那儿以外就没有自由，儿童作为未来的一个人的人格就得不到承认，儿童的性情

和要求也得不到理解，儿童的缺点一点也得不到宽容，只是一味的苛责和鞭打。只有在奶妈的房间里——父亲从不到这里来，我们才感到自由自在，才感到自己是人，是孩子，甚至是主人，而且是受人疼爱、娇惯的孩子和主人。这里简直是天堂，是世外桃源。在这里，受到凌辱和欺侮的人可以得到心灵上的休息；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倾吐苦痛和委屈，得到抚爱和同情。孩子们可以把头埋在奶妈的膝头痛哭，她会把你的泪水吻干。一颗慈爱的心！没有她，我们怎么活？这里是一个温暖、柔情、自由、快乐、爱和忠诚的世界。

想到这份情爱和照拂绵续了许多许多年，不是对一代人，而是对三代人的童年，我不由得停下笔来为她祝福。是的，整整三代人！她六岁时给送到外祖父克利斯托弗尔·彼得罗维奇·库普里扬诺夫这里，与其说是为了照料他，不如说是陪他玩——他那时三、四岁。外祖父长大了，奶妈也长大了，他给送去上学，她则学女红和家务。外祖父娶外祖母时，奶妈便送给了新婚夫妇。妈妈出世了，舅舅和三个姨姨相继出世了，他们都是奶妈抚养大的。妈妈长大了，嫁给爸爸，奶妈又随着陪嫁过来。哥哥萨沙出世了，我出世了，还有六个弟弟妹妹——我们八个全是奶妈一手抚养的。要是我有子女，她还会抚养！

古风不是很可敬的吗?奶妈知道自己的价值,对她认为是尊重和荣誉的事，她是非常敏感的。母亲或其他成年人流露出来的不满、投来的一瞥斜眼或无意中的疏忽,都会使她火冒三丈。她开始哭,一直哭到我们发出惊叫。于是她便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什物归拢起来,声称要“到伏尔加河对岸”去。我不知道“伏尔加河对岸”是什么意思。显然,在奶妈的脑海里,这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广大的地域,而是一个确定的地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地点,那儿有她的亲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她是否真有亲人——谁也不知道,她也从没细谈过。细究起来，这一切也许跟神话中的鬼怪差不多,人们对孩子们说:“看，鬼来了!鬼来了……要把你吃掉!”不过,我们倒是害怕起来,我们便到妈妈跟前求她和奶妈讲和,满足她的要求。母亲去了,奶妈的气也就云消雾散了。

一般来说,自从我们长大,我和妹妹上了女子学校之后，奶妈也逐渐地由我们的庇护人变成受我们保护的人了。情况变了,角色随之也变了:父亲在“改革”①的影响下，性情变得温和了。伟大的社会运动使奴隶和主人平等，摧毁了旧制度的一切精神关系和经济关

① 指一八六一年的农奴改革。

系，可能也唤醒了父亲天性中好的一面，他的天性还有可塑性，使他能朝新的方向发展。不管怎么说，父亲精神上的变化是深刻的，在对待仆人、母亲和我们方面，他从一个农奴主义者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从一个乖戾暴躁的人变成一个克制自持的人。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年半载完成的，我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日期。新风是逐渐吹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主要是通过出版物散布到外省的，而我的父亲读了很多书。此外，母亲比父亲小十五岁，她跟父亲结婚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在智力和性格上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到了这时，她通过缓慢的自我发展和读书，在精神方面长大了，在智力上发展了，已经能够不再对父亲百依百顺，反而可以影响父亲了。这种影响是有效的。这时，我们孩子们和她亲近起来，而且在我们成长的关键时期，是接受她的指导的。

这时，不需要奶妈了。但是我们还是热爱她，既由于过去，也由于现在，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有时也能逗她乐，也能保护她了。我们精心照顾她：使她什么也不缺，吃饭时把好菜递给她，平日糕点不断。听说她每月只得到四分之一磅的茶叶和四分之三磅的糖，我们十分不安，由于没法增加，我们便为她而掏空了母亲的糖缸。要是叫我们去贮藏室取东西，我们就乘机把口袋塞满杏

干、葡萄干、扁桃仁，拿给奶妈，而奶妈则认为主人的东西终归还是主人，即我们受用（必要时作些加工），而且以为这些东西不可能是偷来的——怎会偷自家的东西呢——于是便痛快地收下了。奶妈一个月能得一个半卢布（或者照她的算法：三卢布纸币）。一个半卢布！这真不像话！但没法子……母亲是哀求不动的，而我们自己一年才只有四卢布：在圣诞节、复活节、命名日和生日各得一卢布。父亲一般来说是慷慨的，有时甚至有点大手大脚，不过他好像认为有必要教育我们学会精打细算。

我们就这么逐渐长大了，而且一如既往地爱奶妈。再说，我们算什么呢？我们毕竟是年轻人，是孩子……而舅舅，一个调解法官和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分子，奶妈抚养大的人，至今仍然敬重她。舅舅每次到我们家来，临走之前总要说："得去看看奶妈"，于是走上楼去，皮靴在他那笨重的身躯的压迫下嘎吱嘎吱响。舅舅走进奶妈的房间，向她问候之后，沉甸甸地坐到黄箱子上，谈起天气、收成和奶妈的骨痛病；要不就是谈新时代，故意逗她挖苦"新派人士"和时髦风尚或对如今女仆"翘尾巴"的不满。然后，舅舅说："纳塔莉亚·马卡里耶芙娜，可不可以嗅嗅鼻烟？"

没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让奶妈开心了。她的脸顿时开朗起来，她从口袋里掏出银制的鼻烟壶——那是

外祖父送给她的，用两个手指拔出壶盖，递给舅舅。舅舅抓出小小的一撮，神气庄重地时而用左边，时而用右边的鼻孔嗅着，接着发出勇士般的"呵—呵—哧！"接着就有好几只手伴着欢笑声伸向鼻烟壶，我们每个人都抓了一小撮嗅起来，于是响起一片欢乐的、此起彼伏的"呵哧，呵哧……"声，像俗话说的，天花板都要给震坍了。舅舅装出一副喜剧演员的样子，挑起眉毛，打眼镜上面惊讶地望着外甥们，奶妈则盖上烟壶盖，半是疼爱，半是责备地说："一群淘气精！"这之后，舅舅便起身告辞，我们大家也迈着正步走下楼。

我女子学校毕业的第二年，父亲去世。妈妈在省城买下一座房子，搬到那儿住，奶妈和大家一起过去，像过去那样生活，每年回到乡下度夏。后来，我和妹妹到国外留学，弟弟们要上大学，母亲也和他们一起来到彼得堡。他们把奶妈留在乡下，借口说请她照管产业，而实际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不可能在彼得堡也向她提供昔日的方便并每年夏天送她去乡下，再接回来。

奶妈一个人呆在乡下，自然感到寂寞。她感到委屈，也感到无聊，因为她爱我们大家，而且长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没有分离过。可现在，孤零零的一个人…… 奶妈谢世了，也许她已享尽天年，也许她像老而

脆的青苔那样：只要它附在墙上，它就还有生命，尽管墙壁已光秃，似乎已不会供给它什么养分，但若是把它抠下来，那它就会干枯，死去。

奶妈留下来和管家一家人住在厢房里。这位管家是外祖父的农奴中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他的妻子从前也是农奴。他们家口多，奶妈被当作他们的亲戚，也许是因为她是她们的孩子的教母（教母在一般纯朴人的心目中要比我们看来更亲、更可敬），也许是因为他们曾是同一个老爷的农奴。头一个冬天，奶妈就得了感冒，发烧、发炎。我不知道是否给她延医诊治，可能没有。在那儿，去哪里请医生？方圆二十俄里内连一个医士也没有！奶妈病了，可是心里只惦记着我们。她在昏迷中从床上跳起来，快乐地挥舞双手喊着"主人们回来啦！主人们回来啦！"冲到大门口去，光着脚，只穿着一件单衣。人们抓住她，让她躺下，她挣扎着，喊道："你们怎么不去接他们？怎么不出去接他们？难道你们没听见？听呀，铃声！……他们来啦！他们来啦！……"说着又冲出门去，乱跑起来。

她就这样喊着"主人们来啦！他们来啦！"离开了人间。

我从国外回来后就到乡下去看望我一向敬爱的舅舅，也去看了可爱的老家。我和舅妈一起回到老家，当

她跟管家谈事务时，我到屋子里和园子里四处走走。到处空荡荡，一切了无生气。我在一个房间里坐了片刻，地板上一只老鼠匆匆跑过，屋角全是蜘蛛网。园子里的那口池塘，记得从前有一次我出于淘气，也为了让弟弟妹妹们羡慕，坐在大盆里在池塘里荡起来，拿一把铲子当桨。如今池塘里长满杂草，鱼也不见了，妈妈说“因为没人捉”。舅妈催着走，也许是为了减少这座曾经是那么生气勃勃、如今却人去楼空、满目荒凉的房子给我的压抑感吧。我请她顺路到墓地看看，它就在大路边。我走下马车，跳过一道分隔墓地和牧草场(有时在这里放牧牲口)的小沟。父亲的坟上围着铁栅栏，竖着十字架。旁边是姑姑的坟，再过去便是奶奶的坟。坟上长着不高的野草，两三棵小白桦，细柔的树干耀着白光，嫩叶在夕阳中摆动，闪闪烁烁。

在这三座坟中，最亲的是奶奶的坟。

四、我想当皇后

父亲说我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尽管父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可是由于父亲的这句话，来我们家的其他成年人都对我另眼相看：爱抚我，送我小礼物，爱听我胡说八道。这种与成年人的交往，促进

了我的早熟，有时使我对自己和人们对我的态度想入非非。

当我们从“森林”去马马德什的姑姑家做客时，她的朋友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卡特科夫整天陪着我。他同我开玩笑，同我玩，常常管我叫做他的小妻子，而我则叫他小丈夫。后来，我们搬到捷秋希县，我还不满七岁。他寄来一封信，姑姑大声念着。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说他结婚了，我听罢感到自己受到伤害。他怎么敢结婚，他不是管我叫妻子吗?!这是不忠，是对我，一个把他和自己联结在一起的人的莫大侮辱。

我没有大哭大闹，本能告诉我，不能向大人说这个，不能在他们面前袒露自己的感情。为什么不能，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应当沉默，于是便沉默了。

后来在我九岁时，又发生了类似的事。

我们家来了个年轻姑娘——我妈妈的妹妹伊丽莎白·克利斯托弗洛芙娜，当时她刚从喀山的女子学校毕业。从此，驻扎在捷秋希县的那个团的军官们便常来我们家，其中有个叶尔戈利斯基，常跟我在一起，我于是认为我对他拥有特权。但是，儿童警觉的眼睛不久就发现他更注意我那年轻的小姨。我吃醋了。我选择了他和我单独呆在朝花园的一个阳台上的时候，对他噼呖啪啦地斥责起来，像夫妻吵架那样闹了一通。

奇怪的是他认真对待我的发火，不但没有嘲笑我这个小傻瓜，反而安慰我。

如果说有些成年男子由于对我过分关注而助长了我的女性优越感的话，那么，另一些人则无意中怂恿我去追求生活的殊荣。

在这个县离城五俄里的美丽的柳多戈夫卡田庄里住着两个老贵妇，她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彼得堡，只是晚年才回到僻静的县里。她们日夜打牌消遣，一些爱打牌的人便从四面八方凑到这里。两姐妹中小的一个名叫纳塔莉亚·格里戈里耶芙娜·采利舍尔特，她听说家里要送我去彼得堡上斯莫尔女子学校后，每一次见面时都叫我坐在她身边的一张扶手椅里，向我介绍这个学校的情况，谈我未来的命运。她关照我："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得第一名。得了第一名，就会得到皇后赐给的系着绶带的花字奖章。大公爵们和沙皇本人都常到学校来。大家都会注意你，如果你得了花字奖章，就会选你做宫中女官。你将生活在皇宫里，参加宫廷舞会。"

迄今为止，除了森林和乡村，我还什么也不曾见过，我听采利舍尔特的话就像孩子们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

打这以后，我开始幻想更高的东西了。

那些年，母亲还很少给我们朗读东西，不过偶尔念一点。一次，她给我们朗读一本历史书中有关古莫斯科大公（记不得是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还是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故事。母亲读道：到了大公该娶亲的时候，便下谕俄罗斯各地，要贵族们把自己的成年女儿送到莫斯科来。大公将在莫斯科的皇宫里观看所有的姑娘，选最美丽的做妻子。接下去书里描写了围绕着选妃如何搞阴谋诡计：有一个被年轻大公看中的美人，她的辫子给故意扎得太紧，致使她晕倒，“中了邪”，失去做皇后的机会。

我没有区分时代的不同，幻想着“没准沙皇要娶妻时，也会把我送到莫斯科，沙皇可能在众多女郎中选中我。我将要做皇后！……那时奶妈将在我身边，穿银戴金。我浑身上下将缀满红的、绿的宝石。”

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进了斯莫尔女子学校——公认的最高贵的贵族学府，会有什么结果。我没到那儿去，而是进了喀山的罗季奥诺夫女子学校。恰恰在这个时期，该校的教育方针发生了可喜的变革。在这所学校简朴的、近乎修道院的环境里，我那稚气的关于皇宫和凤冠的幻想，不经任何外来的干预，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生活后来以全然特殊的方式实现了我童年

的幻想。诚然，我得到的不是沙皇的国家，但也是一个“王国”。

在席吕塞尔堡的囚徒中，只有两个女囚——我和伏尔铿席泰因。同志们为了减轻生活的重压，亲昵地戏称我们为“女王”，但是我穿的不是镶着银鼠皮的紫袍，而是背上印着黄色方块A的灰囚服。

五、在 家 里

如果撇开上面说的那些影响不说，那我是一个活泼、能干的女孩子，聪明、机灵、淘气、好斗，常常欺负大弟弟和大妹妹。当我死命打架时，人们把我拉开，说：“别打，别打！”我则喊着：“就是要打！”并且气得“在地上打滚”——奶妈这样形容任性的孩子在这种场合乱打乱踢的样子。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父亲眼前，而是在奶妈的房间里。

我不爱玩娃娃，至于读和写，我是在不知不觉中，一面玩一面学会的，究竟什么时候，我自己也说不准。我只记得在克利斯托弗洛夫加，我跪在椅子上，刚够得着桌子，用斗大的印刷字体给留在马马德什县的姑姑写信，这大约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那时我大约刚

满七周岁。

我的母亲在我智力发育的最后阶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我进女子学校之前，她没有什么时间顾及我们小孩子。我想这是她过密的怀孕、生育和哺乳的关系。确实如此。当我小妹奥莉加出世时，我才只十岁，在短短的十年里，这是第六胎。难怪我们只领受到父亲强加给我们的纪律，好在它只涉及生活的表面，我们只在早晚和饭桌上，当不得不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比较强烈地感受到纪律的约束，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们是自由自在的，没人管——只要大恶作剧没暴露。在我们家庭生活里也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人物，他们来了，又走了，但都是我们所不喜欢的。起先是一个德国老头儿乌菲尔斯，不知为什么把他从马马德什请来。后来是一个陪母亲的女伴或女管家，这是个怪人，老是牙痛，她的姓氏让人讨厌：斯温因娜①。最后是一个为了教我们习字而请来的老头儿阿夫托诺姆·雅科夫列维奇。他原是外祖父的农奴，住在克利斯托弗洛夫加的亲戚家里，他和他们只有衣着上不同。我们都不喜欢斯温因娜和阿夫托诺姆·雅科夫列维奇，他们可没少受我们的气，特别是顽皮淘气的尼古拉，他管老头儿叫阿

① 意思是“猪”。

夫托马特·雅科夫列维奇①，他还一个劲儿地模仿老头儿的口头禅"哦，我的上帝啊"，气得老头儿吹胡子瞪眼的。

因此，父母亲对于我们来说是疏远的，他们并没有设法接近我们，在我们与父母之间没有那种给童年涂上异采的亲昵关系，只有奥莉加享受到这种感情，因为父亲死时她才八岁。

但是，我们爱母亲，我和妹妹总是争夺紧靠她身边的位子。当父亲到县里去办事的时候，我们更爱和她一起睡在那张祖父时代的大床上。

跳上铺着熊皮的大床，钻进暖乎乎的被窝里，你会感到多么的温暖和舒适啊。妈妈卧室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个黄色的小神龛，供着圣像，有穿着银色镀金袈裟的耶稣、侍者尼古拉、显灵者谢尔盖和其他圣徒，还有戴着珍珠的圣母。在神龛前，一盏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室内被它那小小的火光照得半明半暗，显得格外的温馨、安静。我们躺在床上，母亲还没来，她正在神龛前做祷告。瞧，她跪下来，两眼望着圣像，口中念念有词，虔诚得近乎狂热地祷告着。

在那遥远的时代，母亲有什么好这么长久而热忱

---

① "阿夫托马特"是"阿夫托诺姆"的谐音，意思是"机器人"。

地祈祷的呢?她的生活平平淡淡，既没有激情的乐事，也没有熬心的忧伤。在穷乡僻壤，没有社交，没有诱惑，也不可能有什么恋情。生活，尤其外省妇女的生活只局限在家务琐事的窄小天地里，看来是没有可能突破这樊笼的。再说，在那个时代，人的内心也不像后来那么复杂、细腻，那样苛求，那样大胆追求。

我们望着神秘地低语的亲爱的身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把祈祷者的动人影像带进了梦乡。

六、教　训

在母亲对我们进行的道德教诲中，除了一贯要求我们诚实之外，我记得还有这么一件事。一天傍晚，母亲特意把我们唤到一个房间去，用动人的声调说："今天有个女孩子要来我们家，和我们一道生活。这孩子非常不幸：你们都会跑会跳，可她在得了寒热病后给锯去双腿，不能像你们那样行走，只能爬。你们可得记住，不许讥笑她。你们自己会看到，她是一个多么善良和聪明的孩子。"

她就是我们的表姐妹，终身残废。

在这之前不久，我出了一件终生感到痛心的事，我管它叫做狮子锁事件。

有一间低矮的大房间，从外祖父时代起就叫做“绣房”，因为这里是农奴姑娘在绣架上刺绣的地方。房间里有一只包着铁皮的大箱子，总是上着锁。箱子里存放着一些不常用的什物：旧桌布、绣花袜（奶奶的作品）、等着派用场的呢绒、绸缎、银器等等。一天，母亲打开箱子整理东西，我和妹妹跟在一旁转，看这看那，摸摸花边和缎带，欣赏银盐瓶和高脚酒杯。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箱子上的那把挂锁。它是美国货，黄铜做的，形状是只狮子，真正的狮子，有尾巴，有鬃毛，靠一块有凹口的铜片锁上。我们轮番玩弄这只狮子，一会儿开，一会儿锁，它真好玩。最后，当母亲要锁箱子时，锁却不灵了。

“谁把锁弄坏的？”——母亲问道。“不是我”，“不是我”，——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母亲还是追问：“那么是谁搞坏的呢？”“锁最后是在莉坚卡① 的手里，”——我说。

母亲没加分析就抓住莉坚卡，打了她。她自然大嚎，我则感到羞愧，不是可怜，是羞愧，确实羞愧。因为锁可能是我弄坏的，可是妹妹却挨了打，因为我说锁最后是在她手里，……

妹妹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件丑事，早忘了，因为当时

① “莉坚卡”是“莉吉亚”的昵称。

我们是五岁、七岁的孩子。但是我却忘不了这件可耻的事，我生平第一件可耻的事。它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七、农 奴 制

在我童年所处的那种环境里，农奴制及其废除，我是不可能理解的，也不可能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它主要反映在家庭关系方面：起先反映在专制的家规上，后来反映在父亲的性情和行为的转变上。

六年的"森林"生活把我们完全置于地主和农民生活之外，有二十户人家的克利斯托弗洛夫加虽然住的是外祖父的农奴，却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可供评判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材料…… 我没听说过农奴制的劳役，没见过迫害，也没听到过告状，在我视野之内，不存在任何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农奴就是家里的人。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母亲向来是亲切和宽容的。她性情温和，品格高尚，她耐心、仁慈，因而总是受到众人的爱戴。至于父亲，他对仆人是暴躁、苛求、专横的，但是他对子女也是这样。有时他对厨子大发雷霆，因为汤盘里掉进苍蝇，或者面包烤坏了。在这种时候，母亲往往不吭声，呆坐在那儿。她在我们在场的

场合，从不劝阻父亲，也不和他争论。在我们面前，他俩从来不吵架。但是，既然父亲咆哮，母亲沉默，那也就不说自明，母亲的沉默就是责备，我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

关于农奴制，我只记得一件重大的事，那是发生在"森林"里。家里的人，从母亲、奶妈到小女奴帕拉莎，个个都心情紧张、害怕。父亲不在家，大家不安地等着他回来。大家说话都很小声，我的小耳朵听到的是他们要在马厩里打普罗科菲。为什么，他们没说，或者说了而我忘了。可能就是那一回：普罗科菲离家出走，三天不见回，院子里那口钟徒然懊丧而长久地响着，召唤他回来。听说他在森林里迷了路，是母牛把他领回来的，那母牛也迷了路，不过它又凭本能找到了路。事实是否真是这样，还是他企图逃跑，成为自由人，因为逃跑不成而回来，我不知道，同时我也不记得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收场的。也许没有进行体罚，因为不可能我记住笼罩全家的那种等待风暴来临的可怕气氛却忘记风暴本身——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也许母亲私下里跟父亲谈过，消释了父亲的怒气。

在我们家里，废除农奴制的标志是多年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女仆杜尼亚莎和卡嘉不愿继续做下去，希望回克利斯托弗洛夫加自己的家去。她们的离

去使母亲很难过。在那里，她们不久就出嫁了。帕拉莎是孤女，仍然留下来。奶妈早就解放了，还是外祖父解放她的，她之继续与我们在一起完全出于爱。

人民生活中的这一伟大的变革及其在精神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影响，不是我这样小小年纪的孩子所能理解的，那是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事。在学校里从来不谈农奴制和农奴解放，也不谈份地和赎回土地的事。

在假期里，我常常看到一群群农民在我们家的走廊里和父亲的书房里，常常听到父亲的大嗓门，那是他作为调解官在给农民办案子，究竟是什么案子，我没问，不感兴趣：在乡下有那么多诱人的事——读书、和奶妈聊天、到林子里去玩、游泳、捉鱼……因为一年里头我们只放六周的假，而日子过得飞快，没等你回头看一眼，就已经把你送回学校了。

父亲在吃饭或夏夜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是不爱谈公务的，只有一次，我已长大，正是父亲敬仰加里波第的品格、欣赏政论家杰梅尔特[①]的文章的时期，他说了一句话使我惊讶难忘："要是农民还没解放，起来造反，我会站在他们前头率领他们……"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会使说话的人承担什么责

①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杰梅尔特（一八三五——一八七六）：俄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任，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理解。

不管怎么说，正如后来我从旁人那里知道的，父亲作为调解官是诚实对待农民的利益的，他竭力劝他们不要做诸如领取免费的“叫化子地”这种不合算的交易。尽管如此，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克利斯托弗洛夫加还是被白给白拿所诱惑，后来他们十分后悔。因此，父亲谈起“暴乱者”就很气愤。那些人要人民相信宣言所宣布的那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转到农民手中，不必赎买，才是真正的“自由”。父亲认为在废除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时，这样做是有损农民的切身利益的，而且会延缓二月十九日宣言所规划的土地改革进程。

八、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

记述我的童年时代，不能不谈到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面典型，它教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应当做什么。

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驯悍记》里讽刺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我们的远房亲戚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巴扎诺娃也可以作为类似喜剧的素材，她是不可多得的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的活典型。她和老母亲住在喀山，靠抚恤金度日——她母亲是教授的遗孀，因而

才有抚恤金。抚恤金数量有限，为了生存，还得挣钱，老妇人便教音乐，织袜子和花边拿去卖。女儿则整天看小说、弹钢琴。她喜欢音乐，琴弹得蛮好，我母亲和所有熟人都劝她收学生，以减轻老母亲的负担，并且告诉她收入将是不错的。可是白搭！她无论如何不肯教课，她说："这是对艺术的亵渎。"

她们有两间房，伊丽莎白把两间都占了，把母亲赶到过厅里，在屏风后面搭张床。抚恤金和母亲挣来的钱，她全拿走；家里要是有好吃的，她全吃掉。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她们家去时，看到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喝茶加鲜奶油，却没给老母亲喝。当时我非常吃惊。

妈妈告诉我们，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她们家的老女仆染上伤寒。伊丽莎白不管病人，一早就出门办自己的事去了，整天不在家，把厨娘一个人锁在家里。当她晚上回来时，厨娘已经病危，伊丽莎白雇来一辆马车，让病人自己爬上去，把她送到医院去，她就死在那里。

母亲却邀请这个可怕的女人夏天来做客。于是我们便天天亲眼目睹她的肆无忌惮的自私行为，对她抱着儿童的那种不折不扣的憎恶态度。她的脸长得相当漂亮，她和母亲同龄，个子非常高——全喀山最高的女人，非常胖，体重不多不少，正好八普特①，单是她这副

① 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千克。

硕大无朋的身躯就足以使我们退避三舍。与她的个头相匹配的是那副雷鸣般的大嗓门，而且她还动不动就大嚷大叫，一点也不顾惜别人的耳朵。在克利斯托弗洛夫加，后来在尼基佛洛沃，她总是满屋乱嚷，从来不看看是否有人在睡觉，从来不管她是否打搅了别人。她一来到就吵吵闹闹，挑最舒适、最安静的房间住，然后占客厅里最软的安乐椅、挑靠近窗口最凉快的地方坐。吃饭时，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像老鹰扑小鸡那样专挑盘子里最大块、最好吃的东西吃。坐车外出游玩时，她挑最舒适的位子坐，而且一人占两个人的位子。两个淘气的弟弟，特别是柯里亚[1]，认为给伊丽莎白找点别扭是莫大的快乐：他们特意坐在她喜欢坐的安乐椅里，或是当马车快到台阶时飞跑上马车，使胖子无法坐在她喜欢的地方。那时就会听见她大喊："卡坚卡！[2]喂，卡坚卡！"——她在喊我们的妈妈来解围。母亲来了，赶走捣蛋的男孩子，以她通常的谦恭恢复了秩序。

吃饭时，父亲常常用各种玩笑来激伊丽莎白谈她对人和对生活的看法。她很容易受挑动，大放厥词，大人们听了大笑不已，我们也跟着大笑。总的说来，她的

---

① "柯里亚"是"尼古拉"的昵称。

② "卡坚卡"是"叶卡婕琳娜"的昵称。

待人接物和我们温婉的母亲截然相反，即便母亲在伊丽莎白表现自私自利时也常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们很明白这微笑的含意，我们也受到现身说法的教育，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不应当做哪些事。从这个角度说，伊丽莎白的到来虽然是我们所不欢迎的，但却是有教益的。许多年后我们在谈到童年时代时，还常常回忆起她的一些趣事。

例如，我们回忆起有一次她如何拒绝弟弟的一个天真无邪的要求时，都禁不住大笑起来。在《奶妈》那一节里，我谈到父亲如何给我们立下斯巴达克式的生活制度，比如说，不许我们吃白面包。不过，有一次父母亲都不在家，只剩我们和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喝茶时，她给我们每人一块奶油饼干。彼得吃完自己的那一块后说："亲爱的姨妈，再给我一点饼干。"① 我们的监护人吼道："哟，还馋饼干哪！不吃点黑面包吗？"饼干当然是没给啰。

多少年以后，弟弟们在生活的舞台上已大有成就，已经能够充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了，但是在他们家里，吃饭时还是常说"哟，还馋饼干哪"这句名言，虽然已经无需对什么人吆喝"不吃点黑面包吗"。

---

① 原文是法文。

第 二 章

一、女家庭教师

一八六〇年，我刚八岁，家里就为我们三个大孩子聘请了一位女家庭教师。

母亲带我到斯维雅日斯克，大概是去朝圣。在那儿的一位亲戚家里，我们见识了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鲁斯卡娅的教育成果。尤莲卡，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小姑娘，会弹钢琴，说法语，跳波莱罗舞和卡楚查舞。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使亲戚们不快的是，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要离开他们家，到克利斯托弗洛夫加我们家来。

她二十六岁或多一点，皮肤白净，脸颊绯红，体态丰盈，穿着随便，戴着卷发，一只腿是瘸的，整天和一只黑色狮子狗形影不离，给它剪毛、洗澡、梳毛，在它身上花去不少时间。这使奶妈很生气。女教师就跟在斯维雅日斯克教尤莲卡那样给我们三个大孩子上课：法语、

舞蹈，还教我音乐。对我和莉坚卡来说，跳舞是够受罪的。我们先学“姿势”，费了好大劲才学会第一个“姿势”。为此，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甚至订购了特制的木装置。它由一块木板和两根竖杆组成，木板上刨出脚掌大小的凹槽供脚站，竖杆则供手扶，不扶着这两根木杆就没法站牢，因为要求脚跟对着脚跟，使两只脚掌处在一条线上。不过，舞蹈课还是顺利进行下去。不久，我穿着玫瑰色的绸裙、戴着天鹅绒头饰，莉季亚扮成男孩子，我们已能在捷秋希县外祖父的屋子里当着众多宾客的面跳俄罗斯舞，博得一片赞赏声了。

我很乐意学音乐，因为一般说来，我喜欢学习东西，而且勤勉，我可以一连两个小时练习音阶而不觉得累，但是小手不够弹八度音。为了尽快达到这个目标，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夜里举着蜡烛来到我的床前，拿起我的手抻手指头。我当然给弄醒了，但我听天由命，宁可装出睡着的样子，闭着眼，一动不动，生怕“好梦飞走”。

法语课的情况就糟多了。我们三个人才学了十来个法语单词，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便要求我们彼此之间用法语通话，如果说俄语，她就对我们施以侮辱性的惩罚。她用厚纸板剪了一个大舌头，裱上粉红色的纸，系上一根带子。谁要是讲俄语，就把这个装饰

品挂在他的脖子上。当然，谁也不愿挂它，于是我们便尽量不说话，并且注意地互相监督，以便尽快摘下自己的"红舌头"，挂到别人的脖子上去。

在处罚人方面，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真会别出心裁。例如，谁要是不专心听讲，没学会功课或是淘气，她就给他戴上"傻子帽"。这顶尖头高帽是她用从糖块上揭下来的蓝色厚纸做的。① 不难想像这位教师这一整套处罚办法引起什么后果：我们忍无可忍，我们恨她，奶妈也和我们一样恨她。她想办法使我们摆脱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因为我们自己不敢反抗。奇怪的是，整整一年里，不论母亲或父亲一次也没来学习室看一下，没问起我们的学习情况，当然也就一次也没见到我们挂红舌头或戴高帽了。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倒是对我手下留情：我是老大，又学得好，更主要的是因为在需要展示成绩时，我是一张王牌。我常常发现她对待弟弟和妹妹不公平，对我偏心。但是父亲和母亲是那么难于接近，于是一切只得埋在心里。最后还是奶妈壮起胆子"告了女教师的状"，我们在受她管制一年之后终于解放了。

---

① 从前俄国把白糖做成圆锥形的大糖块，食用时要用锤子敲下来。

二、丽 莎 姨

这时，丽莎姨(我在前面已提到她)从女子学校毕业了，我便受她指导。小姨是典型的旧时代女学生：天真烂漫，没有思想。学校已养成她注意修饰打扮的习惯，给我上课时，她或是对着镜子把她那头浓密的秀发梳成当时时髦的宽宽的样式，或是用一整套工具，如小锉刀、剪子等等，把那双小手的指甲修成扁桃仁形。军官们的来访，跟他们散步，在家里表演戏剧，到捷秋希县野餐，这些活动占去她不少时间。后来她与林务官戈洛夫尼亚订婚了，于是家里为我们从莫斯科聘请来一位新的女家庭教师。这是一位很年轻、爱脸红的姑娘，她刚从莫斯科孤儿学校毕业，名叫薇拉·伊万诺芙娜·马利尼娜。她和蔼可亲，一下子就在我们家里赢得众人的喜爱，她教得很好，为我进喀山的罗季奥诺夫女子中学做了很好的准备。

我考取了公费。照规定我应从初级班，即七年级念起，但是我已十一岁，照我的知识水平，可以念五年级，因此把我破格编入六年级。我在班里立即取得第一名，而且在下一年级即五年级，继续保持这个名次，因为这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

三、女子学校

一八六三年，我进女子学校。告别亲人和乡村，并不使我难过。我们家已搬到尼基佛洛沃，我还不习惯这个地方。我进入女儿国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和纪律严格的新的生活秩序。

我的第一任班级训导员是玛丽亚·斯捷潘诺芙娜·切尔尼亚夫斯卡娅和傅尼耶女士。她们两人极其不同。玛丽亚·斯捷潘诺芙娜是很出色的人。她长得并不漂亮，一张男性的脸，大驼背，但在待人的态度上却很讨人喜欢：低沉圆润的嗓音很能打动人心，一对灰色的眼睛流露着亲切，嘴角常挂着微笑，这一切立即赢得人们的信赖。她是个年轻、面颊红润的栗发女子，相当丰满，有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她的整个人给人以软绵绵和暖乎乎的感觉，她身上有种母性的东西，也许正是这把我们大家都吸引住了。但是，她可不是一个松松垮垮、没有个性的人。如果必要，她在温柔之外也可以表现出强硬，没有这一点，她是不可能受到尊敬的，而我们不仅爱她，也尊敬她。促使我们尊敬她的还有一点：她很有学问，遇到困难，总是可以从她那里得到必要的帮助。在学校里，在这方面没有突出表现的班级训导

员一般是让人瞧不起的。

另一位训导员傅尼耶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出于儿童的恶意，我们私下里都管她叫傅尔卡[①]。这是一个干瘪的老处女，高个子，黑眼睛，一张外国人的脸，焦黄，毫无生气。黑色的头发留着刘海，梳得非常光洁。一双难看的手，细长的手指头，害着关节炎，老是搽着碘酒。她的一切都叫人讨厌。她的嗓音和她这具木乃伊正相配：干巴巴的，没有和音，没有抑扬顿挫，好像不只她的肉体，连她的灵魂都已干瘪了似的，变成了羊皮纸。在这个学究身上，除了形式主义，什么也看不到，也休想看到。在学业上，我们非但没有得到她的帮助，反而受到损失，很大的损失，因为全部课余时间都给她占去搞法语听写。我们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

四、反　抗

傅尼耶的外表和内在素质都使我们无法接受。当我们升到五年级时，便开始想办法撵走她。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相当天真的。有个学生在教室黑板上写了一句简洁的口号："请您离开我们"。我们希望傅尔卡

① 按俄语的习惯，这是"傅尼耶"的蔑称。

看到它，读了它以后会明白这话是对谁说的。但是，她根本就没想到看黑板。

于是，一个女孩——伊孔尼科娃就把这句话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署上“五年级全体学生”，放在傅尔卡旁边的桌子上。在这之前，纸条在全班传阅过，没有一个人反对。但是，小纸条放在桌上很久都没被发现。后来，傅尔卡终于看到了，读了。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谁放的？”她问了两遍，我们都不吱声。于是她走出教室，把纸条拿去给校长看。

校长是苏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梅尔特瓦戈，一个外表严肃、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只看重学生的智力和才能，她上任后，学校的风气完全变了：在她的前任扎戈斯金娜时盛行的那种虚伪的贵族习气一扫而光。扎戈斯金娜对漂亮的姑娘另眼相看，培养一批宠儿，组织一个沙龙，让一些受她宠爱的高年级学生实地学习“高雅的风度”和上流社会的装腔作势。苏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接任校长后，不再崇拜美和美女，学生们不再注意修饰，她们走出校门时和清教徒几乎没什么两样。

苏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满脸通红地走进教室，脑袋由于激动而晃动着。她重新提出傅尼耶的问题：“这

纸条是什么人写的？”我们还是一个劲儿地沉默。后来她问：“你们对什么不满意？”我们这些十二岁的女孩子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不会表达傅尼耶的刻板所造成的压抑感，只会嘟嘟囔囔地说傅尼耶拿听写折磨我们。“谁写的字条？”——梅尔特瓦戈固执地问。

我们本没商量过，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这下子我们自己出丑了。后面几排人里面出现混乱，有人小声说：“说吧！说吧！……”伊孔尼科娃站出来说字条是她写的、她放的。

“我们走吧！”——苏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说罢，把她带走了。

我们吓坏了——会出什么事呢？伊孔尼科娃会被开除！大家都这么想，大家都感到羞愧：让她一个人受苦。

可是事情圆满结束了。一般说来，伊孔尼科娃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她学习并不好。她给拘留在医院里三天，又送回班里，这使我们的良心稍为好过一些。但是，她的操行得零分，其他人得九分——本当得十二分。

我们被告知傅尼耶病了，另一位训导员暂时代替她。后来她给调到初级班——七年级，并且固定在这个年级，而通常班级训导员是跟班上去的，从学生入学

带到毕业。

我在最高班，即“蔚蓝色班”的时候，赶走傅尼耶一事还记忆犹新，“小苗苗们”和我们当年无法忍受傅尼耶一样，打心里恨她，她们来向我们取经，求教怎样甩掉她。

我们笑而不语，保守我们的秘密。

我们摆脱了傅尼耶，这是好事，可是我们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同时也失去了敬爱的玛丽亚·斯捷潘诺芙娜，她被学校解聘了。我们爱她，这就足以使傅尼耶编造说她是我们反抗行动的幕后指使人，尽管她事先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图谋。

五、普·亚·切尔诺乌索娃

在临时代班老师之后，从下一个学年（根据衣服的颜色，称做“绿色班”）开始，我们的班级训导员由安娜·伊万诺芙娜·勃拉维娜和普拉斯科维亚·亚历山大罗芙娜·切尔诺乌索娃担任。她们彼此也和切尔尼亚夫斯卡娅之与傅尼耶一样，很不相同。勃拉维娜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姑娘，高个子，眼睛近视得厉害，淡黄的头发，长得并不漂亮，已经失去青春的光彩。她善良，但不聪明，无主见。她的学识值得怀疑，因此从这方面说，她

在我们心目中没有威信，我们一点也瞧不起她，不听她的话，在课外，如果是她值日，那教室里就是一片嗡嗡声，秩序糟透了。与她相反，比她大几岁的切尔诺乌索娃温文尔雅。她孱弱消瘦，但聪明能干，一头乌发，五官清秀，两只手又瘦又小。她精通几国语言，德语尤其好。除任课教师（都是一些很没天分的人）之外，她也教我们外语，使我们得益匪浅。而上勃拉维娜的课只使我们厌烦。对这两个人，我们一下子就作出自己的评判。切尔诺乌索娃自始至终受到我们充分的尊敬。

从四年级起，我失去第一名的位子。我已习惯于以为自己学习什么都不费劲，因而不再用功学习了，于是我降到第三名，下一年甚至降到第四名。后来，当我十五岁时，我突然醒悟过来：离毕业只剩两年了，如果我还这样不用功，那就得不到花字奖章。那时我已经不想当宫廷女官了。但是，老师们，特别是文学、历史和地理课的老师们是那么夸奖我，使我清楚知道第一名非我莫属，既然花字奖章是授予第一名的，那就应当归我。

不论在家度假时或在学校里，没有任何人开导过我应当用功念书。只有一次，在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俄语得了一分，苏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走到我身边，拉起我的一只手说："你得了一分，那就是说，你生病了。"

于是把我带到医院，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让我卧床休息，看护妇阿诺索娃（她有一只大鼻子，为此我们都不喜欢她）给我病号饭，给我喝椴树花汤，从那时起，我就非常讨厌椴树花。

由于毕业临近，我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状况，下决心用功学习。但是，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切尔诺乌索娃总是压低我的操行分数，而在女子学校里是最重视操行分数的：在最后的两年里，如果不是月月都得十二分，那毕业时就得不到任何奖励，可是我总是得十一分。这是由于我和切尔诺乌索娃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起初，她很欣赏我，甚至显得偏爱，这使我讨厌，因为偏爱我就意味着对其他人不公平，而在家里，由于父母亲对孩子们一碗水端平，培养起了我的平等感情和对平等的需要。当我恶作剧时，总是没事，不受处罚，切尔诺乌索娃会替我辩护："妃格念尔是个活泼的孩子"，"她像水银那样好动"，经她这么一说，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我不仅淘气，而且爱找碴，很容易发现别人的弱点，我嘲弄的牺牲品是我的邻座——善良的鲁达诺夫斯卡娅，她成绩优良，我和她很要好，但是有时我会把她气得眼泪汪汪的。这时，切尔诺乌索娃非但不批评我，反而开导她："唉，有什么好感到委屈的！妃格念尔是个心直口快的孩子，心里怎么想，嘴里就说出来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切尔诺乌索娃之间的良好关系消失了，她开始挑剔我，我们开始发生冲突。在毕业前两年，切尔诺乌索娃毫无缘由地说："妃格念尔是我们的人，也是你们的人。"我非常生气，回敬一句同样无根据和不公正的话："您以小人之心忖君子。"这就彻底砸了锅。她告了状，我由于粗暴无礼而在全体学生面前受到苏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的训斥。

女友们说，切尔诺乌索娃是因为我崇拜(这是学校里的行话)高年级女生奥莉加·西多罗娃而生气吃醋的。这种说法实在可笑，不过从女子学校的风气来看，也许不无道理。西多罗娃是我父亲的一位同事的女儿，非常漂亮，记忆力好得惊人。她的学习非常优秀，但是，尽管她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却从来没得过头奖。学校领导对她印象不好，因为全校就她一人接触了新思想。她读过皮萨列夫的许多文章(而我们却没有一个人听到过这个名字)，对博物学极感兴趣。皮萨列夫死后她说，他不是偶然死的，是政府因为他的文章而把他溺死的。假期里，她读《钟声》①，她说那是她父亲收到的，藏在床垫底下；还说她在做忏悔时坦白告诉神父说她不信上帝——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

---

① 一份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加廖夫在伦敦、日内瓦编辑、出版的政治杂志。

西多罗娃比我高两班，她对我谈过赫尔岑、皮萨列夫和政府，这超出我的理解力，一点也没触动我，没引起我的兴趣。但是，我喜欢黄昏时和她一起在走廊里散步，喜欢讨好她，欣赏她。凡是她留意的人，我都嫉妒，因此我对西多罗娃本人干了许多蠢事，带给她许多不愉快。但是，在我和她的关系中也自有严肃的感情，有对她那出类拔萃的人格的崇拜。她毕业离校后，我们曾通信来往了两年，也许她无人可以谈心，因此在信里对我详细披露了她的生活秘事。她想学习，喜欢研究自然，可是父母却把她拖进上流社会的生活。她对周围的环境不满，但在萨马拉的舞会上却出尽了风头，她不能也没下决心与家庭决裂，另建自己的生活。在众多追求者中有一个热姆丘日尼科夫，我不知道是诗人本人，还是他的兄弟。她一点也不喜欢他，但还是同意嫁给他。

但是，婚事没办成：西多罗娃在一次舞会上着了凉，可能是故意的，得了肺炎，死了。这时她才只有十九岁。她写给我的信和照片在我被关押在席吕塞尔堡期间在乡下丢失了。

不管怎么说，由于我喜欢西多罗娃或者由于其它缘故，反正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切尔诺乌索娃常和我争吵。后来有一天，她非常突然地请我到她那儿，对我

说："我已经没精力与你争夺对班级的影响，我累了，我们和平相处吧。"这话令我吃惊得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争夺，而且是争夺对班级的影响！然而，这话却是聪明而坚强的切尔诺乌索娃对我说的——和她相比，我还只是一个毛丫头！

在这次解释之后，切尔诺乌索娃改正了我以前所有的分数，而且这以后总是给我打十二分，虽然我的行为还和过去一样。我执行了自己的决定，在最后两年里注意学习，再次取得第一名，在毕业时得到了我童年曾经梦想得到的金质花字奖章。

但是，在讨论给奖问题的会上，切尔诺乌索娃坚持把奖章授予克罗特科娃而不是我，不过老师们都为我辩护。克罗特科娃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文静的好姑娘，她的姓正合她的性格①。

六、总　结

学校的六年给了我什么呢？文明的仪表，还有就是和在一切封闭式的学校里一样，与许多地位平等的人共同生活，培育了我的同志感和对同志感的需要，而正

---

① "克罗特科娃"意译是"温顺的女子"。

规的学习和严格的作息制度则培养了一定的纪律性。如果说在进学校之前我已喜欢学习，那么在学校里更养成我脑力工作的习惯。但是就学习科学知识而言，特别是在智力发展上，这几年不仅收获甚小，甚至可以说阻滞了我的精神发展，更不用说人为地与生活和世人隔绝所造成的危害了。

总的说来，学校的师资队伍是不尽人意的。最好的要算是神学院教授波尔菲里耶夫，他教授俄罗斯语言和外国文学。他的文学课很精彩，但只讲到四十年代为止。在俄罗斯文学方面，没有对我们讲别林斯基，更不用说后来的评论家了，甚至也不谈现代小说家。关于屠格涅夫，我们是从他的短篇小说《木木》知道的，那是有一次做作品分析时发给我们的。

在历史方面，同一所神学院的教授兹纳缅斯基整整一年间，向我们灌枯燥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波斯、巴比伦历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则采用伊洛瓦伊斯基写的课本。

在高年级，地理老师克尼泽是位好老师，其他的就不值一提了，仅举一例就够说明问题了：教我们动物学和植物学的老师列万多夫斯基没给我们看过骨头架子，或是某种动物的标本，或是某种植物。我们一次也没用过显微镜，对细胞和组织，我们一点概念也没有。

切尔尼亚夫斯基和萨波日尼科夫——前者教物理学，后者教矿物学——本可以教给我们一点东西的，但是在一个学年里，他们每周只有一节课，课时少得可笑。

可是书法折磨了我们整整四年，绘画学了七年，可是从没一个人表现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天才迹象。我们不敬重绘画老师，他不善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他的课上，没有一个人作过一张画，但个个都得十二分。

歌咏课和钢琴课不是必修的，要上这种课必须另外交费。因此，是否学习取决于家长。

在课堂学习之后，每天晚上要对第二天的功课进行预习，一些人在做笔记上，另一些人在抄笔记上花去不少时间。除了伊洛瓦伊斯基的课本之外，根本没有课本，我们是通过教师的口授学习的。怎么学呢？两、三个学习最好的学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用种种缩写记录下教师所讲的。然后我们坐下来对比几份记录，补上漏掉的，猜测只写了一两个字母的缩写词的意思，紧张地回忆着，想象着，编出完整的课文，其他女孩子则应当把它转抄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此外，神父给了一厚册《天祭》和一册《基督教的义务》，我们也得抄下来。

历史、俄国文学、外国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

学、矿物学、教育学，统统都是手抄的，而且大部分是学生自己编纂而成的。

不难想象，这些完全不必要的抄写工作给我们造成多么沉重的负担。我们只有在两次课间休息(一次一小时，另一次二小时)时才能喘口气。说实在的，我们连淘气的时间都没有。

夏天，我们有时在校园里散步。校园里有一条老椴树林荫道和峡谷——我们都怕往谷底看。冬天，每天带我们到户外一两次：我们没有暖和的冬衣，只穿薄薄的棉大衣。如果不算一周一小时的舞蹈课，我们完全没有体育锻炼，一个个都身体脆弱，脸色苍白。

但是，既然学校不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发育，那还谈得上什么道德教育和为生活作准备吗？这方面的教育一点也没进行。我们没听到任何有关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和对祖国的责任的教导，从来没有人对我们提起这些。

学校不鼓励看书，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读书的必要性。在我们班里，除了我和三、四个女孩，人人手里捧的除了笔记本还是笔记本。

晚上，当例行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便偷偷打开托书架的盖板看起来：书藏在那下面，为的是不让班级训导员看到。

我不以此为满足，连夜里也看书，这在全校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是不许自备蜡烛的。在宽大的寝室里点着一盏可怜巴巴的小夜明灯——插在盛有水的高脚铜盏里的一根小蜡烛。但是在高级班学生睡的那个房间的一角，有一张小桌，供着耶稣像。我们虔诚地在桌前点了一盏神灯，我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油，要是钱不够了，我就用蓖麻油代替。

夜里值班的是一个非常爱发脾气的干瘪小老太婆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戴着黑色包发帽，穿着黑袍子，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五官端正的脸上还留着昔日秀美的余韵。也不知她是为青春时代的罪过祈求宽恕呢，还是生来就是笃信上帝的，反正她一小时一小时地在放着她的值班床的房间里祈祷。我利用这个爱发脾气的小老太婆的崇敬精神，走到小桌前，跪下来看书。

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不时停下祷告，过来巡视各个寝室。我一听到她猫一样轻的脚步声，便开始跪拜，只要我感觉到她还站在我背后，我就不停地跪拜。她站了一会儿，看出我一时不会停下来，便走开了。于是我又接着看书——刚才书给藏在桌子底下了。

我看的大多是英国小说，那是我的好朋友鲁达诺夫斯卡娅和克罗特科娃提供的，她们的家就在喀山，那些书是从亲友处借来的。

学校里也有图书馆，但那里面的书我们连看也不曾看过：它们都锁在书橱里，钥匙归督察员科瓦利斯基保管，他是大学里的系主任，很少到我们女子学校来。只有一次，切尔诺乌索娃给了我一本从这个书库借来的别林斯基的著作。但是，我一点也不习惯于啃严肃的著作，何况收入这一卷里的是论戏剧、论莫恰洛夫扮演哈姆雷特的论文，而我直到毕业也不曾去过剧院。文章引不起我的兴趣，自是不足为怪的。我只读小说，在学校的六年里，除了别林斯基的这一卷著作之外，我没碰过一本严肃的论著。

七、文学的影响

我在这几年里的智力发展，应归功于读书。假期里，我在母亲的指导下专心读书。但是在乡下，我整天读的也和学校里的一样，全是小说——长篇、中篇、短篇，不过都是刊载在当时大型刊物上的优秀作品①。母亲没有向我推荐严肃的论著，因此，我的阅读是片面的，它只对感情起作用。最后两年，这样的读书机会也

① 一次，母亲说某一中篇不要读，不值一读，这反而引起我的兴趣，我偷偷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读了。果然是一篇空洞无物的东西。我为自己不相信妈妈的看法而感到惭愧。——作者

没有了——高年级学生不放假，怕她们受到不良影响。

十二岁时，母亲给我一本小书看，那是早被人忘掉、而且本来也不出名的作家费奥克蒂斯特·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意志的病》。我读过之后感到困惑不解：作家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书名？为什么作家把主人公追求真理、厌恶虚伪，致使他痛苦、不幸、疏离了朋友、亲人甚至钟爱的姑娘的行为叫做“病”呢？我向母亲说出自己的疑惑。母亲解释说，当然应当说真话，并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也不能像小说里那个年轻人那样严厉对待有悖于真诚的事，如果有人说了点假话，做了点假事，无伤大雅，那也不能和他断绝关系，否则自己就会孤立，就会像托尔斯泰的那个不幸的主人公那样不幸。母亲说，他的过分求真已具有病态。这个解释败坏了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悻悻地走开了。

一年以后，舅舅库普里扬诺夫准许我把两厚本杂志带到学校去，那里面刊载了施皮尔哈根[1]的小说，而且是《寡不敌众》。这部小说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很能了解书中人物的性格和作品对社会的描写：西尔维亚和莱奥的高尚的追求和莱奥寻求支持的那个资产

① 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一八二九——一九一一）：德国作家。

阶级环境的虚伪。没有一部小说像这一部这样开阔了我的眼界。它把两个阵营作了强烈的对照：在一个阵营里有崇高的目标、斗争和痛苦，在另一个阵营里有的是自负、空虚和生活的浮华。十三岁时所作的评价是如此正确，多年后我重读此书时也没感到必须改变这个看法。

一个人的性格通常是在他人、书籍和周围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不过有时也有这种情况：这些因素中的某一个在心灵中刨开一个深槽，放下新性格的奠基石。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一块奠基石是涅克拉索夫的《萨莎》——波尔菲里耶夫发给我们做作品分析练习的。

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聪明、有教养、见过世面的阿加林从京都来到偏僻的乡村。在他的田庄上的一位邻居的宗法制家庭里，他遇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他开始开导她，谈社会任务，谈为人民谋幸福，他说得很多，很动人。在他的说教下，萨莎的心里萌发了理想主义的意向和需求。但是过了一年还是两年，当他们重逢时，她不能不对导师感到失望。萨莎在智力上和精神上已经充分发展，在她眼前，阿加林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一个空谈家，他“周游天下，想给自己

寻找伟大的事业”，他只会说漂亮话，对现实生活却毫无贡献。萨莎看到她的英雄言行不一，她在失望之余离开了这个唤醒她的才智、被她当作理想人物膜拜的人。

我思索着这首长诗。在我十五年的生命中还从来不曾这么认真地思索过。

长诗教导我应当怎样生活，应当追求什么。言行一致——这就是长诗教给我的，对自己，对别人都应当这样要求。这成为我终生的座右铭。

第 三 章

一、环　境

一八六九年，我从女子中学毕业。我长成了一个活泼、快乐、淘气的姑娘，外表上看似文弱，实际上身心都很健康。六年的遁世生活并没有使我憔悴，但是，我对生活和人的认识，却全是从所读的小说里得来的。现实生活被挡在学校的院墙之外，而在我和妹妹回来度假的尼基佛洛沃的家里，除了家里人，我们没见到外人。只有一次，即我毕业前两年最后一次回家度假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来看我父亲，其中一个是喀山大学博物学系的学生。他们在我们家住了四天。那个大学生很健谈，他谈到太阳、月亮、星星，批评了女子学校的教育，他否认有宗教奇迹，嘲笑宗教。他从随身带来的杜勃罗留波夫的书里给我念了两篇论文，一篇叫《卡武尔伯爵和加瓦奇神父》，一篇是分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的文章——《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可是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我一个也没读过。这次会见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有这么一次会见罢了。

我的父母常年住在乡下，我在女校毕业后也来到这个前几年只在假期才回来的环境里。乡村宁静、纯朴和安定的环境有助于进行认真的思考。

还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我感激我的聪明能干的训导员切尔诺乌索娃说了一句永远镌刻在我脑海里、对我一生起了巨大作用的话。有一次，她不是对我，而是在训斥一个懒惰的女生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以为出了校门就不必学习了吗？不！学无止境。一辈子，直到进棺材都得学习。"这句话虽是老生常谈，我当时可是第一次听说。它使我深思，往我的心田投进一束光。我忘不了这几句无意中听到的话。

但是，我首先得感激我的母亲，是她让我一毕业就开始脑力劳动。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并未受过教育，但是她通过自修达到高度的精神发展，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她让我读当时最好的杂志《祖国纪事》，在她的藏书室里，我找到《现代人》，在舅舅那儿，我看到了《俄罗斯言论》、《言论》和《事业》等杂志①。

① 《祖国纪事》：俄国文学政治杂志，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都曾领导过该刊。一八三九年创刊，一八八四年被政府

我周围的环境和前几年的一样。可以说，我们没有相识的地主，县里根本没有在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上与我相当的青年，与我们经常来往的只有两家亲戚：舅舅彼·克·库普里扬诺夫和舅妈，以及戈洛夫尼亚夫妇。就这些。但是，应当公正地说，这些人——一共四个，要比县里的市侩层高出一头，他们是"思考着的现实主义者"（那时的政治词汇里还没有这个术语），用比较后来的术语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派，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曾从他们口中听到一句有关这一学说的话，他们从来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学说最著名的创始人傅立叶、圣西门的名字。我甚至不知道斐·拉萨尔的名字，虽然他的光辉的活动在六十年代的德国得到那么热烈的反响。当我来到国外，第一次听到有关这位工人领袖的谈话时，竟然把拉萨尔和拉普拉斯这两个名字混为

查封。

《现代人》：俄国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创办，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都曾参与领导和撰稿工作，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喉舌。一八六六年被政府取缔。

《俄罗斯言论》：一八五九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进步文学政治杂志，一八六六年为政府查封。

《言论》：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科学、文学和政治杂志，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一年在彼得堡出版。皮萨列夫、柯罗连科、安东诺维奇都曾为它撰稿。

《事业》：俄国进步的科学文学杂志，一八六六年创刊，一八八三年后成为温和的自由派的杂志。

一谈了①。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不敢请人解释。我的亲戚们也不是共和主义者，尽管他们赞扬瑞士和北美合众国的政体，还向我推荐了狄克逊②的两本书：《瑞士与瑞士人》、《美国与美国人》，我津津有味地读完这两本书，但是如何在俄国实现这种制度，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而我则由于对政治不开窍，也没产生过这个问题。

他们是皮萨列夫的崇拜者，在各门科学中特别推崇博物学。我照他们的指导，读了达尔文、莱尔、刘易斯、福格特③的论著和皮萨列夫的通俗文章(尽管由于根底浅，许多地方看不懂)。

舅舅和戈洛夫尼亚没有宗教、社会和等级的偏见，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赞成实行全民普及教育，主张人人劳动，人人自食其力，主张男女平等，主张简朴的生活方式。舅舅是所有人中最有教养、最开明的一个，常常取笑我身上的金银首饰和时髦的衣裙："薇罗奇卡④，

---

① 斐迪南·拉萨尔(一八二五——一八六四)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彼尔·西蒙·拉普拉斯(一七四九——一八二七)是法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 威廉·赫普沃思·狄克逊是英国政论作家。

③ 查尔斯·莱尔是英国地质学家，刘易斯是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达尔文主义生理学家，卡尔·福格特是德国自然科学家。

④ "薇罗奇卡"是"薇拉"的昵称。

让我们来估量一下有几普特铁锈作了耳环挂在你的耳朵上？啊，原来有五十普特！”或者：“有几普特燕麦变成这块布披在你身上？”等等，等等。亲人们以为学校已养成我追求上流社会的衣饰和财富的虚荣心，因此常常说我大概想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儿。显然他们起初对我这个人的评价并不怎么好。例如，有一次我听到一段对我不甚赞许的谈话，使我很是伤心。夏季某天，我夜里醒来，家人都睡了，只有两个亲戚坐在阳台上聊天，一个是母亲的小妹瓦莲卡（她不久去世了），一个是喀山来的表姐，谈的是我和莉坚卡。瓦莲卡谈到我的妹妹：“莉坚卡会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会有出息。薇罗奇卡是个漂亮的洋娃娃，好像挂在她房间犄角里的那个红灯笼，外表好看，但朝墙的那一面却是空的。”我把头埋在枕头里，伤心地哭了。我泪流满面，问自己：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好人呢？——当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他的那句名言“做个好人是可耻的”① 都还未问世。

我看杂志时，从不放过母亲和舅舅向我推荐的

---

① 俄国作家列·安德烈耶夫（一八七一——一九一九）的中篇小说《黑暗》是一九〇七年出版的，书中主人公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世界上有那么多“罪人”的时候，做个“圣者”是可耻的。薇·妃格念尔这里是讥讽地借用这句话。

杰梅尔特、沙什科夫、波尔奇加洛夫、舍尔古诺夫[1]等人写的东西。舅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崇拜者，但是他很少让我读皮萨列夫的著述，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东西，我干脆看不懂。

库普里扬诺夫舅舅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在地方自治局以及一班县和省的议员中颇为突出；作为一个调解法官，他受到普遍的尊敬。由于他的关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各种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为自己，为家庭，还应当为社会，这一思想受到我们的重视。在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的头脑里还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它还是一块处女地，一块可以培育出尊重科学和知识、热心公益和社会活动等品质的土壤。

这些品质果然从我的亲人们有意无意中播下的种子里发育起来了。

---

① 谢拉菲姆·谢拉菲莫维奇·沙什科夫（一八四一——一八八二）：俄国民主主义政论家，多次受政府迫害。

维尼阿明·奥西波维奇·波尔奇加洛夫（一八三五——一八六九）：俄国医生、政论家，参加过革命活动。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舍尔古诺夫（一八二四——一八九一）：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社会活动家。

二、生活的教育

当戈洛夫尼亚家横遭飞祸、根本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时，我才十二岁，念五年级。梅切斯拉夫·费利齐安诺维奇·戈洛夫尼亚是波兰人，生活在俄国，在俄国受教育，但他的亲人——母亲、姐妹和一个弟弟是波兰王国的地主，住在华沙。他们因参加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的起义而被捕，巨大的产业被充公。后来他们被发配到俄国内地的一个省份。当这一切在华沙进行时，宪兵们也想到梅切斯拉夫·费利齐安诺维奇。当时他已从林务学校(即后来的林业专科学校)毕业，在捷秋希县担任林务官，娶了我的姨姨伊丽莎白·克利斯托弗洛芙娜·库普里扬诺娃。他们在离克利斯托弗洛夫加两俄里的祖巴列夫卡村筑了一个安乐窝(这里是一个相识的地主的美丽的庄园，地主本人常年住在彼得堡)。看来他们会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但是，有天黑夜，突然来了一群宪兵，抄走了信件，逮捕了戈洛夫尼亚，把他带去喀山。这样的事，在我们乡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它引起强烈的反响。伊丽莎白姨当时正怀第一胎，自然非常悲痛。戈洛夫尼亚在要塞里给拘留了大约三个月，后来获释，但是被革了职，而且不许

再担任公职或社会职务。年青夫妇的处境极为艰难。梅切斯拉夫·费利齐安诺维奇本是个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人，而伊丽莎白姨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受到扎戈斯金娜任职时的女校校风的熏陶，爱修饰打扮，不知人情世故，因为她甚至连假期也没离开学校。苦难的日子降临了，生活毫无着落，挣钱的门路全给堵死了，一切习惯，整个生活，不得不彻底改变。是捷秋希县的大富豪和守财奴卡尔·伊凡诺维奇·克莱梅尔把他们从绝境中救出来的。关于克莱梅尔的吝啬，有许多笑话传说。在农奴制改革之前，他是县医生。妈妈说，他是靠招募新兵发财的：体格检查时，一些想逃避被剃头的人在接受口腔检查时，嘴里含着金币送给他。克莱梅尔老头是外祖父的至交，看着我母亲长大，如今便来帮助她的妹妹了。起先，他聘请戈洛夫尼亚做他的一处离我家四十俄里的田庄的管事，后来又以分期付款的优惠条件让戈洛夫尼亚买下它。戈洛夫尼亚毅然扔下一切老爷派头，坚强地着手工作。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种植园主"——我女校毕业后这么开玩笑地称呼他。他穿着一身帆布工作服，脸孔晒得黧黑，夏天整天泡在大田里、牧场上、茬地上、割草场上，冬天则在干草棚、磨棚的机器旁忙碌。我的姨姨从前是个多愁善感、不会做粗活的娇小姐，腰"细得跟黄蜂的一般"。现在则

从早到晚在厨房里操劳，照料奶牛和孩子，变成一个什么都能做的家庭主妇了。我亲眼看到他们精神面貌的突变，这对我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这么勇敢地告别往日的舒适和习惯，不怨天尤人，过起简朴的劳动生活，凡是知道他们的过去的人，都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

那时候，我多次到卡尔加拉他们家做客，在这家可爱的人家里，在劳动、友爱和生气勃勃的气氛中生活，对我真是一种享受。

他们总是给我以温暖和柔情。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小屋的窗旁，沐浴在我的第十八个春天的灿烂阳光下。梅切斯拉夫·费利齐安诺维奇走到我身边，望着我的脸，朗诵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诗："为什么这么热切地望着大路？"接下去："吹毛求疵的丈夫会打你，婆婆会虐待你"，——他好像在预告我会出嫁，警告我会为孩子和家务所拖累，免不了一般妇女的厄运。我脑子里已有所思想，但不想说出，只是意味深长地挺直身子，暗自说道："不，我决不掉进日常琐事的泥坑。"

也是在这个觉醒的时期，我开始对波兰、对她的独立和自由产生同情。县自治局医生中有一个波兰人斯文季茨基，他医术高明，达观，爱交际，相当聪明。他常来我们家，有时是作为医生，有时则带着年轻的妻子

(也是波兰人)，作为朋友来的。在晚上开始打牌之前，常常会谈起波兰，谈到那儿正在发生的事情，谈到对起义的镇压和迫害。斯文季茨基从口袋里拿出刽子手穆拉维约夫[1]的像——他给画成一只发狂的狗；而戈洛夫尼亚则把穿着民族服装的妹妹们的照片拿给大家看。大家还把捷秋希县的宪兵队军官洛季取笑了一通。这个家伙在我们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偷看、偷听，四处搜寻“波兰鬼”和“波兰阴谋”。晚上，妈妈到露台上仔细观察花园里黑暗的灌木丛，做手势告诉大家，她看到躲在树丛中的洛季。斯文季茨基深情地朗诵拉斯托普钦娜的诗《包办婚姻》，诗里，波兰被强迫与俄国结合，她愤怒地说：“我受污辱，受欺凌……我被出卖了，我被出卖了……我是囚徒，不是妻子！”

三、情　　绪

我毕业后才几个月，便开始对我们这种安静的、没有目的的乡村生活感到不满了。我反复思考着我该做什么？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上舞台，当演员？或者去当

①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一七九六——一八六六）：沙皇俄国的国务活动家，因其残酷镇压人民，史称“刽子手穆拉维约夫”。

教师？前者有点渺茫，后者我一点也不适合，从妹妹叶夫金尼亚准备进女子中学、我教她功课的过程中，使我对这一点确信不移。

在那个时代，女子受高等教育还是一件新鲜事，不过苏斯洛娃已经在苏黎世获得医学博士的文凭。《事业》杂志报导的这则消息给我指明了方向。

促使我想学习，以便做一名乡村医生的既不是对人民的使命感，也不是一个悔过的贵族的良心发现。所有这一类的思想都是后来在文学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当时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情绪。

旺盛的生命力在我身上奔突，使我躁动不安，在脱离学校的禁锢之后，自由解放的快乐处处都想表现出来。正是初次踏入生活的这种过剩的、快乐的情绪，才是我的利他主义志向的真正源泉。激昂的心绪要求行动，那种不能让人表现自我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

我把自己和所有的女友作了一番比较，我认为（不管这看法对还是不对）自己是特别幸福的，内外条件都非常优越；我觉得我是所有人中最受大家宠爱的一个，这使我深受感动，引发了我感激的柔情，虽然还不清楚要感激谁。感激什么人呢？感激爱我而又不嫉妒我的女友们？感激维护我得第一名的老师们？感激在斯巴达克式的童年之后处处体贴、关心这个刚毕业的女

学生的父亲和母亲？感激给大地染上金色的太阳？感激在黑暗的花园上空眨眼的星星？……都不是。这是一股浩茫的感激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是对一切的一切。

为了世界的幸福，为了生活的幸福，我想报答。我要做好事，要做能使你、也使别人变得更好更好的好事。

在奥热日科[①]的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圣母站在教堂的尖顶，双手伸向人间，这双手伸向不幸的人们流不完的泪水中，从手里洒下金线，照亮着、温暖着一切需要爱和怜悯的人。

莫非这里描写的就是每一个怀着快乐的预感进入生活的健康、年轻的心所怀有的幸福情绪？

莫非每一个人都体验过这样一个时期：不是由于空想，不是出于自责，而纯然出于一种不由自主的愿望，想站在教堂的尖顶向四周洒下善的金线，但愿周围的一切与你和谐相处……但愿一切都健康、快乐、美丽和坚强？……

可是周围却是乡村。肮脏、贫穷、疾病、愚昧。

现在，一根金线从苏斯洛娃手里伸到我这里，又继

① 伊丽莎·奥热日科（一八四二——一九一〇）：波兰女作家。

续往下，伸到农村，伸到农村居民中，以后还要伸得更远——伸到人民中，伸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伸向全人类。

除了情绪之外，还有金玉良言。我从舅舅那儿第一次听到功利主义理论，他还给我看一篇有关的文章。舅舅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当成为一个人的生活目的。"我接受了这个看法。我的头脑还没装进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怀疑，它对舅舅的话没有任何异议，相反地，我立即觉得功利主义学说显然是真理：舅舅只是把我已深信不移的东西表达出来罢了。应当说，我认为不实践自己所认定的真理是不可思议的。对我来说，真理、理想和责任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任何真理，既然我承认它是真理，那么对我的意志就具有强制的性质，这是性格的逻辑。

所有这些情绪和影响，必然要求冲破局限在家庭小天地里的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不能无所事事地生活，不能没有远大崇高的目标。

报导苏斯洛娃的事迹的那本杂志决定了我的未来，她走的道路也成了我向往的道路。我开始设法进大学——国外的，喀山的，哪儿的都行，只要能够学习，能成为医生，把我的知识作为与疾病、贫穷和愚昧作斗争的武器带到农村就行。

我央求父亲放我到国外去，他不同意。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父母害怕新鲜事物，害怕把女儿放到生活的海洋中去。这事可是非同小可，父母想象着离开家门的孩子会遇到种种危险。

我有一点是可以自慰的。有一次，我向父亲撒娇，问他：

“也许您认为我不会达到目的，认为我力量不足吧？”

他说：

“不。我知道，要是你动手做一件事，那就一定会把它做成。”

我不知道父亲的这种信心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只知道，从自我肯定这个意义来说，父亲的这种信心给了我巨大的力量。父亲郑重说出的这句话对我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它坚定了我的意志。

对我的个性形成有着更大意义的一件小事是后来发生的，不过也是在我从女校毕业的那一年。

我必须对重要的生活问题作出决定。父亲病了。那是个夜晚。他坐在扶手椅里，我跪倚在他身边。

我叙说着，请他出主意。

父亲转过脸，忧郁地说：

“不知道。”

我站了起来。

“我干吗要说？我干吗要说出来呢？”——我这样想。我为袒露了自己的心事而非常羞赧。

于是，在我心里非常清楚而深刻地镂刻下一个思想：“重大的决定应当由自己亲自来作出。”

这一刻，我的思想定型了。

四、没有上大学，反而出入舞会

我一心想上大学，而父母却带我去喀山，好像是为了用上流社会的娱乐来引诱我，考验我的坚定性似的。他们是开明的人，但也谨守自己那一阶层的惯例：如果家里有年轻姑娘，那得带她到社交界去——去看看人，也让人看看她。

父亲在县里有一个好朋友——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菲利波夫老头，一个地主，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个调解官。他一年到头独自一人住在乡下，他的妻子为了孩子们的教育而呆在喀山，他们在喀山市中心有一座很好的大房子，位于当时存在的黑湖湖畔。菲利波夫听说我们要到喀山去，便向父亲提议住到他们家里。我们在十二月里动身，接受了他们一家的美意。这样，在喀山，我认识了他们的长子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

并且天天见面。他是法学士，当时在法院里当侦查员。在去剧院看戏（在这之前我还从未去过剧院）、参加贵族家庭舞会和去商人俱乐部的时候，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自然便成为我的固定的伴侣和骑士。

我为第一次参加大型舞会而作的准备，不能说是愉快的。我站在窗间大镜前，笼罩在煤气灯的白雾中，头发梳成一绺一绺的，穿着白鞋。这时我可没少使性子，而且很符合"跺脚姑娘"的绰号（这个绰号是后来"萨什卡工程师"——费多尔·尤哥夫斯基送给我的。这个尤哥夫斯基就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和一批同志在赫尔松金库下挖了一条地道，盗走一百五十万卢布的那个人）。

当我来到宽敞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的时候，那儿已经有几十对漂亮的舞伴在乐队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了。他们全是我不认识的、陌生的，我感到自己是这么孤单，简直要大哭起来。但是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给我介绍了几个年轻人，他们立即围住我，我也在跳舞的人群里旋转起来，迅速忘掉恐惧和寂寞。在后来的舞会上，我已经比较大胆，而且开始有点喜欢社交娱乐了。

不过，我们在喀山呆的时间并不长，当我们回到乡下之后，令人头昏目眩的狂态也迅速收敛了——它来

得快，去得也快。

不久，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从喀山调到捷秋希县，以便能常和我们在一起。他赞成我的观点，支持我的计划，我们一起看书，在我上大学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在尼基佛洛夫加的一个乡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几个星期之后，我父亲去世。接着，母亲带两个小女儿去喀山，我的两个弟弟——彼得和尼古拉在那儿上中学。妹妹莉吉亚已从女子学校毕业。我和阿列克谢住在尼基佛洛夫加，因为我们一点也不喜欢县城。

我的生活在出嫁之后并没有改变，上大学已是决定了的事，问题在于钱，要过一年或一年半才能筹足到苏黎世的费用。

多亏了切尔诺乌索娃，使我的德语学得相当不错。母亲在我毕业后立即为我从喀山借来席勒和歌德的作品。现在，我在作上大学的准备时，继续提高德语水平，在阿列克谢的辅导下学几何（我在学校里学得不好）和代数（学校里根本没教）。同时，我劝阿·维辞去公职，和我一道去瑞士。当时我就已确信，犯罪是由贫穷和愚昧引起的，我还认为侦查员是个可憎的角色。好几次我在房间里听到隔壁房间的审问。一方是竭力

搪塞、逃避，一方则多方设圈套，诱使对方上当。这种审问使我深感愤慨。我建议阿·维也像我一样去当个医生或是在地方自治局选个差事干。我准备忍受贫穷和匮乏，只要他丢掉这份可憎的公职。我对地方自治局的活动有自己的看法，与我所见到的周围的那些自治局工作人员的官方态度不同。我幻想着为农民盖起粮仓、宽敞明亮的校舍、设备完善的医院和其它种种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设施。我终于说服了阿·维辞职，和我一起到国外去学医。

在这一时期，亲人们和朋友们与我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支持我的计划，衷心祝愿我成功。但是，我已长大成人，已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曾经在某一方面帮助我成长的人了。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即将进行。沃尔孔斯基公爵想作县自治局主席的候选人。此人倒不笨，但很懒，他曾经恬不知耻地说过，他之所以出来做事，只是为了俸禄，还说，放猪或是当调解法官，对他来说都一样。我的舅舅知道沃尔孔斯基不是恰当的人选，十分愤慨。我期待着舅舅会站出来，自荐当候选人。可是他没这样做。我只能伤心地作这样的解释：当主席就得搬到城里住，就会破坏村居生活，影响田庄的经营。此外，我还听说，死去的瓦莲卡姨姨的丈夫，他本是个大学生，因为参加为悼念在别兹德诺被杀害的农

民而举行的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了，可是他自己却迫害农民：在他的田庄上，对踏坏麦苗的农民处以惊人的罚款。我是一个要求前后一贯、言行一致的人。

我们的出国之行拖延下来了。在筹集四年的大学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决定到喀山去，和女校毕业的妹妹莉吉亚一起设法进喀山大学。

五、受业于列斯加弗特教授

我照着舅舅的指点，先去拜见彼得罗夫教授。舅舅说他支持女子受高等教育。但是，彼得罗夫是个病理学家，他说应当从另一头开始学习，让我去找化学教授马尔科夫尼科夫和解剖学教授列斯加弗特。

马尔科夫尼科夫是个圆滚滚的、好心肠的人。他好心地听完我们的话，好心地同意给我们提供实验室的位子，不过要在学生们不使用实验室的时候使用。至于听课，这个问题暂搁一下，他认为我们得先从做实验开始。他领我们到放着试剂的小柜前，建议我们买一本缅舒特金写的分析化学。办完这些，他认为已对我们好心关照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妹妹捧来指定的书，立即开始笨拙而又毫无意义地忙碌起来。我们取来某种东西，加

进某种东西，煮沸、蒸馏……却什么也不明白！神奇的科学，它揭示了许多世界之谜！美妙的科学，跟魔幻的童话一样！它把一切简化为种种机械性的操作，可是这些操作的意义及其间的联系，我们一点儿也不明白。

马尔科夫尼科夫一次也没走过来问问我们在做什么，一次指导也没作过……他也不关心我们对化学有没有一般的认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工作的无效本该叫我们灰心丧气的，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出我们做得不对。但是年轻的乡巴佬仍然耐心地加热、蒸馏，耐心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奇迹终于出现，光明突然照进黑暗王国，我们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但是，光明没有到来，我们始终没有开窍……

于是我们去敲叩另一座圣殿——解剖所。它是校园里的一座独立建筑物，这里的主人是彼得·弗兰采维奇·列斯加弗特。

我们走上楼梯，进入一间摆着许多桌子的大厅，一些桌子上放着尸体——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青年的；一些桌子上放着人的肢体——手、脚，等等。一些神色严肃的年轻人默默站在桌边，或者弯腰坐着，手里拿着解剖刀，大家都穿着白色围裙，干净利索、全神贯注地工作，谁也没看我们一眼。有一个高个子的消瘦

的姑娘，她皮肤微黑，脸孔并不漂亮，有点男子气，看来是个助教。其余的都是学生，个个都忙着做切片。

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恶臭。那时还没有用福尔马林来消毒尸体。在标本制作室里，人们是在恶劣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工作的。

对裸体的尸体和臭味，我们是做了思想准备的。我们等待着这个，并且事先打定主意不要给吓倒，不要听任坏印象摆布。我们经住了考验。

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教授本人，一个个子不高、面目清秀的黑发男子，约摸三十二—三十四岁，一张略瘦而严肃的脸，一对暗色的眼睛。他皱着眉头打量我们，好像要估量一下我们是否会有出息。

他当下就痛快地答应我们来听他的课，好像他已认识我们一百年似的。第二天上午，又答应给我们准备解剖标本。

彼得·弗兰采维奇领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它就在标本制作室的隔壁，十分简陋，没有什么陈设，是真正的解剖学家的工作室：几张桌子，靠墙放着几个架子——这就是全部家具。架子上放着装有酒精标本的玻璃缸，桌子上有一架显微镜和一只大培养箱，下面亮着一只灯泡。在培养箱里有包着棉花的鸡蛋。彼得·弗兰采维奇对我们说，他每隔一定时间把鸡蛋逐一拿

出来，在显微镜下观察鸡的胚胎的各个发展阶段，他还指出这种观察对研究人的发育史的意义。他要我们好好看架子上装有各种胚胎的玻璃缸。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各种哺乳动物的胚胎，看到鳃弓，还有使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人的胚胎上的小尾巴和许许多多其它东西。看来，彼得·弗兰采维奇对胚胎学非常感兴趣。那时，这门科学本身也还处于胚胎状态，大学里使用的唯一的教材是著名的克利克尔写的。①

彼得·弗兰采维奇这么平易近人，我们一下子就不感到拘束了，而周围又是那么浓厚的工作气氛，使我们当下就产生一种庄严的感觉，意识到科学的大门打开了，这是一个人踏上为遥远的生活理想而认真劳动的道路的一刻。

第二天上午，那位长得像男子的姑娘给了我们一套工具和一具猫的尸体，我们得做出猫的骨架标本。必须有方法有步骤地取下软组织，注意观察肌肉、神经和血管的位置。我们系上围裙，严肃认真而又战战兢兢地（可别搞坏什么东西啊！）开始工作。

---

① 指德国生物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阿尔贝特·克利克尔（一八一七——一九〇五）写的、供大学生和医生使用的《人和高等动物发育史》。

我们也开始去听课，通常彼得·弗兰采维奇是从自己的办公室走进教室的，我们则跟在他后面。解剖所的一间大教室里坐满男青年，而下面，在教授的右边，摆着两张凳子，那是给我们预备的。

我们全神贯注地听彼得·弗兰采维奇的讲课，那些医科大学生，我一眼也没望，连一张脸孔也没记住。但是他们却很注意我们，对他们来说，妇女的出现可是一件新鲜事。七年后，我来到萨马拉的自治局工作时，那里的医生立即认出我就是一八七一年在彼得·弗兰采维奇课堂上旁听的女生之一。这个回忆使我们成了朋友。

彼得·弗兰采维奇的人格魅力是惊人的。他讲授的是骨骼学。有什么会比这门学科更枯燥呢？可是，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而坐满人的教室仍然一动不动，兴致盎然地听讲，好像在听非常重要的报告似的。彼得·弗兰采维奇有迫使人听他说话的天才。大家都觉得，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重要的、必要的，一个字也不能放过，为了将来，全都得牢牢记住，今生今世永记不忘。大家都觉得，眼前是一位专家内行，他正在给医学教育打基础，这个基础在听课者脑海中的牢固程度，决定着他做一个医生或科学工作者的整个未来。

彼得·弗兰采维奇深受学生们的敬爱。在标本制

作室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在家里聚会的时候，都在大量谈论他。他是一年级学生的中心人物——既是他们的严师，又是他们的宠儿。人们告诉我们，彼得·弗兰采维奇是彼得堡医科大学格鲁贝尔教授的得意门生，而格鲁贝尔本人则是希尔特尔①的高足，当时的俄国大学生和医生，哪一个不知道这几个闪光的名字？谁不知道格鲁贝尔这位出类拔萃的人？他在当局面前毫无惧色，坚定勇敢，在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时，他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在学生面前，他又是一个严格的、不讲情面的教师，他要求他们在学习上一丝不苟，他谆谆教导他们：认真严肃地对待科学、对待自己的专业乃是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责任、义务。

彼得·弗兰采维奇也是这种品格的人，他有独立的性格，热爱自己的科学，对学生的学业抓得很紧。他，既刚且柔，既严肃又平易近人……和他初次接触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人，他既是一个优秀的人，又是一个好教师，这两者的奇妙结合造成他的魅力，使他成为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涯的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楷模和崇拜的理想人物。

---

① 约瑟夫·希尔特尔（一八一一——一八九四）：著名的奥地利解剖学家。

对于任何一个开始学习和开始生活的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与人类优秀的典范相识。之所以幸福，是因为这是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的最强大的有利因素之一。学生们在大学的门槛上，在生活的门槛上找到了这个幸福，遇见了这样的典范。我亲身体验到这一点——但我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周围的气氛洋溢着他的影响，他的关系，而且后来他的学生莫不异口同声承认这一点。

彼得·弗兰采维奇对自己这门科学的炽热而执着的爱，自然而然地传染给他的学生。要知道，他们是学生，而不是听众。学生们一走进解剖大厅，便忘却外面的世界，导师控制了他，用自己的韧性和对事业的爱，顽强地、锲而不舍地把他塑造成和自己一样的人。

“不可做一个有愧于自己的导师的学生”——这样一个念头在每个人的心里不知不觉地产生、发展、牢牢地确立下来。

既然老师提到颞颥骨的骨质部分的细小沟纹，既然他提到有一条神经穿过的小沟纹，那么，难道可以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未来的医生，尤其是外科大夫无关紧要吗？不！既然列斯加弗特提到了，既然他要求了，那就是有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都要印在脑海里；每一句有关组织与机能的关系的话，都是一

个启示；每一句有关发育史的话，都是投射进意识的黑暗王国的一道光……

正当我们摸到知识的源头，正当我们把握到认识自然现象的钥匙之际，我们的学业却突然无端被粗暴地打断了。

一天上午，当我和妹妹来到解剖所，走进标本制作室时，我们大吃一惊：桌子上没有尸体，屋子里没有学生，列斯加弗特也不在……

我们被告知：根据从彼得堡电报发来的沙皇的命令，列斯加弗特被解除教授头衔，永远不许执教。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消息真是可怕，荒谬。

后来，一些与列斯加弗特特别接近的学生告诉我们：部分教授不喜欢彼得·弗兰采维奇的鲠直、敏锐，打了小报告，说他对青年学生起着有害的影响。

这些学生还告诉我们，其他一些教授——马尔科夫尼科夫、戈卢别夫、科瓦列夫斯基对彼得·弗兰采维奇的被逐感到愤慨，纷纷放弃自己的教席，拂袖而去，到其它大学去了。还说，一些学生，虽然为数不多，也不想继续留在喀山大学，他们将去彼得堡——被驱逐的列斯加弗特要到那里去。

当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不理解这件事与整个国

家制度的关系，我主要气愤那些告密者和诽谤者。

我很难过，因为我的计划被破坏了，我的学习被打断了。我担心将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当下便决定不再在俄国争取什么了，立刻到国外去，那儿不会受到干扰，可以安安稳稳地学习，完成学业。

我们为彼得·弗兰采维奇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到他家去看望他。那儿一切都给翻得底朝天。家具、器皿都卖掉，生活整个儿给毁了。彼得·弗兰采维奇和他的妻子和一个年纪还小的儿子断了生活来源，而且将来也没有着落。一切全给打碎了，必须在新的地方重建生活。一个教师，却失去了教室，失去了他赖以生活的气氛，失去了做他喜欢做的工作的可能性。

……他看起来很平静，和往常一样说话微带讥讽，我们没听到一句平庸的话，他非常镇定，极其有分寸。对所发生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提，我们也没问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学生那儿打听到一切。我和妹妹从拍卖的东西里各买了一只茶杯留作纪念，我们送给他一张特意为他而照的照片——我们两人站在小桌旁做解剖。

我长久保存着这只白茶杯。在席吕塞尔堡，当我的关押生活即将结束时，有一次，宪兵给了我一只与这一只完全相同的茶杯。我高兴极了，它使我回忆起喀山

的彼得·弗兰采维奇。①

在彼得·弗兰采维奇离开之后，我们继续呆在喀山已毫无意义了。我又回到乡下，回捷秋希县。一八七二年春，我们三个人(妹妹莉吉亚和我们一道走)离开尼基佛洛沃去苏黎世。新的天地，广阔而遥远的天地吸引着我们……

① 在我从席吕塞尔堡出来之后，一九〇七年，我有幸再度会见彼得·弗兰采维奇。——作者

第 四 章

一、在 苏 黎 世

来到苏黎世之后，我只有一个念头：专心致志学医。我怀着景仰的心情跨进大学的校门。两年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两年里我听到的都是：要实现这个志愿必须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忘我的勤奋。我才十九岁，但我想摒弃一切哪怕最无害的享受和娱乐，为的是不浪费宝贵的时间，哪怕一分一秒。我兴致勃勃地听课、读书、做实验。这种热情，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不曾有一丝半点的衰减。

起初，我们没有朋友，后来来了两三个人，他们属于后来称之为“安分守己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保守阵营”。他们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但是，莉吉亚妹妹在解剖学课上认识了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亚历山大罗娃，通过她接触了一伙大学生，他们比我们早来，已尝到生活的甜酸苦辣。他们之中有柳巴托维奇两姐

妹、巴尔金娜、卡明斯卡娅等人。不久，她和她们就很要好，甚至搬到她们那幢房子一起住。一个春季学期、整个夏天、半个秋季学期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把我们拖出离群索居的状态。这事与我们在其中订阅书刊的俄国图书馆有关。

俄国图书馆是一八七三年之前由流亡者米·彼·萨任①和首批来到苏黎世的女大学生创办的，在我和妹妹来此时，另有一些流亡者加入，如斯米尔诺夫、拉利和埃尔斯尼茨。它收藏三种语文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一般问题的书籍和俄国人在国外出版的全部刊物（«钟声»、«北极星»②等等），以及有关工人问题的小册子；在阅览室里可以读到所有的俄国杂志、报纸，以及所有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报刊。比较少的是文艺小说和教科书。我们后来了解到，这不是无意识的。它的创办者抱有教育目的，因此在选择书报时有所侧重。图书馆不应成为专业学习的辅助场所，而应促

---

①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萨任（一八四五——一九三四）：巴枯宁主义者，参加过巴黎公社。一八七七年被判服苦役，流放西伯利亚。一九〇〇年以后从事文学活动。他是薇拉·妃格念尔的妹妹叶夫金尼亚的丈夫。

② «北极星»是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加廖夫在伦敦、日内瓦编辑出版的文学和政治文集。

进一般的发展，尤其应当用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读者。为保证贯彻这一宗旨，图书馆的管理和领导集中在一帮已经完全定型的人的手里，新成员也是由他们遴选的，其他人可以付款借书，但对图书馆的管理没有发言权，他们称为“读者”，以区别于“馆员”——图书馆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随着大学生的大量到来，“馆员”和“读者”的比例日益失调，在一八七二年年底，两者相差非常之大。对这种状况的不满，看来早已有之，现在终于爆发出来了。“读者”要求权利平等，由少数人来监护一百多人是不可容忍的。人们开始集会、辩论，决定要斗争，必要时全体退出，另外办一个共有的、人人平等的图书馆。“读者”的最后通牒未被“馆员”接受，于是一百二十人签名退出图书馆，在群情激昂中开会讨论按新原则筹办新图书馆问题。书和钱纷纷捐献出来。不到一个月，新图书馆开放了，不久差不多就超过了对手。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决定开办小饭馆，设立困难救济基金，后来又想买一幢房子，把新开办的社会机构集中在一幢房子里。房子也真买了——采取集资和债务让渡的办法买的。后来又办起了俱乐部，出现了创办两个作坊——木工作坊和装钉作坊的计划，考虑成立一个为经济困难者找工作的小组，提出了就某

些问题举办演讲会的建议。当时刚从俄国来的拉夫罗夫[1] 做了几次关于斯拉夫人参与思想史的报告。

在全体大会上提出把分散在欧洲各大学的俄国青年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互助联合会，通力实现共同的任务，主要的一条任务是为祖国的幸福而全面发挥自己的力量。

二、妇 女 协 会

这一时期的一段有趣的插曲是组织妇女协会。

在上矿物学课时，坐在我旁边的巴尔金娜对我说："今晚八点请到帕尔门戈弗来。女生要在那儿开会。"

当我按时赶到时，那儿已经有五十来个人。会议在医生的妻子、女大学生埃梅的主持下开始。

这次会议的发起人艾德尔森——一个风度优雅的年轻妇女致词说："我们开这个会是为了讨论成立妇女协会的事。协会的目的应当是学会逻辑地说话。妇女

---

① 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一八二五——九〇〇)：民粹主义思想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一八六八——八六九年间发表的《历史书简》是"到民间去"运动的号召书。一八七〇年后侨居国外，参加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事件后成为民意党国外代表。

一般都不在集会上发言，她们怕难为情。虽然她们的知识并不比男子少，但是不会运用，不敢说话，一味沉默。有一些男子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像个老练的演说家。其实一切全在实践。如果我们妇女自己在一起开会，那很快就可以学会驾驭语言的艺术。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只有妇女参加的协会，我们将在会上做专题学术报告，演讲，讨论各种问题。没有男子在场，我们每个人就能自由讲话，不怕出丑，不怕批评或讥笑。”

一些高年级的女生反对这个排除男子的主意。她们认为排除男子是可笑的，并且指出成立清一色的团体，其会议将是没有趣味的。但是较年轻的女生赞成纯妇女的组织，由于我们人数多，艾德尔森的建议获得通过，妇女协会成立了，简短的章程也订出来了。

第一场专题报告是由艾德尔森本人做的。使听众大为惊讶的是年纪轻轻、一点也不该想到死的她，做的竟是关于自杀问题的报告。报告人断言，任何一个自杀者都是精神病患者，一个正常的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自己下毒手的。

这个题目引起热烈的讨论。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报告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她们问道：什么样的叫做正常人？什么样的叫做不正常？两者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再说，是否存在着完全正常的人？大多数人对此表示

怀疑。

大厅里就听见“正常的”、“不正常的”……我们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谁也没能说服谁，但是我们分手时都很友好。

下一个专题报告是瓦丽亚·亚历山大罗娃①做的，内容是评论斯捷潘·拉辛。她只是平平淡淡地复述科斯托马罗夫的文章②，没有什么趣味，对这位下层自由逃民领袖的赞扬没有引起什么分歧，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英雄。

我们协会的第三次集会开得极为热烈。会上讨论的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在社会革命时如何对待现代文明和文化？它们在过去给了人类的大多数——劳动群众什么？现在又给了什么？这个文明和文化是必须予以摧毁还是保留？

一些人受让-雅克·卢梭，特别是巴枯宁的思想的影响，坚决主张文明应予摧毁，因为千百年来它只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是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在摧毁现存制度的同时也让它见鬼去吧，人类不会因此而毁灭，在

---

① 后来随夫改姓纳坦森。——作者

② 指H·H·科斯托马罗夫的著作《斯坚卡·拉辛的暴动》，是第一部论述一六六七——六七一年由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的书，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废墟上将长出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将如鲜花怒放，它将不再是一小撮寄生虫的禁脔，而是所有劳动者的财富。而现有的文化、科学和艺术财富是用劳动者的白骨和鲜血创造出来的。

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这种看法，主张维护人类用惨重的牺牲获得的成果，应当摧毁的不是文明，而是那个使一切成果只供社会上层分子享受的经济制度。她们说："我们将致力于推翻现代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将享受现在只供特权阶级享受的一切。"

争论进行得非常之激烈，大家都没有照正常的方式讨论，而是一齐说话。分成两派，一派极力主张摧毁文明，一派极力主张维护。喧闹声、叫喊声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纵然埃梅一直摇铃，谁也不听铃声；大家都想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有一个人竟因为激动而流鼻血，就是这样也没能制止住我们。最后，主席拚命地摇铃，这才使众人静下来。埃梅站起来，极富感情地说："女士们！请想想吧，你们在做什么呀？……全欧洲都在注视着你们！……"她这话很像当年拿破仑在埃及金字塔下发出的号召①，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会场

① 拿破仑在一七九八年率领三万五千军队远征埃及。在决战前夕，拿破仑跃马阵前，指着远处高耸的金字塔，号召全军说："士兵们！今

情绪一下子和缓下来。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继续从会场的各个角落传来，但已没有先前那种挖苦味道了。疲倦使这次为时很长的会议结束了，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大家走在街上仍然在争论，在沉入睡乡的苏黎世寂静的街区上空，还长久地回响着“摧毁！”“保留！”的喊声……

这次会议的混乱秩序引起人们的讥笑，也给那些主张吸收男子参加协会的人提供了口实，她们重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其他人也坚持己见，于是那些人宣布要退出协会。这无异于分裂，它预告了我们的创举即将夭折。

果不其然，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全体大会。这样，妇女协会在存在五、六周后悄悄消亡了，谁也没注意到这事。

三、“弗　里　契”

在从前那个图书馆里经常进行种种募捐：为罢工工人，为公社社员，为俄国流亡者，为西班牙革命②，等

天，四千个年头正从这些金字塔顶注视着你们！……”拿破仑的这句话从此流传下来。

② 一八六八年西班牙开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到了一八七二年推翻了伊萨贝拉二世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等，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新来者出了钱，却不太清楚是为什么出的。由于经常募捐，最后终于产生了要求做解释的问题。在阅览厅的墙上常常看到工人集会的布告、为工人做报告的布告等，只有瞎子和聋子才不会为这些布告所吸引，于是开始去参加工人的集会，参加为庆祝巴黎公社而举行的宴会，参加瑞士工人协会和国际[1]支部的集会。从理论上及其表现在工人组织的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的兴趣，达到非常强烈的程度。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成立了种种小组，其中之一叫做弗里契小组，这个名称是取自它的大部分成员所居住的那幢房子的女房东的名字。参加这个小组的共有十二人，全是女性，后来大多数都在“五十人案”中被判刑。小组提出如下任务：1）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从托马斯·莫尔到当代的发展，这里面包括傅立叶、圣西门、卡贝[2]、路易·布朗[3]、蒲鲁东、拉萨尔；2）研究政治经济学；3）研究人民运动和革命；4）了解西欧工人问题的实际处理，研究英国的工联、研究国际的历史和斐迪

---

① 指第一国际。

② 艾蒂安·卡贝（一七八八——一八五六）：法国政论家，“和平共产主义”的思想家。

③ 路易·布朗（一八一一——一八八二）：法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南·拉萨尔创建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历史等。

为实现这一计划，需用两年时间进行系统的阅读和学习，对这些问题的认真态度由此可见。

这个时期，社会活动和大量追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挤掉专业学习，科学、文学和生活和谐相处、相得益彰。我们非常重视解剖学课，特别是在解剖所的实验课。弗雷教授的动物学课也引起我们巨大的兴趣，这位教授对女生们在组织学课（也是由他讲授的）上的实验才能，赞不绝口。当然，我们从不放过生理学课，那是由著名的格尔曼教授讲授的，他可是长期反对苏黎世大学招收女生的。只有化学和矿物学教授的课堂是空的，因为他们讲得既枯燥，又比书本上所写的还少。但是，化学实验室却人满为患。总的来说，女生比男生用功。

正在苏黎世的生活热火朝天的当儿，一八七三年夏，俄国政府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女生离开苏黎世大学，如有违抗者不准参加俄国国内的考试。这道突如其来的命令使大家十分惊讶。命令里提出的理由是她们热衷社会主义思想，此外还有一条，说什么俄国妇女在学科学的借口下出国，以便恣意享受“恋爱自由”的快乐。这是对全体妇女的莫大侮辱，是无耻的诽谤，它使一些外国人开始把我们看成轻浮女子。

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女生立即集会。会上有人提议立即起草一份抗议书，抗议诽谤我们的名誉，并在欧洲各家报纸上刊登。遗憾的是意见不统一：保守阵营——高年级生一致反对这个建议，她们决定默认侮辱，如果抗议书刊登出来，她们将联名发表声明，说明她们未参加抗议。因此，这事就告吹了。

在这道命令之后，希望留在国外的人只好钻空子，转到其它大学，因为命令中只提到苏黎世。

从此苏黎世便分化了，一些人由于财力不济而回国，一些人回国是为了把在瑞士接受的思想付诸实践，还有一些人则转到巴黎、伯尔尼和日内瓦。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自从我和丈夫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碰上新问题之后，我们之间便产生分歧。他接近年龄较大的保守的人，而我则接近极端分子。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问题上，我们的分歧都很大。弗里契小组刚成立时，我并没有参加，我很迟才加入她们的读书会。她们没邀请我是因为不喜欢我的丈夫——他看不起她们的学习。她们以为我和他一样。自尊心使我不愿说出真情。直到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偶然逗留在巴尔金娜那里，恰巧这一天要在这里开读书会。当大家陆续到来时，我赶忙站起来要走，但是巴尔金娜婉言留我，我们彼此作了解释。从此

以后，我每会必到。

这一年，我的思想也和别人一样，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当作目标的东西渐渐地变成了手段。在我们的心目中，医生、农学家、技师这类人的活动失去了意义。过去我们想的只是减轻人民的痛苦，而不是从根本上治愈他们。这样的活动是慈善事业，是治标的，好比在衣服上打补钉，然而这件衣服不是该缝缝补补，而是应该扔掉，做新的。我们想的是消除症状，而不是根除病因，不管你怎样给老百姓治病，给他多少药水和药粉，结果只能暂时减轻他的病痛，疾病还是少不了，因为病人的环境、恶劣的衣食住条件，一切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这样做好比松鼠蹬轮子——瞎忙和。曾经被我们看作那么高尚和崇高的目的，如今在我们心目中几乎降低到一无是处的境地。

究竟应往何处看，往何处使劲呢？一个希望满足自己从事社会活动需要的人，应当怎么办呢？新观念告诉我们，现存的经济制度是万恶之源。它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极少数人基于私有制而占有一切生产工具，而其余的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只拥有劳动力。这大多数为饥饿所迫，向前者出卖劳动力，由于竞争的缘故，他们只得到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极小部分，即维持他们本人的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最起码的生活

资料。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其余部分全被生产工具所有者所攫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吞食着富裕的中间阶级，导致资本越来越甚的集中，与此同时，贫困大军日益扩大。在上层一小撮幸运儿享受富足和文明所提供的一切的同时，下层的千百万人却生活在贫困、愚昧、犯罪之中，注定要在体力、心智和道德方面退步。要结束这种可恶的状况，只须做一件事：把生产工具从私有者手中夺过来，转归劳动集体所有。实现这个转变，唯一的途径是斗争，因为养尊处优的阶级是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为了进行这个斗争，必须把与斗争成功最有利害关系的阶级——工人阶级，人民，组织起来。把这个阶级的利益视为全人类的利益的人，应当在人民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组织人民积极斗争，实现这一思想。他们应当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这个事业。

这就是苏黎世生活得出的结论。

一八七三年暑期开始时，大家分手了。妹妹莉吉亚和她的同伴到纳沙特尔州去，我也和她们同行。我们住在纳沙特尔湖畔的小镇卢特里。瑞士的夏夜真是充满诗情画意。一次，我和妹妹在葡萄园里散步，就我们两人，她深情地问我一个问题：我是否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在必要时，我是否能与丈夫断绝一切关系？我是否将为了这个事业而放弃

科学？放弃前程？我热情地作了回答。这之后，我被告知，已经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①，它计划在俄国开展活动。向我宣读了这个组织的章程和纲领，在我表示同意所有各点之后，我被宣布为该组织的成员。当时我二十一岁。

这个最早的章程差不多是国际任何一个支部的章程的翻版，里面一点也没谈到俄国人民的特点和俄国的生活条件，把现成的西欧公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俄国。七十年代初的宣传员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犯同样的错误。西欧工人阶级的任务在于改变现存的经济关系，在于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如此明确地提到无产阶级面前，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经历了斗争、失望和流血的。在一七八九年②，人民把自己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与他们携手，共同推翻了"神授"的君权，确立了人权原则，宣告人权和公民权的胜利，打倒了等级特权制，确立了政治平等。后来，政治平等使大家看清了法律上平等的公民实际上并不平等，社会仍然是一个等级社会，改变的只是等级结构：

① 这个秘密团体成为后来的民粹派组织——全俄社会革命组织（即"莫斯科人小组"）的核心。

② 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

资本贵族取代了血统贵族，革命果实为在那以后掌权的资产阶级所独吞。随着这一真理的逐渐被认识，人民开始明白他们的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是格格不入的，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在没有消灭经济不平等的条件下，政治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工人奴隶般地依附于主人，他的公民权变成了一纸空文。

关系弄清楚了，任务也就简单明了了。当然，这是很大的收获。除此之外，法国大革命确也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给予人民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强大武器，用这武器可以夺取世界。于是，无产阶级发动了他们的争夺战。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在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里都有自己的组织，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组织的大会（一八七三年在日内瓦举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和瑞士的代表，代表着参加这一组织以便与资本剥削作斗争的千千万万工人。向同一目标迈进、捍卫同样的利益的不同民族的代表济济一堂，没有比这样的大会更伟大壮观了）。

我们看到，在西欧，政治自由并没有使人民变得幸福，许多利益还是被人漠视。我们便接受了工人阶级最新探索的成果，完全从经济关系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号召俄国人民起来争取那

些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想改变现存的经济条件，希望消除人民对沙皇制度怀抱的幻想，争取政治制度民主化。我们没有考虑到俄国现存政治制度的高压政策，没有想到这里缺乏通过口头宣传或报刊言论进行活动的任何可能性。尽管当时我们也想到我们会被流放、服苦役，但是对于我们面临的困难、障碍和危险，我们连一点实际的认识也没有。日后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以为无须对人民现有的观念作任何让步妥协，就能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他们。我们以为不仅应当对他们谈集体所有制，还要谈“各尽所能”的集体劳动和“按需分配”的劳动产品的集体消费。简而言之，我们想在人民中造就出西欧那样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为此，当然应当生活在人民之中，可能的话，甚至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合在一起。起初，我们并不认为要使知识分子变成体力劳动者，这种看法是后来才产生的。刚开始，我们只是想摒弃一些十分特权的地位：地主、医生、调解法官等。我所参加的那个团体的纲领概述了这些观点，而且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革命说成似乎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的事。我们这个团体一共只有十二个人，全是女生，但我们知道抱定同样宗旨的小组还有很多，因此我们相信，工作将大规模展开。

这年夏天，《前进》杂志[1] 第一期出版了，它引起了许多争论和问题，有力地开拓了我们的思想。

在被逐出苏黎世之后，我们团体的一个成员叶夫根尼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苏博京娜回俄国，五个人去巴黎（巴尔金娜、亚历山大罗娃、莉吉亚·妃格念尔和苏博京娜的两个妹妹），其余的——柳巴托维奇两姐妹、卡明斯卡娅、我和其他几个人进了伯尔尼大学。

不久，特卡切夫[2] 来到伯尔尼，建议我们小组与俄国国内的"一百个"革命者联合，他说，是他们派他来提这个建议的。

那时，我们以及大多数社会主义青年比较倾向于联盟式的组织原则，在使国际分裂成两派——集中派和联盟派——的争论中，站在巴枯宁一方，我们一般是受巴枯宁个人的品格魅力的影响的。

特卡切夫带来了一个雅各宾式的集中派纲领。他是一个认为为了革命，造谣撞骗亦无妨的人，而我们则最反对涅恰耶夫[3] 的主张，所以在与彼得·尼基季奇·

---

① 由彼·拉·拉夫罗夫主编，一八七四年后在伦敦出版，曾发表过许多革命民粹派的纲领性、理论性文章。

② 彼得·尼基季奇·特卡切夫（一八四四——一八八五）：革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主张用阴谋斗争手段夺取政权。

③ 详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特卡切夫会谈几次之后，我们拒绝了与他们联合的建议。

在此同时，我们在巴黎的人认识了高加索小组的人——贾巴达里、奇科伊泽、齐齐阿诺夫和其他几个人，和他们来往，后来合并为一个组织。不久，妹妹莉吉亚和纳杰日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苏博京娜回俄国去进行活动，其他人又认识了革命者费先科，他把在塞尔维亚的关系转接给他们。那时，我们是从国际的立场看问题的，因此决定务必利用这个关系，派一个成员到塞尔维亚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当地力量的配合下建立社会主义组织。选中我去。这时，我已差不多是自由的了，因为我的丈夫已回俄国去担任喀山区法院书记官。可是我不懂塞尔维亚语，我无法想象在这种条件下我如何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因此一再请求不要派我去。于是便改派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苏博京娜去，后来她从塞尔维亚直接回俄国去了。

到了这一学年末，又有六个人决定放弃学业，回俄国开展活动。我还一直下不了决心效法这些极为真诚的人。尚未斩断的家庭关系和结束学业的希望还在束缚着我。母亲非常惋惜莉吉亚放弃大学学业，所以支持我念完大学。此外，我们团体的那些回国的人想在国内参加产科医师的资格考试，然而我清楚知道她们

并不具备必要的知识。我可不想冒充内行。我想毕业后也和她们一样在乡村当个平凡的医生，用医生的经验和知识来帮助人民。于是我差不多是孤身一人留下来，在伯尔尼又学了一年半。

四、生活的一课

这时，在俄国国内已大举摧残社会主义团体，在西欧不断出现新的流亡组织。假期里，我在日内瓦遇见许多流亡者，有一些是在苏黎世时就已认识的，当时他们和我在一起学习，例如尼古拉·热布尼奥夫和他的妻子。在日内瓦，我认识了丘巴罗夫、尼克、莫洛佐夫、萨布林、苏济洛夫斯基，后来又认识了克列缅茨、克拉夫钦斯基、伊万钦-皮萨列夫、伊万·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皮缅·恩库瓦托夫和其他许多人。除了俄国人之外，我的熟人中还有外国人：巴黎公社社员潘迪和勒-弗朗索瓦、国际杰出的活动家布鲁斯①、汝拉联合会机关报主编纪尧姆。②

① 保尔·路易·布鲁斯（一八四五——一九一二）：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② 詹姆斯·纪尧姆（一八四九——一九一六）：瑞士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巴枯宁最亲密的战友，曾参加第一国际，后被开除。

在伯尔尼，有一些俄国人来拜访过我，由于得到我的同情和帮助，因此，俄国的许多团体在我还没回国之前就已经知道我这个人了。许多人回国是靠我资助的，如丘巴罗夫（后被判处绞刑）和他的一位同志，尼古拉·莫洛佐夫和萨布林（两人在国境上被捕），还有伊万·莫克里耶维奇、恩库瓦托夫和他们的两位同志。此外，我还接济了在柏林和伦敦的一些俄国人。那时候，我自己可以支配一点钱，我把自己的用度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能够多帮助些别人。此外，我还努力唤起别人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请他们捐助。所有这一切使得我小有名气，大约从这时起，在我们的圈子里形成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需要钱，就得找我。我确实一向不能容忍这样的看法，即可以因为该死的阿堵物而耽误好事或有益的事。如果需要一大笔钱，我就千方百计去搞，哪怕在地层深处，我也要把它挖出来。

在日内瓦的年纪较大的流亡分子中有一个涅恰耶夫分子、政论作家特卡切夫和他的妻子杰缅季耶娃，他们在一八七一年一起受审判刑。我们青年一代对涅恰耶夫个人和他招募组织成员的办法持否定态度，我们不能接受他的理论——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而杀害伊万诺夫更使人感到恐怖和厌恶①。对特卡切夫作为一个持有这一同样观点、采取同样方法的革命活动家，

我们的态度也是否定的。但是他是一个快乐有趣的谈伴，很活泼，很平易近人，因此我常常去拜访他。

在女子中学时，我是一个出名的爱开玩笑的人，在苏黎世也是。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多么会作弄人。一八七四年夏，在日内瓦，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上校法列茨基常常到我们中转悠，为了显摆，他逢人便说他到国外来，是为了同拉夫罗夫商谈在俄国国内设立帮助流亡者的救济基金会的事，还说他随身带来了基金会组织章程。到了该回国的时候，上校开始显得不安，不管遇到什么人他都说他担心警察会嗅出他的使命而在国境上逮捕他。我和特卡切夫看出他是胆小鬼之后，便想作弄他。我们写了一封信，通知他正面临危险，准备在穿越国境时把他抓起来，详细情况将由一位女士告诉他，他可以在让-雅克·卢梭岛上会见她，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戴绿色面罩作标志。然后我们到著名文学家尼古拉泽[2]的妹妹、女大学生卡托——一个很机灵的姑娘那儿去，告诉她我们的计谋，请她答应在约定的时间到卢梭岛上去，在那儿的一个约定的地点等法

---

[1] И.И.伊万诺夫是莫斯科农业大学的学生，原是涅恰耶夫小组的成员，因与涅恰耶夫意见不和而被涅恰耶夫杀害。

[2] 尼科·雅科夫列维奇·尼古拉泽（一八四三——一九二八）：格鲁吉亚民主派社会活动家和文学评论家。

列茨基，对他说她的一个在警察局外事处工作的熟人通知她，该局收到密告，据此将在法列茨基回国时把他抓起来。和卡托·尼古拉泽谈妥后，我们便到法列茨基下榻的地方去。他的房间在一楼，我们从窗户里望进去，确信他不在家，便把我们写好的署名“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的信扔进去。

后来，一切都很顺当。法列茨基回来，看到信，心绪不宁地来到秘密会见地点。卡托把他骗得深信不疑。上校绝望了，他跑到所有相识的人家里诉说自己的不幸，他沮丧之至：再过三个月他就可以领退休金了，现在，他看不到它了，就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既然如此，何必要回俄国去呢？等着他的是逮捕，接着，是流放，毫无疑问。晚年没钱，他只好做个流亡者了。

但是，有个人给这个不幸的人出了一个主意：何不去找找埃尔皮金——流亡者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和他商量该怎么办。埃尔皮金已在日内瓦住了多年，与日内瓦当局有一些关系。他决定过问一下同胞的事。他这个人患有疑心病，听说他们夫妻在幸福地生活多年之后，他竟然怀疑起自己的妻子，对她的政治可靠性进行了调查。他在情报工作方面很有经验，轻而易举地揭穿了带面纱的女士。我和特卡切夫不得不咽下我们种的苦果。当法列茨基和其他人获悉这一切全是故意

作弄人的恶作剧，当我们听说这场恶作剧对法列茨基起了多大的影响之后，我便到他家去。我看到他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怯懦被人察觉而感到自卑，看到他那副可怜相，我不禁感到心疼和羞愧，我真心感到后悔，我请求老人原谅。他原谅了我。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不再这样作弄人了。

五、动身回国

那个时候，我们小组在俄国国内积极开展活动。它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这可以从“五十人案”审讯时宣读的小组纲领中看出。小组成员实际上不超过二十至二十五人。它有自己的机关报——《工作者》，它是在国外出版的。这个组织确定自己的任务是通过和平宣传，在人民中形成社会主义少数派，同时也承认有进行鼓动以及支持和发动个别暴动的必要性，而并不一定要等待胜利的总暴动。这个组织是纯粹联盟性质的，没有任何等级色彩，不存在一级服从一级的问题。知识分子进行活动的形式应当是工人式的、民主的。这个组织选择工厂工人作为自己的活动领域，因为工厂工人既是最先进的，又没有和农村割断联系，他们夏天要回家务农，因此可以极其容易地成为把思想传播到农村、

灌输给农民的传导体。口头和文字宣传的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组织的成员分散到各工业中心：有的到莫斯科的工厂去，有的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当纺织工人，有的在基辅的糖厂做工，有的在图拉住下来。但是到了一八七五年秋，整个组织被一网打尽，所有的成员和一些接近他们的人，以及许多工人都给关进监狱。不过，即使在这之后，也还是残留一点余烬，设法死灰复燃，要把已开了头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有人想起国外还有一些组织成员，他们起誓过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马克·纳坦森向我和多罗泰娅·阿普捷克曼转达了要我们回莫斯科整顿和继续小组的工作的要求。如果我在这里避而不谈我在决定走这一步之前所进行的思想斗争，那我就是在撒谎。丈夫已不再是我的障碍，因为春天里我已写信告诉他，我拒绝接受他的金钱帮助，并请他停止与我的一切来往。可是医学、文凭怎么办呢？离毕业只差不到半年，我已经想好博士论文的题目，过两三个月就该动笔了。母亲的希望、亲戚朋友的期待，他们都把取得学衔看作来之不易的了不起的大事。还有，自负心和虚荣心！目标已近在咫尺，可是，这一切都要亲手毁掉！我仔细分析了这一方面，也分析了另一个方面：那里有热忱地全心

全意献身事业的朋友，他们蔑视这类感情和这种幸福观，不迁就亲人的利己私心和自己的虚荣心。我想到这些人正蹲监狱，遭受我们曾一起作过思想准备的那种厄运；我想到我现在已具有医生所必备的知识，所欠的只是这一称号的正式标签；现在，了解情况的人说需要我，正是此时此刻需要我，我对于我准备献身的那个事业是有用的。想到这一切之后，我决定走，为的是使我的言行不脱节。我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是坚定的，因此后来我从没有后悔过。一八七五年十二月，我离开瑞士，永远地带走了对这些岁月的金色的回忆，它给了我科学知识，给了我朋友和目标，这目标是如此崇高，相比之下，一切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了。

在我动身回国的同一个时间，我的母亲正准备来瑞士疗养——她的健康因莉吉亚的被捕而大为恶化。我事先没通知她，突然地出现，赶上在彼得堡见到她。不用说，这对她又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新的打击。几天后，她带着妹妹奥莉加和叶夫金尼亚（她俩已中学毕业）出国了。对于叶夫金尼亚，这次出国没有白走：她在国外认识了一些流亡者——伊万钦-皮萨列夫、列舍恩等，在她回国后，我发现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母亲走后，我在莫斯科住了下来。这里是被摧毁

的组织的中心。为了不引起警察对我和新同志的注意，我只好不同莉吉亚会晤，她就关押在莫斯科某警察部队里。我对此并不感到难过，因为我本不是为她而来的。我希望，并且深信，公共事业将向我的智慧和道德力量提出广泛的要求，因此个人因素将完全给排挤出我的生活。等待着我的是失望，极其难过的失望：和我一起被召来进行工作的同志们，是一群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经验、没有共同行动计划的人。比较优秀、比较有经验的人——瓦西里·伊万诺夫斯基和约诺夫不久就被捕了，周围的年轻人没受过丝毫的训练，我们碰到的工人是堕落的，一味无耻地向我们伸手要钱。我们抓的不是全面的、富有成果的事，而是支离破碎的、无系统、无关联的东西，我怎么也无法从这种混乱中理出头绪来。

我被委以与狱中同志联系的任务。我整天忙于破译信件，晚上则到肮脏的小饭馆会见某个黑社会人物，或到街心花园、到阴暗的胡同里和宪兵或警士接头。和这些人见面是很恶心的，他们随时都可能出卖我这一方或狱中的一方。我们打算组织几次营救①，但除了耗费了巨款之外，一无所成。宪兵军士布哈诺夫受审

① 帮助奥·柳巴托维奇和巴尔金娜越狱。——作者

也是这个时期的事，他因企图将齐齐安诺夫和贾巴达里救出拘留所而被判押赴流放连。

除了这种沉重的压抑之外，更糟的是革命派的一般状况：所有的团体都被政府破坏，据司法大臣帕连伯爵的报告提供的情况，约有五百人受审，受短期拘留的和受搜查的更大大超过此数，就像有一场黑死病在社会某个阶层中蔓延似的——人人都失去了朋友或亲戚，许多家庭惨遭不幸。但是，这一切与宣传运动的失败所产生的精神震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许多人希望破灭了，看来完全可以实现的纲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对事业的正确性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摇了，越是热情地到民间做宣传的人，失望越大。旧的被摧毁了，但新的观点却尚未树立。

个别人尽力集合溃散的队伍，但是，只是徒劳，他们一下子就失败了，因为基础还是旧的，他们还是照老规矩行事。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森，一个极有能力的人，把幸存的柴科夫斯基团与拉夫罗夫小组的人（拉夫罗夫的亲密的同志，他们给予《前进》杂志财力支持，向它提供文学材料）合并，但不出一个月，新团体又垮了。这时，亚·索洛维约夫、尤·波格丹诺维奇在铁工厂（莫斯科省）做工，其他人在波格丹诺维奇的兄弟的田庄上做工。稍后，一些在下哥罗德省的伊·利涅夫

(即约·费利普斯)的田庄上做宣传的人（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叶·维辛斯卡娅、尼·克日明斯基）刚一落脚，就不得不逃跑。警察监视严密，加上居民对任何一个外来人的不信任感是如此强烈，因此，要在农村扎下根来，简直是不可能的。经过这一系列的试验之后，热情也消退了。

我个人的情绪是还不如死了好。在这一时期的熟人中，我可以怀着热爱之心谈到的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拉夫罗夫分子——安东·塔克西斯。他在最困难的时刻扶持了我，教给我一些原则，从那以后，我始终坚持这些原则。他向我指出革命运动失败的一些原因。他是一个真正的拉夫罗夫信徒。他认为，毛病不是出在过于书卷气地提出问题，而在于行动者缺乏训练，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缺乏本事。他对革命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把眼前的状况看作是运动刚起步时不可避免的事，它很快就会过去。此外，他经常教导我说，事业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耐心细致的工作，还说一件费了好大力气去做的工作，成果可能是微小的，但我们对此应有所准备，不能失望，因为每一个新思想只能慢慢贯彻到生活中去，每一个人都只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他所能做的事。他还支持我离开莫斯科，到农村去生活，亲自看看人民是什么样的怪物。

春天，我找到一个人接替我的工作，便动身到雅罗斯拉夫尔。遵照一位有实际经验的人的忠告，我隐瞒了曾在国外呆过和上过大学的经历——这种经历被认为是政治不可靠的。我开始到雅罗斯拉夫尔地方自治局医院学习，一个半月后，我通过自治局卫生局医士资格考试。据卫生局督察员说，我回答问题像个大学生，拉丁文比他还好；在证书上写明我考试成绩优秀。其实我不止一次不得不话到口边而打住，免得道出过于科学的见解。

我从雅罗斯拉夫尔到喀山，以便了结我的家庭事务，因为丈夫和我都希望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几个月之后，手续办妥了，我恢复使用原来的姓。在回到彼得堡之后，我通过了医科大学的产科医师资格考试。到了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我的一切生活问题已全部处理完毕。过去已经彻底结束。从二十四岁起，我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与俄国革命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

第 五 章

一、民粹派的纲领

在一八七六年年底以前，俄国革命者分成两大派：宣传派和暴动派。前者主要在北方，后者主要在南方。前者或多或少持有《前进》杂志的观点，而后者则鼓吹巴枯宁的革命教义。两派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承认在民间进行活动是唯一的活动。但是，两派对这一活动的性质，理解是不同的。宣传派把人民看成是一张白纸，应当在上面画上社会主义图画，他们要在精神上和智力上把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并从人民中造就出一个团结的、有觉悟的少数，使他们能在发生自发的或有组织、有准备的运动时，把社会主义原则和理想付诸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点，自然须要下很大的功夫，做很多的工作，还要提高自身的素养。暴动派则相反，不仅不想教育人民，而且认为我们自己应当向人民学习，他们断言，人民由于其地位所决定，已经是社会主义

者，已经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憎恨现存的制度，而且说实在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反抗，他们或消极或积极地反抗，总是在暴动。把这些个别的反抗和小规模的骚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洪流——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任务。鼓动、大造舆论、打家劫舍、自立为王——这些就是革命者适用的手段。谁也不知道人民复仇的时间，但是，当人民中积聚了许多易燃物的时候，一点小火星就足以引燃火焰，而一股火焰就能引起燎原大火。现在农民的状况就是只缺这一点火星。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小火星。当人民起来时，运动将是无秩序的、混乱的，但人民的智慧将把他们引出混乱，他们能够按照新的公正原则来处理一切。

这个纲领甚至不要求活动家们有什么特别的组织和纪律，由于四面八方的人民都已准备起义，那也就没有必要确定起义的地点：不管火种扔到哪里，大火反正都会四处蔓延开来。

与南方相反，在北方，组织问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就为革命事业立一大功，因为这可以保证革命的连续性，积累经验，逐渐锻造出最卓越的组织。实际上，南方人如过眼烟云，在地方上没有留下什么传统，他们的系谱断掉了，不论卡拉科左夫分子、涅恰耶夫分子、多尔古申分子，通通给连根拔

除了,个别人,极少几个幸存者,则加入新的团体,被完全同化了。① 而在北方，由于强大的组织性,革命团体还能保持连续性:柴科夫斯基团(以个人姓氏命名的最后一个团体)② 在一八七六年成为土地和自由社的基础,而一八七九年,从土地和自由社又诞生了民意党。

但是,不管怎么说,宣传派和暴动派在民间进行的活动都一败涂地,也就是说,在实现他们所理解的纲领时，他们不论在人民中或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都遇到意想不到的、无法克服的障碍。但是,愿意继续进行革命工作、献身一定的行动计划的,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之中比较有经验的人,不顾一再的逮捕，开始总结过去，制订新的革命实践原则。

一八七六年秋，在彼得堡，柴科夫斯基团的三个成员——尤利·波格丹诺维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和尼古拉·德拉戈着手制订在民间从事

---

① 卡拉科左夫分子是指参加莫斯科一个由H·A·伊舒京创建的秘密团体的人。德·弗·卡拉科左夫因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被绞死。多尔古申分子指一八七二——八七三年间彼得堡和莫斯科一个革命团体的成员Д·B·多尔古申等人,他们是"到民间去"运动的先驱，一八七四年被捕,几乎都死在狱中。

② 柴科夫斯基团是一八七〇年初在彼得堡成立的民粹派组织,主要创建人是马克·纳坦森等。一八七三——八七四年被摧毁,大部分成员在"一百九十三人案"中受审判刑。

活动的原则，把自己个人的经验和迄今为止整个社会的经验，包括其希望和挫折，作为新纲领的基础。与此同时，与他们无关地，以柴科夫斯基团最老的、有着广泛的革命联系的马·纳坦森为首的其它一些革命团体，也在彼得堡研究同样一些问题，并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劳动的成果便是后来被称为“民粹派”①的纲领。它整个儿地被吸收进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后来又部分地被吸收入民意党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基本思想是：俄国人民和其他任何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民一样，有其独特的、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所产生的道德观和理性观念相适应的世界观。人民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一定的态度，构成人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如果生活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于其中的体制照旧不变，那么要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此，在民间从事革命活动时，必须尝试从人民当前的态度、意愿和希望出发，在自己的旗帜上提出人民已经意识到的理想。在经济方面，这样的理想是土地和作为财产权的基础的劳动权。关于土地，人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土地可以属于除他

① 我们那时并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作者

们之外，即土地的辛勤的耕耘者、播种者之外的任何人。他们把土地看作是上帝的赠予，只有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才配受用这份礼物。他们认为现在这种土地占有状况是他们的奶娘和保姆的暂时占有，这土地迟早要全部归他们所有。

在这块土地上，人民照自己古老的习惯，即村社的习俗生活。千百年来人民都没离开过土地，现在他们也以传统的虔敬之情守着土地。把全部土地收归村社所有，这是人民的理想，也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要求的。应当立足于此，为此而开始斗争。

但是，人民对国家政权，对它的体现者——沙皇，是怎么看的呢？如何对待他们对国君所抱的希望呢？他们把国君当作保护者、庇护者，当作一切幸福的源泉。

要破除对沙皇的信任，只能拿出实际的证据说明沙皇不是在捍卫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侧耳倾听他们的申诉和呻吟。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是有计划地组织乡、县、省的农民觐见沙皇，向他陈述人民的困苦和希望，不消说，这类陈情者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的会给发配到偏远省份，有的给抓起来，有的给押解回乡。痛苦的经验将告诉人民，不能坐等沙皇的开恩，美好的未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但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斗志和他们的保卫自己的利益的能力，需要革

命者采取一系列行动。革命者不可以把有文化的人的习惯和弱点强加给人民，而是要接近人民，即以小知识分子（如乡文书、贷款储蓄银行的会计、医士、小商人等）的身份，生活在人民之中，利用农民生活的一切场合和机会支持正义思想，帮助个人和社会保卫他们的利益和尊严。革命者一旦处在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地位，比如说乡文书的地位，就应当促使法庭取消小费、杜绝贿赂，把法庭变成真正秉公执法的法庭；他应当提高调解会和乡法庭的作用，使它们真正成为公众舆论的表达者，而不是土豪劣绅的玩具；他应当抑强扶弱，把富农和恶霸排挤出社会事务，提高农村贫农的作用，启发并支持农民控告地主、富农和政府机关，在可能做到的一切地方促使农民坚持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要求，——一句话，发展农民的自尊心和反抗精神；与此同时，要注意发现特别热心公益的精明强干的领袖人物，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便在斗争中依靠他们；斗争将从非法的反抗开始，最终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

这些基本原则在集会上提出来供大家审议。应邀参加会议的人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他们都曾有过某种突出的表现，许多人是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的。在民间活动的纲领得到一致的赞同，并作了一些新的、极

为重要的、含有未来的萌芽的补充。第一，建议选择一些传统上最富有革命性、土地问题最尖锐的地区作为在民间活动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便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既然在革命的大旗上写的是人民已意识到的要求，那就无需在全国活动，只要把一个地方的起义搞起来，其余的地方因为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追求，就自然会加入这一提出全民理想的运动；第二，会上第一次指出：任何起义都没有成功的把握，如果不把一部分革命力量用于对付政府，准备好一旦外省起义便对国家的心脏发出打击，使国家机器陷于瘫痪、失灵，从而使人民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那个时候就已经谈到用炸药炸掉冬宫，使整个沙皇家族葬身冬宫废墟的可能性问题。这两点补充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此外，当时也决定用暴力捍卫同志的荣誉和尊严，教训一些气焰太过嚣张的政府走狗。这种革命正义审判行动被赋予一个不甚贴切的名称——瓦解政府。第一个应当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和残酷迫害被捕者付出代价的，是检察官热利霍夫斯基。但是，他的命还是保住了，虽然也没有因为他所制造的“恶魔案”而受到嘉奖。这个案件的被告，相当一部分在长达三年余的判决前的羁押中就因霍乱、自杀和神经错乱而死去。

二、土地和自由社

新诞生的革命组织不是建立在联盟制原则上的，那时就已经肯定集中制原则了，尽管还是相当薄弱的集中。参加讨论纲领的有三十—四十人，当时计算可以立即吸收入组织的有一百二十人。遗憾的是在讨论吸收新成员应遵守什么原则时，出现意见分歧：一些人(其中大多参加过那些以亲密友谊和同情为纽带连结起来的团体)主张，组成任何一个组织的必要条件应当是彼此充分信任、深刻了解和亲密的情谊；另一些人则认为，按此原则建立的组织无疑是牢固的，但太过狭窄，永远不会具有按下述原则吸收成员的广泛性，即一个人只要精明干练、有用、有事实证明是忠诚的，那就足以被吸收进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法取得一致意见，形成了两派，起初差不多人数相等。一派是建立在新原则上的，注定会兴旺壮大起来，这就是土地和自由社；而另一派则越来越萎缩。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说，在后面这一派里面有我一个。

一八七六年秋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时的主要活动家和领导者，是出类拔萃的鼓动家、聪明能干的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森。他原是柴科夫斯基团的一员，当

时刚从行政流放地回来。团体的名称，正如他本人当时向我解释的，是为了纪念在六十年代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名叫"土地和自由"的团体而取的①。土地和自由社的首批成员除纳坦森本人外，还有他的妻子奥莉加、奥博列舍夫、阿德里安·米哈伊洛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博戈柳博夫、特罗先斯基、普列汉诺夫、巴兰尼科夫和其他许多人。加入具有同一目标的另一派的有：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波格丹诺维奇、皮萨列夫、涅恰耶夫分子皮缅·恩库瓦托夫、玛丽亚·列舍恩、魏玛、格里博耶多夫、玛·苏博京娜、德拉戈、亚·科尔尼洛娃、我和其他人。与过去的纲领相反，新纲领把成员的活动范围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指出必须渗透进军队、行政机构、地方自治局、自由职业界，以便争取这些人来与政府斗争，发动他们参加各种抗议活动，表达对政府措施的不满。执行这个方针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伊萨阿基大教堂附近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后来，在喀山广场又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都不成功。暂停不久，这

---

① 必须指出，那时我们在公众中并未称自己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通行的称法是民粹派，只是当机关报《土地和自由!》问世之后，"土地和自由社分子"的叫法才流传开来。这大概成为某些人以为土地和自由社是一八七八年，即出现了冠有这一名称的铅印机关报时才成立的依据。——作者

一方针又继续执行了：为死于判决前的羁押中的波德列夫斯基送葬；发动邵乌工厂和新棉纺厂工人罢工；组织工人到阿尼奇科夫宫请求王储保护工人的利益，反对工厂主剥削；在彼得堡一些高等学校里要求结社的权利；医科大学学生计划向王储递交请愿书，要求赐予宪法，等等。上述这些行动以及类似的行动，其目的在于在社会上造成奋发情绪、不满情绪，给当局制造麻烦。喀山广场的游行示威，目的就在于此。在宪兵长官进行穷凶极恶的围捕之后，它要向政府提出挑战，要在一片沉寂中以自己的无畏使敌人吃惊，使朋友振奋。这个目的自然是达到了。对这次行动表示不满的只有彼得堡某些团体的青年，他们认为游行的组织者把公众当作工具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是，仅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组织的成员，包括马·纳坦森，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他们才没受到惩办。我的政治命运也差一点因参加这次示威活动而告终。

在普列汉诺夫演说之后，青年工人雅科夫·波塔波夫站起来，在人群头上挥舞一面写着新组织的口号“土地和自由”的红旗，这时，警士吹响警哨，示威者急忙散开。我和妹妹叶夫金尼亚、雅科夫·波塔波夫（我们请他一起去吃饭）沿着涅瓦大街走去。我们这三个

人太没经验了，竟然没有想到波塔波夫有危险：他那件光板短皮袄是很容易让人认出他的。果不其然：在大花园街附近，两个暗探——他们可能早就跟踪我们了——突然扑到波塔波夫身上，抓住他的两只手。他们忙于对付他，没注意我们，我们赶紧雇辆马车逃走了。在起诉书上说，波塔波夫受到两个戴灰色帽子的女郎的护送。这两个灰帽子就是我和叶夫金尼亚。

组织这次示威活动的土地和自由社原本是打算召集尽可能多的工厂工人，在广场上发表演说，陈述工人们的贫困状况和他们在与工厂主斗争中的无权地位；在这之后亮出“土地和自由”的旗帜作为未来的口号。但是这一天恰好是尼古拉节的前一天，工人们都四散在家里，来的主要是学生，而普列汉诺夫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幸遭遇和政治迫害的演说又是临时准备的。警察和房屋管理人大打出手，还抓走了三十五人，提交法庭审判。这样的结局自然不能令受害者及其亲属朋友们感到宽慰，因为街头那场殴打是非常野蛮的，而审判也是极其严厉的。此外，许多被告是与我们的事业毫无干系的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如果说示威的组织者犯了什么法的话，那就是他们让每一个人亲身领教了在首都街头闹事会有什么后果。

不管怎么说，事情干起来了：十二月六日，新的旗

帜树起来了，新的组织开始行动了。

喀山广场示威游行之后，土地和自由社的一部分成员留在城里，即俄国的心脏，另一些人则前往萨拉托夫省和阿斯特拉罕省。我们小组（号称分立派）则选定萨马拉省作为我们的活动地区。一八七七年春，皮萨列夫、波格丹诺维奇、列舍恩、莫斯科工人格里亚兹诺夫到那儿去了。晚些时候，我和妹妹叶夫金尼亚也去了。波格丹诺维奇的朋友亚历山大·康士坦丁诺维奇·索洛维约夫已在萨马拉，他在那儿加入我们的团体。此外还有一些外围分子，有的是当地人，有的是外来者。我们团体有两名成员去了敖德萨。皮缅·恩库瓦托夫死在那儿，死得很惨——死在孪生兄弟手里，而德拉戈则脱离革命了。其余的人留在彼得堡，有的后来被行政流放或受审判，有的由于没表现出什么活力和组织才能，与他们的联系便逐渐减少，不久就完全中断了。

由于我们在萨马拉没有熟人，所以我一直逗留在彼得堡，等待着朋友们在那边搭上关系，取得乡文书的身份安顿下来，并为我谋得一个医士的职务，因为医士要经当地地方自治局的医生推荐，他们不便从彼得堡延聘医生。因此，我在彼得堡一直呆到一八七七年秋。

在这期间，在国人眼前进行了一连串的政治案件审讯：喀山广场示威游行案、五十人案、扎斯拉夫斯基

案、戈鲁博夫夫妇案，等等。这些审讯引起普遍的关注：喀山广场案判刑之严厉引起自由主义阶层的愤慨，因为有的被告根本缺乏罪证，谁都知道警察在街上随便抓人，审判就跟戈尔布诺夫说的故事一样①。第二宗案件引起普遍的同情。女子抛弃优渥的特权生活到工厂做苦工，她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纯洁的信念、坚强的性格，博得大家的钦佩，她们的精神风貌长久铭刻在许多人的心里，有的人把她们的活动比作圣徒的舍己忘我行为。索菲娅·伊拉里奥诺芙娜·巴尔金娜和工人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传诵，引起热烈的反响。党的最初的行动虽然遇挫，但却赢得道义上的威望和为信念而受难的荣光。如果说这不能说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也说明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而这更使他们比一般人高尚。总而言之，这些案件审讯的结果、它们所产生的共同印象只能激发更多的人沿着被判刑者的足迹走向苦役，走向流放，而决不会使人们放弃危险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者的牺牲本身更促进了运动的发展。后来，在一百九十三人案时，政府似乎打算后退：参议院特别法庭开释了绝大

---

①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戈尔布诺夫（一八三一—一八九六）：俄国的演员和作家，善于表演小市民、手工艺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多数被告。不幸的是在狱中无辜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生。不管怎么说，政府后来明白了审判的后果于他们不利，因此便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使审判情况公诸于众。先是取消政治案件审讯的旁听制度，后来是停止在报上发表审讯总结报告，只登载起诉书和判决书，再后来干脆只刊登简短的消息：发生××事件，抓获若干名凶犯，若干人受审，若干人处死刑。有时甚至什么也没披露就把人处死了（列赫基就是这样在西伯利亚被绞死的）。最后，为了不使社会想到革命者，下令不在广场上当着群众的面执行死刑以“杀一儆百”，而是在监狱里秘密执刑。

三、卡布利茨

我逗留在彼得堡时，尽力设法帮助被关押的人，同时与土地和自由社的人频繁来往。他们当时已拥有一个印刷所，印出种种小东西（如巴尔金娜、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词等）。我可以出入土地和自由社成员的公共宿舍，他们许多人也常在我这里碰头，如利左古布、尊杰列维奇、奥莉加·纳坦森、奥勃列舍夫、巴兰尼科夫、瓦列里·奥辛斯基等。

来访的人中有一个卡布利茨是值得在此一提的，

因为他与把炸药用到斗争中来这件事有关。在革命文献中我还没读到有关何时何人想到在革命斗争中使用炸药的记述。其实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工业上和军事上使用炸药，自然是许多人早已知道的事，但把炸药作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武器，这个发明权，就我所知，应当归南方的暴动派，他们不仅在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间就有这种想法，而且首先实际使用它来对付亚历山大二世，他们在尼古拉耶夫搞爆炸，结果维滕贝格和洛科文戈被捕牺牲了。至于在北方（我是比较熟悉北方的情况的），在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间，在土地和自由社成员中积极鼓吹使用炸药的，则是卡布利茨。他的文学笔名是尤佐夫，我们则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是假的。

一八七六年，卡布利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正因“一百九十三人案”而受追捕，他是顶着别人的姓名躲在彼得堡的，他原先的活动地点是基辅，在大学念书，起先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小组，后来加入基辅公社。在拉夫罗夫的宣传派和巴枯宁的追随者暴动派激烈争论的时期，卡布利茨是巴枯宁的热烈崇拜者，他在会上抨击和平的拉夫罗夫派，鼓吹爆炸、闹事和暴动，说这些是引发社会革命的最佳手段。他把这些观点带到彼得堡。在土地和自由社成立的初期，我在这里认识了

他，当时他的写作生涯刚开始，他在青年集会上的讲话要比他作为一个报人更为出名。

那个时候的政治风气还是古朴的。在彼得堡，在小屋里，在院落的厢房里，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常常举行集会，参加的人很多。大家挤得密不透风，听演讲人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卡布利茨尽管没有合法身份，是搜捕对象，但他感到自己处在专注的听众之中，在这种友谊的气氛中，他十分安全，于是尽情发挥他心爱的思想：通过各种冲突、反抗和起义，培养人民的革命感情，从而使人民革命化①。他援引斯宾塞的观点（体育锻炼对于器官的发育和机能有益）来佐证。一般来说，卡布利茨的论证是乏味的、学院式的，谈不上有多大的说服力，作为演说家，他不能给人造成印象：音色不美，语调平淡，缺乏乐感。他的外表也不吸引人：干瘪，头发淡黄，一张苍白瘦长的脸，颏下留着淡褐色的山羊胡子，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对没有表情的灰色眼睛。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干巴巴的人，从分类上看更像日耳曼人，而不像俄罗斯人。但是，他的话很有逻辑性，考虑周密。他说得很流利，而且善于迅速插话，是一个论战者。我觉得他在朋友聚会或在私下谈话时比较有趣，他人不笨，又博览群书，有很多谈话资料。

① 他在《星期周报》上撰文发挥这个思想。——作者

除上述话题之外，卡布利茨的另一个偏爱是分裂教派和宗教分化问题，后来他还写文章鼓吹这个，在与人谈话时常常提到俄国生活中的这个现象，坚持认为这是对现存国家制度的一种反抗，具有革命意义。

土地和自由社的人把独眼龙看作自己人，但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至于制订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更不用说讨论社的章程和人员分工等，都没有吸收他参加，也没请他加入土地和自由社，因为他没有道德威信。但是，他常在我们中间转悠，并得到进入一处公共宿舍的许可。进出这里的人是经过选择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开会地点。这里只讨论理论问题，至于实际行动问题，则在巴谢伊纳亚街纳坦森藏身的处所商讨，这里可以遇见一些核心分子：哈里佐梅诺夫、基先科、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普列汉诺夫、谢尔盖耶夫、亚·米哈伊洛夫等。甚至一些经过考验的人，如克列缅茨和伊万钦-皮萨列夫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必要时也没法轻易找到土地和自由社的人。

有一次，皮萨列夫、克列缅茨、我，还有一个什么人碰到一块，谈话中克列缅茨诙谐地描绘了这种无法找到隐蔽得很好的同志的事。

他以惯常的那种讥讽式的微笑说："这是一群洞穴人，穴居原始人，藏在外人无法到达的石缝里和看不见

的洞穴里。”这个比喻很受欢迎，常被引用，后来由此而产生了“洞穴原始人”的诨号，再后来“历史学家”更把这个开玩笑的说法变成正规的名称：“洞穴人协会”。

卡布利茨常到这样的一个“洞穴”去，它位于市中心，靠近切尔内绍夫桥。他成了这里的主要演讲人和谈伴。在谈话和讨论中，这里不止一次谈到土地和自由社纲领中提出的“中心打击”问题。卡布利茨总是一有机会就把话题拉到这上面来。所谓“中心打击”指的是打击政府首脑，使中央政府瘫痪，从而保证革命运动一举成功；指的是消灭沙皇，如果可能就干掉他全家。不是别人，正是卡布利茨一贯宣扬炸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

也在那时，我从土地和自由社的人那里得知，卡布利茨在七十年代初，受南方派的委派到英国专门学习炸药的制造技术，了解它的工厂生产方法。不过他们又说，这次出国只使卡布利茨丢脸：除了浪费钱之外，别无所得，卡布利茨什么也没学会，炸药的制造和使用都没学会。因此，后来在一八七九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革命者从言论转向行动时，完全由另一批人通过试验和摸索，独立进行，除了思想相同之外，与过去完全不相干。但是当时，即土地和自由社的初期，我们离实行“中心打击”还那么遥远（它完全取决于人民群众运

动)，因此没谈到，也不可能谈到实际搞炸药的问题。不过，由于常常谈到炸药是强大的斗争武器，因此这一思想便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早在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间，许多人就听说炸药的破坏力：有几艘轮船在从荷兰的港口开到大海时突然爆炸，许多人丧生，全欧洲都被这谜一般的惨祸所震惊。经过调查，查明这起事故是因为船主把这些旧的、不能用的船投了保险，然后用定时装置引爆炸药，把船炸掉。

卡布利茨不厌其烦地鼓吹使用炸药，还制定了炸死沙皇的计划。但是，当时认真讨论的、没有引起异议的设想，后来在民意党真的使用起炸药来的时候一看，却显得十分可笑。卡布利茨以为炸药只要一受震动就会爆炸，至于硝酸甘油啦、引线啦，则从来没有提到。因此，当沙皇一家呆在阿尼奇科夫宫或冬宫时，要炸掉宫殿，卡布利茨认为只须往那儿运去一车炸药，把车翻倒就行了。

从这么一个粗陋的设想，发展到民意党党员伊沙也夫和基巴利奇奇制造出来的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使用的精巧的炸弹，这中间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改进、试验和完善的演化过程啊！

而卡布利茨这个在理论上对炸药狂热崇拜的人，在一八八〇年罗利士-麦里科夫任内取得了合法身份，

到了三月一日事件时已完全脱离革命运动，向后转，甚至转成保皇派——这是我在某份文献中读到的。

四、起　步

一八七七年春，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马·纳坦森在彼得堡被捕，同年夏天，由于这次逮捕，叛徒工人沙拉什金被土地和自由社的人打死。七月十三日，在审判前的羁押所里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市长特列波夫对叶梅利扬诺夫进行体罚（叶梅利扬诺夫化名博戈柳博夫，因为参加喀山广场的示威活动而被判褫夺公民权），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都说要对暴虐者实行报复。但只是半年之后复仇者才出现，这就是薇拉·扎苏利奇。在这之前，为了暗杀特列波夫，南方派的一些人曾来彼得堡，作过一些劳而无功的准备。

当薇拉·扎苏利奇的枪声响时，我已在萨马拉草原，只能从远方向她的英勇行动喝采，并为我对她只有淡淡的印象而深感遗憾——在我离开彼得堡之前不久，我曾在马利诺夫斯卡娅家与她有一面之缘。

在萨马拉，我受到朋友们和整个小组的欢迎，他们都是聪明、正直，准备为我们提供一切支持和效力的人。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波格丹诺维奇的弟弟尼古

拉当时也在萨马拉，他打算在省城开一家铁工厂；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也在这里。人们把我介绍给地方自治局的一位年轻的医生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波波夫，他不久就向自治局申请聘我为他负责的地段的医士。当我来到萨马拉县叶卡捷琳诺夫卡村他领导的地方自治局医院时，他告诉我，我被派到斯图坚采村，他向我交代了我的职责，并说必要时应当向他要药品。到叶卡捷琳诺夫卡拿药品，使我有可能与波波夫交往，特别是不久后，他记起在列斯加弗特的课堂上曾见到我和莉吉亚，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对这位教授的敬爱、莉吉亚的遭遇（她此时已因为“五十人案”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在国外学医，这些使我们的关系成了同志友爱的关系：能在穷乡僻壤遇见一个懂得医学问题的人，使他非常之高兴。他热爱医学，当我介绍我们的民间活动纲领时，他表示完全支持。不久，我来到斯图坚采。这是一个大村子，从前是皇室领地。我负责两个乡。萨马拉县实行巡回医疗制度，医士在一个月里应到所负责的各个村出诊。归我负责的村落共有十二个。我生平第一次实地面对农村生活，远离亲人、熟人和朋友，远离知识分子，单独和人民在一起。我承认，在农民的汪洋大海里，我感到自己孤单、软弱、无依无靠，而且，我不知道如何同普通老百姓接近。

迄今为止，我还没实地见到农民的悲惨状况，我所了解的人民贫困都是理论上的，是从书本、杂志、统计材料上得到的。六岁之前，我生活在马马德什县的茂密的森林里，林务官的房子孤零零地远离人居四十俄里；接下来的五年虽然住在乡下，但与农民生活也相距很远；再后来是六年的女子学校寄宿生活。不错，女校毕业后我在故乡住了近两年，我第一次萌发了帮助农民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不是因为直接接触到农民的贫困状况而产生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出于学校毕业后的那种情绪，出于对周围人的生活的否定态度，我觉得那种生活是空虚、苍白和自私的。为了走出家庭、厨房、牌桌和发家致富的狭窄小圈子，我选择了科学作为手段，人民作为目的。可是，我无意从现实生活中研究生活，我潜心读书，书本使我的心智得到发展，也更切实地为升入大学作准备。后来便是大学时代，新的印象，新的观点，刚确定的自由主义计划又给推翻了，新的理论取代了它。接着是回国后的一年半……在所有这些岁月里，哪里有活生生的人民呢？现在，二十五岁的我，面对着人民，就像一个孩子被人往手里塞了一件古怪的、从没见过的东西那样，感到茫然无措。

我从做我的本职工作入手。一个月三十天中我有十八天不在家，到各村巡回出诊。这使我有可能深入

了解人民无底无边的贫困和苦难。我一般是在称为客栈的茅屋落脚，立刻就有病人川流不息地来到，是甲长挨户通知的。茅屋里一下子挤满了三、四十个病人：年老的，年轻的，不少是妇女，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儿童。他们大声叫嚷着，把人都震昏了。肮脏、虚弱……望着病人，你的心情简直无法平静。都是陈年痼疾。成年人是关节炎、头痛，已经拖了十年、十五年。差不多人人都有皮肤病——村子里难得有澡堂，绝大多数情况是洗俄罗斯式蒸汽浴，肠炎、胃炎已无法治愈，胸腔里的罗音几步以外就听得见，不论哪个年龄的人都有梅毒，疖子、脓疮比比皆是，这一切，再加上住所、衣服这么脏，食物这么没营养、这么少，只能使你怀疑这是牲畜的生活还是人的生活。我常常眼泪像断线的珠子，簌簌地落在为这些可怜人准备的药粉和药水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与雅各利奥所写的南印度的四千万贱民① 没有什么两样。

天黑之前，我耐心地把药粉和油膏分装在破碗碟里，酊剂和汤剂装在破酒杯、破酒瓶里，再三再四交代如何用药。工作结束后，我倒在地板上当作床褥的麦秸

① 路易·雅各利奥（一八三七——一八九七）：法国作家，长期生活在印度和大洋洲，供职法属殖民地司法部门，回国后写了大量游记、随笔、小说。

堆上，这时我真沮丧极了。这种可怕的贫困状况何时结束？在这种环境中，这些药品显得多么虚伪；在这种条件下，还有心思想到反抗吗？向这些贫困如洗的人讲抗议、讲斗争，岂不是讽刺吗？这些人不是已处在完全退化之中吗？是否唯一地只有绝望才能打破这种逆来顺受的状态呢？

三个月里，我天天见到同一的景象。为了深刻体验人民的疾苦，了解人民的心声，偶而看看农民的茅屋、好奇地看看他们吃的穿的是不够的，在农夫干活时或到医生这里、到医院里来看病的时候看看他们，是不够的。为了充分了解他们的可怕状况、他们的全部痛苦，必须或是当工人，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或是当个乡村医士，他是在农民家里看到农民，在寒冬酷暑，在春荒夏忙时看到农民，每日每时看到他们，既在平时，也在疾病流行时观察他们，看到他们衣衫褴褛、肮脏、害病，没完没了的病痛。只有这些印象逐渐积淀起来，才能得出有关我们的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概念。这三个月，我从了解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得到可怕的印象，对我是一个沉重的考验；至于人民的心灵，我还没能看到——我还没开口做宣传。

这时，“一百九十三人案”的证人切普尔诺娃在从彼得堡回萨马拉的途中被捕，从她身上搜出彼得堡的

朋友们给我和其他同志的信，它会给我们造成麻烦。我们收到有关此事的电报，警告我们小心。彼得堡还派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来带我离开农村。他这样做了。一个星期后，宪兵来到斯图坚采村。

第六章

一、在农村

当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我来到萨马拉时，皮萨列夫、列舍恩和波格丹诺维奇也已经离开各自的地方，比我早到了，他们正准备动身。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索洛维约夫，他早已丢下他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做工的那个乡村铁工厂。我们决定去沃罗涅日省落户。我们派皮萨列夫和列舍恩到彼得堡去，设法弄到给当地人士的推荐信，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发。这之后不久宣布了对“一百九十三人案”的判决，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送回了许多同志。我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机会，从他们之中吸收一些愿意立刻和我们一起到农村工作的人的。于是波格丹诺维奇和我也从沃罗涅日来到彼得堡。

我们看到极其动人的场面：年轻人欣喜若狂，老朋友和新朋友向被释放的人祝贺，就像他们是从另一个

世界来的似的，而他们虽然肉体上备受折磨，却立即忘却身受的痛苦，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和久被禁锢的冲动，向往着新的活动，着手拟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新计划。他们的住处，从早到晚挤满人，成了人流不断的革命俱乐部，每天，来的人都有几十、上百，老相识带来新朋友——他们希望结识这些一度被活埋的人。我就是在这时认识许多七十年代上半期的活动家的。我与柳博芙·伊万诺芙娜·谢尔久科娃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科尔尼洛娃的友谊，使我爱上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其中有索菲娅·利沃芙娜·佩罗夫斯卡娅。我是这时第一次见到她的。人们用最热情的语言把我介绍给她，她的平民化的风度和习惯、她的淳朴和温柔使我十分感动，从这时起，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就义之前还从监狱里送出话来，嘱咐同志们“要好好保护纳乌姆① 和薇罗奇卡”。

未被捕的和刚恢复自由的柴科夫斯基团的人决定恢复自己的组织。他们还打算从一同坐牢的人中吸收一些最希望加入组织的人。这样便成立了一个四十来人的团体，这里面有老团员波格丹诺维奇和皮萨列夫，而列舍恩和我、妹妹叶夫金尼亚、索洛维约夫——我们

① 苏哈诺夫的化名。——作者

则是新团员。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有克列缅茨(那时刚从国外回来)、索菲娅·利沃芙娜·佩罗夫斯卡娅、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列别杰娃、祖博克-莫基耶夫斯基、萨布林、莫洛左夫、库夫申斯卡娅、科尔尼洛娃、谢尔久科夫夫妇;在以前不属柴科夫斯基团的人当中,有扎瓦茨卡娅、亚基莫娃等。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并通过了“民粹派”纲领,选出执行组,克列缅茨入选。这个组应留在彼得堡,处理全团的事务。作出这些决定后,大多数人便分头活动了,我们——到农村去,其他人,有的去处理家庭和财政事务,有的去治病、调养身体。可惜的是这个团体的生命也就此告终:由于沙皇不批准法庭的判决,许多人重新被捕并受行政流放,有些人逃往国外,我们的领导小组也解体了,个别人(处理完自己的私事或从流放地回来的)来到彼得堡后,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土地和自由社。和我们一道走的只有一个莫洛左夫,稍后,塔季扬娜·伊万诺芙娜·列别杰娃也来萨拉托夫,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在农村住下来,又回到城里去了。这期间,许多人一直劝我留在彼得堡,认为我是最适合做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但是,我是一个顽固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人,只有亲身经验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或办不到的时候,我才会放弃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愿望,继续在人民中生活。

我们在彼得堡逗留期间，认识了一个从坦波夫来的人[1]，他答应帮我们找工作，这使我们放弃沃罗涅日，改去坦波夫。但是，在坦波夫，事情也很不顺。为了不在无谓的等待中白白浪费时间，我们决定与在萨拉托夫的土地和自由社的人联合起来，于是便到那里去，这大概是一八七八年三月里的事。但是我张罗了一阵子的联合，由于伊万钦-皮萨列夫的急躁而告吹。那时，在萨拉托夫已经干出点名堂：十二个人分散在农村，当乡村教师、文书、鞋匠、农业工人、货郎等，此外，还在萨拉托夫城里的工人中进行了有效的宣传。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住在西年基耶村，在分裂派教徒中当一名非正式的宣讲师，他对这些人非常感兴趣。他梦想建立一个奉行积极斗争原则的新的理性主义教派。他饶有趣味地向我们描述逃亡教派和云游派教徒的风俗和分裂教派教义宣讲师的典型性格，说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和观点显著超过一般农民的水平。后来彼得堡发生的事——奥·纳坦森、奥博列舍夫等人被捕——把他从这个心爱的环境中拽出来。行前他含着泪花对我说，他担心他的思想——为革命而把分裂教

① 是杰韦利。——作者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杰韦利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多次受政府迫害。

派作为一支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加以利用，在首都不会得到应有的支持。到了彼得堡之后，这个生性一丝不苟的人又以同样的狂热献身新的需要，以坚毅顽强的精神沿着新的道路前进。那年十二月我从乡下到彼得堡短期逗留时，他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我反对这个纲领，我们两人都坚持己见，我仍回到我的农民那儿，他则全副身心投入城市活动了。

我们在萨拉托夫的社会上完全没有所谓的"关系"，而我们又十分需要关系，因为男同志一定要取得一些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农民生活、能有力地介入村社，即农村公社事务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公证人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普劳采夫对我们来说，真是一部活字典。他是此地的老住户，不仅深谙省城里的一切底细，而且在各县都有关系和熟人。这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有几分任性，还保留着青年时代的富有同情心的品质。他原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六十年代被开除，流放到北方某地。和我们相见之后，他钦佩我们的人格，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个受过教育、不是出于贫困而要找职业的青年女子。他认为我要求的职业是侍候医生的。当我对他说起我有几位朋友，人很老实，很好，却无法给自己谋得乡文书的职位时，他说，没问题，包在他身上。果然不久，无需什么审查历史，便把波格丹

诺维奇安排到沃尔斯克县，介绍给公证人弗罗洛夫，这之后，波格丹诺维奇自己设法弄到乡文书的差事。他深得农民事务会议常务委员和首席贵族的赏识，从而也给皮萨列夫和索洛维约夫弄到同样的差事。他们三个人苦心经营，以便今后能通过自己的举荐，把沃尔斯克县所有的乡文书职位都拿过来。

但是，好景不常。不久，县警察局长就怀疑他们是宣传员，当时县里已设置了警察，他们开始盯梢他们。随着他们之得到人民的拥护，受到威胁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不安了：地主、管事、富农、土豪劣绅都跳起来，交头接耳，告密信接踵而来。保护世界大多数人，反对少数富人的剥削，与富农斗争，捍卫工人的利益，反对雇主，替农民打官司，——这一切都暴露了他们的面目，终于足以控告他们图谋造反：社会主义者不承认私有制，鼓动一个等级反对另一个等级，等等，等等。从第一个月起，他们的地位就受到威胁了，县警察局长当时就想逮捕他们，但是乡长们替他们说话。后来，不论农民事务会议常务委员科斯特岑的支持，或是首席贵族弗罗洛夫的保护（他俩力排众议，赞同保护农民利益）都不管用了。坚持了十个月，皮萨列夫、波格丹诺维奇和担任贷款储蓄组合的会计的列舍恩不得不离开，以免遭逮捕。

差不多在这些同志安顿下来的同时，我也在彼得罗夫斯克县得到一个差事，妹妹叶夫金尼亚和我在一起，她刚通过萨拉托夫卫生局的医士资格考试。那时，彼得罗夫斯克县的地方自治局主席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叶尔莫拉耶夫。不久，我们和他的妻子(娘家姓温科夫斯卡娅)就搞得很熟。我们在县里的出现，不论在社交界或老百姓中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交界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我们有那么好的教育程度和地位，为什么要把自己"埋没"在乡下？何苦来着？图什么呢？[①] 幸而我们的风度和外表不能令人把我们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这，更由于我们与主席及其夫人的引人注目的友谊，大家突然都开明了，所有的大门都为我们敞开。只有首席贵族乌斯季诺夫和常务委员德利夫龙当时就扬言，这不是平白无故的，对我们应当"特别留神"。我们听说，乌斯季诺夫曾因为刑事罪(杀人)给关了六年，后来得到宽赦，而德利夫龙则是一个认为知识对人民有害的人，他认为，老百姓除了认得几句祈祷文和家长姓名之外，什么都无需知道。此外，维亚兹米

---

① 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知道一个人不是只有物质需要，他们当下就为我们的行为找到一个崇高的解释，用他们的话说，是"为了灵魂"，他们把自己的意思加进这句话里，说是灵魂的需要指导着我们的行动。——作者

诺乡的文书切戈达耶夫公爵也有这种看法，这个破落贵族不愧是他那个把农奴活活鞭打致死而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父亲的孝子。我不得不与这个公爵为邻，因为我被派到维亚兹米诺。他在第一天观看了我如何给人看病之后，说了一句名言：“哈！我们这里来了新派人物啦！”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预言下开始工作的。农民把医士、药剂师的出现看作是一件怪事。男人们去问神父，我是给派来为大家还是只为女人看病的？在神父作了解释之后，我被病人包围了。穷人成群结队而来，川流不息，就像来求圣像显灵似的。医务室的周围，从早到晚车水马龙，我的名声很快就传出我所负责的三个乡，后来又传出县。我由于不必受医生的监督（他从没到我的地段来）、可以通过主席从卫生局如数得到药品，所以可以按需要量下药。这一点可能是我能于病人有助的原因。有一个害出血症的不幸女人步行六、七十俄里来找我，她回去后逢人便说，我的手刚一碰到她，血便止住了。有的人运来水和油，求我“咒”它们，让它们产生魔力，因为听说我会“念咒治病”。有人带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来，他十五一二十年前双目失明，渴望我能帮他在死之前重见光明。老百姓对我的检查、详细询问病情、仔细交代用药，都感到新鲜。第一个月，

我接诊了八百个病人，十个月里医治了五千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城里自治局医生在医院里、在几个医士帮助下一年里所接待的病人数。假使在这五千人里我治好了十分之一，那么，他们将替我向最残忍的耶和华祷告，求他宽恕我的罪。当然，如果没有妹妹叶夫金尼亚的协助，我是无法担负这么繁重的工作的。

不久，我们办起了学校。叶夫金尼亚对农民说，她将免费教孩子，只要他们把孩子送来。一切学习用品我们都有，家长不必买识字课本、纸张和笔墨。立即就有二十五个男女孩来跟她念书。必须指出，在我负责的这三个乡里，没有一所学校。克留切夫卡村的居民原是乌斯季诺夫家的农奴，当他们向他表示希望办一所学校时，他劝他们说，这事还不到时候，要花很多的钱。有的学生是从其它村子来的，有的村庄离此二十多俄里。除了儿童之外，还有成年人——有几个农民要求和他们一起学算术，因为各种农村公社和乡的统计都用得着算术。不久，妹妹得到一个美名："我们心爱的女教师"。

在做完药房和学校（它就在医务室的这座房子里）里的工作之后，我们拿起针线活儿和书，"到民间去"，随便走进某一个农家。于是这一晚，这一家就跟过节似的：主人跑去通知邻居和亲戚，要他们也来听。朗读

开始。已经十一、二点了，主人们还要求继续读下去。我们读的是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以及莱蒙托夫、谢德林的一些东西，有时读大本杂志里的一些文章，纳乌莫夫、列韦托夫、加利岑斯基的短篇小说、历史小品等等。能让老百姓听得懂的书太少了，我就这事请教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伊万钦-皮萨列夫，他也只能向我推荐苏沃林的《地球与人》、《地球与动物》，就这么两本。每一次我们都要谈谈农民的生活情况，谈谈土地、与地主的关系、与当局的关系，了解农民的疾苦，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困苦和希望，对他们的痛苦表示同情，与他们共哀乐。有时他们要求把书留下来，说是要重读感兴趣的地方，甚至背下来。他们请我们参加乡会，以便揭露文书的造谣、受贿和村长的欺诈，维护农村公社的和睦。大家有意让叶夫金尼亚来当村文书，因为那时这个职务是由敌视农民的切戈达耶夫兼任的。他们请求我们出席乡法庭，常到乡公所走走看看，为的是不让文书骂人、说下流话、抓人。农民说："他当着你们的面不好意思乱来。"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我们每次在与主人道别时都要郑重保证把他们的孩子也培养成像我们这样"知书识礼"的人。

这种生活，渴望光明的老百姓与我们的这种关系，是这么美好，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愉快[1]。我们时

刻都感到我们不是多余的人，人们需要我们。正是这种感觉吸引着我们青年人到农村去，只有那里才有纯洁的心灵，只有在那里良心才能得到安宁。如果说我们放弃了这种生活、这种活动，那责任不在我们。

作为“新人”，我们尽量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不奢侈，我们的家常生活早就一点奢侈的影子也没有了。我们不吃白面包，好几个星期不见肉，在普遍贫困和匮乏的环境里，每一块肉都使我们难于下咽。我的二十五卢布薪俸，用于生活的是十至十二卢布，包括付给替我们做这些简单的家务的妇女的工钱。不用说，我们根本不接受农民送来的钱和物（送礼是农村常见的习俗）。要是某个穷大娘送给我们一份不足道的礼物，比如说，两只鸡蛋，为了不显得清高，我收下鸡蛋，顺手塞给她一个银币，说：“这够买蜡烛的”，就是说可以满足她宗教上的需要，所以不曾发生拒绝我付钱的情况。

这种生活我们觉得是自然的，本应当称作正常的，然而在村子里却成了刺耳的不谐音，它扰乱了从上到下的明抢暗偷、巧取豪夺——从达官贵人成百万成百万地抢到村夫俗子的一分一文地刮。

---

① 一九二七年，维亚兹米诺村的农民成立消费者协会时就用薇拉·妃格念尔的名字命名，薇拉·妃格念尔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给他们寄书，给他们物质上的支持。

农村一级的掠夺者只不过是小巫，微不足道的、可怜的小巫，可是农民的收支也仅限于几卢布、几十卢布啊。他们的支出（人头税、土地税、向自治局和村社缴的税）每一笔都只几戈比，但已大大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刮走很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被刮走的那一点点却已是穷人最后的一点财富，失去血汗换来的几个铜板，是多么心疼的事！为了几个铜板而与旁人斗，农村的生活里充满了这种斗争。我们的出现是对这种人的威胁。当我和神父同时给叫到病人床前时，难道他能因做圣礼而收费吗？当我们出席乡法庭时，难道文书不会计算我们使他少收入二十五戈比、五十戈比或多少实物吗？此外，还要担心如果滥用职权、使用暴力或敲诈勒索，我们会写状子通过城里的关系（我们与主席、侦查官相识）告到法院，呈报高级官员，等等。于是，乡村的蜘蛛开始织网。以当局为一方，人民、社会和知识界为一方，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提供了现成的武器，使用它，不愁不会取胜。

二、被 撵 走

针对我们而发动的一场斗争是如此典型，如此具有代表性，使我不能不在此说一说。顺便指出，与其他

同志不同，我们是有合法身份的。尽管有过萨马拉那件事，我存在侥幸心理，以为警察制度未必多么严密完善，所以仍然持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县里，除了叶尔莫拉耶夫夫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有一个姐妹在西伯利亚。我们还没住多久，农民便告诉我们说，我们村的神父散布流言说我们是没有身份证的人，说我们什么书也没念过，什么证书也没有，还说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药剂师。当农民想叫我们做他们的孩子的教母时，神父拒不同意，推说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已婚还是未婚，等等。过了一些时候，这个神职人员向地方自治局提出报告，说自从我们来到维亚兹米诺之后，他的教徒群众的精神状况变了：少来教堂，诚心大减，一个个变得大胆放肆了。自治局对他说，这一切与我的履行职责无关，也不干自治局的事。

于是开始对学校进行密探活动。时而是地主管事，时而是文书，时而是神父把孩子们找去盘问。孩子们对妹妹说："都问我们，你有没有教我们祈祷文。"妹妹倒是教了祈祷文，可是他们却往萨拉托夫寄去告密信，说叶夫金尼亚向孩子们灌输"没有上帝，不要沙皇"。村子里传说乡公所说我们窝藏逃犯。从此，不论谁到我们这里来，警察就会以各种借口到我们住处查看。我们进城的时候，侦查员告诉我们，切戈达耶夫公

爵逢人便说我们挨家挨户宣读秘密传单，说我们对每一个就诊者都说邪恶统治着世界，所有的官吏都是贪官。

一八七九年一月，我们乡该选举公职人员。在乡会上，农民选举出新的村长，并把文书的薪俸减少一百卢布。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切戈达耶夫一口咬定是我们害了他，常务委员德利夫龙宣称："各地的乡会都像个乡会，唯独维亚兹米诺的乡会不像样！"这次乡会被宣布为非法，指定另行召开新的乡会。首席贵族乌斯季诺夫亲自出马。许多选举人因没得到通知而缺席了。邻村的农民是种公地的，是独立的、机灵的人，他们给偷偷地排除出乡会。新选出的村长被莫名其妙地宣告当选无效，原来的村长，一个受贿者，继续留任，文书的薪俸恢复原来的数目，旧秩序又恢复了。

这之后发生了土地问题——农民与地主发生纠纷。维亚兹米诺和邻近两个村的居民原先是涅谢尔罗杰伯爵的农奴，伯爵解放了他们，白给了份地(所谓"叫化子地")，另给自己留下一万八千俄亩土地。奇怪的是，维亚兹米诺人的这块叫化子地，正如一八七八年划地界时所查明的，少给了二十五俄亩。这些从前的伯爵的农奴真是走投无路。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的破产是从农奴解放时代开始的。由于没有放牧的地方，他们

处于卖身依附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因为另一个地主，即乌斯季诺夫的一万俄亩土地与他们的地块毗连。在解放后的头几年，地租是一俄亩二十五戈比，一八七八年，提高到三个银卢布。但是，一八七九年，伯爵的管事又订下新条件：除了这个数目之外，农民还得从六十或七十俄里以外，差不多到达库兹涅茨克县界，往地里运木料，每俄亩五根圆木或板材（确切的我已记不清楚）。农民沮丧极了。他们不能同意这个条件，这是他们绝对办不到的事。三个村社拒绝租种土地。迄今为止，租涅谢尔罗杰土地的农民是由村社出面向他承租整片地，然后再自己来分，交租则实行连环保。这样可保地主按时如数收到地租，而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却使农民的反抗变得一致而坚决。为了破坏农民的团结，管事向个别人允诺较优惠的承租条件，企图引诱一部分人，破坏另一部分人的顽强抵制。各个击破当然要比与整体打交道容易。但是，这个阴谋也没得逞。不过，两个村社终于还是妥协了，只有维亚兹米诺人仍然不肯租土地。

这事也认为是受了我们的影响。村里的神父是得到地主的好处的，他写信向地主报告农民的反抗情绪，解释说："究其原因，全在那两个女医士。"这之后，县警察局长来了，对我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和学校进行了一

番调查，审问家长，恐吓学生，关闭了我们的学校，借口说它未经教育委员会批准，是擅自开办的。

当农民知道这消息时，他们的难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之前不久，曾有人劝他们集资办一个学校，修建费预算是一千卢布，还要雇个校工、购置取暖的木料。农民由于穷，谢绝了。如今，他们失去了免费教学的教师，他们的孩子失去了免费上学的机会。大家异口同声说这是不公平的，还说他们要强行免费进入公立学校。但是，事情到此还没完。不久，两个农民由于文书的告密而被押送去城里。文书假装个别谈话，套出他们对土地问题的一般看法。农民说，正如服兵役是人人平等一样，土地面前也应人人平等；他们由于参加了俄土战争①，理应得到土地；他们没法再这么生活下去了；王储本人也确认了这一点：他和三十名议员巡视全国，到处都听到农民的申诉和请求，每到一处他都说："将照你们说的办，"——这就是说，正如一八六一年从地主手中解放农民一样，现在，在最近的将来，也要解放土地。被捕的人放回来时告诉我们，县警察局长千方百计引诱他们，要他们说这些看法是我们灌输

① 沙俄为了夺取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在历史上曾多次与土耳其交战，结果在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巴尔干半岛攫得大片土地。最后一次重大的交战发生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

的，是我们“把这些权利读给他们听的”。从此以后，警察和村长就不再让我们有片刻的安宁了，虽然我救过他们子女的性命，花了不少时间看护他们。他们推说是上头强迫他们从窗户里偷看我们，跟踪我们，偷听我们和农民的谈话的。农民不敢白天来找我们了，他们晚上偷偷地从后院进来。村长（我长期给他妻子治病）故意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有什么办法呢，米古拉芙娜？乌斯季诺夫每次见到我都恐吓我，他说：‘村长，瞧着点那两个女医士，你要对一切负责！’”

一个受我冷遇的地主竟然屈尊驾临乡公所打听我们在乡里是否安分守己。当文书因为没想到会在有教养的人中碰到一个和自己同样无耻的人而瞠目结舌时，那地主做出意味深长的手势接着说：“怎么啦？她们两个会把全县闹得鸡犬不宁的！”总而言之，谢德林笔下的无赖就站在我们眼前，一副泼皮相，要把我们撵出农村——那是他们的地盘。正如在生存竞争中最能适应环境的就能得胜一样，在农村纠纷中，谁的手法更无耻，谁的意愿和理想与整个生活制度、与社会的整个气氛、与社会的陈规陋习最合拍，谁就能占上风。官方的农村不需要不合乎它的尺度的人来效力。

三、改变方向

当亚历山大·康士坦丁诺维奇·索洛维约夫来村子里和我们商量去彼得堡刺杀皇帝时，我们的处境还不十分紧张。他向我们谈了他对在民间活动和俄国现状的看法。他认为，当前，以合法途径争取群众利益的斗争，在一切有产者和官吏看来都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民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凭着一腔正义感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原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因为在我们的敌人方面有的是物质财富、传统加政权。

有鉴于此，在萨拉托夫的最后一次会上，我们决定把火和剑带进农村，采取农村恐怖活动，对警察制度采取恐怖活动，要使用暴力来捍卫正义。由于人民受经济压迫，受专制凌辱而自己又无力采取暴力手段，就更需要我们采取恐怖行动。但是，为了实行这种恐怖，必须要有新的革命力量，可是新的力量几乎已不再到农村来了，因为反动派的迫害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力量，摧残了他们在农村扩大力量的信心，青年们看不出那些在农村活动的先行者取得了什么成果。在反动派具有一定力量的情况下，热情找不到出路，冷却下来了。那时

的俄国正处在社会的革新精神衰退、反动气焰增强而不是削弱的时期。索洛维约夫说："杀死皇帝可以使社会生活发生转机，会使空气变得清新，会消除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他们将有可能在人民中展开广泛而有成果的活动，大量年轻和正直的力量将涌向农村。要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真正影响全体俄国农民的生活，需要一大批力量，而不是我们这样寥寥几个人的努力。"索洛维约夫的这一席话反映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情绪。

我们已经清楚看到，我们在人民中进行的工作失败了。我们的失败是革命派的第二次失败，这次失败已经不是由于革命者缺乏经验，不是由于纲领的抽象空洞，不是由于想把人民所不赞成的目标和不可企及的理想强加给他们，也不是由于对人民的力量和准备程度抱有过高的希望，——不是，都不是。我们虽然走下舞台，却应当意识到我们的纲领是现实的，它的要求在人民生活中是有现实基础的。问题在于缺乏政治自由。

如果专制政权与人民的要求和社会的意向处于某种相互作用的状态，那么，这种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就可能被伪装起来，可能不会让人尖锐地感觉到。但是，如果专制政权无视人民的要求和社会的意向，一意孤行，如果它对人民的怒吼、种田人的要求和政论家的声

音一概充耳不闻，如果它对学者的严肃研究和统计数字一律视而不见，如果没有一个臣民团体能影响社会生活的进程，如果一切手段都告无效，一切道路都行不通，如果社会中那部分年轻、热情的力量找不到活动领域，找不到可以为人民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热情的事业，那么，情况就是无法忍受的了，全部愤懑就会发泄到这个与社会背道而驰的国家政权的体现者和代表者身上，发泄到君主身上，因为他曾亲口宣布自己对民族的生存、福利和幸福负责，因为他把自己的理智和力量置于千百万人的理智和力量之上。如果一切说服教育手段都试验过，并证明都是无效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物质力量：匕首，手枪，炸药了。索洛维约夫选中了手枪。

在城市活动的革命党人也同时得出同样的结论。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的薇拉·扎苏利奇差一点再遭逮捕。在全国热烈欢迎法庭的判决的同时，皇族成员却去慰问特列波夫。参议院认为可以从宽处理“一百九十三人案”，而沙皇却加重判刑，对每一个教训他的胡作非为的臣仆的行动，他都回报以更加严厉的反动和迫害，几次政治暗杀行动换来的是实行戒严状态。打奴才而不碰主子，岂非怪事！政治暗杀必然要导致暗杀沙皇本人。戈登贝格和科比连斯基产生这个念头的时

间差不多和索洛维约夫同时。这个想法真的完全迷住了他们。我想，即使大家都起来反对这种思想，他还是要把这想法付诸行动的。此外，他无疑深信他会成功。当我对他说，如果图谋不成，可能导致更加强烈的反动时，他信心十足、斗志昂扬地要我相信不可能不成功，他不会失败，他是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希望才去干这事的。于是我只有祝愿他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我们便这样送别了这个身上兼有英雄的无畏、苦行僧的无私和儿童的纯真的人。从此，我们便忧心忡忡地长久地等待着彼得堡的消息。与此同时，我们在农村的情况越来越糟。我决定离开彼得罗夫斯克县自治局，但它坚决不肯放我走。当时的主席克罗波托夫就我的申请报告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备加赞扬，请我不要离开这个县，建议我另选一个村庄，继续我的有益的工作。为了不显得不通情理，我只好再呆一段时间，等待适当的借口。继续长期呆在农村，已是没有意义和无法忍受的了。

当四月二日索洛维约夫的枪声响了但并未获成功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必须再接再厉干下去。我们不但没有摧毁反动派，反而给了他们更加猖狂嚣张的口实，那么，我们就应当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干到底。这时，我们在沃尔斯克县的同志已被迫离开那里，同时，

彼得堡来信说，索洛维约夫曾在萨拉托夫省呆过一事已经暴露，现已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他的活动。不久，从萨拉托夫传来消息说这个委员会已经抵达，正要前往沃尔斯克县。朋友们催促我们赶紧离开危险之地，说我们与索洛维约夫有来往一事迟早会暴露的。最后，从沃尔斯克县来了一个信使报告说，已经找到了那几个送索洛维约夫来彼得罗夫斯克县的马车夫。这么说，是得赶紧离开了。

我说服了妹妹先走。然后我向自治局打了一份报告，请他们接受我辞职，因为母亲生病，要我到彼得堡去。但是，不管我怎样坚持要县自治局把我的全部证件退还我，主席还是只给了我临时事假。我只得从命，免得露出马脚。同一天，城里的医生被派来接收我的书、器具、药品等。第二天，星期天，早晨我告别了维亚兹米诺的乡亲，上路去萨拉托夫。不可能的机遇再一次救了我：星期一，当局派人到维亚兹米诺。这一次不是像萨马拉那次那样迟了一个星期，而是一天。

我们在萨拉托夫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满怀希望地开始，一事无成地结束。但是，如果说我们对"在人民中开展活动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由于农村盘根错节的外部条件而作了否定性的答复，并得出结论说首先要铲除这些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同时也得到这样的信

念：人民是了解我们的，他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朋友。当宪兵和警察来到维亚兹米诺时，农民的共同反应是："这全是因为她们站在我们一边的缘故。"后来，文书散布说我们被捕了，叶夫金尼亚给绞死了，农民夜里来找叶尔莫拉耶夫打听这是否属实。他们回来时感到放心和高兴。

几个月以后，我碰到我们住过的那个地方的一位姑娘，她奔过来搂住我的脖子，热情地说："你们在那儿没白过。"我的朋友波格丹诺维奇和皮萨列夫可以感到宽慰：只要能放过他们，村长愿意为他们每个人出五千卢布的保金。一个阅历丰富、十分了解农民生活的人——他声明他对社会主义毫无兴趣——在获悉波格丹诺维奇和皮萨列夫不愿继续在农村生活时说："要是他们看到他们乡的农民是怎样关心他们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拒绝在农村生活的。"这是亲眼看到索洛维约夫行刺后发生的一切的当地居民的心声。

在我们小组最后一次在萨拉托夫举行的会议上，我宣布要退出小组，以便参加土地和自由社，因为我看不出小团体单独存在有什么意义，在土地和自由社里，我仍将支持那些赞成继续行刺沙皇的人。其实，与政府斗也已成了其他所有人的口号。这之后，我们四散而去。皮萨列夫和列舍恩去了北方，波格丹诺维奇、叶

夫金尼亚和我暂时留在坦波夫——那里有许多土地和自由社的人。不久，我收到巴尔金娜从西伯利亚写来的信，请我帮她逃跑。尤利·波格丹诺维奇着手办这事。整整一年，他音讯杳无。与此同时，土地和自由社通过它当时在坦波夫的成员米海尔·罗季奥诺维奇·帕坡夫再次建议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比我自己提出申请还早了一步。当我表示同意后，帕坡夫通知我该组织正在沃罗涅日召开代表大会。于是我便与另外几个土地和自由社的人一起到那儿去。

四、一般状况

从一八七六年末到一八七九年夏沃罗涅日大会召开的这一个时期里，革命党的一般状况可以概括为：党还没有表现出把所有志同道合的人联合成一个全俄的组织的意向，因此，尽管他们的纲领在目的和手段上是相同的，但却分散成几个完全独立的团体，彼此之间只靠个别成员之间的个人相识关系来联系。在北方，土地和自由社已是一个紧密团结的组织，有共同的章程来维系、调节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南方人仍然表现出俄罗斯人那种奔放豪爽的天性，不承认纪律，没有把自己和一般的革命青年

群众严格区别开来，总在敖德萨、哈尔科夫和基辅几个大城市间游击。一八七七——一八七九年，政府的一连串打击镇压，窒息了这几个城市；几次审讯夺走了他们之中的精英——奥辛斯基、莫克里耶维奇、科瓦列夫斯卡娅、斯捷布林-卡缅斯基、沃洛申科、丘巴罗夫、维滕贝格、科瓦利斯基和其他许许多多人。对于北方，类似的迫害没有致命的影响，因为党组织在每次受到损失之后，都能从外省调集力量。因此，在一八七九年夏季，土地和自由社是唯一的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它拥有机关刊[①]（从一八七八年秋开始出版）和大量的成员。它有一个领导中心，设在彼得堡；这个中心领导一个印刷所，出版机关刊，管理全党的经费，负责与外省的联系，处理一切不涉及外省活动的日常事务，扩大党的联系和力量。派遣新人到农村也是它的职责。外省成员分布在萨拉托夫、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和顿河军屯区，他们组成名叫“村社”的组织，有权独立处理地方事务。这些“村社”在有一定地位的地方人士中、在工人和青年中发展新成员；团结那些重又到外省来的人，在地方事务方面与他们构成平等的统一体，但是不把这些人算作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也不让他们知道这

① 《土地和自由!》。——作者

个社做的事情和组织情况。这些“村社”是具有地区目标的地方组织，与彼得堡组织只通过个别成员保持秘密联系。外省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民中进行活动，准备起义。因此，小部分成员留在城市里，在工人中做宣传工作、筹措经费、结交一些于组织有用的人士，等等；大部分人则分散到农村，两、三个月到省城碰头一次，交流观察心得，商讨如何进行工作等。共同的需要和利益使外省人逐渐接近起来，他们之间的团结越来越紧密，而与彼得堡的距离和隔绝则削弱了他们与旧同志的联系。外省“村社”由于其活动性质和远离提供主要革命力量的大学城市，不论在经费上、在新生力量的补充上（这事更重要），都完全依赖领导中心。农村的一般活动条件不利于新生力量的输入。随着纲领中有关打击政府走狗的嚣张气焰部分越来越吸引彼得堡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的注意力，他们已越来越不关心自己的外省同志了。全部经费和人力都用在营救被拘押者，用在搞恐怖活动上；不再向外省提供经费和输送新力量。外省终于完全陷于没落的境地。

不仅如此，精神上也开始分离。彼得堡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所进行的斗争要求自始至终高度紧张，但却能提供空前有力的鼓动材料。在这种火红的斗争中，他们因成功而兴奋，因失利而气馁。他们开始以惊

讶和轻蔑的心情来看待无声无息的萨拉托夫和坦波夫的农村。那儿没有半点积极斗争的样子，在农村的几十个人显然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这使他们深感不满[①]。既然几十个革命者活动了两年多，不仅不能发动人民，反而为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准备好人民起义这一观点提供了实际例证，那么，他们还在农村呆着干吗！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继续呆在农民中的党员是已被甩出斗争了，他们自己则是热情献身于火热的斗争的。而道地的民粹派则觉得，在城市活动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是在摘花架子，华而不实，他们的一时闪光会吸引青年人离开真正的事业，离开这么需要青年人的力量的人民。在他们看来，刺杀几个宪兵将军和头目远不如在农村进行恐怖活动重要和有效；农村的恐怖活动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的，无法从哪一个人身上观测到它所产生的印象，它们没有序幕和尾声，连农村的土地和自由社党员自己也没感觉到震动，他们没有体验到斗争的惊心动魄、危险和欢乐，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农民的汪洋大海中，他们没有为走上绞架的同志致哀恸哭。

① 莫洛左夫因此给他们起了一个蔑视的名称："乡巴佬"。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这个名称虽无贬义，但并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来历，也忘了城里人是这么叫从农村来的笨头笨脑的人的。——作者

第七章

一、分　歧

如果说在城里活动和在农村活动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之间的精神鸿沟在扩大的话，那么，在执行党的全盘政策的彼得堡中心组内，认识也不是一致的。在打算采取和实际采取斗争行动的地方，个别成员之间的观点分歧确实相当尖锐，而且越来越常发生冲突。

这里那里不时发生政治暗杀，有的成功，有的未遂，消息像一朵朵电火花，接二连三传来，青年和社会为之精神振奋。在基辅，宪兵军官海金男爵被暗杀死、检察官科特利亚列夫斯基遇刺，这些都是土地和自由社分子奥辛斯基和当地人(波普科、戈登贝格、科贝利扬斯基)策划和组织的；在哈尔科夫，省长克罗波特金被暗杀掉；在敖德萨，科瓦利斯基及其同志武装拒捕，为抗议审讯他们而举行了游行示威；在彼得堡，土地和自由社分子暗杀了宪兵首脑梅津采夫，行刺他的继任

德连捷林，营救沃伊纳拉利斯基——企图在他被押往中央监狱途中武装劫持他。所有这些事件在灰色、沉闷的俄国生活中，是非同凡响的，它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受到热烈的欢迎，使新派大受鼓舞。基辅的奥辛斯基是一个活泼热情的人，他一头栽进这股新潮流，而他的彼得堡同志——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尼·莫洛左夫、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巴兰尼科夫、季霍米罗夫、尊杰列维奇和奥沙尼娜，摸索到革命活动真正的新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通过积极地与政府斗争以获得政治自由的必要性。

在他们的思想上，土地和自由社纲领中的两个方面渐渐掉换了位置。在一八七六年建立组织时，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放在准备组织人民起义，而"中心打击"只处在从属的地位，取决于群众工作的进展情况；而现在，在一八七八——一八七九年，这个"打击"却变成重点，占居首位，正是它，而不是别的，应当使人民群众有可能在政府瘫痪、不知所措的时刻站出来，释放出自己的能量。从今以后，党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都应当放在创造这个时机上。

亚·米哈伊洛夫、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他们的同志们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在同一个彼得堡组织里，与他们并存的是一些强烈反对这种观点，极力顽强地捍

卫原先立场的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和米·帕坡夫，他们个性棱角鲜明，激烈反对新潮流。

他们指出原先的纲领并未修改，而且要考虑实际情况。他们说，每一次恐怖行动之后总有一些组织被摧毁，政府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而被捕的往往是最优秀、最可宝贵的人，这种损失可以说是无可弥补的。用这来博取同情和鼓舞，代价不是太高了吗？况且这种同情和鼓舞只能使同志们更加晕头转向，把他们推向单一的政治斗争道路。普列汉诺夫和帕坡夫认为，政治恐怖活动给予青年的精神影响是有损于人民的利益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与政府搏斗使年轻人激动，使他们不去农民中从事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可是这恰恰是党迫切需要做的工作，党恰恰需要到群众中争取支持。

于是，革新派每想做一件新事，他们的计划就会受到激烈的反对，引起尖锐的争论。两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当我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从萨拉托夫省彼得罗夫斯克县来到彼得堡时，中心组成员之间的分歧已非常明显，他们各唱各的调。莫洛左夫和米哈伊洛夫说，继续在农民中呆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极力劝我放弃农村，到彼得堡来。在全组会上，普列汉诺夫发言时那么冲

动，使用了那样的口气来表达对米哈伊洛夫和莫洛左夫的敌意，使我这个不习惯于这样待人的人觉得反感。

在一八七九年春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从萨拉托夫省来到彼得堡后，口角和争执更达到极点。

“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革命者呆在农村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这就是他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得出的结论。“要不惜任何代价改变这种条件，首先要摧毁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为代表的反动派。”——于是，他决定打死他。

但是，他需要在彼得堡有人帮助他，他就是来找土地和自由社的同志帮忙的。行刺问题被提到中心组。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人在转达索洛维约夫的计划和请求时，认为有必要把他的名字保密——这是对普列汉诺夫和帕坡夫的不信任，担心他们的情绪。但是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被告知，行刺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任何人的拒绝都改变不了。这补充声明无异于说组织不必干预。这使普列汉诺夫和帕坡夫忍无可忍。愤怒的帕坡夫喊道：“如果你们中还有个卡拉科佐夫，那难道不会再出现一个不同意你们做法的新的科米萨罗夫？”[①]帕

① 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于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据官方说，一个名叫奥西普·科米萨罗夫的制帽工匠挺身而出，救了沙皇。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卡拉科佐夫被处绞刑。

坡夫的朋友、曾和他一起到民间去的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应声吼道："如果你就是这个科米萨罗夫，那我就连你也毙了！"

激烈的冲突以妥协告终。土地和自由社作为一个组织，拒绝协助行刺，但是成员个人可以提供他们认为必要的帮助。

四月二日，索洛维约夫行刺了，但是没有成功。他使用的大手枪是土地和自由社的人提供的。这支枪使魏玛被捕，因为枪是他从开设在涅瓦大街上他母亲的房产里的一家商店里买来的。索洛维约夫本人自杀未遂，而他的被抓获又导致一连串的逮捕——他在彼得堡、普斯科夫省的朋友、熟人被捕，宪兵还到萨拉托夫省沃尔斯克县和彼得罗夫斯克县搜捕，在那儿，凡是与索洛维约夫有过来往的人都不得不躲藏起来。

二、组织里的组织

在索洛维约夫行刺之后，普列汉诺夫和帕坡夫提出必须召开全体成员代表大会，解决新旧两派之间的纷争：组织是准备坚持旧纲领，还是希望根据政治斗争派的精神，对之进行修改？两方中的一方最终必得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否则就得自动退出，以免被开除。

彼得堡不甚了解外省的情绪。帕坡夫以为它是有利于自己的观点的，这使新派感到不安。为了不致给打得措手不及，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自己即使在与从前的同志们破裂之后，仍然能继续进行政治斗争，一个日后成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核心的小组，便是在这时形成的。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莫洛左夫、奥沙尼娜、季霍米罗夫和巴兰尼科夫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成立了一个其他成员并不知道的特别小组。奥辛斯基在基辅与当地几个不属同一组织的恐怖分子，已在传单上使用过"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他们在采取自己发起、自己负责的恐怖行动时都散发传单。奥辛斯基的彼得堡同志也仿效他，开始在莫洛左夫主编的机关刊《土地和自由！》的副刊《〈土地和自由！〉小报》上，用上这个署名。尽管普列汉诺夫始终反对，《小报》还是具有鼓动性质，并在机关刊因故脱期时出版。《小报》上常用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报导有关密探和奸细的消息，这些情况是克列奇尼科夫提供的。他从克里米亚来，主动提出为党做工作，在亚·米哈伊洛夫和他的朋友们的同意下，从一八七九年一月起进第三处当办事员。

由于基辅的传单和《小报》的报导，"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已经传开，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秘密组成的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小组决定加以利用，取了这个业已为人知晓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背着其他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成立的"执行委员会"立即在那些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同情一八七八年间在俄国各大城市采取的战斗行动的人中间，吸收支持者。在彼得堡，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很快就挑选了一些人，成立一个小组，但并没有告诉新同志他们同时也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小组与执行委员会的任务一致，小组应当协助执行委员会完成它的任务。小组与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全通过尼·莫洛左夫。他是执行委员会的正式代表。

参加这个小组的，除上述两名组织者之外还有：没有合法身份的尼·基巴利奇奇、"一百九十三人案"的安·瓦·亚基莫娃和索·安·伊万诺娃、大学生格·伊沙也夫和阿龙奇克，亚基莫夫夫妇和刚从国外回来的斯捷潘·希里亚耶夫。

小组通过的纲领具有政治斗争性质，承认采取政治恐怖手段的必要性。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作为座右铭："不自由毋宁死！"

从战斗方面说，"不自由毋宁死！"小组并没有什么建树，看来这是该小组的成员后来对它的意义估计不足的原因。他们说，别看它的名字叫得挺响，其实更多

的是做技术工作，成立它是为了培训人员，以便进一步建立组织，——这样说也许更合适。

但是，从以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两点对不久之后发生的革命事件有着巨大的意义。这个小组的成员，即这些事件的参加者的名字——亚基莫娃、伊万诺娃、基巴利奇奇、希里亚耶夫和阿龙奇克，都载入革命运动史册。只有亚基莫夫夫妇脱离了革命，但他们提供了为实现当时的革命任务所必需的物质帮助。

委员会得到了基巴利奇奇这么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从一八七八年初出狱后就一直在研究家庭制造炸药的方法，后来不仅在理论上研究了炸药的性质和制造，而且作了这方面的实验室试验。

说干就干，这是这批新人的典型特征。基巴利奇奇的准备工作刚一结束，他们便利用"不自由毋宁死！"小组的成员，建立起一个作坊来制造硝酸甘油，后来又制造日后需要的炸药。作坊的领导人是化学家基巴利奇奇，技师是希里亚耶夫、伊沙也夫和亚基莫娃，她还是作坊所在的那所秘密住宅的女主人。

这些勇敢的同志们在这座临时试验室的简陋条件下，在随时有被警察发现或连房子带人全给炸掉的危险情况下，截至一八七九年夏天，已制造出好几普特的炸药。他们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是在每分每秒都

可能死亡的情况下，摸索着干的。

三、利佩茨克和沃罗涅日

当决定召开土地和自由社代表大会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便准备进行搏斗了。他们决定先走一步，召集自己的同志开一个秘密的派别会议，并邀请没有参加土地和自由社的南方杰出的革命者参加。他们是基辅的科洛德凯维奇、敖德萨的热利亚博夫和土地和自由社成员弗罗林柯。弗罗林柯常年住在南方，早已因自己的活动而闻名：他在敖德萨把科斯秋林救出狱，在基辅把斯特凡诺维奇、杰伊奇和博哈诺夫斯基救出狱，还尝试在哈尔科夫城郊搭救沃伊纳拉利斯基，还参加挖掘赫尔松金库的地道，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从那里偷走了一百五十万卢布。

土地和自由社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沃罗涅日，时间是六月二十四日。那些赞同新潮流的人则决定提前几天在避暑胜地利佩茨克（从这里可以很快到沃罗涅日去）召开全体大会。到了预定的开会时间，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从彼得堡来到此地，被邀的南方人接到电报，也赶来了。这十一、二个人对执行委员会书记莫洛左夫起草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之后，通过了它，并组成一个

团体。团体的纲领提出本组织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确立政治自由，手段是与政府作武装斗争。

迅速办完这件事之后，参加土地和自由社的人便去沃罗涅日，而南方人和希里亚耶夫则留在利佩茨克，等着他们在沃罗涅日提议吸收他们参加土地和自由社之后，把他们叫来参加大会。弗罗林柯、热利亚博夫、科洛德凯维奇这些人无异议地立即被通过；斯捷潘·希里亚耶夫在那些了解他的彼得堡人的热情推荐下也被通过了。他们出席了大会，加强了左翼的力量。另一方则提议接收尚在国外的斯特凡诺维奇、扎苏利奇、杰伊奇和博哈诺夫斯基。他们也被通过了。这里面的头三个人在回到彼得堡后，是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的。

理论上的分歧，个人间的互相怨恨和不信任，双方都担心对方占上风，在一个秘密团体里又秘密隐藏着另一个团体——双重秘密团体，大家由于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而时刻戒备着，——这个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全俄性质的革命代表大会，便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举行的。

但是，大会刚一开始便可明显看出，在城市活动和在农村活动的土地和自由社党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紧张，不像彼得堡人之间那么对立。

没有出现批评和攻击，而是心平气和地、耐心地进

行讨论，彼得堡的那些反对搞政治恐怖活动的人，显然夸大了农村党员对这种做法的否定态度。大会的决议具有折衷性质。分裂组织、与同志分道扬镳，是一件痛苦的事，大家都想保持团结，大家都怕因为分裂而削弱力量。

写得十分概括的土地和自由社纲领给予各方对之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的可能性。不论城市党员或农村党员，在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中都可以援引纲领，利用其中的条文来为自己的活动辩护。经过双方互相解释和一番辩论之后，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章程仍保留原样，未作修改。决定继续在民间进行活动，但增加了搞农村恐怖活动的内容，与此同时，也决定继续在城市中搞恐怖斗争，包括行刺沙皇。

机关刊《土地和自由！》应保持原来的性质，恪守纲领的精神；而《〈土地和自由！〉小报》则获准作为鼓动性增刊出版。

只在大会刚开始时曾出现紧张场面。冲动的、愤怒的普列汉诺夫大力捍卫自己的立场，当他看到与会者都倾向于妥协时，气愤地站起来，离开会场——郊外植物园的一块小草坪。他走时扔下一句话："我没有必要继续呆在这里！"我跑过去想拦阻他，但亚·米哈伊洛夫制止了我，他说："由他去吧。"

这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的离去算不算退出组织？回答是肯定的。大概他自己也认为是退出了，因为从那以后直到他出国时为止，我再没碰见他。

出席沃罗涅日大会的有：亚·米哈伊洛夫、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莫洛左夫、巴兰尼科夫、季霍米罗夫、奥沙尼娜、弗罗林柯、热利亚博夫、科洛德凯维奇、佩罗夫斯卡娅、我、希里亚耶夫、科洛德凯维奇、米·帕坡夫、普列汉诺夫、季先科、哈里佐梅诺夫、阿普捷克曼和尼古拉耶夫——一共十九人。谢尔盖耶娃（季霍米罗夫的妻子）没有出席，因为她是彼得堡宿舍的女主人，不能离开。

一些在农村的土地和自由社党员没来，他们不认为代表大会有什么意义；另一些人在大会未开始之前来了，由于怕丢掉差事而匆匆赶回去了。

总的来说，大会开得缺乏生气，它并不像彼得堡的党员预期的那样是个决定性的战役。在利佩茨克开过会的那些人还不希望自己与其他同志决裂，但他们利用沃罗涅日大会来观察组织里的人，摸清他们的情绪，以便胸中有数，一旦不得不采取决定性步骤，即分裂的时候，可以知道把什么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

因此，我的老朋友莫洛左夫打从在沃罗涅日见到我的那一刻起，便极力要把我拉进他们的秘密小组。他

没说它已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成立，而是竭力要我相信建立它的必要性。但是我没有盲从。我不但否定有成立这个小组的必要性，而且认为在秘密团体内再搞一个秘密团体，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说："涅恰耶夫是这么干的。"我坚决否弃这个计划，认为这是走极端的秘密活动者的无聊想法。

四、自由主义者

由于热利亚博夫是个引人注目的人，在这里谈谈他在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大概不会是多余的。当大会讨论在纲领里加进搞农村恐怖活动的内容时，他问道："革命的政党想依靠谁——依靠人民，还是依靠支持推翻专制制度、确立政治自由的自由资产阶级？"他说："如果是前者，那么，不论搞农村恐怖活动或工厂恐怖活动都行；如果我们想在工厂主、地主和城市自治活动分子中寻找支持，那么，这样做就会把这些天然的同盟者吓跑，离开我们。"他指出，在切尔尼戈夫省和塔夫里切斯克省，在基辅和敖德萨，都有一些活动家出于政治目标的一致而寻找与革命党建立联系。例如，奥辛斯基（当时已牺牲）在基辅就曾与自由主义者有相当广泛的联系，而他本人显然也从社会主义转向单纯

搞政治斗争。那时候，在敖德萨的市议会里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开会讨论的恰恰是宪法草案。总督托特列边最得力的助手帕纽京把这个议会称为"巴黎公社"，急忙在一八七九年的夏天铲除这些过早冒出来的共和主义分子，把为首分子遣送到西伯利亚偏僻的地方。

对热利亚博夫的问题，大家一致的回答是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要据此建立我们的纲领——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①。

在革命文献中，不只一次地把热利亚博夫的发言看作是主张与自由主义立宪派结盟，弗罗林柯还说，在这次大会上，一些来自农村的土地和自由社党员也是这样理解这个发言的，他们愤怒地说："他是一个十足的立宪派！"而热利亚博夫似乎也感觉到外省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是这样看的，以致他也同样愤怒地喊道："这也是革命者！"

我自己是这样解释热利亚博夫的问题的：他一向生活在南方，不参与当地任何一个派别（自由主义立宪派、乌克兰主义者、暴动派、宣传派），而是广泛接触公众。现在，完全出乎自己意料地来到北方参加利佩茨

① 当时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还没有"策略"这个词，也没有"行动纲领"、"最低纲领"、"最高纲领"这些术语和概念。——作者

堯和沃罗涅日的大会(受弗罗林柯,后来又受亚·米哈伊洛夫的邀请),他自然得了解情况,弄清未来的同志的政治面貌,因为在这些人当中,他认识的并不多。

应当指出,在我们北方,从来不把自由主义者当作一支力量,而且一般说来,在七十年代,对他们是持否定的、讥笑的态度的。他们无所作为,对政治压迫的种种无耻行径毫无反抗,对中央和省里的行政当局低声下气。这一切完全毁坏了热利亚博夫所指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的形象,而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机构在民众教育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不论在城市或在农村,完全看不出它们做出了什么成绩。

在北方,这些人也曾试图与"极端分子"——我们通常是这样称呼自己的——联系,但这只使人更加看不起他们。例如,在一八七八年,当地下刊物《开端报》① 出版问世时,自由主义者也想出版自己的地下刊物。怎么办呢?他们来找在《开端报》的印刷所工作的尼·布赫,请他搞一个秘密印刷所,搞来设备、人员,印刷他们即自由主义者交给他印的东西,他们答应负责提供经费。这样,一切风险和责任都由革命者来担当,

① 一份由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办的报纸,从一八七八年三月至五月,一共出了四期。

他们日后可能因为他们无法左右的事而给送去服苦役和流放。这一提议只能让人报以讥讽的一笑。

这事是由作家埃特尔对布赫提出的。布赫拒绝这一建议时说，如果自由主义团体提供经费和印刷所的人员，他倒可以帮助他们搞一个印刷所。埃特尔说："他们有谁能在印刷所做工呢？叫瓦西里奇科夫公爵[1]吗？他可以出钱，写稿，但是，你也知道，他可不能到印刷所做工呀。"

---

① 亚历山大·伊拉里奥诺维奇·瓦西里奇科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一），俄国社会活动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家。

第八章

一、土地和自由社分家

沃罗涅日大会之后，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生活开始了。我跟着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到了彼得堡，他把我带到列斯诺伊——他在那儿和索·伊万诺娃共住一所公寓。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总是能找到一些矢忠于他的普通妇女为他工作。我们在列斯诺伊的女仆是一个德国人，她对于我们这种非常不一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构成危险，我们并不避讳她。

这里是土地和自由社战斗派的总部。时值盛夏，这里又是别墅区，这为总部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还有许多处于同样状态的人来我们这里办事，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在松林里，在室外，以郊游散步的方式开会是很容易的事。

我们便是这样做的。我们选择一个一般游人不去

的僻静的林边，坐在松林的干叶堆上，如果有人偶然向这里走来，我们老远就能看到。

我们回来后不久就开始这样开会了。但这已不是土地和自由社成员的会，而只是那些参加利佩茨克会议的人和常到别墅来的人的会了。克维亚特科夫斯基、莫洛左夫和米哈伊洛夫一开始就埋怨那些主张在农村活动的人，说他们阻碍恐怖活动的开展。他们说："应当执行沃罗涅日大会关于行刺沙皇的决定，应当争分夺秒，否则准备工作就不可能在秋天亚历山大二世从克里米亚回到彼得堡之前完成。其实我们有足够数量的炸药和必要的人员在沿途几个地方行事。"可是，反对搞恐怖活动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千方百计拖延此事；他们说，力量都消耗在争论和内部磨擦上；将来的局面不是齐心协力，坚决行动，而是犹疑、退让和折衷；沃罗涅日大会没有消除分歧，只是掩盖分歧罢了；为了不致互相掣肘，最好还是分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他们反反复复地一再谈论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没有反对意见了，主要的论敌普列汉诺夫、帕坡夫和斯特凡诺维奇不在场。佩罗夫斯卡娅和我在沃罗涅日大会上还在动摇，还想尽力维护组织的团结，现在，当事情涉及到行动，而且彼得堡的同志们公开对我们说行刺

的一切物质手段都已准备就绪，只剩下把设想付诸实现，不要停滞不动，于是我们也就不再反对了。显然，普遍的情绪是主张分家。土地和自由社的命运问题，即分家问题，终于正面提出来，并作了肯定的决定。

双方各推举出几个代表来商定条件。用来印刷党的机关刊的铅字归新纲领派，印刷所的老主人玛丽亚·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雷洛娃（大概由于她的名字吧，大家都管她叫“圣母”）是绝对反对新派的，她仍留在旧纲领派一边。尊杰列维奇搞来的备用铅字仍归他，这样，他们可以立即组建一个自己的印刷所。新派的印刷所由索菲娅·伊万诺娃[1]负责，她熟悉印刷业务，因为她曾是麦秀根[2]在莫斯科办的印刷所的排字工。在土地和自由社印刷所扮女仆角色的格里亚兹诺娃没什么文化，她由于更同情我们这些人而到我们这边来。其他人员并不缺，布赫同意当负责人，而楚克尔曼和普塔什卡则当了排字工。经费决定平分，不过这是将来的事：从前参加柴科夫斯基团、后来加入土地和自由社的德·利佐古布拥有大笔田产，他委托德里戈全权照管，对他无限信任。他要德里戈把田产全部变

① 后来随夫改姓博列伊舍。

② 关于他的事迹请参看本回忆录的第二卷《狱中二十年》第27页（巴金译，三联书店1989年重印本）。

卖，把钱交给土地和自由社。但是，利佐古布已给关在敖德萨的监狱里好几个月了。秋天里，他和秋巴罗夫、达维坚科一起被绞死。而德里戈呢？德里戈变节了，他投靠政府，妄图侵吞宽厚、轻信的朋友的巨额财富。土地和自由社是通过亚·米哈伊洛夫与德里戈交涉银钱事宜的，米哈伊洛夫非但没有从德里戈那里弄到一分半厘，还差一点落入叛徒设的陷阱里。

这样一来，就我所记得的，我们土地和自由社的旧派同志分文未得，而我们则剩有储备金二万三千卢布，这是支持搞恐怖活动的亚基莫夫夫妇答应给我们的，他们也确实拿出来了。此外，尊杰列维奇转给我们八千卢布，这是利佐古布存在他那儿、专供搞恐怖活动用的。

根据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继续使用土地和自由社这个旧名称，因为它在革命人士中已经拥有相当的知名度，赢得一定的同情，两派都想争得继承权，任何一派都不愿另一派作为过去的组织的继承者独享全部好处。

旧派把注意力集中在土地问题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上，取了“土地平分社”的名称；而我们首先致力于推翻专制制度、用人民的意志代替一个人的意志，便取名“民意党”。

用莫洛左夫的话来说，我们把过去的组织的名称也一分为二了：土地平分社取了“土地”二字，我们则取了“自由”二字①。于是，两派便分道扬镳了。

二、民 意 党

那时，土地平分社作为一个派别，保留了土地和自由社纲领的主要点，只是强调了其中的在民间活动和组织人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民意党的纲领则以完全新的出发点为基础。这个出发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整个人民生活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认为这个因素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转折关头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从前的时代，这种政权摧残了古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联邦制萌芽，它先是使历来就是纳税等级的人民束缚在土地上，然后又把他们变成人身依附的农奴；它先是把贵族变成官宦，然后又变成不任国家公职的赋闲的封建领主阶级；当这个阶级贫困化，最显赫的贵族世家到十八世纪初已败落、僵死时，这个政权又通过“至仁至善的皇上”的一连串巨额赐赠国家份地和公地农民，为大贵族富豪所有制奠定了基

---

① 在俄语里，“自由”和“意志”是同一个词“воля”。

础。在近代，这个国家政权于一八六一年把农民从人身依附状态解放出来之后，便成为自由劳动的最大的剥削者：它分给农民远低于农民劳动力价值的份地，却向这一小块份地课以骇人听闻的沉重赋税——相当于农民的总收入，在许多地方甚至超过土地收入的百分之二百以上。这样一来，每个成年劳动者的劳动税高达四十至五十卢布。

中央集权的国家通过这种沉重的税收敛得巨额财政收入(其中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下层阶级交纳的)，差不多全部用于对外耀武扬威、豢养陆海军和偿还国债(之所以举债，也是因为穷兵黩武)，而只将区区一点钱用于生产和国民教育这样一些迫切的国民需要上。这种状况完全说明，是人民为国家出力，而不是国家为人民服务。与国家对人民的剥削相比，任何私人的剥削都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大力扶持私人剥削：和它从前造就贵族土地所有者一样，现在它着力造就资产阶级。政府不是支持国民经济，而是扶持私人企业主、大工厂主和铁路老板。所有经济学家的资料都证明，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整整二十年中，政府没有采取任何一个改善人民经济状况的措施。相反地，政府的整个财政政策都以创造和扶植私人资本为宗旨——这个时期的津贴、银行担保和税

率，一切经济措施，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在西欧，政府是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和体现者，而在我们这里，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产阶级的根子和缔造者。因此，民意党认为，在经济领域里，现存的国家在支持其它较小的剥削者的同时，本身就是最大的有产者，是人民劳动的最主要的、独立的掠夺者。政府在从经济上压迫人民的同时，也使各阶层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一千万以上的分裂教派教徒没有信仰自由，告密和警察措施使人民失去行动自由。人民由于缺乏受教育的自由而被迫处于愚昧状态。人民无从向政府反映自己的贫苦和需要，因为没有请愿权。最后，人民的整个生活全由横行霸道的行政当局摆布。

民意党人说，其它社会阶层的状况也不见得好些。地方自治机关被变成收税者，它不能提出有关人民需要的请求，它被故意弄得四分五裂、人事不和，它的有关人民生活的最迫切问题的呼声（例如征收所得税问题）没人管理，在国民教育方面，它必须服从国民教育部，在与它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伤心地关闭自治局办的学校（例如特维尔县自治局），地方自治局的选举和会议完全受政府的操纵。社会可以影响政府并通过政府影响生活的唯一途径是书籍和报刊，

但它们又受到严密的管制。在一个没有科学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地方，出版物又会怎样呢？即使在提供给它的有限的范围里，它也只能是荒漠中的哀鸿，就是说，只是对读者进行一点引导教育的工具，而不是实现思想、主义的工具，不管它指出什么，提出什么，——全是白费劲。它的最优秀的代表不是曾被流放，就是还在流放中，而被释放的人也是处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中（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赫尔岑、萨尔蒂科夫、弗列罗夫斯基、舍尔古诺夫、皮萨列夫、拉夫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加文、米海洛夫斯基、乌斯宾斯基等）。至于社会的年轻部分——青年学生，也是受到压制，没有结社的自由，受到警察的密切注意。对现制度进行变革的任何尝试都会撞在惰性上或受到残酷的迫害。青年向人民进行和平的宣传，受到的却是大规模的逮捕、流放、服苦役、蹲监狱。当他们为暴力所激怒，惩罚几个政府爪牙时，政府就报之以成立总督管区，报之以死刑。从一八七八年下半年到一八七九年年底，短短的一年半中，俄国共对十八名政治犯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成了真正的摩洛①，人民群众的经济福利以及一切人权和公民权都成了祭品，贡给了他。

① 古代腓尼基宗教中的男性大神，以活烧婴孩祭之。另一种说法是，“摩洛”是宗教术语，指以婴孩为祭品的火烧献祭仪式。

革命的民意党把现在这样组织的政府称为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头号敌人，民意党向俄国生活的主宰宣战，即依靠庞大的军队和专制的行政机构支持的国家政权宣战。这一论题的结论是：搞政治斗争，把革命活动的重心从农村移到城市，不是准备人民起义，而是策划针对最高权力的密谋活动，把它夺过来，转交给人民；高度集中革命力量是与集权的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一切给当时的革命界带来了真正的转折。这些观点推翻了过去的革命理论，动摇了社会主义和联盟制的组织传统，而且彻底打破了过去十年定下的革命陈规。因此，为了冲垮反对派、使新观点在革命阵营中最终占上风，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不倦的宣传，并采取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际行动，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民意报》第一期针对君主制喊出“Delenda est Carthago!”①的口号时，引起了一片不满的叫嚣，而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却受到一致热烈的叫好②。

在分家已成既成事实之后，列斯诺伊的公寓取消了。索·伊万诺娃和印刷所迁到萨佩尔胡同。我改用利

① “踏平迦太基!”此语出自古罗马政治家大加图。

② 指民意党人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

哈列娃的姓氏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搬到列什图科夫胡同十三号第二十二室，同年[①]十一月，他在这里被捕。

这地方定为我们开会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讨论并通过了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公布了。

先是由莫洛左夫宣读了利佩茨克大会通过的纲领，但与会者认为不尽如意，于是委托季霍米罗夫另行起草。他很快便提出一份草稿。我们都是同观点的，因此讨论进行得很快、很顺利，没有多余的废话——说长话不是我们讲求实效的会议的本色。

一开始我们就被一句定义难住了："我们是民粹派社会主义者。"我们是否能够和是否应当像已不存在的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那样，把自己也叫做民粹派呢？这样会不会引起概念混淆呢？会不会太顺从旧习而模糊了新思潮的涵义呢？要知道，我们分立出来正是为了巩固这新潮流的啊。热利亚博夫说："那么我们就使用'社会民主党'吧。"他接着说："这个词译成俄文只能译为'社会主义民粹派'。"但是大多数人坚决反对。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专有的称谓，我们俄国的纲领与德国的差别这么大，绝对不能袭用这个称谓。此外，我们中间也有坚决维护旧定义的。旧

① 即一八七九年。

定义强调了我们革命的历史，强调了我们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党派，政治自由对我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向人民群众的手段，是为他们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民粹派”这个名称表明，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是追求社会主义学说的抽象的终极任务，而是追求人民已经觉悟到的要求，它在根本上包涵着社会主义萌芽和自由原则。考虑到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是较为遥远的将来的事，新党提出近期的目标是：在经济方面，把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土地转移到农民村社手中；在政治方面，用全民的专制代替一人的独裁，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以自由表达的人民意志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高的和唯一的调节者的国家制度。达到这些目标的最有力的手段是消灭现在的国家政权组织，因为整个现存秩序，与理想的秩序如此截然对立的现存秩序，就是由这个政权支撑的。要消灭它，就得靠搞密谋来举行政变。

三、夺取政权

既然纲领的头几行就已开宗明义，确认以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为根本原则，那么在论述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人民代表制形式的人民政权的政治部分，我们便

合乎逻辑地得出进行政变和建立临时政府的结论。

应当指出，在民意党的纲领中没有谈到夺取政权问题，只谈到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取代它的人民政权之间的过渡环节，没有它就没法实行国家制度的任何革命变革。

“夺取政权”是后来在《党的准备工作》这份文件中提出的。我不能确定是由于这份文件还是由于我们出版物中其它类似的夺取政权的提法，引起了对热利亚博夫的非难，因为他纵容使用这个有雅各宾主义味道的词。在热利亚博夫住处（在伊斯梅洛夫团）佩罗夫斯卡娅和朗汉斯激烈批评了他，当时我也在场。我们大家都不满意，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是雅各宾主义者。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用少数人的意志来束缚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要颁布实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法令——而这些却是雅各宾主义的核心。要是这样，那我们当作党的口号和旗帜提出的“人民意志”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我们党现在这样的人员组成情况下，临时政府问题多半是个理论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它，更谈不上我们要进入政府。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是为了使纲领严整，是为将来党的规模扩大时而提的。要是我们真能活到这一天，见到这一天，那么，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地方自治机

构和城镇的活动家、律师、教授和文人伸手摘桃子，就跟十九世纪的法国至今的情况一样。

不得不这样。唯一只求能除掉这个窒息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注定贫困、愚昧和落后的沙皇制度。

我们与雅各宾主义有多大的不同，可以从执行委员会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事件后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看出。委员会提出召开制宪会议，并承诺它将尊重人民通过其代表所表达的意愿。这个承诺的意思就是，万一人民代表机构辜负革命党的希望，党不会对它行使暴力、采取恐怖行动，而是在还不能担负起历史重任的人民中宣传自己的思想。

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而且是品格出众的人，鼓吹过雅各宾思想。这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奥沙尼娜（娘家姓是奥洛文尼科娃）。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于奥廖尔省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在奥廖尔市受教育，也是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她在这方面的老师是扎伊奇涅夫斯基。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一个雅各宾派老革命家，六十年代曾服过苦役，后来住在奥廖尔市，受警察的监视。多年来，他一直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学生，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他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

玛丽亚·奥沙尼娜是一个睿智、机灵、刚强和干劲

十足的人，这些品质使她具有影响别人的力量。她的活动中心不是彼得堡，而是莫斯科。她从民意党一成立起就住在莫斯科，如果说她的雅各宾主义观点有所表现的话，那也只是在莫斯科。但是，完全看不出这种观点对以捷拉洛夫和她为核心的那批革命青年有什么影响，更不能把民意党某些文件中偶然出现的“夺取政权”的字样归咎于她。

历史学家尽可以认为雅各宾影响是来自国外。特卡切夫和图尔斯基先后在国外主编了《警钟》这份有雅各宾色彩的杂志。

当俄国的革命运动具有了战斗性质、向专制制度发起冲锋时，《警钟》热烈欢呼这些行动，并且把俄国革命之转向政治斗争归功于自己，归功于他们的影响。这是徒然的。《警钟》在俄国国内差不多没什么关系，它的传播是极其有限的，自从我一八七五年从苏黎世回到俄国之后，我从未在任何一个人家里看到过一本《警钟》；到我一八八三年被捕时为止，我从未在俄国任何一个大城市中听到有人提起这份杂志。不错，确有个别人具有雅各宾思想：奥廖尔的扎伊奇涅夫斯基，敖德萨的尤扎科娃，她曾在苏黎世上大学，但在南方人的圈子里（科瓦利斯基等），她完全没有影响。不错，在库尔斯克有过一次审讯被认为是审讯雅各宾派。受审的是

拉夫列尼乌斯、季莫费耶夫、斯皮钦和列别杰夫。但是，他们之中只有季莫费耶夫是雅各宾主义者——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的。《警钟》传入俄国的渠道没有一条是通畅的。我听帕立瓦诺夫说，图尔斯基在彼得堡没有任何接收和散发他的杂志的组织，还说有一次由于害怕搜查，当着他的面把刚来的不多几期《警钟》付之一炬。

不论土地和自由社或民意党与在国外的警钟分子都没有、也不想建立任何联系。

但是，如果说在民意党的创始人中有个女雅各宾主义者奥沙尼娜的话，那么，在我们中也有一个受人敬爱的同志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尊杰列维奇原先参加柴科夫斯基团，后来参加土地和自由社。他曾在国外（德国）住过一个时期，在那儿不仅接触了社会民主主义学说，而且接受了，而且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那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尊杰列维奇是个聪明、活泼、干练的人，党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设备，主要地是由他去搞来的。由于俄国的生活条件，他不能不看到，在当时的农民的俄国不存在建立一个像工业的德国那样的工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因素。目睹专制制度逞凶肆虐，而又有一个团体奋不顾身地向俄国人民的敌人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袖手旁观呢？于是他不顾自己的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信仰，毅然加入民意党，以便在俄国的

条件下，与俄国生活所推出的那些人携手并肩，用俄国生活所要求的那种武器进行战斗。

出于同样的原因，尊杰列维奇和奥沙尼娜与民意党的其他党员完全融为一体，而且成为党的非常积极的一员，并没有对我们党的共同活动方针提出任何异议或把他们个人特有的倾向强加给党。

毫无例外地联结着我们的共同东西是行动精神，是积极斗争，以及对人民、社会和那时仍按兵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那种消极状态的不满。

四、不到民间去了

起初，当民意党还在组建、党纲还在草拟尚未问世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观点和情绪主要的还是民粹主义。我们大家不久之前还生活在农民之中，坚持了这么多年的在民间活动，要割断过去是很困难的，尽管我们离开农村到城市不是出于自愿，而是逼于政治制度（它使我们的活动一事无成），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内疚，也担心这样做是抛弃过去的传统，叛变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真正解放是在经济方面得到解放）。但是，随着斗争的展开，时间的流逝和一桩宏伟的事业已由我们设想出来并正在进行之中，过去在人民中进行

的活动在我们心目中逐渐暗淡下来，对它的兴趣逐渐减弱，农村逐渐隐退到远处。民意党纲领中有关农村活动部分逐渐变成纯理论性的、文字性的东西。这完全是由客观情况，而不是由我们的情绪决定的。事实是在民意党活动时期，没有再往偏僻的农村派遣新生力量。不过，这种情况在民意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普列汉诺夫和帕坡夫在坚持保留旧纲领、反对他们称之为危险的狂热的时候，往往指责同志们说，战斗行动会使年轻人放弃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意愿。他们是不对的，不是恐怖行动使青年们放弃在农村活动，而是从事这一活动的人证明了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们拿不出值得夸耀的成果，他们拿不出足以吸引那些愿意人民幸福并自问如何才能帮助人民、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人的成果。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经历都说明了一点：在那儿，甚至合法的文化工作也无法展开，每一个在农村活动的人都处在警察、乡文书、区县警察局长的高压之下，在这些无孔不入的警察的视野之内，没有他立足之地。每一个想接近农民的人都被迫逃走，这种事不断发生，自然也就不可能鼓励其他人再去农村了。

一八七七至一八七九年，我生活在外省，很了解萨马拉、萨拉托夫、坦波夫和沃罗涅日儿省的情况，我可

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到民间去”的运动即使在七十年代初也是非常短暂的，个别人实际上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很多人呆了一、两个月，到了一八七五年底，这种热潮已经过去。只有一些侥幸逃过摧残迫害的人还在做这种试验。在北方，土地和自由社重新推动了这一运动；而在南方，不久便发生了斯特凡诺维奇策划的奇吉林斯克事件①。除了老一代（大两、三岁）剩下的人之外，土地和自由社还从较年轻的一代里吸收了一些人。不过，我们总数还是不多。在萨马拉省有八至十人；在萨拉托夫，连那些联系工人的人算在一起，在最高峰时也只有二十—二十五人；在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在农村中生活并尽力安顿下来的不上十人。如果看一看所有这些人的成分，便可发现，几乎没有新人，都是前一个时期剩下来的没有合法身份的人。

我在彼得罗夫斯克县呆了十个月，我的最亲近的同志们在沃尔斯克县呆的时间稍为长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期间没有一个新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尽管凭着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轻而易举地安置新来的人。我们所处的那种革命孤立真叫人懊丧。奇怪

① 一八七七年亚·亚·斯特凡诺维奇等民粹派在基辅省奇吉林斯克县组织农民秘密团体，准备起义。事情败露后有一千余人受追究，五个农民领袖被判处十二年苦役。

的是我们这些生龙活虎的人竟能这么长久地忍受这种状况，只有对人民的高度信任，深信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努力也终有一天会觉醒，只有这个信念在支持我们。土地和自由社只往伏尔加河流域派出自己的队伍，从"到民间去"的意义上说，谈不上对青年产生什么影响。我本人一八七七年曾趁我在彼得堡的时候物色可以吸收来参加外省活动的人，但一无所获。

因此，普列汉诺夫和帕坡夫把大学生——革命力量的主要来源——中逐渐蔓延的对在民间进行活动的冷淡态度归咎于恐怖活动，是不对的。不存在对革命的冷淡，但存在着对积极斗争的向往：莫洛左夫、奥辛斯基、米哈伊洛夫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正确发现了是什么可以使年轻的心跳动得更剧烈，何处有可以扩大革命运动、使之成为燎原大火的小火星。他们用行动来宣传，他们指出具体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道路，他们使脉搏跳动加快。他们用榜样来鼓舞人，把人引出停滞状态，投身战斗，建树功勋。

五、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纲领经过通读、讨论，通过了，这件事迅速办完了。我们转而讨论建党计划和制订执行委员会章程。执行

委员会这个名称是从利佩茨克会议的同志们那儿借用来的，他们是筹备组的主要核心，理应成为我们设想中的党的领导者和主持者。

考虑到与强大的敌人紧张斗争的需要，民意党建党计划规定了严格的集中制，并且要建立一个全俄规模的党。秘密团体即民意党的小组中，有的可以担负一定地区的一般革命任务，有的可为自己选择某一个革命工作领域，担负特殊任务。这些秘密小组组成的网络应当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就是执行委员会，通过它来取得团结和联系。地方小组必须服从这个中心，根据它的要求提供人力和物力供它支配。一切全党性的职能和全国性的问题都由这个中心来掌握。在起义时，它指挥党的全部力量，可以要求他们行动；而在这之前，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组织密谋上，——这是唯一能保证实行政变以便把政权转移到人民手中的组织手段。党的力量充分转移到这个方面来了，后来，它得到一个奇怪的名称：恐怖活动。它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名称纯然是从表面看问题。恐怖活动从来就不是党的目的。它是防卫、自卫的手段，被认为是强大的宣传鼓动工具，是为了达到有组织的目的而使用的。行刺沙皇只是这个活动的一个局部。一八七九年秋，行刺沙皇是必要的、迫切的问题，这就给某些人，包括后来背叛

我们的戈登贝格以口实，把行刺沙皇和搞恐怖活动作为整个纲领的最主要点。希望制止妨碍组织工作的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力求尽快进行组织工作，这就是作为民意党的中央的执行委员会一成立便决定同时在四个地方准备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唯一原因。但是，与此同时，执委会的成员们也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进行有力的宣传工作。热利亚博夫在哈尔科夫、科洛德凯维奇和我在敖德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在莫斯科，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科尔巴和其他人则在彼得堡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总是同破坏工作同时进行的，它虽不那么惹人注目，但是会带来成果的。

新党在把不满分子吸引到反政府的密谋活动来的同时，充分了解农民群众的起义在推翻政府之际能给予党多么大的支持。因此，它给予农民运动以应有的注意，而且一贯地把愿意献身此项活动的人看作自己的天然盟友。遗憾的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这样的人在民意党成立时和它活动的整个时期内，少得可怜。新党在农村活动方面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它只指示自己的农村同志必须向人民讲清政府在经济关系领域的作用（它一贯支持贵族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它的关税政策，等等）。

执行委员会的章程是我们据以约束自己的规章，

早已由召集利佩茨克会议的那些人写出来了。我记不得这次有没有作什么修改，以及对每个执行委员应承担并神圣履行的义务是否作了什么补充。章程有关这方面的要求是：1)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为革命抛掉一切亲属关系和个人感情、爱情和友谊；2)必要时也毫不顾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3)没有私人财产，自己的每一样东西莫不同时也是你所属的那个组织的财产；4)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秘密团体的同时，摒弃个人的意志，要使个人意志服从于体现为这个团体的决定的大多数的意志；5)有关组织的一切事情、人员、计划和设想应绝对保密；6)不论在私人或社交性质的交往中，不论在正式文件和声明中都不能称自己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只说是它的代理人；7)在脱离团体时，对团体的活动、对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的一切绝对保持缄默。

这些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对于满怀革命豪情、不避艰难险阻、不左顾右盼、一往无前的人来说，它们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不要求这么高，如果它们不这么深深地触及人的灵魂，它们就会使人感到不满意。而现在，这样的要求却因自己的严格和高度而提高了人们的境界，使人摆脱一切卑微的情欲，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心中怀着理想，感觉到一个人应当有理想。

第 九 章

一、行　刺

在忙完一切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后，执委会决定转入实际工作，决定在沙皇从克里米亚回京途中，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准备行刺他。几个代理人奉命立即前往莫斯科、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三个地方都使用爆炸的方法。但是，执委会没有预先规定究竟在什么地点、用什么具体办法，把这交给代理人自己决定，只是他们制定的计划必须上报执委会审批。代理人可以自行从当地人中找助手。一个地方的执行人员组成和执行方法对其它地方的代理人应当保密。除此之外，由执委会准备在彼得堡炸冬宫，但此事严加保密，由“指挥部”（我们当时管它叫“董事会”）负责进行。由于事关重大，指挥部由执委会从其成员中选举三个人组成，这三个人是亚·米哈伊洛夫、季霍米罗夫和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有一次，我听到克维亚特科夫斯基说了一

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当一切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匹夫之勇可能断送一切！"这是暗指哈尔图林。他后来对我说：有一次在冬宫里，他正好和沙皇单独在一起，只要给他一锤子，就能结果他。

我赞成搞行刺，却没被选派去组织行刺。我只承担道义责任，不能参加实际行动，而参加行动的同志却要冒受法律最严厉的惩罚的危险，这使我无法心安理得。因此我想方设法要求组织也派给我一点有关的工作。组织批评我说，我这是在寻求个人的满足，而不是把自已的一切交给组织支配，组织自会作出最好的安排的。不过，批评之后，组织也作了让步：派我送炸药去敖德萨。为了照管我们的公共宿舍，我征得组织同意让妹妹叶夫金尼亚接替我，住到这里来。她不久前才从梁赞省来彼得堡，用了波别列日斯卡娅的假姓，我建议她过来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一起住的时候，仍使用这个假身份证，却没想到妹妹由于缺乏经验，在与人交往时会用这个假姓自我介绍。这就成了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不幸遇难的间接原因。库尔西斯特卡·博古斯拉夫斯卡娅被她的一个熟人告发而被捕，搜家时查出几期《民意》杂志，她说是波别列日斯卡娅给她的。经向居民住址查询处查对后，叶夫金尼亚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

捕，一八八〇年他被处绞刑，她则被永久流放。在住处搜出炸药、导火线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来不及毁掉的一张小纸片。他把它揉皱，扔到墙角。宪兵拣起来看，但看不懂。纸上画的是一个平面图，有个地方画着十字架。正是这张小纸片断送了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的性命。宪兵方面说，只是在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冬宫发生爆炸之后，他们才明白这纸上画的是冬宫平面图，打上十字架的地方是餐厅，是准备炸掉的地方，因为沙皇一家都在这里。①

我拿到需要数量的炸药后，便带着它前往敖德萨，时间当是九月初。在敖德萨，我只见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基巴利奇奇。他对我说得赶紧找间房子，以便开会、做导火线试验和存放爆炸所需用的物品。过了几天我们便找到一座合适的房子，两个人用了伊万尼茨基夫妇的姓氏住了下来。房子坐落在叶卡捷琳娜大街六十六号。不久，科洛德凯维奇和弗罗林柯来了，稍后列别杰娃也来了。我们的房子是大家碰头的地方，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炸药存在这里，在这里烘干硝化棉，制备导火线，试验诱导器，一句话，在基巴利奇

① 据《红色档案》的文件披露，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在其特别声明（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中断然否认他知道炸冬宫的计划。他一口咬定这张平面图可能是哪一个来客落在他家里的。——作者

奇的领导下进行一切工作。同时，其他人，包括我，也给予种种帮助，有时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帮助。首先要制订计划——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把地雷埋在铁轨下。我们曾打算在夜里利用两趟列车之间的空隙时间把炸药放在敖德萨近郊的铁轨下，把电线拉到田里。但是，这不论在做准备工作时或是在实际行动时都有很多困难和不便。我们又想，最好是我们中有人弄到一个巡道工的差事，那就可以从巡道工的小屋埋设地雷，行动时没有比这更方便、更可靠的了。我自告奋勇去搞到这份差事。我们决定，如果搞到，这差事就由弗罗林柯担任，如果需要家室，那就由列别杰娃扮作他的妻子。起初，我想通过熟人把弗罗林柯安插到铁路上去，但不可能对他们透露真实目的，再说他们中未必有人愿意帮这个忙。闭口不谈目的意味着在要负重大责任的事情中滥用了别人对你的信任，再说，任何人对我要求谋一份巡道工的差事都会感到意外和可疑。因此，我决定作为一个陌生的求职者去找西南铁路管理局的有权人士，并把我的请求说成是出于慈善动机。在翻阅了各级负责人名录之后，我选定了敖德萨总督托特列边伯爵未来的女婿温格尔恩-施滕贝格男爵，当时他因为轰动一时的季利古尔斯克火车事故（数百名新兵在事故中丧生），正给关在要塞的禁闭室里。打听到

他会客的时间后，我便去找他。我对男爵说，我的看门人的妻子害肺结核，需要城外空气新鲜的环境。我请求他给他一个巡道工的差事。他说，巡道工不是由他，而是由分局长官派的，他一点也帮不了忙，他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空缺。于是我请他给分局长官写张便条，我说："有您的三、两个字就足以保证我的看门人走运了。"于是男爵给我写了一张给席格尔斯基的便条。我发觉温格尔恩-施滕贝格接见我不像一般上流社会人士接见太太小姐的样子，赶紧纠正我在衣着打扮上所犯的错误。我去见分局长时穿着天鹅绒衣服，打扮得雍容华贵，像个有求于他的贵妇人。我受到最为殷勤的接待，并要我第二天就把"您的人"送来。我回到家，扔掉孔雀毛，给弗罗林柯写了一份市民文书，用的是谢苗·亚历山大罗夫的姓名（我对他未来的上司说的就是这姓名）。这份文件就一直留在铁路局办公室，因为弗罗林柯扔下巡道工的工作时并未办辞职手续。第二天，他去见分局长，被派到离敖德萨十一（或十二）俄里、格尼里亚科夫附近工作。在他分到一间单独的巡道工房之后，便把塔季亚娜·伊万诺芙娜·列别杰娃作为自己的妻子接去。在这之后，往他们那儿运去了炸药，准备埋在路轨下。这时，戈登贝格突然来敖德萨，要求拨给他一些炸药带去莫斯科，因为那边的炸药

不够，而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是沙皇最可能通过的路线。只好听他的。戈登贝格在敖德萨呆了不到两天，等着把炸药从格尼利亚科夫运来。他大概是在来敖德萨的途中碰到基巴利奇奇，从他那儿知道我们在叶卡捷琳娜大街上的住处。基巴利奇奇是去哈尔科夫，因为那里的同志请他去弄一个什么技术装置。此外，确实情况我已记不清，只知道戈登贝格是在回莫斯科的一切都为他准备好的前一天由一个曾到过我们住处的人带到我们这里的。他确实按时离开了敖德萨，但在伊丽莎白格勒被捕。这之后，我们获悉沙皇不会取道敖德萨。于是弗罗林柯和列别杰娃先撤离格尼利亚科夫，接着又离开了敖德萨。后来我们听说沙皇的专列沿洛佐沃—塞瓦斯托波尔铁路顺利通过哈尔科夫：执行委员会派热利亚博夫、亚基莫娃和工人奥克拉茨基在这条线路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附近组织的暗杀没有搞成。地雷倒是埋到路基下了，电线也接上了，拉到远处的田里，沙皇专列通过时，行动组成员也在场，但是却没有发生爆炸。一种说法是因为电线接得不对，因此没有点火。莫洛左夫说，彼得堡执委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为什么没有发生爆炸。希里亚耶夫、莫洛左夫和亚·米哈伊洛夫被选为小组成员。他们让热利亚博夫表演他是怎样接线的，热利亚博夫接

得就是不对。而流行的说法是电线埋下后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被弄坏了。

在第三个地点——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上，是在车站旁的一座房子里作爆炸准备的。十一月十九日午夜一时是沙皇过境的时刻，两挂灯火通明的列车一挂接一挂驶过。这座房子的女主人索菲亚·利沃芙娜·佩罗夫斯卡娅发出第一个信号，但斯捷潘·希里亚耶夫没把电线接通，火车安然通过了。佩罗夫斯卡娅给了第二个信号，第二挂列车炸毁了①。但沙皇乘坐的是第一列火车，第二列里乘坐的是随行的宫廷侍役。暗杀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件事在俄国产生极强烈的印象并在全欧洲引起反响。

秋天，在彼得堡，我们接二连三地受到损失：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牺牲了，接着是希里亚耶夫和其他人，后来在萨佩尔胡同的民意党印刷所在英勇地武装抵抗后被捣毁，一个工作人员普塔什卡② 自杀(或被击毙)，四人被捕。

十二月中，基巴利奇奇离开敖德萨，一月里，科洛德凯维奇离开，其他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人也和他们一

① 电线是希里亚耶夫接的，但大家约好在法庭上都说是加尔特曼接的——加尔特曼当时已在国外。——作者

② 即卢布金。——作者

起走了，分散开来。全部事务交给我和几个在革命者中少有人知的当地人负责。

我的工作是宣传。我的住处必须小心保护，不能与外界、与旁人频繁接触。我在这所房子里呆了三个月。我渴望与人们交往，渴望生气勃勃的活动。那个时候，如果我在各界的中间人是些更有能力的人，确切些说，更善于选择材料的话，那我本可以给组织做更多的工作。在我身上，长期受压抑的能量像地下泉那样奔突着，可是我接收的是一些萎靡、畏葸、对未来没有信心的人，后来这些人不得不因为不适用而淘汰掉。但是，在基巴利奇奇离开后，我还是广泛结交各界人士，这里面有社会各阶级的人，从教授、将军、地主和大学生、医生、官吏，到工人、裁缝。每到一处，只要可能，我都宣传革命思想，捍卫民意党的行动方式。但是，我最喜爱的圈子是青年，年轻人感情真挚、强烈。遗憾的是我在大学生中认识的那些人对他们周围的环境抱着悲观的态度，根本不相信这里面会有革命分子。

二、萨什卡工程师

在敖德萨，我用安托尼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戈洛夫列娃的姓名住在亚玛街。我是用费·尼·尤哥夫

斯基所使用的身份证到当地公证人处公证分家而搞到身份证的。我在北方时就已认识尤哥夫斯基。此时，他在敖德萨住了一个半月左右。

尤哥夫斯基是一个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的人，与当时一般类型的革命者迥然不同，因而使人对他怀有好奇心。

我是一八七九年在彼得堡，当我们住在列斯诺伊区的别墅里的时候，认识尤哥夫斯基的。他刚从南方来，一方面为在赫尔松金库下面戏剧性地挖了地道、偷走一百多万卢布而欣喜陶醉，另一方面又为没有为革命保住这百万钱财而懊恼。

一次，我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他是半路上坐上来的）一起乘有轨马车到列斯诺伊。他对我耳语道：

“您看看我们对面的那个人。”

“是骗子？”——我看了看我对面的人，问亚历山大。

我还从来没见过骗子。在我想象中骗子一定有明显的标志。这不，我对面的那个人，那对大大的眼睛就是骗子的标志。

当他和我们一起在别墅前下车，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微笑着介绍他：“萨什卡工程师”时，我是多么惊讶啊！这个诨号是报界因为他在赫尔松干的那桩漂亮的

事而送给他的。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南方型的黑发美男子，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一张椭圆形的脸，五官端正，蓄着络腮胡子，一张不大的嘴，挂着微笑，一对大眼睛也流露着微笑，还闪烁着狡黠的光辉，——是一个使人不能不注意的人。

他的精神面貌在我们当中也是很突出的。这样满不在乎、快活、放任不羁和勇敢的人，我不论在这之前或之后都没碰到过。这是一个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么叫做纪律，什么叫做使自己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的人，真正的自然之子。他是一匹没有笼头的草原野马，终其一生都是独来独往，不受约束，在北方时也没加入我们的组织，尽管很靠拢我们。他的道德素质和我们大家全然不同。我们相识后，我笑着对他说："也许在党里应当有一个萨什卡工程师，两个也行，要是有三个，那可就受不了啦。"

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因此不能没有强烈的激情，他爱生活中的一切赏心乐事、美酒佳肴。对我们的同志来说，生活已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所圣化，而尤哥夫斯基则是"我们是为生活而生"这一原则的化身。从这一方面看，我觉得，与我们那些严肃的、苦行僧式的严厉的理想主义者相比，他简直是个堕落者。但是，我

还是对他有点眷恋，虽然从大量小事上看出他是个有心计的人，对他得小心提防着点，不能不顾一切地信赖他。我的同志们都是实在、真挚和坦率的人，而萨什卡工程师却狡猾，常常像孩子那样要滑头，我不敢担保他不会心口不一。

他对我们女革命者的态度与我们其他朋友完全不同：他们有的是纯朴的同志情谊，而尤哥夫斯基则两眼发亮，献殷勤，讨好我们，努力满足我们刁钻刻薄的要求，开玩笑，说俏皮话来逗我们大笑、淘气、胡闹。

他不理睬我们公认的准则和我们革命秘密活动的特殊条件所要求的一切。一次，他对我和安娜·帕夫洛芙娜·科尔巴干了一件把戏，那是我们的彼得堡同志中没有一个人干得出来的。

有一个时期，我和安娜·帕夫洛芙娜一起住在列斯诺伊，我们占了两间房，有单独的过道。一天夜里，我们正要入睡时，听到楼下门口有人在小心地转动钥匙。我们害怕了。这座房子里除我们俩之外，还住着几个不相识的年轻人。莫非他们要闯进来？但是，当我们从楼上窗口探身问道："谁在那儿？"时，下面小声说："萨什卡工程师，开门！"

篱笆和大门都上了锁，院子里还有狗，但狗却没吠。尤哥夫斯基怎么能进入院子并打算撬我们的门

呢？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在彼得堡城郊从行驶中的郊区列车上跳下来，铁路宪兵怀疑他是小偷，把他带到段警察局，以便验明他的身份。警察检查了他的通行证后放了他。但尤哥夫斯基认为他的住处已然暴露，决定拿“几件东西”后放弃它。但是他根本不想整夜流浪街头（而其他任何一个同志都会这样做的），于是便来找我们。他爬过篱笆，给狗“念了咒”，用万能钥匙——“我随身带着它”——开我们门上的锁……

他从住处拿的“几件东西”不是衣服。不是！而是一只手工做的红色的描黑镶金的小木碗和一只同样的小木桶。他当下就把它们送给我们，还说除了我们这里，他无处可去。

“可是我们把您放到哪里呢？”——我们问。“我们只有两张床呀！”

“难道我要占很大的地方吗？蜷一蜷不就得了？”——快活的客人回答说。他要了一条毯子，便在地板上躺下。

第二天早晨，我们着慌了：看门人的妻子要来收拾房间，她会看到萨什卡工程师在我们这里过夜的。

“瞧，这儿不是有大衣柜吗？”——他说，“把我锁在里面。我以名誉发誓，打扫房间时我不会吱一声。”于这

类事，他是有经验的。说罢，他便躲到女服后面。我们锁上柜子，他安安静静地呆在里面。当桌上摆上茶炊时，我们才放他出来。

这件事叫我们心神紧张，又感到挺有趣。但是，我们严厉的安全监督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由于他警觉地监护着我们大家，我们管他叫做“看门人”）可不是这样看的，他把萨什卡工程师狠狠地剋了一通，使他感到十分委屈。打这以后，什么应当服从组织及纪律，什么遵守秘密工作守则一类的话，他连听都不想听。

尤哥夫斯基完全不善于从事稍微有点严肃的工作、脑力劳动或读书，而且对这类事毫无兴趣。他天资聪颖，也不乏才干，但他需要的是活动、热闹、与人交往，他需要获得各式各样的印象，需要刺激。

我在列斯诺伊看着他整天游手好闲，感到讨厌，便对他说：

“您倒是找点事干干呀，哪怕看看书也好！”

于是我给他一本刊载有格·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的《祖国纪事》。

几天以后，尤哥夫斯基有点难为情地把书还给我。

他说：“请原谅，跺脚姑娘，我怎么也看不下去……我眼睛看着书，心里却想着挖地道。”他说他想再去挖地道，为革命事业再搞来几百万。钱使他着迷。

尤哥夫斯基在席吕塞尔堡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在库尔斯克省一个地主家里的家庭变故中偶然被捕的，当时他用的是戈洛夫列夫的姓，正好有事到这个庄园来。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他和帕坡夫、布清斯基等人一起受审，被发落到西伯利亚卡拉矿山服苦役。他企图从那儿逃跑，于是给送回彼得堡，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基棱堡，那里的狱规和半月堡的一样。一八八四年，他和民意党人一起给转到席吕塞尔堡。

在这里，疾病终于彻底毁坏他那强健的体魄，他于一八九六年去世。

三、炸 冬 宫

在这期间，彼得堡发生了许多事件。前面已经说过，在准备在莫斯科、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和敖德萨搞爆炸的同时，执委会在彼得堡还有一个打算——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曾向我暗示过。

同情民意党的斯捷潘·哈尔图林[1]是个很机智的工人，一个细木匠，那时正在皇帝的游艇上做工，有机

---

①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作者

会出入冬宫。为了完成反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行动，他通过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与执行委员会联系，执委会由“指挥部”出面，完全赞成这一行动，并把这事揽过来。

哈尔图林详细了解了宫里各个房间的位置、周围的环境、仆役的规矩和习惯，与下层人员混得很熟。他伶俐、手巧，尤其讨得和他同住在宫里的地下室的一个宪兵的欢心，他竟然把哈尔图林看作是自己女儿的理想夫婿。

经过此番准备后，斯捷潘开始一点一点地把从执委会得到的炸药放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带进地下室。等积到相当可观的数量、继续带进会让人看出、招来搜查的时候，便决定行动了。

在黑森王子抵达彼得堡的那一天，即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当大家都进入餐厅时，哈尔图林应当引爆，炸掉餐厅，把沙皇一家连同他们的客人都埋在瓦砾里。

他这样做了。在预定的时刻，他把一段俾氏导火线与埋在炸药里的发火管接通，点着导火线，便永不回头地走了。

当沙皇一家走进餐厅时，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地下室上面的那一层住的是芬兰卫队，五十名士兵伤亡。可是炸药的数量仍不足以把上面一层的餐厅炸毁。餐

厅仍然完好，只是地板震歪了，桌上的餐具叮咛哨啷地掉下来。

沙皇一家有惊无险。

这之后，宣布实行罗利士-麦里科夫专政，迎接他的是姆洛杰茨基的子弹。三、四天后，姆洛杰茨基英雄般地含笑死在断头台上。这些事件连同十一月十九日的事、萨佩尔胡同的事，还有戈登贝格招供后出现的关于其它两起行刺准备的传闻，使整个社会大受震动。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苦于缺乏政治自由，对反动派早已感到不满，但又逆来顺受，不能与政府作斗争，现在，他们惊讶又欣喜地看到我们党是反对君主专制的斗士。他们由于许多人被流放、被绞死而惊慌，而愕然，他们原以为革命运动已山穷水尽，可是就在这一片沉寂和失望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前所未闻的事。革命者借着化学和电气的帮助，炸掉皇帝的列车、潜入皇帝的宫室。社会的惰性越大、越不敢反抗，革命者的力量、创始精神和坚定性就越使他们感到惊愕。当我们自己因为失败而深深陷于痛苦之中的时候，执委会的声望却在我们周围与日俱增，它的活动使人目眩，使青年忘乎所以。普遍的看法是，现在没有什么执委会干不了的事了。事件本身的磅礴气势使人忘却了它的失败。二月五日事件在欧洲产生的印象，使土地平分社

的领导人心花怒放，他从国外给我们写信说：“使世界注视你们，对你们刮目相看，难道这不就是胜利吗？”这样一来，民意党本来只想煞一煞反动派的威风，但周围却推着它更上一层楼。

对执委会和党的这种态度越来越增强，到了三月一日，当其它一切行动都进行得很顺利时，达到了最高峰。社会期待的不是沙皇政府会给予什么，而是革命力量会做出什么。当然，我应当说明，我上面所说的社会是指我们革命者与之有接触的那一部分社会。但是，由于我们把深入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唯一的任务，我们的工作；由于我们不仅在省城，而且在穷乡僻壤都有志同道合者，而他们又有自己的亲朋友好；由于我们周围有一圈同情者，而在这一圈同情者之外是一些欢迎自由化的人；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到处受到赞扬，没有一个地方遇到精神抵制和反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权代表社会讲话，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社会的先进部队。也许我们把我们在其中活动的这一部分社会看得比它实有的要大，但是它一定比我们敌对阵营里的人所想象的更有力量。我们知道有这么多人同情我们，因此我们不觉得在我们与国内其他人之间有什么隔阂。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在行为中表现出顽强的精神，即检察官在审讯时

所说的“顽固不化”、“怙恶不悛”。为了消除我们的“顽固”，就得消除我们周围的不满气氛，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使不满意的人满意。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感到满足了。

四月二日、十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五日造成这样一种情绪：如果那时执委会和整个民意党放弃搞破坏活动，那也会出现一些志愿者或新组织担负起刺杀沙皇的使命。继续进行暗杀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执委会也就继续干下去了。

一八八〇年三月或四月，萨布林和佩罗夫斯卡娅先后来到敖德萨。他们到亚玛街斯塔夫罗夫家我的住处找我，对我说执委会派他们来此制备地雷，以供皇帝到克里米亚度夏路过此地时使用。

我正忙于为刺杀总督托特列边伯爵的办公厅主任帕纽京伯爵作准备。此人是总督的得力助手，看来，总督把沙皇委交给他的这个地区的一切内政大权，完全交给此人了。至少在我在敖德萨的这段时期里，人们议论帕纽京多于议论托特列边。帕纽京确实是敖德萨人的凶神恶煞。他受过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栽培，对百姓是毫不手软的，“二十八人案”绞死了五人；与此同时，他在全市进行大清洗，把市议会比作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抓了议会的好几名职员；接着又逮捕了教

师、文化人、大学生、官吏和工人。许多人被放逐。大概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敖德萨这样苛刻、这样随意把人驱逐出境，而且进行得这么草率，甚至没有认真验明身份，以至错误百出，把同姓者或亲属放逐了。当时的《民意》杂志曾公布了这位"英雄"的数则业绩。他粗暴无礼，在他办公室里，流放者的亲属常常受到侮辱。当一个被捕者的怀孕的妻子忍不住抽噎起来时，他大叫："给我滚出去！莫非你想在这里下崽！"仅举以下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托特列边伯爵一八八〇年夏被调往维尔纽斯，行前曾奉召到彼得堡，据说他受到申斥，说他在总督任内"plus royaliste que le roi"。[1]在他前往维尔纽斯上任时，他在月台上当着为他送行的全体贵族的面责备帕纽京，说他滥用了他对他的信任，使社会和他（托特列边）对立。托特列边离开敖德萨之后，大多数受行政流放的人都被接回来。

我想用党的武器来惩治这个帕纽京。为此，起先安排一个人住在帕纽京办公室所在的索亚街，以研究他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收效，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哪一个是帕纽京。后来，一个年轻人不但向我指出他，而且还介绍了他通常走的路线，

① "比皇上本人更专制。"

因此我只要在一定的时刻出门，差不多天天都看到他那肥胖的身影，有两个便衣护送他：一个在他身边，一个跟在后面，离开四、五步。执行行刺任务的人也物色好了，他要在帕纽京某次散步时用匕首干掉他。时间和地点都已选定。为了便于刺客逃遁，我想准备一匹马。

但是，佩罗夫斯卡娅的来到和执委会布置的任务，使我只得放弃这一计划。

佩罗夫斯卡娅告诉我，她带来热利亚博夫（或科洛德凯维奇）给工人瓦西里的一封信，他可以参加计划中的暗杀沙皇的工作。她想见此人。这个瓦西里就是梅尔库洛夫，后来他在敖德萨出卖了所有他认识的工人和斯维坚采夫小组的一个人，在“二十人案”中检举了自己过去的同志们，最后，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日，在哈尔科夫街头把我抓住，当时这个叛徒装作好像是给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其实是特地给派来抓我的。在佩罗夫斯卡娅来到之前，我已经认识这个坏蛋，那时我想向他学石雕手艺。还在秋天里，我就听科洛德凯维奇说他是一个极诚实、极好的小伙子，在格尼利亚科夫的爆炸准备工作中，他也做了一些事，因此，我不假思索地就把我在亚玛街的住处告诉他，请他来这里教我雕刻。安排佩罗夫斯卡娅和他见面，自然不费什么事。

不几天，他们就见面了。

萨布林和佩罗夫斯卡娅来时已带来一个拟好的行刺计划：他们应当选定皇帝从车站出来去码头最可能走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以夫妻的身份租一间小店铺做买卖，从店铺里把地雷埋到街道下。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后来在彼得堡小花园街上实行的那一种计划。技术方面当由格里戈里·伊沙也夫负责。不久，他和亚基莫娃一道来了。

佩罗夫斯卡娅没带钱来，她要和我们一起造出预算送执委会，它将送来需要的款数。我们计算了一下，需要一千卢布。我建议报告执委会不必送钱来，我可以负责搞到这笔款。我确实分几次先后给了佩罗夫斯卡娅大约九百卢布，用来付房租、买食品杂货和螺旋钻、支付所有参加者的食宿费和后来离开的路费。

小店铺坐落在意大利街，一租下来便立即开始工作：必须抓紧，因为皇帝五月份就要来，而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在四月里才开始的，而且只能夜间进行，因为地雷的导火线不是从卧房，而是从铺面接出去，白天顾客进进出出。我们不打算挖地道，而是用螺旋钻钻孔。这工作很艰巨：土壤是粘土，会粘住钻头，钻起来得用很大的力气，而进尺却非常之有限。最后，我们终于钻到人行道的石板下面了，于是朝上钻，终于通天了。不久，

格里戈里·伊沙也夫在制备导火索时给炸断三个手指头。他本人倒是坚强得很，可是我们难过极了，他得住院治疗。这之后，存放在他住处的东西（炸药、雷汞、铁丝等）全部转移到我这里，因为我们担心他房间里的爆炸声会引起整座房子的注意。我们少了一个工作人员。我提议吸收我了解的当地人参加，大家都反对。我们决定不用钻，而是先挖几俄尺地沟，再从沟的末尾用钻子钻，挖出的土得堆在卧房里。我们认为，在完工之后也应当清除干净，防备沙皇过境之前对沿途进行逐户大检查。因此我们提前把泥土弄出去，每个人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在自己的住处找到一个可以埋土的地方。同志们用篮子、提包、包袱皮把土拿到我这里，我趁屋里没人时把女仆支出去办事，把土倒出来。这时，没再听到沙皇要到利瓦季亚的传闻，接着我们接到执委会的停止准备工作的通知。于是我们建议利用已经作好的准备来炸掉托特列边伯爵。这个提议被否决了，因为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对付沙皇的，要谨慎使用。不过准许我们用其它办法暗杀伯爵。

这之后，我、萨布林和我吸收的几个人开始注意总督的行踪。我们想使用投掷炸弹的方法。假如那时有伊沙也夫和基巴利奇奇后来发明的那种东西，那伯爵当然就已不在人间了。可是我们只有炸药和不完善的

引火线，因此炮弹体积大，既不方便，效力也不见得可靠。不过，要不是托特列边被调离敖德萨，我们还是要执行我们的计划的。我们想为丘巴罗夫、达维坚科、洛戈文科、维滕贝格、迈丹斯基、德罗比亚兹金、马林卡和利佐古布报仇。他们之中，马林卡和利佐古布是因为自己的富有而被托特列边杀害的，迈丹斯基和德罗比亚兹金是因为知道要行刺密探戈里诺维奇，知情不报，而给送上断头台的。托特列边和切尔特科夫残忍无道，一般人莫不对其恨之入骨。我们打算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干掉各地的总督，以摧毁他们所领导的机构。

托特列边调离之后，一切准备工作只得取消。意大利街上的店铺关门，那下面的地沟则用原先挖出来的土填上。我也帮着做这件不费力气的工作：夜里我用麻袋把土从卧室里拖到地下室，男同志们再把松土踩实。当一切都妥善处理完毕之后，萨布林和佩罗夫斯卡娅离开敖德萨，接着伊沙也夫和亚基莫娃也走了。我请他们转告执委会：我请求把我从敖德萨调回，并指定一个我可以将此地的工作和关系移交给他的人。我为我这愿望陈述的理由是，我远离组织的中心、独处外省已将近一年，感到自己与全局的工作有点脱节；我须要在彼得堡呆一呆，总结这一时期自己所做的一切，并和组织研究商量一下今后的工作。

大约在七月里，没等接替我的特利哥尼到来，我便离开敖德萨前往彼得堡了。

瓦西里·梅尔库洛夫根据彼得堡的邀请，和我同时离开。看来，这个叛徒当时待我很不错，因为到京之后，他曾通过几个与他有工作往来的人约我见面。回想起这事就叫人恶心。我到花园里见他，因为那时天气还暖和。

他是一个爱动肝火、永远不知足的人，总是骂知识分子，赞美工人和劳动生活。我们原谅了他的某些暴怒，以为这在无产阶级身上是难免的，因为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仇恨老爷们的一切。我们认为他唯一的缺点是自尊心太强，我们尽量照顾他。我最后一次与他相会不晚于一八八〇年八月。从那以后，与他再没有个人的或工作上的交往，也没见到过他，直到一八八三年二月十日，他和德加叶夫在哈尔科夫出卖了我。

四、米哈伊洛夫被捕

彼得堡迎接我的是一顿训斥——擅自离开敖德萨，没有亲自把特列哥尼介绍给熟人。我明白，如果我在敖德萨，他会比较容易熟悉情况，但是我为自己辩解说，由于长期没有收到彼得堡的来信和任何消息，我感

到不安。看来这使组织原谅了我。我在提出敖德萨工作总结时，向特列哥尼介绍了一切，作了必要的提示，给他写了介绍信，使他能迅速与周围的人建立一定的关系。这之后，特列哥尼南下，而我则由执委会留在彼得堡。

这时，这里正在石桥附近的戈罗霍夫街进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和炸冬宫的那次一样，这事也是高度保密的，由我们的“指挥部”负责。我只知道一点：准备在沙皇路过时炸死他。这次是由水下炸。

我知道沙皇常在一定时间去皇村车站，因此，有一次我便沿这条路走，而且果真碰见载着沙皇的马车。我很想看到这个是我们党的灾星的人，哪怕一辈子只见到一次也好。这之前和之后，我都没见到过他。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驶过这条路，因为这之后他便到克里米亚去了，深秋之前不会回彼得堡。因此，行刺计划没有实施。

十月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被捕。他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卫士，一个管家型的人物，没有一件关系到我们的安全的小事能逃过他警惕的眼睛。

被捕的人一般在涅瓦大街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照相馆照相。米哈伊洛夫因为一个小青年不肯到那儿取

相片而非常生气，便亲自前往。这是一些已被判刑的同志们的照片。照相馆里乱哄哄，一个店员做了抹脖子的手势暗示米哈伊洛夫有危险，米哈伊洛夫便走了。但是，他不顾这一情况和执委会的禁止，第二天又去……他刚一走下楼梯，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暗探便一把抓住他……

对我们来说，亚·米哈伊洛夫是一位无法取代的同志，可以说他是我们党的明察秋毫的眼睛和革命事业极其需要的纪律的维护者。我们因失去他而受到惨重的、简直无法抵补的损失：要是他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后来许多的不幸是可以避免的。他对革命赤胆忠心，他生气勃勃，坚定顽强，办事干练，讲求实际。他是那么小心谨慎，连最胆小的人和他在一起工作也会感到安全无虞。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能透彻了解人，但是在执行组织原则时，他是不折不扣，说一不二，始终不渝的。他严格要求每一个人履行自己的义务，他视事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要求革命者抛弃人的一切嗜好，抛弃个人的一切兴趣和抱负。有一次我们谈到这个题目时，他对我说："如果组织命令我去洗碗碟，我也会像做一件有趣的脑力劳动那样，高高兴兴地去干这事。"因此，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某些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卑贱的观点，在他看来，凡是党需要的都是高尚

的，都是应当满腔热情地去做的。这样完美的人不能不在党内和党外人士中具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党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俄国狭隘的生活天地不容他在广大范围内施展才干、在历史上扮演重大的角色。要是在十八世纪大革命的法国，他会成为罗伯斯庇尔。

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来说，他还具有另一层意义。按参加革命的时间来说，他是那些联结着现在与过去的最老的党员之一。还在一八七六年之前他就与革命联结在一起了。从此，他成为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经历了一八八〇年底为止的革命运动的一切波折和各个演进阶段。

因此，他是革命传统的保持者，与这四年间牺牲的所有优秀人物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的牺牲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每当我们遭到不幸时都倍加怀念他。

第十章

一、军事组织。苏哈诺夫

一八八〇年秋和一八八一年初是民意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迅猛发展的时期。与外省建立广泛的联系，建立地方组织，按地区分别制订详细的行动计划，执委会派出代理人巡视一定区域或常驻国内一些最重要的城市，——这些都是这个时期里做的事。这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件已为这些工作打好稳固的基础：土地平分社作为一个组织可以说已经消失，它的领导人逃到国外了。在基辅，米海尔·帕坡夫的人数众多的组织，由于潜入其中的扎布拉姆斯基的告发而被摧毁。《民意》机关刊的广泛传播，口头宣传执委会的纲领，主要的是斗争行动本身——它们是最有力的宣传，引来了对民意党的普遍好感。四面八方派人来找执委会，要与它建立联系，表示愿为新的行动计划效力，要求它派人去组织地方力量。执委会自然立即利用这么有利的

形势，收获自己用劳动和牺牲所培育出来的果实。理性的广泛觉醒，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活动的结果，它表现在各团体和个人强烈要求联合，要求参加党，一再表明自己随时准备参加反政府的积极斗争。勇敢精神也和惊慌情绪一样，是有传染性的。党的力量和勇敢吸引了新的生力军。死并不可怕。

在彼得堡，在极大的范围内扩展了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在罗利士-麦里柯夫专政时期，警察和宪兵没有找碴和搜捕，这特别有利于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进行工作。这是一个人心活跃和怀抱希望的时期。七十年代前半期的革命失利和接踵而来的反动高压所造成的那种沮丧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好像这十年（一八七○——一八八○年）不是对在俄国进行的一切反抗进行慢性摧残的十年似的。弑君的呼声很高，因为罗利士-麦里柯夫伯爵的政策骗不了人，它一点也没改变政府对社会、对人民和对党的态度的实质。伯爵只不过用软的一套来代替粗暴的硬的一套而已。但是，他这只手给的，另一只手又夺回去。例如，他把受行政流放的人遣回，并对此举大肆宣扬，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对彼得堡居民广泛实行这一措施；他一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手令使西伯利亚卡拉矿山的苦役犯的境况更加悲惨。这一手令除了别的规定之外，还剥夺了他们与亲

属通信的权利，而与亲属通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宝贵啊！直接给亲属写信被禁止，却假仁假义地允许编入自由大队的人写信给苦役犯的亲属报告犯人的健康状况和需要，这些信通过官方，即监狱办公室发出。当然，除了这个办法之外，苦役犯还有与亲属通信的秘密方法。我已把这样的一封塔·伊·列别杰娃来信交给彼得堡革命博物馆。它是写在胸衣的白布衬上的，而且就随着这件胸衣带出来。

革命的社会舆论要求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处死沙皇和他的伪装自由派的御前大臣。在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代表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它的技术人员正忙于改进投掷式炮弹。迄今为止，地雷的威力都嫌不足，投掷式炮弹应在地雷爆炸时起辅助作用。组建民意党的军事组织也是执委会在这一光辉的活动时期所做的一件事。

必须在军队里拥有支持者——不是偶然地吸收个别人，把他们埋没在革命大军里，而是在军队本身不断积聚革命分子，以便与专制制度进行武装斗争。这种认识在七十年代是根本没有的，只有民意党才把在军队中进行工作变成革命党的一件例行任务。在“一百九十三人案”和“五十人案”中都有军人，但他们只是一些脱离了自己的环境、“到民间去”——到农民和城市工

人中去的普通宣传员①。民意党既然把政治斗争、武力推翻专制政府和赢得自由放在第一位，不可能不懂，没有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休想指靠未经军事技术训练的人民群众来取得胜利。因此，自从土地和自由社分家之后，先是为建立新党进行组织工作，继而是在莫斯科、敖德萨和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进行暗杀沙皇的准备工作，当这一切都告一段落时，执委会的代表开始在军界寻找关系，目的在于为未来的军事组织准备干部，以便积极支持日后有组织的或自发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个军事组织的性质如何、它与执委会的关系如何，当时都还没有确定。在没有确切的材料来实际采取计划之前，这还是一件空泛的事。重要的是问题提出来了：致力于首先以暴力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党，应当在军队中寻求支持，应当在军队中有同盟者，他们虽然在某些场合无能为力，但在另一些场合，在必要时是能给予党积极的支持的。在执委会一八七九至八〇年那个冬季所制订的关于党的准备工作的《意见书》中，已约略概述了这个构想。在这份《意见书》中有一章专门谈党在军队中的活动问题，虽然远不如一八八〇年秋天所

① 例如彼·阿·克鲁泡特金、列·埃·希什科、谢·米·克拉夫钦斯基等。——作者

确定的那么明确。

在一八七九至八〇年的那个冬季，执委会通过苏哈诺夫中尉与喀琅施塔得海军军官建立了联系，通过谢·德加叶夫与彼得堡的炮兵建立了联系。德加叶夫从前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的炮兵里服役过，在炮兵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由于“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

建立这种联系的条件，部分地已在前几年由一些自学小组准备了。这跟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间海军学院里的情况差不多。当时，苏哈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卢茨基等人都参加了这样的小组。后来他们被谑称为“捕鲸人”。这个名称出自参加自学小组的人向长官作的解释：由于有人打小报告，长官发现学院里存在“秘密团体”，小组成员解释说，他们是想发展俄国北方的捕鱼业——这个想法是读了马克西莫夫①有关这些渔场的文章后产生的。另一种说法是，这种解释是为上级编造的，上级自己也乐得事情不具有犯法性质。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小伙子们确实想去捕鲸，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

不过，生活本身也不能不对军人阶层，哪怕是对部

①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马克西莫夫（一八三一——一九〇一），俄国作家和民族志学家。

分军人，发生影响：有热爱人民的合法出版物的存在，成群结队的青年到民间去，七十年代中进行的一连串政治审讯，在全国各城市进行的一连串逮捕，还有早在民意党成立之前，从一八七八年薇拉·扎苏利奇行刺开始的一连串暗杀行动，震动了俄国的社会舆论（这里面有：在彼得堡，梅津采夫毙命、暗杀德连捷林；在基辅，海金毙命；在哈尔科夫，总督克罗波特金被暗杀掉；索洛维约夫暗杀沙皇没成功）。如果这一时期陆军和海军里人人都对军界以外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那倒是反常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一八七八年，一个由海军军官和海军学校高年级学生（阿·布拉诺夫、维鲁博夫、拉夫罗夫等）自发组成的小组在喀琅施塔得的下级军官中进行宣传工作。俄土战争、保加利亚的解放和实行宪法也起了作用。战争充分暴露了俄国制度的腐败：丧尽天良地侵吞军饷和盗窃国家财产，对士兵毫不关心，他们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缺医少药。军官们不能不思索这一切的根源，不能不寻求铲除这一切的办法。他们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那里实行了宪法，却让俄国继续处于原来的专制制度之下，继续受政治奴役。参加过攻占普列文的波希托诺夫在法庭上（一八八四年）说："我们想，与其解放别的国家，不如想想如何解放俄国。"

高等军事学校、军事学院作为提供良好教育的机构，不可能不分化出一定数量的受到社会思潮和要求自由的呼声鼓舞的军官，事实上它们确实产生了以罗加乔夫、波希托诺夫、布采维奇等人为代表的这样的军官。

执委会委员与喀琅施塔得的联系始于一八七九年晚秋，持续到一八八〇年春水兵出航之前。我们与苏哈诺夫的相识是通过他的妹妹奥莉加·叶夫根尼耶芙娜（夫姓佐托娃）的。热利亚博夫在克里米亚时就认识她和她丈夫，后来奥莉加·叶夫根尼耶芙娜在彼得堡上学时，热利亚博夫和佩罗夫斯卡娅去拜访过她。佩罗夫斯卡娅也认识佐托夫。

埃·亚·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其回忆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在喀琅施塔得苏哈诺夫寓所里的第一次聚会上，热利亚博夫留给他们的印象。在这里，海军军官们与革命党的卓越代表第一次见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民意党纲领的明确性，演讲人的口才，他的信念的内在力量，以及他的堂堂仪表，使听众着了迷。谢列布里亚科夫说，这个晚上他们都变成了狂热的革命者，尽管一个小时之前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还几乎没想到过政治，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还可能为头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感到后怕。对许多人来说，这次印象不久就淡忘了，因为

被邀请参加第一次聚会的人并未经过特别的挑选。但是，对于另一些人，也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一样，这印象却是永不磨灭的。

后来的几次聚会，除了热利亚博夫之外，科洛德凯维奇也参加了，与会者不如第一次多，但却加深了民意党革命思想的影响，把准备吸收进军事组织的那些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苏哈诺夫从一开始就一般地支持热利亚博夫在会上阐述的执委会纲领，但当时还不准备加入党：他向来反对搞政治恐怖行动；再说，执委会当时也还没制订出军事组织的计划。只是一年之后，即一八八〇年秋，当我们与苏哈诺夫及其伙伴们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并确信可以实际考虑军事组织问题的时候，才制订这个计划。

一八八〇年九月，我也认识了奥莉加·叶夫根尼耶芙娜。这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对哥哥崇拜得不得了。尼古拉·叶夫根尼耶维奇不在彼得堡，他出海还未归来。但是，妹妹不停地谈哥哥，显然是希望我们尚未见面就成为朋友。其实我从热利亚博夫、佩罗夫斯卡娅和佐托娃那里听到如许多的对他的赞美，也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归来。当他回来，我和他共同消磨第一个晚上之后，我也被他迷住了：他的谈吐是这么自然、高尚和坦率。一八八一年二月，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奥

沙尼娜(当时奉执委会之召从莫斯科来参加会议)初次和苏哈诺夫相识，也得到同样的印象。苏哈诺夫确实是一个令人不能不爱他的人。他属于那种你越了解他就越爱他的一类人。他正直无私，毫无虚荣心。他纯真坦诚得像透明的水晶，你不由得会奇怪：在一个虚伪、欺骗、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纯洁的人。他在私人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温柔多情，对社会事业满腔热情，生气勃勃。他不在追求功名和个人幸福上浪费精力，在三十岁上，以青年人的热忱和执着投身政治活动。

在第一次难忘的会见之后，我们开始常常见面，话题自然是社会问题、革命问题，和我们民意党党员为之而生存的党的利益问题。我想使苏哈诺夫和我们一样，把这些问题和利益当作自己切身的和最焦虑的问题。有这样一位同志，能在共同的事业中与他携手前进，是幸福的，他是值得争取的。热利亚博夫、佩罗夫斯卡娅和我都在他身上下功夫。我们在奥莉加·叶夫根尼耶芙娜那座简朴的寓所里消磨了很多时间——苏哈诺夫和他的朋友施特龙贝格男爵常到这儿来。施特龙贝格已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比苏哈诺夫早确定自己对党的态度。热利亚博夫从头年在喀琅施塔得与他们谈话中就已了解他们，因此一开始就交代我："施特

龙贝格已不成问题，把注意力放在苏哈诺夫身上。”那时的苏哈诺夫确实还远不是我们其他同志在一八八一年二月和三月间看到的那个苏哈诺夫。不过已经可以看出，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使他发出光和热。到了一八八一年初已经可以说苏哈诺夫将死在断头台上，他甚至是在政府宁可不大肆杀人的情况下自己为自己建造断头台的。在他所热爱的热利亚博夫牺牲后，在那个对于执委会是多事之秋的春天，他的情绪激流冲决了一切堤防：三月一日之后，他的行动极其急躁，极其不谨慎。要是热利亚博夫在世，他的铁臂是可以把他约束在应有的限度之内的。苏哈诺夫一以当十地拚命工作，希望最大限度地从青年的热情和社会的同情中为党争得好处。我们竭力遏制他的狂热，但都无济于事。我多次对他说，他的热情不能支持长久，我们的活动不是以月计，而是要以年计。他不以为然，他说：“不，不，应当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年，两年，然后就——一了百了！”在他这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下，未必能干一年、两年。

一想到没有合法身份的生活，他就感到讨厌，他没法忍受这种生活的封闭性：时时伪装，处处提防。他需要的是广阔的天地，自由的空间。当我们在花园街挖地道时，苏哈诺夫不得不和其他同志一样，在黑暗的

地底下挖土，他向我坦白承认，这很不合他那光明磊落、公开行动的习惯。“瞧，我跟田鼠一样打地洞！”——他说着，不禁打起寒颤。

此外，他不像我们这样久经磨练，他的神经还没有为不幸和殇逝所麻痹，他无限热爱和崇敬的那些同志的牺牲使他痛不欲生。这对他来说还是新伤，在我们这种革命生活的条件下，他是活不长久的——绷得太紧的弦一定会断。他本可以免遭厄运：同志们向他发出了警报，他自己也终于及时看到了危险，但是他仍然不听劝告隐蔽起来，而是麻木不仁地束手就擒，而被捕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除了大部分罪证之外，他下一步的行动方式也已经确定、深思熟虑过，他已拿定了主意。他就这样牺牲了，这个精神品质如此高尚的人就这样牺牲了。可以说有苏哈诺夫这样的党员的那个党是幸福的！

在我们相识的初期，我们谈的纯属理论问题，影响苏哈诺夫立即加入我党的主要障碍，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政治恐怖活动。但是当我们说服了他，使他相信必须用战斗行动来反对压迫着俄国的暴力和专制之后，他承认了执委会的全部纲领、策略，于是我们的话题便转入军人在革命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谈到除了民众组织之外，还需要纯军事组织。

这时，执委会已订出建立军事组织的原则，并开会讨论通过了。这之后，军事组织的纲领和章程就可以成为与苏哈诺夫、施特龙贝格以及其他军官代表讨论的东西了。

军事组织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军事组织应按民意党建党方式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即集中制原则，并在组织上完全独立于党之外；军事组织由一个由军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其成员由民意党执委会选定；各省的地方军事小组由军事中央委员会或党组建，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而中央军事委员会本身则服从执委会领导。

军事组织的目的是在执委会确定的时间举行武装起义。执委会掌握着在准备时期里在军队、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积聚起来的全部力量。因此，军事委员会不是独立发挥作用，而是从属于党中央，因为党中央充分了解国内形势和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情绪。

何时主动出击反对现存制度，不是由作为党的一部分的军事组织决定，而是由领导全党的机关——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军人的任务或是支持业已开始的运动，在必要时刻把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投入人民的一边，或是发动起义，但不是自己擅自发动，而是根据全

党的领导中心——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发动。

每一个加入组织的军人必须承担某一项义务，视其所参加的小组的革命程度而定，最严重的义务就是一旦中央军事委员会传达执委会的要求，就拿起武器走上街头，并号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做。但是，在这些部队中进行革命宣传却不是军官的义务，他们不到主动出击的时候不得暴露自己。党会根据军官的要求派工人去做宣传工作，军官们只须指出哪些士兵最可能接受革命影响就行。

有时，军事组织的成员应请假，有目的地去那些与军人有联系的地方走走。他们应当利用党的指示和军事组织成员的介绍结识新交，把适当的人组织起来，在新吸收的军官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建立起联系。

民意党地方组织有责任大力协助建立地方军事小组，但这样的小组一经成立，它就独立于普通党组织，不参与地方党的工作，而与中央军事委员会联系，受它协调行动，甚至也不与其它地方的军事小组联系。

这样一来，总的来看，党由两个平行的组织构成：一个是民众组织，一个是军事组织，两者之间只由中央联络。这样分割，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是为了最大限度

地保证军人的安全，否则他们可能因为地方党组织偶然被破坏而受牵连，然而建立新的军事小组以替补已暴露的旧小组要比恢复地方党小组困难得多。

为便于两组织中央的联络，执委会选出两名委员作为代表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后来，我们认为有必要也从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由我们挑选一个人来参加执委会。从一八八一年一月初开始，这个人选便是苏哈诺夫——我们当时所认识的军人中最优秀的一个人。

在一八八〇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苏哈诺夫为了在大学里听课和兼任物理学教授凡德尔弗利特的助教，从喀琅施塔得搬到彼得堡来住。他在尼古拉耶夫斯卡亚街上租了一套有家具的房子，奥莉加·叶夫根尼耶芙娜带着她的小儿子安德留沙搬过来和他一起住。从此这寓所就成了研究军事组织问题的开会、碰头的地点。参加预备会的执委会方面的人有热利亚博夫、科洛德凯维奇、巴兰尼科夫和我，军事组织方面的人有苏哈诺夫、施特龙贝格和炮兵军官尼·罗加乔夫——在“一百九十三人案”中被判服苦役的德·罗加乔夫的弟弟。这三个人是我们挑选来当未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的。纲领和章程的主要点经讨论确定后，又在扩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这时参加的有炮兵军官波希托诺夫和中尉布采维奇。这两人后来都给关在席吕

塞尔堡并死在那里。苏哈诺夫的一些同志——埃·阿·谢列布里亚科夫、扎瓦利申等人也到过他的寓所，因为需要听取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为最后作出决定和把大家联合成一个组织创造条件。这次联合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苏哈诺夫的喀琅施塔得同志彼此之间并不是一般的相识，而是有深厚的亲密的同志情谊的；炮兵方面的罗加乔夫、波希托诺夫和德加叶夫的同志和朋友们，情况也是一样。苏哈诺夫组织了一个海军小组，上述这三位组织了一个炮兵小组。在军人中，苏哈诺夫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地位。

他是个精力充沛、英气勃勃、热情执著的人，在军人中无疑地起着最主要的宣传者、鼓动者同时又是组织者的作用：没有一个人不为他的魅力所倾倒。他的道德品格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指挥才能令人慑服，而他的性情又是那么温柔和富有同情心，在他左右的是聪明睿智、学识渊博的布采维奇，踏实稳健、博学多才、漂亮可爱的大力士罗加乔夫，慎思明辨、待人和气的波希托诺夫以及心灵纯真的施特龙贝格，——这真是出类拔萃的一伙，不论在个人品格、学识教养和仪表风度方面都是令人仰慕的一伙。有了这样的人员组成，军事组织是有望成功的。它的中央领导机构预定由五人组成，其中有上面提到的由我们指定的苏哈诺夫、施特龙

贝格和罗加乔夫，而执委会方面则委派热利亚博夫①和科洛德凯维奇参加。

在通过章程、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之后，苏哈诺夫在喀琅施塔得的同事中组织了一个海军军官小组，为此他在秋季召开了一系列的会。其中一些人我在苏哈诺夫的彼得堡寓所里曾经见到过，其余的则是在喀琅施塔得认识的。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伊沙也夫被捕、我放弃彼得堡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的寓所之后，苏哈诺夫把我带到喀琅施塔得，安顿在他的朋友施特龙贝格和扎瓦利申那儿——他们有一套独门独院的寓所。

施特龙贝格在才智方面并不出众，但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意志坚强，沉着冷静。他是一个感情不外露、不善言辞的人，个子不高，体格柔弱，蓄着金色的大胡子，白里透红的脸色说明他不是俄罗斯人。扎瓦利申和他正好相反，是一个健壮魁梧的男子汉，黑头发，活泼，热情。一个是慢性子，讲求条理；一个是急性子，生龙活虎，对政治恐怖行动非常向往，一谈起它就眉飞色舞，一双黑眼睛闪闪发光。

我和他们相处了七天左右。除了埃·阿·谢列布

---

① 在热利亚博夫被捕后，执委会根据苏哈诺夫的建议，指派我接替。——作者

里亚科夫之外，还见到其他海军人员——他们的好朋友和小组成员（荣格、格拉斯科、普罗科菲耶夫、拉祖莫夫）。他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主要地是由于他们之间那种毫无拘束的同志关系。这是在大学生团体里和精诚团结的革命组织里才可见到的那种团结友爱、纯真质朴的关系。

参加海军小组的共有三十来人，当然各人的素质是不同的。有的革命世界观已完全确立，有的还只能划为“同情革命”。在军界，衡量一个人能否参加组织，其尺度是和我们不同的。鉴于我们的活动首要的是做宣传工作，因此我们对发展对象的理论素养的要求特别严格，入党前需要具备一定的工作履历和相当的经验。对军官则没有这一类的要求，他们都是新手，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在他们那儿，单纯的友谊团体很容易演变成密谋组织。许多人加入这个行列并不是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行动承担严重的责任，要抱定决心走到底；促使他们加入这个行列的是友情、同志义气和年轻人的勇敢精神。

缺乏保密观念、对形势的险恶估计不足，在苏哈诺夫身上表现得很明显，而在他的同志们身上就更加严重了。苏哈诺夫因此付出了生命：我已经说过，他是有意向死神走去的，尽管警告过他会被捕，但他不愿转入

地下。在朋友间聊天时，随便就说出三月一日用的地雷和炸弹的导火线是从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处偷来的。使人惊讶的是除了苏哈诺夫之外，他的整个小组没有受到摧残，只有格拉斯科被调到黑海舰队、施特龙贝格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之所以会这样，多亏海军军人的精诚团结和同志情谊，甚至连一些并不同情革命运动的人也都想方设法掩护同志。

在喀琅施塔得组织起海军军官小组的同时，在彼得堡也成立了民意党的炮兵小组。除了前面提到的罗加乔夫、波希托诺夫和德加叶夫之外，参加的还有帕平(在多尔古申案中被判刑的帕平的弟弟)、尼古拉耶夫和其他三、四个人。

这样组织起来的军事组织看来是有成长壮大的可能的。民意党纲领在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军官中得到支持，领导核心是由不仅善于领导，而且善于争取人的人组成，——一切都使人对军事组织寄予巨大的希望。在向组织成员们征求意见时，他们提出了两百个(后来数量更大)分散在各地、或多或少同情搞政治恐怖活动的军人的名字。军事组织成员到各地巡视时应当去拜访他们，摸清他们的革命觉悟程度，如果合格，就将他们组织起来，与中央建立联系。

一开始，罗加乔夫就受命到芬兰执行这一任务。他

做得很有成绩。接着应到其它地方去。为此目的，苏哈诺夫本当在一八八一年夏季之前请假到南方好几个城市去。他的炽热的激情、简洁有力的讲话、惊人的坦诚和轩昂的风度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三月一日行动后，社会正处于群情激昂之中。

二、与国外的联系

一八七六年，西欧对社会问题的提法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完全消失了，从这时起，俄国革命运动成为独立的运动，采取了完全独特的形式和方向。与此同时，俄国流亡者对革命俄国也失去意义，曾经是传播流亡者的影响并完全由他们掌握的出版物也转移到俄国本土上，以便直接呼应新潮流，适应当前生活的要求。这一年，革命组织与俄国流亡者的正常联系中断了，对行动的党来说，他们已成为“嫁出去的女儿”。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的两次爆炸事件时为止。执委会的这两次行动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西欧社会各阶层对俄国革命党的活动的强烈兴趣和注意。

此后不久，帝国政府向法国交涉，要求引渡执委会代表加尔特曼（十一月十九日就是从他的房子炸沙皇

列车的，他用了苏霍鲁科夫的化名）。不论俄国大使馆怎么奔走，共和的法国始终没有答应，这无异于在全欧洲面前给了俄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会不会引渡莫斯科爆炸事件的主犯问题，在俄国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关注，法兰西共和国的拒绝更具有意义，——这是政府的失败和革命党的胜利。

执委会从这件事看到欧洲的公众舆论对党的意义。它决定在国外宣传党的真正目的和意图，向欧洲社会介绍沙皇政府的国内政策，争取欧洲社会的同情。这样，我们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在国内用爆炸方法动摇王座的同时，从国外破坏它的声誉，也许还可以促使某些文明国家施加压力，从外交上干涉我们这个黑暗王国的内政。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利用流亡者，即对俄国国内的革命工作已无直接作用的革命力量。

执委会建议让他们中的加尔特曼和拉夫罗夫作为党的全权代表，在国外本着民意党的党纲精神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进行这项工作的方式可以是做报告、开会，但主要的工具还是小册子、传单和杂志文章，可以在其中介绍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加尔特曼应当带着这个目的周游美国的主要城市；西欧社会主义方面的所有杰出人物都答应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支持他。执委会还致函其中一些人，如卡尔·马克思和罗什弗

尔[1]，吁请他们在它的代表加尔特曼组织反俄国专制制度的宣传时给予帮助。对此，《资本论》的作者除了表示同意之外，还给执委会寄来一幅亲笔题辞的照片。加尔特曼说，马克思骄傲地把执委会的信拿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根据我们在国外的朋友的一致反映，不只卡尔·马克思一人表示出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敬意，社会普遍都关注俄国的革命运动。记者纷纷抢着报导俄国的消息，俄国革命是最热门的新闻。为了制止新闻界向欧洲公众散布的大量的不实的传闻和无耻谰言，必须从国内向驻外代表经常提供有关俄国革命方面发生的一切情况的报导。一八八〇年秋，执委会推选我为国际联络书记。我负责执委会与加尔特曼的公务信件来往，给他寄去通讯报导和被害同志的生平事迹介绍，提供革命出版物、被捕和被判刑的同志的照片、国内出版的杂志、报纸。总之，我尽可能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三月一日以后，我寄给他我的最后一篇报导——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导以及执委会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和科博泽夫亲自画的他的干酪店的内景素描。

---

① 安里·罗什弗尔（一八三〇——一九一三）：法国政论作家。

三、干 酪 店

早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未被捕之时，执委会就计划在皇帝最常过往的某一条街上租一间商店或小铺子，从店里埋地雷，进行爆炸。为此，有几个人应经常留意所有招租的房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由于沙皇一定要去米哈伊洛夫斯基练马厅，所以便在通往该厅的街道上找房子。米哈伊洛夫生前已看好两处合适的房子，执委会最后从中选定了一处，这就是小花园街上的缅格坚的房子。执委会决定在这里开一家卖干酪的商店。

当执委会着手物色人选时，我推荐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波格丹诺维奇当商店老板。

波格丹诺维奇从一八七九年离开萨拉托夫之后直到一八八〇年秋季一直没有露面，我和他甚至没有通讯。自从我来到彼得堡并见到老朋友皮萨列夫之后，我决定尽一切努力找到他，把他叫来。我照他留给我的地址几次给他去信，没得到回音。在他离开时，我曾为他写了几封给我的熟人的介绍信，现在我便往这些地方写信，希望他们能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我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责怪他把老朋友忘得一干

二净，并恳切希望他来彼得堡一见。原来他病了，虽然还没完全康复，但还是很快就来了。但是他那副模样使我和皮萨列夫不得不强迫他首先去治病。然后，他得了解人和认识人，了解沃罗涅日大会后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党的纲领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之后，他参加了执委会一些代表所进行的实际组织工作，最后他本人也作了执委会的代表。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作为深知他的人，向执委会说他实际工作能力强，极为灵活机智，因而推荐他当商店的老板。这事就这样定了。

我一直不知道商店的确切地点和店主人的化名，直到大概是二月份，即波格丹诺维奇所持的身份证即将过期，他来请我用科博泽夫的姓氏为他另造一个新证。我所写的这份身份证在向缅格坚家登记后，好像一直保存在房屋管理人那儿。

新年前，波格丹诺维奇和假装作他的妻子的亚基莫娃搬进店里。我们开始从店铺往街道下面挖地道。

四、涅恰耶夫

一八八一年一月，根据执委会的决定，我和伊沙也夫应当搞一个寓所专供执委会成员开会之用。下级中任何一个人也不许知道这个寓所的地址，不许到这里

来，唯一的例外是三月一日的前夜，根据执委会的决定，把基巴利奇奇叫到这里来加工炸弹。

我们住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25/26号，靠近沃兹涅先斯基桥。有三个房间，很冷，很不舒适，但有其优点：这座房子的院子通两条街，而且这里开有一家澡堂，这对我们这里人来人往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我们用科哈诺夫斯基夫妇的姓氏报了户口，伊沙也夫住到四月一日，我住到四月三日——由于伊沙也夫在街上被捕，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寓所。

一月的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伊沙也夫满身披霜地回来，那天冷得要命。他扔下大衣和帽子，走到桌边，——我和执委会的两个人坐在这里。他把一小卷纸放在我们眼前，好像没事似地平静地说：

“涅恰耶夫寄来的！从半月堡里捎出来的！”

涅恰耶夫寄来的！从半月堡里捎出来的！

我第一次听到涅恰耶夫这个名字时，正十九岁，正想从偏远的喀山省奔往国外上大学。那时，在彼得堡正在审讯“涅恰耶夫分子”，我从报上读到审讯总结。应当承认，整个审讯只有伊万诺夫之死，由于描写得很悲惨，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其余的一切一晃而过，我并不理解。

我还记得舅舅彼·克·库普里扬诺夫就这个案件

说了这样的话：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它所应得的政府。”

我把这话当作公理，就像那时候我把许多东西当作公理一样。舅舅没有作什么解释，我那时也没有更多的想法。

我第二次听到涅恰耶夫的名字是在一八七二年，那时我已在瑞士的苏黎世上学。这年八月，我们学生中纷纷传说（第一）国际的波兰人斯杰姆普科夫斯基出卖了涅恰耶夫，他被捕了。俄国政府要求把他作为刑事犯引渡。我们大多是几个月前才来瑞士上大学的，都不知道涅恰耶夫在瑞士，在苏黎世；他的被捕我们都极感意外。我们不知道俄国密探早已在瑞士搜寻涅恰耶夫，并且和瑞士当局商定一旦找到涅恰耶夫即予引渡。我们也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件事：涅恰耶夫在日内瓦的时候，有一次有人在街上把谢列布连尼科夫当作涅恰耶夫抓了起来，他当时也和涅恰耶夫一样，住在奥加廖夫[①]家。只是在把涅恰耶夫曾执教的安德列耶夫学校的门房和大学的门房从俄国叫来，确认被捕者不是涅恰耶夫之后，谢列布连尼科夫才被放出来。据米·

①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加廖夫（一八一三——一八七七）：俄国革命者、诗人、政论家，和亚·伊·赫尔岑一起编辑出版《钟声》杂志，

彼·萨任说，这事之后，涅恰耶夫在山里躲了一阵子，是马志尼的瑞士朋友极为小心地把他护送到那里的。后来他住在苏黎世，朋友们劝他别住在这座城市里，他不听，他认为这是流亡者想把他排挤出他们的圈子。在苏黎世，涅恰耶夫靠画广告挣钱度日，据和他有来往的米·彼·萨任说，他是一个手艺颇高的油漆匠，收入满不错。涅恰耶夫不与俄国学生接触，不过和少数波兰人和俄国流亡者有来往，直到斯杰姆科夫斯基把他出卖给警方。

瑞士的一般舆论对涅恰耶夫没有好感，因为大家都知道伊万诺夫被害这件事。一些旅居苏黎世的侨民（埃尔斯尼茨、拉利、萨任）替涅恰耶夫说话，但没有什么收效，他们出版德文小册子，解释涅恰耶夫的活动的政治性质，但销路不大；他们召开集会，但来者寥寥；他们派代表去找瑞士最强大的工人组织格留特利联盟和比尔东斯联盟，请他们为涅恰耶夫谋求共和国法律所保障的向政治流亡者提供的避难权，但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保护刑事杀人犯。

逮捕本身已经表明联邦当局的立场，涅恰耶夫的命运已经定了。

少数青年学生，主要的是塞尔维亚人，打算在涅恰耶夫被押送到车站时劫持他。原以为可以集合起

三十来人，但实际来的人很少，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去和押解涅恰耶夫的警卫队硬拚，是连想也不要想的事。

拉利（阿尔勃雷）在一篇有关涅恰耶夫的文章中说，他们还是试了，但公众帮助警察重新抓住涅恰耶夫，还逮捕了两个企图营救他的人。

有两个学生也坐上火车，想在途中便宜行事，但当局在沿途各站都采取了严密的警卫措施，因此一路上都没有作任何营救涅恰耶夫的尝试。

在俄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庭判处涅恰耶夫二十年苦役，形式上是遵守了与瑞士的协议：把涅恰耶夫作为刑事犯处理。但是后来，他并没给押到西伯利亚，他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他在哪里，是死是活。

几年就这样过去了，他的形象再没出现在我们眼前。现在，在这一八八一年一月的晚上，他从亚历克赛半月堡寄语执委会！

这字条是怎样送达我们手里的呢？

涅恰耶夫在宣判后即被送进半月堡，当时这里只有一个囚徒——神秘的舍维奇，他患着精神病，已无可救药。四十年之后发表了谢戈廖夫根据一九一七年革命后开放的档案文件所作的研究结果，据他考证，这个

囚徒的真姓是贝德曼。①

一八七九年米尔斯基被关进半月堡，他是因行刺宪兵首脑德连捷林而被判刑的。但是，米尔斯基没有取得涅恰耶夫的信任，他不想通过他与民意党联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洞察力②。但是，在“十六个民意党人案”（一八八〇年十月）之后，斯捷潘·希里亚耶夫——执委会委员、在莫斯科城下炸沙皇列车的主持人给关进半月堡。涅恰耶夫看出他是一个严正的组织的从事严正活动的人，便决定和民意党联系。靠着狱中一个忠于他的士兵的帮助，涅恰耶夫给执委会写了一封信，信是寄给医科大学学生杜布罗文的，他是希里亚耶夫的同乡，也是伊沙耶夫的好友。

这信是纯公务式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丝毫伤感，只字未提过去，也不谈现在的感受。涅恰耶夫简单地、直截了当地提出救他出狱的问题。自从一八六九年他躲到国外之后，革命运动的面貌已大大改观，它空前壮大了，后浪推前浪，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乌托邦

---

①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贝德曼（一八四〇或一八三九—一八八三），俄国革命者，在伦敦的赫尔岑的印刷所工作，回国后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关进亚历克赛半月堡，前后达二十年。

②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米尔斯基告发了涅恰耶夫在狱中的秘密活动。——作者

式的“到民间去”阶段，比较现实的土地和自由社阶段，随后是转向政治、转向反政府斗争的阶段，——不是用言论斗，而是行动。而他呢？他写道：他是以一个刚离队的革命者的身份给没有失去自由的同志们写信的。

这封信产生了奇异的印象：涅恰耶夫身上的一切污点顿时消失：无辜者的血，敲诈银钱，假造文件，败坏他人声誉，进行讹诈，总之，本着“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信条所干的一切、蒙在涅恰耶夫革命者形象上的一切污点，顿时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在长期的单独监禁中没有泯灭的理性，在残酷的惩罚下没有屈服的意志，在人生一再的挫折下没有消蚀的力量。在执委会的会上宣读了涅恰耶夫的信之后，我们全都万分激动地说：“应当营救他！”

在后来的信中，涅恰耶夫逐渐透露了他这几年的工作情况。是的，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在半月堡的秘密囚室里继续工作。他日复一日地努力使周围敌视他的环境接受他的影响。他研究每一个看守他的宪兵和狱卒的性格。他不停地观察，把一切都注意到，都记在心里，以便在所收集到的材料的基础上定出对每一个人进行攻心的方法。他日积月累地涣散看守他的下级官吏的纪律，破坏他们的上司在他们心目中的声誉，他宣传鼓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促使人对他说实话，承

认他，从而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利用单独监禁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把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涂上神秘的色彩，提高自己在看守们心目中的地位，使他们崇敬他，使他们对未来怀着某种向往。

就这样，这个不同凡响的囚徒通过缓慢然而不断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据他说，已使四十个受到他宣传的人服从他支配了。从这些人那儿，他逐步地、小心翼翼地探听出半月堡和彼得保罗要塞的详细情况，这里在干什么，这里的机构、工作人员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一切规章制度，特别是要塞和半月堡所在的那个小岛①的地形情况。他终于积累了许多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资料，可以据之制订越狱计划并付诸实施了。他，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多少年来在默默无闻的独处中准备的就是这个。

涅恰耶夫仍然守着他的老传统，认为营救他时要作一番神秘的布置。为了取得武装警卫的信任，营救人员要身着军装、戴奖章；他们要宣布发生了政变，亚历山大二世被废黜，皇太子继位；他们应当以新君的名义宣布对半月堡的这个囚徒实行大赦。诸如此类

---

① 一九〇〇年半月堡被夷平，构成小岛的涅瓦河河汊也被填平。——作者

的装模作样我们当然不屑一顾，而对涅恰耶夫来说，却是很典型的手法。

在执委会会议上提出营救涅恰耶夫问题时，一致决定把这事交给当时已经组建就绪的军事组织去办。行动负责人、营救队队长定为苏哈诺夫，因为他是一个果断机智的人，指挥能力很强。执委会在详细研究了行动地点的条件之后认为，还是用船走水路把营救队送上半月堡所在的小岛较为合适，不要冬季从冰上走。这就是说把营救工作推迟到开春以后进行。不过，促使执委会做出这一决定的不只是这一考虑，还有其它一些情况。执委会手里有亚历山大二世的事。过去组织的行刺一个接一个，却都没有成功，现在正在全力准备一次新的尝试，算起来这是第七次了。小花园街上的商店，白天做干酪买卖，夜里几个执委和一些代表用铁锹和钻头挖地道，挖出来的土装在盛干酪的桶里。放下这项工作就意味着把整个事业的成功拿去冒险。准备工作越快结束，越能自信地放眼未来：商店的干酪库存不足，临时凑数的伙计不会做买卖，亚历山大二世星期天到米哈伊洛夫斯基练马厅去的路线可能改变，——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全部劳动功亏一篑。必须加紧干，不要左顾右盼，不要分散精力。这使执委会坦率告诉涅恰耶夫，行刺沙皇的准备工作占去我们全部

力量，我们不能同时做两件事，因此营救他的事只能放在行刺沙皇的准备工作之后。

我看到有的出版物说，执委会把两件事提请涅恰耶夫本人决定孰先孰后，涅恰耶夫主张先搞行刺。不，执委会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它不可能停下小花园街的准备工作，使它前功尽弃。它只是向涅恰耶夫通报了情况，涅恰耶夫回答说他当然要等候。

季霍米罗夫说什么热利亚博夫曾去过半月堡所在的小岛，在涅恰耶夫的窗下和他谈过话，这也纯属杜撰。没有这回事，也不可能有。热利亚博夫是准备中的暗杀行动的负责人。小花园街的地雷可能在沙皇的马车通过之前几分钟或之后几分钟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在街两头的四名投弹手就应当用手中的炸弹来炸他。要是炸弹也没有炸到，那么手持匕首的热利亚博夫就应完成这件伟业。我们下定决心这一次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这件大事。既然订出这样的计划，执委会有可能让热利亚博夫去半月堡吗？且不说根本就无法把他送到那儿。难道热利亚博夫能置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在小花园街的角色，乃至于营救涅恰耶夫一事于不顾，去冒这个毫无意义的、极其愚蠢的风险吗？绝对不可能！①

与涅恰耶夫的联系，开头是通过杜布罗文，后来由

伊沙也夫担任——杜布罗文带他去和那个传递纸条的士兵接了头。通常他们是在街头某个约定地点碰头，士兵转交给伊沙也夫一小卷纸条，纸宽约一俄寸[2]，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潦草的字。

这种联系持续到四月一日，那一天伊沙也夫被人盯梢，在街上和波德别利斯基同时被捕。这样一来，与半月堡的联系便暂时中断。这个波德别利斯基是个大学生，在二月间大学里的一次闹事中曾污辱了教育大臣萨布罗夫。

佩罗夫斯卡娅比伊沙也夫早被捕（三月十日），她通过她的辩护律师凯德林转告我们，在她的笔记本里用密码写有两三个女裁缝的地址，那是涅恰耶夫提供的，说半月堡的宪兵曾去找过她们。但是，看来这几个地址没有给佩罗夫斯卡娅案的侦查人员提供什么有效线索揭露我们与涅恰耶夫的联系，因为后来还是通过那个杜布罗文恢复了这个联系。我方的联系人是萨维利·兹拉托波尔斯基。但是，叙述这之后的联系情况

---

① 我曾就此事问过目前尚健在的当时在彼得堡的执委会成员亚基莫娃和安娜·科尔巴，她们都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具有决定意义的回答是弗罗林柯：他是“指挥部”成员，不能不知道这事。他的回答是：不曾有过此事。 ——作者

② 一俄寸相当于四.四厘米。

以及最后的结局（说来真惨！），已经不能凭我个人的回忆，而要根据档案了（但我手头没有）。我本人在伊沙也夫被捕后就离开彼得堡，等我再回到这座城市时已是阶下囚了。据一些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看到警察署档案的人告诉我，由于米尔斯基的出卖，一些为涅恰耶夫效劳的宪兵和士兵被捕，其中二十三人受审①，其余的一些人受到行政处分。

涅恰耶夫死在半月堡。他的死直到革命前一直是个谜。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八日希里亚耶夫去世。他在未被捕时就已患肺病，他的死还是涅恰耶夫通知我们的。一八八二年三月在"二十人案"中受审的莫洛左夫、伊沙也夫、弗罗林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克列托奇尼科夫、巴兰尼科夫、科洛德凯维奇、朗汉斯、阿龙奇克和特利哥尼，一八八三年初"十七人案"中的波格丹诺维奇、格拉切夫斯基、萨·兹拉托波尔斯基都被关进半月堡，他们分别被关在半月堡三条走廊的囚室里，但是，在整个关押期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涅恰耶夫也在半月堡。不论是从萨拉托夫押解来的波立瓦诺夫，或是从卡拉矿山转来的一批人（麦秀根、伊格纳

① 被发落到军事感化营。——作者

季·伊凡诺夫、帕坡夫、谢德林等)，在一八八四年全给转押到席吕塞尔堡，他们也都不知道涅恰耶夫的任何消息，说不出他的命运究竟如何。

那时有一种传说：在一八八二年，当涅恰耶夫与民意党的来往暴露后，他被送到席吕塞尔堡，途中借口他企图逃跑而将他击毙。但是，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这个说法。

当涅恰耶夫还是半月堡唯一的一个囚徒时，他的物质条件(就伙食而言)还是过得去的。自从关进大批民意党人之后，情况大变：当局要用慢性饥饿来消灭他们。尤利·波格丹诺维奇说，伙食之坏使人一个月之后只能扶着墙才能走动。败血症使他们个个瘫倒。囚徒对维尔姆斯医生说他们会饿死，他回答说他无能为力，一切全由狱方决定，从他这方面说，他只能给一瓶含铁的药水：吃饭时宪兵给每人倒一小勺这种药水。在这种条件下，不用枪杀，涅恰耶夫也会死的。谢戈列夫在档案中找到此说的充分根据，从文件上看，涅恰耶夫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死在半月堡。半月堡的其他人不知涅恰耶夫的任何情况是由于他们完全与涅恰耶夫隔离。

在革命运动中，涅恰耶夫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典型。不管他的杀害伊

万诺夫和最恬不知耻地奉行“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原则给人留下多么沉痛的回忆，他的意志力和坚强性格还是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公正地说他的整个行为是无私的：他没有虚荣心，他对革命事业的忠心是真诚的、无限的。尽管他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但在他身上有一种令人感动、折服的东西，好像能对普通人的灵魂施行催眠术似的。那时，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半月堡士兵遇见许多被流放的知识分子政治犯。奥列霍夫、杰缅季耶夫、彼得罗夫、捷连季耶夫与萨任夫妇① 和索·安·博列伊舍都住在伊尔库茨克省的基连斯克。半月堡士兵中最有文化、后来自杀的托内切夫在从雅库茨克省出来时也曾路过基连斯克，而维什尼亚科夫在布列什科夫斯卡娅流放在这里时就住在她家，帮她料理生计。这些人对毁掉他们一生的涅恰耶夫从没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对他都怀着一种敬畏之情，都坦白承认自己是听从他吩咐的。他们中有个人这么说：“当他让你干一件事时，你且试试拒绝他！只要他看你一眼就够了！”

这种影响也在法庭上表现出来。

在审讯期间都传说，士兵和军士们在谈到涅恰耶

① 即作者的妹妹叶夫金尼亚及其丈夫米·波·萨任。

夫时都显得害怕他，而且他们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和姓，只称“他”。禁止他们直呼涅恰耶夫的姓。①

即使远在西伯利亚腹地，半月堡士兵仍然慑服于这个征服了他们的心灵的囚徒的坚强性格的魅力。

他的人格威望仍然使他们感到困惑。这是拷打、时间和空间都无法摧毁的魔力。

五、克列托奇尼科夫被捕

一月二十六日，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之一科洛德凯维奇被捕，在巴兰尼科夫的寓所截获了克列托奇尼科夫。这是一个为保卫我们的党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人。在两年中他向我们提供政府准备对我们采取的行动的情报，从外部警卫我们(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则从内部关注我们的安全)。我们极其小心地保护他，每一步都严格保密。指定固定的专人与他联系，这就是有合法身份的纳塔利亚·尼古拉耶芙娜·奥洛文尼科娃——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奥沙尼娜的妹妹。为

---

① 半月堡警卫队中有四名宪兵军士和三十五名士兵受审（一八八二年五月），被控犯有军事罪。第二次审讯(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三日)是政治性的，有十四名下级官吏被判终身流放。知识分子杜布罗文和菲利波夫被判服苦役。——作者

此目的，她完全不参与一切革命活动。克列托奇尼科夫只能到她家，不许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住处传达一切于党有用的情报——第三处里经过他手的准备进行的搜查、逮捕和侦查的计划、有关密探和其它的情报。

我不知道克列托奇尼科夫为什么违犯规定不去合法的奥洛文尼科娃家，而去找没有合法身份、参与所有危险的联系和行动的巴兰尼科夫。而且由于克列托奇尼科夫近视得厉害，看不到我们寓所经常作出的警告危险的标志，他的违犯规定就更加奇怪了。也许正是因此，他中了设在巴兰尼科夫房间里的埋伏。他在"二十名民意党人案"中受审判刑，在半月堡里死于体力衰竭。

克列托奇尼科夫是怎样打进第三处当办事员的呢？这是令人感兴趣的事。现在我就来说一说。他从克里米亚来到彼得堡之后，对执委会说愿为它效力，执行任何任务。但是，马上为一个新来的人找一件适合他的才能和性格的工作，谈何容易。有一段时间，他只得无所事事，十分苦恼。大约在这同时，住在助产士A·库图佐娃出租的房子里的高等女校学生经常遭到搜查，这使我们怀疑库图佐娃是秘密警察的暗探。因此亚·米哈伊洛夫建议克列托奇尼科夫住到库图佐娃处，取得她的信任，自己也进第三处去。克列托奇尼科

夫这样做了。他作为一个房客，常到她房间打牌，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他照执委会的意思，故意输给她，钱数不大。库图佐娃在和他混熟并获悉他正在找工作之后，先是含含糊糊地，后来便明白地告诉他，她与第三处有关系，自告奋勇把他安插到这个机关去。这样，克列托奇尼科夫便打进秘密警察的心脏。他当上办事员，第三处一切行动计划的文件都经过他的手：进行逮捕和搜家的命令、奸细和密探的名单、进行盯梢的命令，等等。克列托奇尼科夫把这一切简明地转告执委会指定的专门与他联系的人。这些宝贵的情报对党的贡献是无法一一列举的。例如，一八七九年秋，他通知我们正准备进行大搜查，其中包括搜查律师巴尔多夫斯基的家。此人是那时一些政治案件（如“五十人案”等）审理中最正直、最有才干的律师之一。我两次到他家报信，但两次都扑空。晚上他在剧院看戏，我进不去。他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宪兵突然闯进来，在柜子后面搜出几期《民意》杂志。他和与他一起住的人都被带走，关在拘留所里。巴尔多夫斯基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患失眠症，滥服水合三氯乙醛。他肯定是得了广场恐怖症。当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马车里时，我不止一次取笑他这毛病。但是，这是精神崩溃的一种征候。由于受被捕的打击，巴尔多夫斯基在拘留所才呆了一天

一夜便精神失常了，而且直到死也没康复，尽管他获释，得到妻子安娜·阿尔先季耶芙娜(我与她也和与巴尔多夫斯基本人一样，关系很好)无微不至的照料。一切都救不了他。巴尔多夫斯基的哥哥是华沙的一个调解法官，一八八六年在波兰无产阶级党一案中在华沙就义。

六、会　议

二月份的上半月，执委会通知其成员来开会。它想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进行暗杀沙皇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发动武装起义。莫斯科以及有民意党组织的各省的委员们应提出这样的报告：党组织是否足够巩固和壮大、各地广大阶层有无这种情绪，使党能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下，用自己现有的力量采取反政府的武装起义行动。

答案是不利的。委员们计算了与我们有直接联系的团体和个人，发现我们的人数太少了，不足以使街头起义产生什么作用①。如果采取行动，那结果将和一八

① 我们能够调集的只有五百人。季霍米罗夫的回忆文章也是这么说的。至于工人群众的情绪自然未考虑在这里面。——作者

七六年喀山广场上的情况一样——挨打，而且会比土地和自由社组织的第一次示威游行所受到的打击更惨重，更残暴。起义的事只得作罢。那时，革命的蓝图还很模糊，还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执行委员会只要求军人承担拿起武器的义务，至于对其他人员，地方组织的章程里直到那时为止并不要求他们承担这样的义务。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我那位于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的寓所里举行的，为了不引人怀疑，我们是在二十至二十五日这几天里隔天开会的。尽管在国内各大城市里都有我们的人，但要举行武装起义，我们的力量还是很不足的。不过问题还是提出了，讨论了，这本身就很重要。这个思想既经道出，就不会消亡，各人分散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地方上不由得会想到这个问题。

第十一章

一、二月里

皇帝每个星期天都走不同的路线到米哈伊洛夫斯基练马厅去。二月十五日，星期天，他走过小花园街。这时，地道已挖好，但还未埋地雷。

当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很为技术人员的行动缓慢而恼火。可能要等一个月，皇帝才可能再次路过此处。

执委会极为生气，开会决定在三月一日之前，一切都要准备就绪，地雷和炸弹要准备好。我们的计划由三个部分组成，目标都是一个，即这一次，第七次暗杀一定要圆满成功。主要部分是从干酪店进行的爆炸。如果这里在沙皇马车通过之前或之后爆炸，那么，正如我前面说的，四名投弹手——雷萨科夫、格里涅维茨基、季莫费·米哈伊洛夫和叶梅利亚诺夫——要在小花园街的两头从街道两侧投掷炸弹；要是他们由于某种缘故也没成功，那么热利亚博夫就要手持匕首扑

向沙皇，结束这事。

从那时起，我们便过着忐忑不安而又激动万分的生活。缅格坚家的干酪店开张两个多月，店老板波格丹诺维奇和亚基莫娃从外表看完全符合自己身份的要求：一部火红的山羊胡子，一张黄铜茶炊色的宽脸膛(波格丹诺维奇是这么形容自己的)，说话准确，应答如流，还夹杂着笑话，这一切使波格丹诺维奇看上去像个真正的普通生意人。而亚基莫娃的大众化的仪容，额前的刘海和维亚特卡地方的口音，跟他真是再好不过的一对。可是在生意经方面，他俩一窍不通，因此左邻右舍的买卖人马上就断定这新来的一对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此外，在一、二月份，我们没什么钱，因此干酪进货量很小。我们用于这极端重要的事业上的资金有多么不足，从一点可以看出：当我在紧急关头弄到三百卢布来进货时，已算是莫大的幸事了。不过，我敢说货物储备不足乍一看是不会发现的。有一次，我碰到巴斯卡站柜台，货架上摆满各种品级牌号的干酪。那一次我是装作要买洛克伏尔干酪的顾客，受执委会的委托来商店的。我走进半地下室的店堂，通知他们“有人在监视”商店，密探在商店附近盯上苏哈诺夫，幸而他叫了一辆豪华的马车，这才甩掉尾巴。

尽管柜台很像样，但盛干酪的桶却是空的，它们是

用来装从街道底下挖出来的泥土的。也许是这些生意人的笨拙，也许是对那些夜里曾在地道里干活中的某个人盯了梢(可能是盯上特利哥尼，原来他就住在涅瓦大街上一个密探的房子里)，总而言之，警察终于注意这家店铺了。

二月二十七日晚，警察来到涅瓦大街上特利哥尼向米秀尔太太租的一间房间里逮捕了他和正在他那里的热利亚博夫。二月二十八日早晨，苏哈诺夫到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我家里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这对我们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同时，城里流传说，警察认为自己发现了极为重大的线索，并且提到科博泽夫商店所在的那个地段。年轻人来报告他们偷听到缅格坚家的管家与警察谈话，说要来搜查；科博泽夫来说，有个什么卫生监督委员会在姆拉文斯基工程师的率领下来店里看过。这真是系千钧于一发的时刻。一个警察指着一只装过湿土的桶上的湿痕问道："怎么这么湿？"波格丹诺维奇回答说："谢肉节时洒的酸奶油。"要是警察看看桶的里面，他就会看到那是什么酸奶油了。姆拉文斯基走到窗台下面的护墙板前（那是用来遮住地道口的），他拉了几下……拉不动！"干吗装这护板？"——他问。"因为屋里太潮了，"——波格丹诺维奇回答道(店堂是在半地下室里)。

后房是仓库，房角里堆着一大堆从地道里挖出来的泥土，上面盖上麦秆、煤渣和蒲席，还乱七八糟地扔着粗地毯。只要掀开这些东西，那就一切都暴露了。姆拉文斯基甚至用脚踢了踢煤渣。但是，一切都过去了。这次检查，整个过程就跟碰运气的“有”、“没有”的赌博一样。波格丹诺维奇说，经过这么一检查倒使商店合法化了，因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是我们听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显然，这件早已策划的、历尽千辛万苦、冒了极大危险要进行到底的事，这件应当结束两年来一直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的事，很可能在胜利的前夕失败。一切都能忍受，但是这，却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之中某一个人的个人安危。我们的过去，我们革命的未来，一切的一切都押在这个星期六，三月一日的前夜这张牌上了。过去，六次暗杀沙皇未遂，二十一人被处死，我们想结束这个过去，甩掉它，忘掉它；未来，光辉远大的未来，是我们要为后代争取的。没有哪一个神经系统能够长期经受住这么高度的紧张。①

---

① 革命团体在最高层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对亚历山大二世的继承人的人品一无所知。亚·索洛维约夫在四月二日去行刺时坚信，除掉沙皇，政府的国内政策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就有可能在民间从事活动。

然而，一切都与我们作对：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警卫者克列托奇尼科夫；干酪店危机四伏；热利亚博夫这个最勇敢的同志、投弹手的领导者和即将实施的暗杀行动的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出乎意料地被捕，必须即刻清理他的寓所，取走硝化甘油，然后放弃这个寓所；捷列日纳亚街上的寓所是用于制造爆炸所需的一切技术装置的，也是信号手和投弹手集合的地方，现在，在三月一日的前夜，据房主萨布林和格利夫曼的报告，也不安全了，好像已有人在监视它。除此之外，我们还惊悉四枚炸弹一枚也没做出来…… 而明天，三月一日，星期天，沙皇可能经过小花园街…… 地道里还没埋地雷！

在这种情况下，二月二十八日，我们执委会委员们在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的寓所里碰头。不是全体都到，因为有的来不及通知。除了房主人我和伊沙也夫外，出席的有佩罗夫斯卡娅、安娜·帕夫洛芙娜·科尔巴、苏哈诺夫、格拉切夫斯基、弗罗林柯、列别杰娃，可能还有季霍米罗夫、朗汉斯，——确切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我们都很激动，都怀着同一种心情，同一种情绪。因此，当佩罗夫斯卡娅提出基本问题：如果明天，

只有革命后的文献才谈到王位继承人对所谓的罗利士-麦里柯夫宪法的二月计划的态度和他在三月八日会议上的言行。他已作为皇帝君临内阁会议，并特邀斯特罗甘诺夫伯爵和波别多诺斯采夫参加，结果，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作者

三月一日，沙皇不经过小花园街怎么办？那时是不是要用炸弹来炸他？全体与会者齐声回答道："炸！明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炸！地雷要埋好，炸弹在清晨之前要做好！炸弹要和地雷一起用，或者不管地雷炸不炸，炸弹都一定要扔出去！"只有苏哈诺夫一个人说他无法表态，因为炸弹还从未试过。

这时是星期六下午三时左右。

伊沙也夫立即到干酪店去埋地雷；热利亚博夫和佩罗夫斯卡娅的住处在苏哈诺夫和几个军人的帮助下清理完毕，索菲娅·利沃芙娜搬到我们这儿来。不仅来不及通知所有的委员，连花园街的信号手也来不及通知，好在原已确定了由谁来当信号手和投弹手，并已和他们约好星期天碰头。

有三个人下午五点起应到我们这里，通宵赶制炸弹。这就是苏哈诺夫、基巴利奇奇和格拉切夫斯基。晚上八点之前，不断有执委会的人出入这里，或是来报告消息，或是来商量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由于这妨碍工作，于是八时左右大家都走了，家里连我和佩罗夫斯卡娅就剩五个人。我劝疲劳已极的佩罗夫斯卡娅躺下休息，以便明天有充沛的精力。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当下手，尽管是一个很没经验的下手：一会儿和基巴利奇奇一起倒东西，一会儿帮苏哈诺夫剪我买来的煤油桶

的铁皮做弹壳。这一夜，我们的灯一直亮着，壁炉烧得通红。夜里两点，我离开他们，因为已不需要我帮忙了。当我和佩罗夫斯卡娅八点起床时，男同志还在忙，不过已做好两枚炸弹。佩罗夫斯卡娅把它们送到捷列日纳亚街萨布林的寓所去。在她之后，苏哈诺夫也走了。然后我帮格拉切夫斯基和基巴利奇奇把其余的两只铁皮壳填满硝化棉，基巴利奇奇把它们带走了。这样，三月一日八时，经过三个人连续工作十五小时，四枚炸弹都做出来了。十时，雷萨科夫、格里涅维茨基、叶梅利亚诺夫和季莫费·米哈伊洛夫来到捷列日纳亚街。佩罗夫斯卡娅一直和热利亚博夫一起领导他们，这时，她给他们下了准确的指示——他们应站在什么地方行动，然后，在沙皇通过之后应如何疏散逃走。

二、三月一日

根据执委会的命令，三月一日我应当在家里呆到下午两点，以便接待干酪店的那些同志，因为波格丹诺维奇应在沙皇过境前一小时离开店，亚基莫娃则在发出沙皇出现在涅瓦大街的信号之后离开。接通电路的事由第三个人负责，他可以装作过路人那样离开店铺，如果他没被由他发出的爆炸埋在废墟里的话。这第三

个人便是米·弗罗林柯。

九点钟，他来我这里。我惊奇地看到他从一个纸包里拿出香肠和一瓶红葡萄酒，放在桌上，准备吃。在我们作出那个决定之后，在彻夜未眠做准备工作之后，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既不想吃，也不想喝。我看到这个几乎一定会死在爆炸的废墟里的人的食欲时，惊恐地问道："怎么啦？""我得有充沛的体力呀！"——他平静地回答道，不慌不忙地吃了起来。面对着这位没有想到死、唯一地只想到为完成任务而保持充沛的精力的同志，我只有无穷的崇敬。

不论波格丹诺维奇或亚基莫娃，都没来。伊沙也夫和几位委员回来了，说沙皇没有经过干酪店，而且已从练马厅回去了。我完全忽略了他们并没有注意沙皇回程走的路线。我走出家门，我想，之所以没有行刺是由于某种意料不到的原因。

事实上，沙皇确实没经过花园街，但是佩罗夫斯卡娅充分表现出她的冷静沉着。她迅速作出判断，认为皇帝回程会走叶卡捷琳娜运河的沿河大道。她改变整个行动计划，决定只使用炸弹炸。她到各个投弹手那儿，重新安排他们的位置，并约好她将挥动头巾发信号。

两点刚过，一下接一下地响起两声类似炮击的声

音：雷萨科夫的炸弹炸毁了沙皇的马车，格里涅维茨基的炸弹炸中皇帝，沙皇和投弹手都伤势严重，几小时后停止了呼吸。

当伊沙也夫回来、我出去的时候，一切还很平静。但是半小时以后，当我顺便拐到格·伊·乌斯宾斯基家时，伊万钦-皮萨列夫来找他，说发生了什么爆炸，街上纷纷传说沙皇给炸死了，教堂里已在举行向继位者宣誓的仪式了。

我奔去找自己人。街上议论纷纷，显然非常激动，都在说皇帝呀，伤呀，血呀，死呀。当我走进家里时，朋友们还一无所知，我却激动得勉强说出几个字。沙皇给炸死了！我们大家全都哭了。十年来，我们眼看着恶梦窒息着年轻的俄罗斯，如今恶梦给打断了。强加给我们成百成千的同志的拘监、流放、暴力和摧残，我们的殉难者的血，——所有这一切，在这一分钟里，我们让沙皇流血来抵偿了，我们肩上的重担放下了，反动统治应当结束，让俄罗斯新生。

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满心希望祖国有个美好的未来。

不久，苏哈诺夫来了，快乐，兴奋，他为美好的未来而拥抱了每一个同志。我们在几天后刊印的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彼得堡党员在三月一日以

后这几天里的情绪。它措词温和，意在争取整个俄国社会的同情。这封信在西欧发表后，在整个欧洲舆论界引起轰动，连最温和的和最右翼的报纸也表示赞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要求，认为它们是合理的，正义的，其中相当大部分在西欧早已是生活中的常规了。

三月三日，基巴利奇奇到我们寓所报告说，格利夫曼的寓所（在捷列日纳亚街）暴露了，格利夫曼被捕，而萨布林这个外表看来无忧无虑、说话风趣俏皮的快乐的人自杀了。他说在格利夫曼被捕后有个人来过这房子，他进行了武装拒捕，原来这人是工人季·米哈伊洛夫。格利夫曼的寓所是有特殊用途的，因此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一些知道什么人许可到这个寓所来的同志在听到基巴利奇奇带来的消息后，马上想到是雷萨科夫招供了。出于这个设想，执委会取消科博泽夫夫妇在清除地雷里的炸药之后才离开店铺的决定，要他们当天离开店铺，而且当晚离开彼得堡。

波格丹诺维奇下午三点到我们这儿来和我告别——他是第一个出走的。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他，直到那年十月、十一月我在莫斯科，他也在那儿，我们才又见面，但已是最后一面了，因为当我一八八二年三月再度来莫斯科时，他已被捕。

三月三日晚上，亚基莫娃来了，为的是换装。她把

店铺上了锁，不准备回去了。同一天，执委会还送走了几个委员。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失去了佩罗夫斯卡娅，是叛徒出卖了她，她在街上被捕。在她之后，基巴利奇奇被捕，据说是他的女房东告的密。在他的寓所，弗罗林柯中了埋伏而被捕。后来，伊万钦-皮萨列夫被抓走。白色恐怖开始了。

那时我们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个认识许多执委会委员的人，是他在街头指认的。现在，在开放了警察档案之后发现，叛徒之一是工人奥克拉茨基。此人在八〇年的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案中受审，被判服苦役。① 由于呆在彼得堡十分危险，执委会提出有几个同志必须离开，其中包括我。但是，我们都希望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来发展党组织：我们看到周围群情振奋，恭顺的人、消极的人、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动起来了，要求指点，要求工作；各种团体竞相邀请党派去代表，要求与党建立联系，为党效力。要是说党员的主导动机是虚荣心，那么现在虚荣心可以得到满足了，因为成就实

---

① 奥克拉茨基在一八八〇年受审，一八八一年上书请求宽赦，答应为警方效力。他供出两处秘密寓所，接着帮助警方抓获许多参加三月一日行动的民意党人。他作为警察局的秘密代理人，为反动派服务达三十七年之久。一九二五年终于受到正义审判。

在太使人心醉了。没有和我们一道度过三月一日之后的那段时日的人，是永远不会理解这个事件对我们这个革命党的意义的。不难理解，在这样的时刻离开彼得堡，对于一个相信自己的力量并认为事业的利益要求他违背理智而留下来的人，是多么的难堪。我得到苏哈诺夫的支持，向执委会陈述留在原地的理由，执委会同意了。可惜好景不长。四月一日，格里戈里·伊沙也夫没有回家：后来我获悉，他也和三月里其他一些同志一样，是在街上被叛徒抓走的。我们有个规定：住在集体宿舍的人事先未说好无权在外过夜。因此，四月一日夜里十二时，我已不怀疑伊沙也夫被捕了。

那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寓所已逐渐变成仓库，存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印刷所被毁之后，铅字和其它东西运到我们这里；化学实验室工作结束后，伊沙也夫把全部器具和大量炸药带回来；佩罗夫斯卡娅也带来炸药和其它必须从她住处转移的东西；弗罗林柯被捕后，我们又接收了半个“身份证科”。此外，民意党印刷所印的东西也全部转移到我们这里，装满一只大箱子（后来在我的住处找到这只箱子已是空的了）。这些财富不应失掉，我决心抢救它们，要做到我离开这所房子时，里面是空空的。

四月一日，我决定不去找自己人，而是等人来找

我。我着手整理革命财产，收拾得便于携带。当格拉切夫斯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了。他告诉我，同志们以为我已被捕，因为一大早起就把各处的房屋管理人集中到市里，去辨认一个头天抓到的、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处的年轻人。根据去过市政府的房屋管理人的描述，谁也不怀疑这个年轻人就是伊沙也夫。格拉切夫斯基很赞成我的抢救财产的愿望。我请他把这个意思告诉尼古拉·叶夫根尼耶维奇·苏哈诺夫，因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的人，最不可能的事在他手上都能办到。

几小时之后，苏哈诺夫带着两个海军军官来了，他以惯常的指挥才能，在两小时内把一切必须拿走的都拿走了，剩下两包袱没什么用的东西。这时已是晚上八时，他要求我即刻离去。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漏夜离家，因为我相信伊沙也夫不会说出他的住处，而警察至今未到，说明我们的房屋管理人还没应召去市政府。我想夜里会让伊沙也夫安宁的（我错了），因此不认为留在家里有什么危险。经我这么一说，苏哈诺夫就让我留下，答应第二天派两个妇女来取走剩下的东西。四月三日清早，当我出去看看动静时，大门口站着一个谢德林写的“穿豆绿色大衣的人”，正交代房屋管理人：“十二点之前一定要到，一定要在十二点以

前！”显然是叫他到市政府。于是，我放出此处仍安全的标志。伊万诺夫斯卡娅和捷连京娜差不多立刻进来，拿走了最后两个包袱，她们要我不要耽搁，及早离开。我等打扫房间的妇女来打扫房间之后，借口送她，把空房子锁上，走出家门。听说宪兵来时，我的茶炊还没凉。他们晚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这一天，四月三日，是我们那些暗杀沙皇的同志们就义的日子。天气非常之好，天空晴朗，春日和煦，是解冻的天气。当我走出家门时，看热闹的人已经散了，到处都在谈论绞刑。我的心因为怀念佩罗夫斯卡娅和热利亚博夫而抽紧了。我在这种心绪中坐上马车，车里的人是刚从谢苗诺夫校场看热闹回来的。许多人脸上很兴奋，没人沉思，没人悲痛。我对面坐着一个穿蓝袍的漂亮的小市民，一头黑发，胡子打卷，两眼炯炯有神。那张漂亮的脸由于兴奋而扭歪了，——这个随时准备去杀人砍头的鹰犬！

我从席吕塞尔堡出来，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时，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莫罗兹寄给我一幅很大、印得很精美的版画——苏里柯夫的《女贵族莫罗佐娃》。她之所以送我这幅画，是因为她知道在席吕塞尔堡里大司祭阿瓦库姆① 的人格和旧教派受难者、坚贞不屈活活饿死的女贵族莫罗佐娃② 在我思想上占有多

重的分量。

版画使我很激动，莫罗佐娃带着手铐，背对着马坐在雪橇里给送去流放，她会死在那里。她双唇紧闭，那张消瘦、美丽、刚毅的脸上流露出坚持到底的决心，带着手铐的一只手高高举起，伸出食指和中指③，像是在向人们发出号召。周围是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个个脸上另是一种表情：有畏葸的、恐惧的，有隐含着同情的，也有幸灾乐祸的。

版画以生动的线条表现为信念而斗争、矢忠于自己的信仰的人们的受迫害和牺牲。它再现了生活的一页…… 一八八一年四月三日…… 载着弑君者的囚车…… 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 穿着蓝呢长袍的漂亮的小市民，漂亮的脸由于兴奋而扭歪了——一张随时准备去杀人砍头的鹰犬的脸。

---

① 阿瓦库姆（一六二〇或一六二一——一六八二）：俄国东正教大司祭，俄罗斯旧礼仪教派的创始人之一，根据沙皇的命令被处火刑。

② 费多西娅·普罗科菲耶芙娜·莫罗佐娃是俄国分裂教派，即旧礼仪教派的活动家。一六七二年死在寨堡里。俄国画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里柯夫（一八四八——一九一六）的这幅油画《女贵族莫罗佐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③ 旧礼仪教派是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画十字的。

三、佩罗夫斯卡娅

索菲娅·利沃芙娜·佩罗夫斯卡娅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于政治案而被处死的妇女，她的革命活动和遭遇使她成为少数名垂青史的人物之一。

这位苦行僧式的女革命家竟是小俄罗斯最后一任执政基利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的外曾孙女、亚历山大一世的克里米亚总督的孙女、亚历山大二世的彼得堡总督的女儿！从血统和环境的影响来看，这是很奇怪的。

出于情势的偶然巧合，在参议院特别法庭审理三月一日案中担任她的公诉人的，竟是她童年的玩伴。

佩罗夫斯卡娅曾在普斯科夫住过，她父亲与她未来的公诉人的父亲是同事，他们的家正好相邻，因此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①

这个公诉人在讲话中超出检察官的职权，除了通常在这种场合指责的“杀人成性”之外，还使用了“道德沦丧”一词。这个人便是尼·瓦·穆拉维约夫，后来当上司法大臣——法律的捍卫者，但却蹂躏了法律。他

---

① 这是穆拉维约夫本人在我被捕后亲口对我说的。——作者

是一位有学问的法学家，在谈到一八六四年的诉讼法时，说它的原则是迄今为止所有文明国家所制订的法律中最好的，但他本人却破坏了这些原则。他就是那个被俄国政府派到巴黎，争取自由共和国违反其避难权法律引渡革命者列夫·加尔特曼（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城郊就是从他的房子里搞爆炸，企图炸毁沙皇的列车的）的法律专家穆拉维约夫。他就是那个号称“铁面无私的公正法庭的仆人”的穆拉维约夫，可是在他担任司法大臣时，谁人不知他是当代最大的贪赃枉法的官僚？……

童年的环境在佩罗夫斯卡娅的心灵里投下永不黯淡的人性光辉和荣誉感。在家长享有农奴权的那一代人里，农奴制的习俗，在家庭关系中对人性的不尊重，往往使孩子们产生对父辈的反抗情绪和对专制主义的厌恶。佩罗夫斯卡娅的情况也是这样。她的父亲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佩罗夫斯基是这样一种农奴主：他不仅自己本人欺凌孩子们的母亲，而且强迫儿子欺侮自己的母亲——一个那个时代典型的心地善良和谦卑的妇女。在沉闷的家庭气氛里，索菲娅·利沃芙娜学会了爱人，学会了像爱她那受苦的母亲那样爱普天下受苦的人。她直到最后的悲惨时日都一直保持着对母亲的一片柔情。在我受审的那些日子里，拘留所的女

看守告诉我，在佩罗夫斯卡娅案件审讯期间，她的母亲被从克里米亚召来，索菲娅·利沃芙娜在与母亲见面时很少说话。她像一个病得软弱无力的孩子，一直把头靠在母亲的膝头上静静地半躺着，很少说话。两个宪兵就在身边，他们日夜呆在她的囚室里。

佩罗夫斯卡娅刚长大就决定离开家庭。继续呆在家里，在精神上她无法忍受。但是，父亲不给她个人身份证，威胁说一旦她出走，就要叫警察把她抓回来。佩罗夫斯卡娅没有退缩，她离开父母，躲到阿拉尔钦斯基女校①的女友科尔尼洛娃姐妹家里。后来，她和其中的一个——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后来随夫姓莫罗兹）都在“一百九十三人案”中受审。

佩罗夫斯卡娅有一颗温柔的心，也许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吧。她和科尔尼洛娃姐妹都参加柴科夫斯基团，受过医士训练。作为民粹派一名女宣传员在农村与劳动人民在一起时，她把女性的善良和温柔全部献给劳动者。目睹她当时的生活的人回忆说，在她对待病人和周围农民的态度中蕴含着母性的慈爱。接触农村给了她多大的精神满足，她多么舍不得离开赤贫、愚昧的农村，可以从她在沃罗涅日会上的表现，以及她

① 彼得堡最早开办的女子学校之一。——作者

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时的动摇不定中看出来。当时，我们俩，我和她，都刚刚离开农村，我们的心还与农村紧紧相连着。我们被邀来参加政治斗争，给召唤到城里，可是我们却觉得农村需要我们，没有我们，农村会更愚昧。理智告诉我们，应当走我们那些搞政治恐怖活动、为斗争所陶醉、为成功所鼓舞的同志们所走的路。而感情却不是这样说，我们另有一种情绪，它把我们吸引向贫困不幸的人们。后来有人正确指出这种情绪是在追求纯洁的生活，追求个人的圣洁。但是当时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们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战胜了自己的感情，克服了自己的情绪，摒弃了在民间生活给我们的道德满足，坚定地站到政治嗅觉比我们灵的同志们的一边来。

从那以后，在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制订的一切恐怖行动计划中，佩罗夫斯卡娅都走在最前面。她是莫斯科郊外一所简陋的小屋的头脑简单、和蔼可亲的女主人，这房子是用苏哈鲁科夫[1]，她的“丈夫”、“铁路小职员”的名义花七、八百卢布买下的。

在关键时刻，她和斯捷潘·希里亚耶夫留在小屋

---

① 列·加尔特曼的化名。

里，以便在沙皇列车开到时接通电流。

她是一个警觉的、随时都能投入行动的人，她及时发出信号，但是倾覆的不是沙皇坐的那一挂车，而是随从们坐的那一挂。但这不是她的过错。

后来，即二月五日炸冬宫事件之后，一八八〇年夏，她来到敖德萨，主持在意大利街下挖地道、埋地雷的工作。

最后，在一八八一年，当执行委员会准备第七次行刺——三月一日行动时，佩罗夫斯卡娅和热利亚博夫共同组织一组人密切监视沙皇的行踪，在预定的行动中担任信号手，同时还领导投弹手——不仅在准备期间，而且在三月一日。她给他们重新指定了位置，因而恐怖主义者用两枚炸弹结束了沙皇的性命。

当然，在一个有许多人参加的、复杂的计划中，很难区分出每一个人在共同事业中贡献出的是哪一份。但是，我还是认为，要是没有佩罗夫斯卡娅，没有她的冷静、考虑周全和无与伦比的指挥才能，消灭沙皇的预谋不会在这一天成为事实。我想，这样说是公正的。

她成全了这一天，但却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是一八七七年在彼得堡认识索菲娅·利沃芙娜的，当时她是"一百九十三人案"的被告，正交保候审。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科尔尼洛娃把她带到我的

住处，并留在这里过夜。她的外貌引起我的注意：她穿着村姑式的套衫，很像一个农村姑娘，梳着一根淡褐色的辫子，有一对明亮的灰色的大眼睛和孩子般圆润的脸颊。只有那高高的额头与她的总的平民相貌不同。那张白净可爱的小脸流露着孩子般的稚气和纯朴。她脸上的这种童真气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尽管三月的日子是悲惨的。

看着她纯朴的外表，谁都不会想到她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女时代，而脸上柔和的线条一点也显现不出她坚定的意志和刚强的性格（也许这是从父亲那儿遗传来的吧）。总的来说，在她的天性中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她对平民百姓是温柔的，母性的温柔，对同志是要求严格的，严厉的，而对政治上的敌人——对政府，则是无情的，这一点差不多使苏哈诺夫发怵：他理想中的女性无论如何不是这样的。在“一百九十三人案”结束时，她在彼得堡的寓所成为被释同志们的聚会中心，来这里的都是那些不承认这次审讯、因此不肯出庭的“抗议者”。麦秀根的刚强和他在法庭上的著名演说给她留下强烈的印象，营救他出狱（他被关在哈尔科夫省丘古耶夫中心监狱）的念头成为她的idée fixe①。她花了很大的力

① 固定观念。

气试图实现它。

佩罗夫斯卡娅最喜爱的同志是热利亚博夫和弗罗林柯(她和我们大家都管他叫米哈伊洛)，他们两人都是精神品质出类拔萃的人,但彼此又是极不相同的：一个是才气横溢,一个是埋头苦干。我是在沃罗涅日会上第一次见到这两人的，佩罗夫斯卡娅在这之前已认识他们,她对我谈了他们的许多优点。不过可以看出,尽管她很器重米哈伊洛,但更敬佩热利亚博夫。

按照我们那时代的理想标准来说，佩罗夫斯卡娅是个伟大的苦行僧。且不说日常生活的俭朴，就说她对公共钱财的态度吧，从这里可以窥一斑见全豹。三月的一天,她来找我：“想办法借我十五卢布，我要买药。这不能算进公共开支。母亲给我寄来一件绸的 sortie de bal①，等裁缝把它卖出后,我就来还。”我们中可能还没有一个人像她这么认真。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体会到她对同志们的爱护和无私的关怀。事情是这样的。我前面说过，在二月二十七日热利亚博夫被捕后,二十八日,他和佩罗夫斯卡娅的寓所里的非法的东西都已清理完毕，放弃了这所住宅。从这一天起到三月十日她在阿尼奇科夫宫附

① 套在晚礼服外面的女式大衣或斗篷。

近被捕为止，她有时在这个朋友，有时在那一个朋友家住宿。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自己的住处的生活是特别难堪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当时我们有好几处公共宿舍，每一个同志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宿舍的平等的主人，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住在里面。

原因在这里：当时正是罗利士-麦里柯夫专政时期（但是这个专政并没有保住皇帝不死于恐怖分子之手），在彼得堡的警察中也和一般居民一样，有一种恐慌情绪。失职的警方必然要为自己挽回面子，他们倾巢出动，搜捕叛逆分子。在人心惶惶的公众中流传着一个极为可怕的传闻：说是夜间不仅要搜查整座房屋，还要搜查整个街区。我们民意党接二连三地失去党员，他们都是在街头或在家里突然地、没有任何盯梢迹象的情况下被抓走的。

佩罗夫斯卡娅在她被捕前一、两天问我："薇罗奇卡，可以在你这儿过夜吗？"我以惊奇和责备的眼光看着她："你怎么这么问？难道这还用问吗？！"佩罗夫斯卡娅说："我问是因为如果来搜查，找到我，那你也会给吊死的。"我搂住她，指着放在床头的手枪："不管有你或没有你，来搜查，我都要开枪。"

这就是佩罗夫斯卡娅的心，是她的心的一个极小

的窗口，因为只向我打开了这么个小口：在那紧张的时日，我们对彼此的心理都无暇深入了解。我们只是行动，并不注意观察。

她是女人，她是会感觉到疼痛，肉体上的疼痛的。在拘留所的院子里，她穿着黑色囚衣，给拉上马车，背对着马坐下，胸前挂着“杀人犯”的牌子，双手给捆得紧紧的。她说：“捆松一点，我痛。”

“等下还会更痛！”——一个监视整个车队的军官恶狠狠地嘟囔道。

此人就是亚历克赛半月堡（此后不久，我们许多民意党人就是在这里面给折磨得慢慢死去）的狱吏，也是我们席吕塞尔堡的最后一任司令官——雅科夫列夫。

其余四个三月一日分子：热利亚博夫——农民，炸弹的制造者基巴利奇奇——僧侣之子，季莫费·米哈伊洛夫——工人和雷萨科夫——市民，也是这样给押往谢苗诺夫校场的。他们象征性地代表了俄罗斯帝国的所有阶层。

在断头台上，佩罗夫斯卡娅表现得坚强如钢。她拥抱了热利亚博夫，拥抱了基巴利奇奇，拥抱了米哈伊洛夫，和他们诀别。但是，她没有拥抱雷萨科夫。这个家伙为了救自己而供出捷列日纳亚街的寓所，从而葬送了萨布林（自杀），葬送了格霞·格利夫曼（死于拘留

所)，葬送了季·米哈伊洛夫(给送上断头台)。

佩罗夫斯卡娅就是这样就义的，她生前忠贞、正直，死时也同样忠贞、正直。

四、三月一日的意义

对三月一日不论怎么说，怎么想，它都是意义重大的。为了评价它，必须回顾一下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它打断了亚历山大二世二十六年的统治。这个沙皇开创了俄国的新纪元，把它引上全人类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停滞之后，他通过实行改革——农奴改革、地方自治改革和司法改革，把俄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在他实行的改革中，第一项也是最伟大的一项改革是农奴改革。但是，它从一开始在经济方面就不能满足社会最优秀的代表（各种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们)和文学界的要求。农奴改革后，十五年过去了，颂扬变成批评，报刊上公开称这个改革是在封建领主等级的压力下进行的，是一种折衷，完全不符合预定的目的："改善农村等级的经济状况，俾使其能正常履行纳税和徭役的义务"。扬松·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和其他研究人员的著作揭示了农民的经济已完全破产：土地少，农村无产者增多，农民的负担与他们的土地收入之

间悬殊之大使瓦西里奇科夫公爵不由地认为，我们农民的状况与法国农村等级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的毫无出路的状况完全一样，他警告说，法国十八世纪末的那场灾难也在威胁着俄国。政府的委员会也肯定和证实了人民群众的破产。

其它的改革在反对改革的人和沙皇本人的反动倾向的不断增强的影响下，也由于各式各样的补充规定、例外情况和解释条款而打了折扣，而被歪曲。慢慢地，社会力量和政府逐渐不合拍，社会人士对国家生活和管理过程无法施加影响。

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之初就存在着不满情绪，到了六十年代，由于风起云涌的学潮，这种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了，并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卡拉科佐夫分子、涅恰耶夫分子等案件的审讯表现了出来。这些不满的表现和波兰起义所引起的骚动，成为加强反动的信号：反动派再好不过地利用了它们；到了七十年代初，政府与社会之间已完全破裂。从那时起，可以说一部分臣民反抗受国君支持的统治秩序的暴乱已成为一种慢性病。但是，每一次暴乱都导致了更加沉重的压迫，而这反过来又引发出更加激烈的反抗。在七十年代末，俄国的整个国内生活、整个国内政策都转向对付造反者。设立了总督署、军事法庭、国

家保安局和残忍的死刑，但是与此同时，也诱发了弑君流行病。在国家政权动用一切非常手段来压制人民的不满时，不论是几十万士兵的刺刀，或是多如牛毛的保安人员和密探，或是皇家金库的万两黄金，都不能保住八千万人的统治者的性命，他终于死在革命者的手里。

三月一日的教育意义就在于这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二十年来的斗争的结束。二十年来的迫害、肆虐、压迫，尽管涉及的是少数人，却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压力，结果便是雷萨科夫和他的话："我看你平安无事！"① 正当人们深信事情即将过去的那当儿，沙皇被炸死了。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提心吊胆，而另一个则急不可耐地期待这事发生。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足可供哲学家、道德学家和政治家们去深思。执行委员会的炸弹震动了整个俄国，向它提出一个问题：摆脱不正常状况的出路在哪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不对生活实行变革，今后会怎么样？我们想，政府通过镇压来摧残革命运动的势力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它通过清除最活跃的不满分子来消除不满情绪的

① 据三月一日暗杀案起诉书说，亚历山大二世在雷萨科夫扔出的第一枚炸弹爆炸后说："上帝保祐，我平安无事！……"雷萨科夫应声说道："看看上帝还保祐不保祐你！……"几分钟后，格里涅维茨基扔出的第二枚炸弹炸中了沙皇。

努力也没有奏效。这已为三月一日之前的二十年的试验所证明。如果说皇帝没有从中作出应有的结论，那俄国却是作出了。我们想，能自由表达的社会舆论将会建议，为了停止内讧，不是与个别的不满表现作对，而是消灭造成这种不满的原因；舆论将会指出，这原因不在于个别鼓动家和杰出人物，政府希望通过逮捕他们来平息人心的不满是徒然的；原因在于普遍受压迫，在于完全不让有文化的阶级对人民和国家生活发生影响，在于没有开展不以掠夺和个人致富为目的的活动的余地，在于政府的政策完全背离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要求。如果旧制度继续下去，三月一日事件就不可避免地会再度发生，而且情况可能更惨。

因此，这道直截了当提出来的二择一问题，我们认为，在社会意识方面是已经解决了，只待将其付诸实施的时机到来。三月一日事件发生时的条件和事件本身的宏伟，大大促进了这个社会意识的明朗化，否定这个事件在这方面对社会的意义是不可能的。

三月一日事件也激扬了整个农民世界。它把他们领出日常琐事和农村利益的圈子，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谁炸死了沙皇？为什么炸死他？当时和后来生活在农村的人都一致证明，沙皇的死和炸死沙皇的动机强烈地震撼了农民的思想，迫使他

们认真思考起来。思考的结果只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沙皇是社会主义者打死的，他们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希望给人民争得土地，把人民从官吏的压榨下解放出来，这是真理；另一个是，地主、老爷们为自己的权利而反对沙皇、打死沙皇，因为他解放了农奴，他们希望恢复农奴制。在第一种情况下，人民与党因利益一致而团结起来，党从而在人民群众中取得立足点，这是几十年的语言宣传所收不到的效果；在后一种情况下，人民对有产阶级满怀敌意，在人民所处的那种悲惨的经济状况下，这积怨可能发展到痛打特权等级，那就将与布加乔夫暴动的恐怖不相上下。这时，党的任务将只能是利用人民爆发出来的激情和不满情绪。不论哪种情况，革命斗争将与人民结合——这就是三月一日事件所开辟的前景。

一般说来，对于党本身和革命事业，三月一日事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把执委会在同情者的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到我们这儿来，领导我们"是对执委会提出的一致要求。三月一日事件造成一种可以满足最狂热的革命者的要求的气氛，要是说有什么可遗憾的话，那就是收成太好了，而收割的人却太少了。

但是，除了民意党从三月一日事件中给自己赢得

最有利的阵地和扩大自己的组织的机会之外，一般说来，三月一日也是组织起来这一思想的胜利。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个人甚或个别一个小团体有力量足以进行为期两年的、包含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的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在这场斗争中，一方占有政权的一切优越性和物质力量，而另一方则只拥有毅力和组织。在与政府进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组织是取得胜利的唯一保障，——这就是三月一日事件宣告的真理。在这个事件之后，已经毋需宣传这个思想了，在为党提供成员的那个环境里，这个思想已深入人心。

革命运动史上的这一重大时刻的不足之处是三月一日事件没有导致人民起义，没有同时发生各城市的武装起义，而且既没有迫使政府在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根本改革，也没有迫使它对不满分子的要求作出让步。关于第一点，可以肯定地回答说，党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既没有在党刊中、党纲中，也没有在口头宣传党的近期目的和任务时——把暗杀沙皇作为一定要举行人民起义的手段，举行人民起义可能是个别人的希望，但不是党的打算。期待着举行武装起义，这是出于不了解组织的情况：党还太年轻，无力实现这样的图谋。如果在革命队伍里真有人因为他们的预想没有实现而不满，那这种人就是不播种却想收获

的人——武装起义是未来的事，它要求做许多艰苦的工作。

至于说三月一日事件没有在俄国经济和政治改革方面导致任何实际结果，这话说得对。但是，党没有精力靠革命力量来进行这种改革，也从来没有把最高当局看作是真能承担起这件工作的力量。诚然，党期待着反动派让步、削弱和停止实行反动政策，期待着自由，使人能活下去，使人能进行和平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党是错了。这是非常惨、非常糟的事——不仅对革命党很糟，而且对人民、对社会、对有产阶级、对官僚、对整个国家和国家首脑都是很糟的，因为这使将来还会出现新的灾难，新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动乱。在当时的俄国，未必有很多人相信自己的祖国未来会和平繁荣、自己的君主可以高枕无忧。可是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没有这种自信，那么未来一定是暗淡的和可虞的。这样的未来有朝一日一定会火山爆发的。

这里还必须就政府对付革命党所采取的手法在社会上造成的道德败坏问题说几句。凡是不是基于思想，而是基于强权的斗争，必然伴随着使用暴力，而使用暴力——不管它是针对思想，或是针对行动，或是针对人的生命——从来不会有助于陶冶情操。它造成残酷无情，发展兽性的本能，激发恶劣的情感，导致背信

弃义。人道和情爱与暴力是不能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进行白刃战的政府和党是在竞相毒化周围环境。一方面，党声言在与敌人斗争时，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在这里，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同时，它造成对炸药和手枪的崇拜，给恐怖主义者画上光轮。暗杀和断头台对青年具有诱人的力量，他们的神经越脆弱、周围的生活越难过，革命恐怖活动就越使他们兴奋：当生的权利越来越少，因而思想工作越来越不见效时，活动分子便希望看到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的某种具体可见的表现；在当时，这样的表现只能是使用暴力的恐怖行动。社会由于看不到现状的出路，一部分人同情党的暴力行动，一部分人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即使这样，他们也赞赏斗士们的勇敢和战斗艺术。如果这样的事件一再重演，那人们也就会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但是，革命活动的阴暗的一面由于同志们内部的团结友爱而有所减弱。此外，党的暴力行动由于是为着人民谋幸福、保卫被压迫者、受凌辱者，因而情有可原，周围的人们由于党的无私的动机而原谅它使用暴力。革命者一旦走上危险的革命道路，他的个人生活便彻底毁了，他们完全放弃物质福利，不追求个人生活的满足，监狱、流放、苦役和死亡，这一切为他们的使用

暴力赎了罪。因此，如果说社会由于习惯于革命党的暴力而见怪不怪、而变得粗野的话，那么，它同时也看到(如果不是在全党身上，至少在它的个别代表身上)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的典范，看到具有非凡的公民美德的人。除党之外，使用暴力的是政府，而且是在更大的规模上使用：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动辄对人实行行政流放，监狱人满为患，处死刑者数以十计。① 同时，在监狱里恣意凌辱人，例如，他们在拘留所里毒打波戈柳博夫、羞辱妇女。②

执行者冷酷残暴，受害者以及他们的亲人朋友自然被激怒，也变得凶狠起来；社会已习惯于侮辱人的尊严，死刑的场面刺激观众也嗜血，“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成了众人的口号。为了防范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需要秘密警察，政府的金钱造就了成群的密探，他们是从社会各阶层招募的，在他们之中有将军和男爵夫人，有军官和律师，有记者和医生，有男女大学生，哎呀，还有十四岁的女学生，在辛菲罗波尔，宪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个中学生，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当密探，赏给他钱。众所周知，没有哪一种情欲比金钱欲更强烈，更能使人

---

① 仅指政治犯而言。

② 当着三个男医生的面，强令马列诺夫斯卡娅·科连基娜和叶夫金尼亚·妃格念尔裸身。——作者

堕落了。波斯的金子使希腊领袖出卖祖国，三十个银币就诱惑了犹大。我们的政府广泛利用人类的自私和贪婪，尽量榨取金钱的威力所提供的好处。克列托奇尼科夫所看到的俄罗斯君主制的"黑皮书"永远是那个时代的世风的污点。青年妇女利用美色和年轻来勾引人，来卖身；密探摇身一变，当了革命事业的发起人、组织者和推动者。彼得堡的拉奇科夫斯基、莫斯科的赖恩施泰因、基辅的扎布拉姆斯基——这就是当时地平线上闪亮的政府明星。成功的告密，背信弃义的出卖，在侦讯时巧设陷阱诱供，以莫须有的罪名株连，制造几十人的大冤狱——这些就是升官发财之道。除此之外，还诱使意志薄弱者改变信念。免予惩处、勾销前科、许以金钱和自由——这些都是诱惑的手段（韦列德尼茨基、皮奥特罗夫斯基、库里岑、梅尔库洛夫等人①）。通过这种办法给我们革命者造成最严重的精神打击，动摇了我们对人的信心。当你看到从前的同志，你曾经准备为他而牺牲自己，你曾经那么信任他，那么尽心保护他，尽可能给予他兄弟般的帮助的同志站在宪兵身旁来抓你，当你听到他卑鄙无耻地说："怎么？没料到

① 这些人原都参加革命运动，被捕后出卖组织和同志，当上坐探。其中梅尔库洛夫帮助警方抓获本书作者薇拉·妃格念尔。

吧?"这时,你的心情是比失去自由更沉痛。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依法"审判、拯救祖国或保卫祖国的秩序的旗号干的。但是,谁能否认这些事实所反映出来的人格堕落呢?而且道德溃疡还通过其它更加有害的途径扩散:他们想通过散布互不信任来瓦解我们的队伍,他们力图通过特务警察勾当对一些和我们携手并肩前进的同志投下怀疑的阴影。利用有的人的欠考虑和疏忽,利用奸细针对某个人而一手制造情况巧合,来在革命友爱的集体中散布阴暗的念头——怀疑它的成员变节和出卖。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造成兄弟互相残杀的局面。事实上我们离这种情况确实也不远了,我们的手可能染上无辜的同志的血,就像涅恰耶夫让伊万诺夫流血一样。

我本人在被捕前的最后两年里曾经三次濒临犯罪的边缘。有一个人我曾决心亲手杀死他,因为是我介绍他入党的,而大家都确信他是个奸细。要是没有弄清作为他的罪证的一个最主要的情况,他可能会死,而实际上他却是无辜的!另一次,监狱里的朋友送出消息,嘱托我清算一个人,他们说是他造成他们被捕的。这个人也是我介绍与党联系的。我相信他的诚实和真挚,我尽自己的所能支持他,由于他年轻,需要温暖,我把他托付给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可是朋友们却告诉我

他是叛徒，应当杀死他。

我知道一个青年，他深受奸细的鬼蜮伎俩的诬陷，致使在众人心目中他是个变节分子。他因为对他的怀疑而差一点自杀。了解他的人相信他是无辜的，但当他们问我能不能让他继续搞革命工作时，我回答说，也应当回答说："不能"。这样就造成一种"世人可畏"的状况。如果我们这些早就参加运动、受纯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教育、准备进行和平宣传的人，真如政府所说的是坏人，那么，政府所豢养的那些人就应当叫做魔鬼！

第十二章

一、在敖德萨

在动乱不安的三月之后，当伊沙也夫被捕、四月三日我和他共住的那个寓所暴露之后，执委会决定我应当离开彼得堡，去敖德萨接替特利哥尼遗留下的领导工作。

特利哥尼是热利亚博夫在新罗西斯克大学的同学。当热利亚博夫因为参加学生闹事被学校开除、完全投身革命活动时，特利哥尼在法律系毕了业，当上律师助手，只是到一八八〇年才参加民意党，在这之前很少参加热利亚博夫一头栽进去的革命运动。特利哥尼从南方给叫来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参加过在小花园街挖地道的工作。前面已经说过，二月二十七日在他来到彼得堡后客居的一间连家具一同出租的房间里，与热利亚博夫同时被捕。① 这次不幸的被捕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敖德萨方面有人告密；但更可能是由于那连家

具一起出租的房子，因为这里的女仆常在门边偷听，有一次就让我碰到，而且这儿的房东太太（米秀尔）非常疑神疑鬼，晚上楼梯上还亮着灯，她却毫无必要地举着灯送特利哥尼的客人。

特利哥尼在被捕时给予宪兵某种强烈的印象，他们认为他在教养、出身和财产方面都高于革命党从中招兵买马的那个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特利哥尼有着贵族的外表，比其他人娇气，从他的风度可以猜出他是个律师，尽管他的律师事业刚刚起步，不论在彼得堡或在敖德萨都还没有什么主顾光临。他的父母是克里米亚的地主，据说他的母亲也是上流社会的妇女，这大概对他不无影响。《往事》杂志上刊载的照片非常真切地反映出他的外貌不象俄罗斯人，他说他的血管里流着希腊人的血。

在敖德萨，特利哥尼从我一八八〇年向他介绍的人中加上他本人吸收的一些人，组成一个民意党小组。现在我得和这些人接触了。首先，他们中有我的朋友：小说家伊·伊·斯韦坚采夫（笔名伊万诺维奇），他原是个军人，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但不能说是个积极

---

① 我们管他叫"总督"，因为他的名字和父名与高加索总督的一样。他被捕后警察局使用的"米洛尔德"这个假名，我们并不知道。——作者

分子，三十五岁左右；年轻姑娘奥尔加·普里茨，出身富家，有着火一般的热情，非常能干。其他党员有：大学生米·伊·德雷，医生的儿子，在犹太穷人中很有威信；教师马尔季诺，年纪满大，是特利哥尼在克里米亚时的老相识。在特利哥尼走后弗拉基米尔·热布尼奥夫也加入这个小组，在苏黎世上大学时我就认识他了。热布尼奥夫参加过“到民间去”的运动，在“一百九十三人案”中受审，后来就成为没有合法身份的人。由于他经验丰富，很自然地就成为小组的领导人。从前，他曾以执委会的代表的身份到喀山和萨拉托夫从事组织工作。但是，在喀山，民意党一直没找到必要的关系，热布尼奥夫在那儿一无所成。至于萨拉托夫，还在土地和自由社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人在从事革命活动了：帕立瓦诺夫[①]（后来给关在席吕塞尔堡）、诺维茨基、杰姆钦斯卡娅和其他人。热布尼奥诺夫建议他们正式参加民意党，组成一个小组，对中央承担一定的义务。他们照办了。这个很小的小组一直存在到一八八二年年中，当时帕立瓦诺夫和赖科企图帮助诺维茨基越狱，但没成功，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被抓起来，帕立瓦诺夫和诺维茨基被判处死刑，但诺维茨基被押赴卡拉矿

① 参看《狱中二十年》第158页。

山，帕立瓦诺夫被关进亚历克赛半月堡。至于赖科，一种传说是被群众打死，他们误把劫狱者当作强盗；另一种传说是他在与押送队武装搏斗时头部中弹，受伤致死。

热布尼奥夫好动，活动能力很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爱讲话，也很会讲话。他比大多数革命者爱虚荣，曾几次谋求进入执委会。他的长处和才能使他有充分条件当执委，我在敖德萨会见他之后，曾向执委会提议吸收他。为此，他被叫到莫斯科，但不久就在那儿被捕，原因不明。警察总署既不知道他与执委会的关系，也不知道他在敖德萨的活动。因此他只受行政处罚，给遣送到雅库茨克省。

在敖德萨，他把小组搞得很活跃，享有无可置疑的威信。就观点而言，他更象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民粹派。民意党人不失对农村的希望，在纲领中称自己是民粹派。热布尼奥夫确定无疑地把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政治斗争的唯一的依靠力量。同时，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认为党的全部力量应当放在在这个阶级中进行宣传鼓动。因此，他在敖德萨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工人群众。

在七十年代的前五年中，敖德萨工人中最著名的活动家是扎斯拉夫斯基。他有自己的印刷所，给工人们

系统上课，因此他比敖德萨的其他任何人都更扎实地在这一领域里为后来的活动家打下基础。[1]工人们在他的培养锻炼下，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到了后来，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也能独立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在敖德萨的工厂里，革命传统始终未断，因此在七十年代后半期，不管谁要与工人群众联系，都可以找到现成的向导。可是，一八八二年梅尔库洛夫的叛变断送了这个工人知识界的上层。热布尼奥夫以及米·伊·德雷就是与工人知识界来往的。

我在敖德萨时，小组里的积极分子增加了一个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他是从西伯利亚逃回来的。一八七七年，他因巴尔金娜案受审。此外，我还把在科瓦利斯基案中受审判刑的斯维特奇的妹妹叫来。这位好姑娘住在附近一个小县里，正苦于无所事事。那时正筹划让芳·莫雷尼斯从尼古拉耶夫监狱逃跑。这事是当地的一批到监狱当守卫的军官想干的。他们在那里认识了莫雷尼斯——她有可能被判服苦役。一个军官应在值勤时把她领出监狱，为了把她藏起来，需要一处秘密寓所。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和斯维特奇负责安置她，便前往尼古拉耶夫。但是，越狱没搞成，他们知道这情况后

① 扎斯拉夫斯基是南俄工人协会的创建者。一八七七年被判服苦役，后来改为终身流放。——作者

便返回敖德萨，准备根据党小组的决定，办一个小印刷所印传单给工人看。由于铅字已经有了，所以事情不难办成。但是印刷所没工作多久，只印了唯一的一份介绍功绩卓著、卧病多年的革命者费先科的去世和葬礼的传单。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与工人们也有联系，这使他遭了殃。有一次他被盯梢，被捕了。斯维特奇同时被捕，印刷所被破获。

一次，我来到他们房子附近，看到安全标志已撤掉。我以为这可能只说明主人暂时外出，便走进院子，走到他们房门前。挂锁表明这里已经完了，我赶紧离开。算我福气，这里没留下埋伏。

奥·普里茨的表弟、大学一年级学生科冈也是敖德萨小组的党员，或者说非常接近党的人。他在学生中活动：组织了一个十人小组，他们都同情民意党，自学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

二、南方的军官

伊·伊·斯维坚采夫曾在军队服役过，通过他，在军人中也建立了关系。我在他那儿认识了这些军人。这里面有柳布林斯基团的连指挥官克赖斯基、军官捷

利耶(他的一个兄弟被判刑)和斯特拉托诺维奇。他们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殷勤，这是军人对待妇女的本色。我们最初的几次谈话是文学沙龙性质的。后来，当我得知克赖斯基喜欢我这个社交沙龙时，我开始较常和他见面，在比较接近之后，我谈出了我的革命观点和情绪，他也坦率表示了对政治自由思想的兴趣和同情，承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正的。但是，使我对他这个人感兴趣的不是这种一般表示的、没有超过一般谈话界限的同情，而是我所发现的矛盾。一方面，他承认信念应当表现在积极的行动中，语言宣传是把一种思想付诸实现的最主要工具；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只有依靠知识进行的宣传才是有效的宣传，而他恰恰缺乏知识。他惋惜自己没受过高等教育，他两次尝试进军事学院深造都被拒之门外，尽管他的才能使他对此抱有希望。[①] 看来他是真心感到惋惜，但同时我又感到奇怪：他一点儿也没设法发展自己的智力，弥补他清楚认识到的不足。我觉得这不好，我想，我的友好干预可以帮助他摆脱这种空悲切的状态，他或是将意识到自己只会空谈不会行动，或是开始学习，提高自己。我还想到也许他把掌握知识问题看得太过严重，对自己提出

---

① 他认为他之所以遭拒绝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作者

太过高的要求了。因此，我在一般地赞同必须有科学修养的时候还谈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一个人自己对某一个真理并不怀疑、并不动摇，只是觉得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别人，那也没有必要先钻研一番理论，好使自己能以全副武装的面目出现。逐步学习个别问题，并同时将已掌握的传授给别人，这对他本人甚至是最好的学习。此外，克赖斯基还常说他无法与智力比他低的人为伍，我认为这与做人的工作的愿望是不相容的，因此在交谈中也常常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克赖斯基是一个可贵的、意志坚强的人，这种人一旦下了决心就不会离开所选定的道路，因此我一定要把他吸收到党里来，打消他对自己的怀疑，扫除那些妨碍他靠拢我们的内心障碍。斯特拉托诺维奇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但心理较简单，性格还未定型，我对他不感兴趣。而且他奉命出差到奥恰科夫，在秋初离开了敖德萨。这两个人与布拉格步兵团的中校米·尤·阿申布伦纳（日后的席吕塞尔堡囚徒）关系都很好。热利亚博夫一八七九年上半年在敖德萨时就认识阿申布伦纳，我是一八八〇年，在我动身去彼得堡之前不久，在斯韦坚采夫家里偶然碰到他的，在这之前，斯韦坚采夫并未向我提到他。在谈到军人参加革命运动问题时，阿申布伦纳说搞军事政变没有用，因为它的后果只可能是换一班人

马，并不会改变社会关系的实质，他举了西班牙的军事政变并没有使国家走上新的道路为例。伊·伊·斯韦坚采夫向我介绍说，阿申布伦纳是个社会主义者、革命者①。我还想跟他再见见面，但始终没有机会。我觉得他意志消沉，不爱说话。他比我大十岁，我不善于与他沟通思想，他或是不习惯于与女性交往，或是不喜欢与女性交往。看来，我们两个人都感到谈话别扭。

现在，在我第二次来敖德萨时，阿申布伦纳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有时来敖德萨，于是我们重新来往。在尼古拉耶夫，阿申布伦纳团结着他的一批同事：塔拉平多夫、迈梅斯库洛夫、米兹凯维奇、基里亚科夫和乌斯宾斯基，他们与阿申布伦纳友谊甚笃，也具有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革命情绪。我希望亲自认识他们，为即将来南方的苏哈诺夫开辟道路。我去过尼古拉耶夫好几次，造访阿申布伦纳这一群朋友聚会的寓所。

这些人年龄都较大，是阿申布伦纳的同龄人，与苏哈诺夫的那一伙同志完全不同——那是一群优雅勇敢的年轻人，摩拳擦掌，尽想干一些冒险的快速的行动。阿申布伦纳本人是个有教养的、知识渊博的人，比自己的朋友们高出一大截，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友谊集体

---

① 阿申布伦纳在一九二四年荣获“最老的红军战士”的称号。

的领袖。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是封闭的，既不娱乐，也不努力吸收新信徒①。他们还从来没有从事过革命活动，当我指出必须带着吸收同情者的目的结识人时，他们总是说在军官中没有合适的人。但是在我的坚持下，后来他们与海军接触了，看来这里有良好的土壤，因为阿申布伦纳认为在水兵中开始进行的活跃的鼓动工作甚至超过理智的限度。但与海军军官的来往，包括与未来的席吕塞尔堡囚徒尤瓦切夫的来往，已是我离开敖德萨以后的事了，因而海军军官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这之前，小组一直处于静止状态；朋友们都很团结，彼此谈到对自由的热爱和向往。有时，对马克思有精深研究的阿申布伦纳作有关《资本论》或其它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题发言，高兴起来还会介绍各种哲学体系——他对这些都很有研究。

应当说，我与这些军官的相交还太浅，谈不上认识每个人的个性。阿申布伦纳是个很仁爱、待人很宽厚的人，对自己的朋友都很赞扬。他与他们心连心，认为他们是忠于人民利益、准备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的人。正是在他这个介绍的基础上，产生了这样的设想：由军事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派一个人来建议这个军官小组加

---

① 指忠于新思想的人。

入民意党，并与军事组织的中央建立关系。我们认为由一个军人，而且是军事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人来向他们介绍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必要的，因为这要比由一个普通的组织者出面更能把地方军事组织与中央联系起来。正如前面说的，本当苏哈诺夫来，但是，四月二十八日他不幸被捕。代替他来到敖德萨找我的是亚·维·布采维奇，他是六月里受交通部的派遣到尼古拉耶夫港搞工程的。我给他写了一封去见阿申布伦纳的介绍信，对他谈了我个人对我所认识的这些军官的印象，并建议他立即安排与敖德萨的军官们见面。但布采维奇要赶到尼古拉耶夫，答应工程结束回程时拐到敖德萨来。直到十二月里他才办了这件事。

对布采维奇来说，把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军官组织起来、并成一个与中央机关联系的支部，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因为他们早已彼此认识，而且已由阿申布伦纳和我做好了工作，准备同意布采维奇可能提出的一切。这些人确实承担了布采维奇宣读的党的章程所提出的严重义务，答应只要中央一声令下，他们就手持武器起事，并把所属部队也拉出来①。

---

① 我派了优秀的工人亚历山大来在士兵中做宣传工作，他受尼古拉耶夫支部的领导。——作者

这样，布采维奇的使命完成了，北方和南方的革命军官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那时，整个军事组织共有五十来名成员。

第十三章

一、党中央迁到莫斯科

十月底，我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邀请信。我离开彼得堡已半年，这期间我几乎没得到有关党的工作和迁到莫斯科的党中央的消息。不言而喻，我是多么急切地动身前往与在春季大逮捕之后幸存的同志们见面：尤利·波格丹诺维奇、科尔巴、格拉切夫斯基、伊万诺夫斯卡娅等，他们希望在逼得我们四散的事件之后第一次重聚。

应当说，敖德萨的生活没有受到三月事件的震动，也没有使我对在莫斯科等待我的变化有所思想准备。抵达那儿之后，我痛切地看到执行委员会在三月一日前，尤其三月一日之后所遭到的致命损失。

执委会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不是因为有什么高明的打算，而完全出于不得已。在三月和四月的大逮捕之后，没有落入警察之手的委员们已无法在彼得堡

呆下去。继续留在那儿意味着必然的灭亡，因为显然有一个认识组织成员的人在街头向警察指认他们。

革命党中央从首都迁往其它城市这本身不能不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害。如果注意看一下七十年代以来的革命运动，那么，每一个熟悉它的人都会说，彼得堡是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它作为国家生活的中心和国内知识力量集中的地方，年复一年地麇集着反对派分子。正是在这里先后成立了全俄性质的严肃的革命团体，而且它们之间有着继承关系：柴科夫斯基团、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组织主要地也是在这里吸收志同道合者。远的不说，仅从柴科夫斯基团算起，革命活动就集中在这里，革命组织的领袖也在这里，外省都向往彼得堡，从这里得到推动力；这里提出口号，发出道义支持，组织的网络也是从这里张开的。所有产生巨大的鼓动作用的政治审讯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一切革命义举也是在这里得到最大的反响。在彼得堡集中了全俄国的主要写作力量和他们之中的接近革命潮流的人。革命团体的机关刊物只在彼得堡出版，再从这里散发到全国。

彼得堡的工人，地位较稳定，较有素养，最能接受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比起其它工业中心来，在这里的工厂中进行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较早，较经常化，较

广泛。

彼得堡的青年学生在数量上比其它城市多，他们站在全国青年学生的最前列：在闹学潮时，彼得堡的高等学校首先发出行动信号并走在最前面。在其它城市，革命传统可能中断过，但在彼得堡，从七十年代起就不曾有过这种情况，它从来不曾没有组织存在，而在组织的周围，始终有同情和支持它的外围组织。撤离彼得堡，把革命中心转移到其它城市，意味着失去迄今为止革命组织发生、成长和存在的土壤，失去滋养了革命的过去的土壤。这种转移无异于流亡、流放、断裂，会有极其惨重的后果。

执行委员会所迁入的莫斯科，是一个没有革命传统连续性的城市。在这里出现过的组织没过多久就由于成员被捕而夭折，没有其它团体接班，继续它们的活动。多尔古申小组(一八七四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他们之前还有涅恰耶夫小组也是这样。柴科夫斯基团在莫斯科有支部，但这不是在莫斯科土生土长的独立的组织，而是由彼得堡来的人组成的，人数不多，对革命运动没作出什么新贡献。在一八七四——八七五年间，一些在“五十人案”中受审的人曾在莫斯科活动过，他们也不是莫斯科本地人，而是在苏黎世留学过的女学生和高加索人，虽然他们在莫斯科工厂中建立

了相当广泛的联系，但是并没有在这个选定的活动中心深深扎下根来。

他们没有留下能继承他们的事业的接班人。土地和自由社在莫斯科没有组织性强的团结紧密的小组。

至于民意党，它不愿使莫斯科处于自己的影响之外，因此它刚成立不久就派去两名杰出的执委会成员——彼·阿·捷拉洛夫和玛·尼·奥沙尼娜。经过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建立了地方组织，在工人和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但是莫斯科组织的真正创建人是亚·米哈伊洛夫，他在一八七九年到莫斯科领导在铁路路基下挖地道的工作。

现在，执行委员会迁到莫斯科之后，插进地方组织，可以说把有生力量抽光了。捷拉洛夫和奥沙尼娜本是莫斯科小组的灵魂，现在作为执委会委员给抽出来，全力从事中央的工作。而且捷拉洛夫七月里被执委会调到彼得堡。除他俩之外，还从小组里调出马丁诺夫和列别杰夫当执委会委员；戈尔登斯基作为执委会的代表被派到基辅从事组织工作，安德列耶夫也为同样的目的被派到萨拉托夫。小组成员弗里登松比其他人更早为执委会调出，在一八八一年一月就已在彼得堡被捕。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削弱地方组织。

除捷拉洛夫外，还往彼得堡派去两个刚参加执委

会的委员——从国外回来的罗曼年科和斯特凡诺维奇。这三个人过去不曾作为民意党党员在彼得堡工作过，在那儿没有私人关系，而老民意党人在莫斯科却成为新来人。这也是一个不利于开展活动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随着党中央的转移，从革命的角度说，彼得堡降格为外省，从今以后，那儿只能有地方组织，而莫斯科则变成革命的首府，可是却缺乏彼得堡所拥有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二、中央的状况

我发现执行委员会在数量和质量构成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毋庸讳言，一八七九年的执委会已被摧垮。奇怪的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一点，我们碰头，讨论种种问题，然后分散而去，好像没发现我们党中央的惨状似的。也许我们大家都是那种看到不幸却不谈不幸的人。只有一次，我和格拉切夫斯基单独在一起交谈，我对他说了我对未来的担忧和对眼前的伤感。但是他却有另一种看法，也许他不愿承认情况遭透吧。在二十八名民意党的创建者和三月一日前的执委会成员①中，现在只剩下八人：三个女性——科尔巴、奥沙尼娜（生病）和我；五个男性：1）格拉切夫斯基：在

这之前从事印刷和制造炸药的技术工作，精力充沛，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七十年代初的老民粹派，与莫斯科党组织的巴尔金娜和贾巴达里一起在莫斯科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在“一百九十三人案”中受审，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从那儿逃跑回来。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富有实践经验、工作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在民意党中一直忙于技术工作，在三月一日之前没怎么参加组织工作；② 2)彼·阿·捷拉洛夫，一位杰出的活动家、宣传鼓动家，莫斯科党组织的创建者，由于身在莫斯科而没能积极参与作为全俄中央的执委会的活动；

---

① 我还没看到文献中有关于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的记载，因此在这里提一下，该不是多余之举：1)热利亚博夫；2)佩罗夫斯卡娅；3)莫洛左夫；4)弗罗林柯；5)科洛德凯维奇；6)尊杰列维奇；7)克维亚特科夫斯基；8)奥沙尼娜；9)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10)索·伊万诺娃；11)希里亚耶夫；12)巴兰尼科夫；13)伊沙也夫；14)薇·妃格念尔；15)科尔巴；16)季霍米罗夫；17)亚基莫娃；18)朗汉斯；19)捷拉洛夫；20)苏哈诺夫；21)列别杰娃；22)波格丹诺维奇；23)奥·柳巴托维奇；24)萨·兹拉托波尔斯基；25)格拉切夫斯基；26)特利哥尼；27)玛·尼·奥洛文尼科娃*；28)季霍米罗娃(娘家姓谢尔盖耶娃)。三月一日之后新增补的有：1)哈尔图林；2)热布尼奥夫；3)马丁诺夫；4)列别杰夫；5)罗曼年科；6)斯特凡诺维奇。

戈登贝格是在利佩茨克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土地和自由社分家之后，他不再是我们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作者

* 原文如此。应为纳·尼·奥洛文尼科娃，是玛·尼·奥洛文尼科娃(夫姓奥沙尼娜)的妹妹。

② 参看《狱中二十年》第 67 页《格拉切夫斯基》一章。

3)尤利·波格丹诺维奇，一个非常好的同志，七十年代初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原先参加过柴科夫斯基团。他经验丰富，在事业上勇敢刚毅，但待人温和宽厚。在成立民意党时，他正在彼尔姆省张罗巴尔金娜的逃跑事宜。他被接纳入执委会后直接安排到小花园街开干酪店，三月一日以后受执委会的委托前往西伯利亚组织“红十字会”，该会的主要宗旨是帮助被流放的政治犯逃跑；4)萨韦利·兹拉托波尔斯基，敖德萨人，由弗罗林柯和科洛德凯维奇推荐入执委会，他们在敖德萨时就认识他了。他是个温和、仁慈的人，但不善于给人造成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最后，5)列夫·季霍米罗夫：我们公认的思想家、理论家和优秀的作家，还在一八八一年，在他身上就已有一些古怪的表现，可能就是心理变化的萌芽。心理变化终于使他改变原先的意识形态，使他从一个革命者和共和主义者变成保皇派，从无神论者变成宗教伪君子，从社会主义者变成卡特科夫和格林格穆特的同志①。早在三月里在彼得堡，他就使我们感到困惑不解了。例如，在三月一日后，他来见我们时，和军人和官吏一样为亚历山大二世带黑纱。又一

①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俄国政论家，早年是温和的贵族自由派，后转向黑帮分子。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格林格穆特：俄国反动政论家，黑帮分子。

次，他告诉我们，他去过教堂并向新皇帝宣了誓。我们不知如何解释这出闹剧。但季霍米罗夫说，他这样做是使自己在房屋管理人心目中合法化的需要，那人很好问，主人不在家时都会闯进房间里来。看来，他已得了密探恐怖症。例如，在莫斯科，他住在一所连家具一起出租的房子，他怀疑邻人在墙上挖了个洞偷听他房间里的谈话，便立即退掉这房子，到谢尔吉圣三一大教堂去祷告，以便在那儿登记，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治可靠，好继续呆在莫斯科。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秘密工作者像他这样要诡计的。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从前的执委会还剩下什么了。我们党的主要台柱、民意党的发起人和创建者、确立了新方向和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业的人已不复存在于我们之中了，他们离开了革命舞台，不是已被判刑，就是等待受审。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已不在人间。他是一个热情的革命家和优秀的组织者，具有吸引人参加革命的特殊才能。他在一八七九年被捕并被处死。尊杰列维奇也不在人世了，他是搞到各种技术材料的能手。莫洛左夫也不在，他是民意潮流最早、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在民意党成立后半年就出国了，没有看到党的鼎盛时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党的“警惕的眼睛”、真正的“管家”，巴兰尼科夫——忧郁、寡言的

大力士、美男子、恐怖的化身，克列托奇尼科夫——保护我们免受警察袭击的卫士，都不在了。热利亚博夫、佩罗夫斯卡娅、科洛德凯维奇和弗罗林柯这些既善于言语，也精于行动的卓绝的活动家也不在了。伊沙也夫、亚基莫娃、席里亚耶夫、索菲亚·伊万诺娃这些技术人员也离队了；热情的苏哈诺夫、执委会成员特利哥尼、列别杰娃、朗汉斯和刚吸收进来的热布尼奥夫，都不在了。已牺牲的执委会代表有：基巴利奇奇、萨布林、格霞·格利夫曼、捷连季耶娃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同志，他们都是共同事业所需要的人，以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才干支持着我们党各个活动领域的行动协调。现在剩下的只是一片荒漠——既缺才智，也缺人手；既缺决策者，也缺执行者。在一八七九年，执行委员会集中了前十年积聚起来的、几经摧残而幸存的全部革命力量，把他们投入政治斗争中，完成了巨大的工作，在两年里耗尽了全部资本。现在，在一八八一年年终时，剩下的只有不多几个人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人，正如一八八四年我的案子的出庭辩护人所说的，已是“学生辈”了。

实质说来，执行委员会已不复存在，此时此刻的民意党中央已无力扮演过去的角色。在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自由思想界所知晓的人物

了。由于人员的损失，执委会已失去战斗力。眼下要做的是宣传和组织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振旗鼓。但是，活动条件复杂得多了：特务、侦探的手段更加高明，出现了干这一行的能手——诸如苏杰伊金这样的一些爱虚荣、有能力、有魄力的人；另一方面，与七十年代相比，对革命者的要求提高了。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寻找更加成熟的人。但是，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人。在青年中，要找一般工作人员是相当容易的：搞外省的、地方的工作，他们完全能够胜任；但是对中央的人选，我们提出另外的要求，我们用的是民意党成立时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适合的人就不多了。

随着原来的组织的瓦解和大量同志的消失，对个人的集体监督削弱了。当我四月里路过莫斯科到南方去时就发现这个问题。有几次可怕的逮捕就是由于个别人忽视安全措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缘故。亚基莫娃是非常大胆、临危不惧、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应当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她，可是却给派到基辅，明知那儿的警察戒备与彼得堡同样严密。在那儿，她不久就与朗汉斯和莫雷尼斯一道被捕了。列别杰娃的情况也是一样。弗罗林柯的母亲是个普通妇女，从来没来过彼得堡，列别杰娃想帮她和儿子见面，于是经常和她碰头而不顾明摆着的会受到盯梢的危险。果然，

列别杰娃被捕了。由于她参与暗杀沙皇的行动，和亚基莫娃一样，被判服苦役，后来死在西伯利亚的卡拉矿山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和热利亚博夫在世时，存在着整个集体，大家是不会允许个人这样去冒险，这样任性的。而且，难道会发生佩罗夫斯卡娅本人以及后来苏哈诺夫被捕这样的事吗？如果在执委会活动的最好时期，组织上严格的监督就能制止他们，而且必要时强制个人服从革命纪律，只有经过集体的讨论、为了共同事业的需要，才允许拿个人生命去冒险。[1]

三、社会的期待

执行委员会——我说的是一八七九年的执行委员会——实质上已不存在，可是在受沙皇遇刺身亡而激动的俄国，还回荡着三月一日事件的回声。广大公众并不了解党的真实力量，社会舆论被党的活动搞得眼花缭乱，大大夸大了党的力量，期待着党再接再厉干下去，因为执委会在自己的出版物中不止一次宣告，只要专制制度不投降，只要沙皇制度未被自由体制所取代，党

---

① 后来尤·波格丹诺维奇之所以被捕并牺牲，也是由于到一所已被我们放弃、受警察监视的寓所去。集体本来应当禁止他这样做的。——作者

就要一直暗杀沙皇，决不放下武器。

这里不妨谈谈当时的一件小事。

三月三日，基巴利奇奇突然万分激动地到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我们的寓所来（没有特别通知，他本不当到这里来的）。他报告说捷列日纳亚街上萨布林和格霞·格利夫曼的寓所被警察破获，萨布林自杀了，季莫费·米哈伊洛夫来找他们，在楼梯上被抓走了。这件事使小花园街上的干酪店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我们还没撤销这爿店，店主人波格丹诺维奇和亚基莫娃还住在那里。它每一分钟都有被警察破获的危险。下午二时，屋里除我和伊沙也夫之外，还有季霍米罗夫、佩罗夫斯卡娅、朗汉斯、亚基莫娃和其他六个执委，我们讨论撤销干酪店问题并决定这事立即要办，而且店主当晚就应该离开彼得堡。只有我持另一种看法。我提议干酪店继续保留二、三天，看看与皇后一起住在阿尼奇科夫宫的新沙皇会不会像他父亲那样经过小花园街到米哈伊洛夫斯基练马厅去，如果他真来了，那就拉响为亚历山大二世准备的地雷炸掉他。我说，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留在店里的人是值得的，执委会有权去作这样的冒险…… 但是与会者全都反对。我脱口喊道：“真是胆小鬼！”站在我旁边的季霍米罗夫和朗汉斯愤怒地挥手喊道：“您没权利这样说！”其他人没说话。这事就

作罢了。

当下决定亚基莫娃回店里去，把执委会的决定告诉波格丹诺维奇，要他搭下一班火车离开彼得堡，亚基莫娃按照平常的时间锁上店门，从另一个车站离开彼得堡。他们这样做了：波格丹诺维奇先走，晚上在通常的时间，亚基莫娃关上店门，点上胜利者格奥尔基神像前的小油灯，带着一个小包袱经过打盹的看门人，走出了大门。

三月四日上午，房屋管理人看到时间已过而店门还没开，也没发现店主人活动的迹象，感到不妙，便去报告警察。警察自然来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

他们在柜台上找到一堆铜钱和一张字条，东家太太请他们把钱转交给肉店老板，那是她为小猫瓦西卡买牛肝的钱。

由于没有可能紧接着再次暗杀沙皇，一切复归沉寂。从我们方面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沉寂，可是公众舆论却把它理解为大雷雨前的沉寂。政府也是这样看的，等待着新的悲剧发生。可以说，紧张的期待是那时的社会情绪的典型特征。过去，执委会的行动一直很神秘，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以何种形式发出打击。谁也不知道民意党拥有什么手段(包括人员和技术装备)。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

以开玩笑的形式隐喻地反映了这种绝对的神秘和公众的看法：承认执委会是现时俄国命运的主宰，决定着俄国是朝自由转变，还是变本加厉地反动。在三月一日之后，有一次他和我交谈时，他就这个事件说："现在，薇拉·尼古拉耶芙娜要给我们表演点什么吧？"——他说的"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指的是执行委员会。

在短时期的动摇不定之后，已可清楚看出，新沙皇不会进行什么改革（官吏们已经预言：最凶恶的反动统治还要继续二十五年）①。国内政策的反动取向已经明摆在大家面前：四月二十九日的诏书宣告专制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罗利士-麦里柯夫、米留京和阿巴扎的辞职表明，自由派要稍许满足社会对自由的一般要求的努力已告结束，一切都将恢复原状。

但是革命党，执行委员会在作了种种声明和致信亚历山大三世之后，会不会沉默呢？——信中表达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一切对旧制度不满的人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党不会沉默。政府的表现使他们更加这样相信：新皇帝还没举行加冕典礼，也没有要举行的迹象，唯一能够解释的理由是害怕恐怖分子。公众中流

---

① 亚历山大二世从一八五五年登基到一八八一年遇刺，一共在位二十五年。

传着种种有关恐怖分子的计划和打算的神话传说，诸如为了等待加冕礼，在莫斯科已租下房屋，在那里面挖地道，准备炸死加冕队伍；已租下一间阁楼，准备从那儿扔炸弹。还传说干酪商科博泽夫（波格丹诺维奇）已为了同一恐怖目的承包了节日彩灯装修工程。还有的人说他继续做干酪生意，正在外省采购干酪，在里面放炸药运进莫斯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执行委员会并没有类似的意图。在三月一日后，起初佩罗夫斯卡娅由于亲身经历的种种感受而极度兴奋，好像发了狂，失去理智，一心只想再次暗杀沙皇。她到处打听，寻找为宫廷里的人服务的洗衣工、时装师，到处请人指给她看那些可能在某种场合（例如在格奥尔基节）碰到皇室的人的人。她亲自观察沙皇出入阿尼奇科夫宫的情况，终于在那附近被捕。随着她的被捕和执行委员会的转移到莫斯科，这类神经质的尝试停止了。我们探听到沙皇躲在加特契纳①，像个囚徒，根本不可能接近他。执委会没有进行任何寻访，没有收集任何情报，更不用说进行观测，也没有任何利用加冕庆典行事的计划。暗杀沙皇的问题连提都没有提过。我在莫斯科的那段时间里，会上一次也没谈到这个问题。凭着

① 在彼得堡西南四十五公里，有皇室的行宫。

我们当时的力量，显然是根本谈不上这件事的。

四、新 委 员

我已谈过那些在这之前离开我们的人。我也接触过接替他们的新人：马丁诺夫、列别杰夫和罗曼年科；第四个是斯特凡诺维奇，但他在彼得堡，老委员捷拉洛夫和萨维利·兹拉托波尔斯基也在那儿。

马丁诺夫和列别杰夫就职业而言是医生，参加由捷拉洛夫和奥沙尼娜创建的莫斯科地方小组。如果说关于列别杰夫我没听到好的，也没听到坏的反映的话，那么，关于马丁诺夫，奥沙尼娜在彼得堡和我相见时可是谈了很多，说他是个聪明的、有独创性的、有趣的人，善于即兴编故事。在她看来，他是莫斯科组织中最有才能、最出众的一个①。但是，在莫斯科的波格丹诺维奇和奥沙尼娜的公用寓所里，我和他以及列别杰夫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我并未得出明确的印象。由于他们作为执委会成员的时间不长，他们在执委会中起的作用并不大：马丁诺夫被派到彼得堡工作，在一八八二

① 二十五年之后，马丁诺夫由于另一案件被行政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参加了寻找北方自然矿产的科学考察。由于工作出色而获得科学院授予的金质奖章。——作者

年一月，即捷拉洛夫被捕（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后不久就被捕。警察总署提不出马丁诺夫与党中央关系密切的材料，所以他只受到行政流放的处罚。列别杰夫的遭遇也一样（于一八八二年二月被捕）。如果说列别杰夫不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在莫斯科的碰头中没有给我留下明确的印象的话，那么，他作为一个写作人员，在党的机关刊物中，在一八八一年的下半年却是起着突出的作用，工作很有成效的。例如，这一时期的《民意》杂志上、《民意小报》第一期的社论、《民意》杂志第七期、第八一九合刊的社论和其它一些文章和短评，都是他写的。

后来，列别杰夫从流放地回来之后已不再参加革命活动，只当医生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论在农村或城市，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尊敬他。

格拉西姆·罗曼年科，我在敖德萨时就已认识他。就所受的教育说，他是个律师。他是一个聪明、有学问的人，风度优雅，脸庞清秀，显出肺病的征候。他是一个极有教养的人，待人接物很有魅力，我和科洛德凯维奇（他曾在敖德萨呆过一段时间）都很喜欢他。我们常常见面，一起商量所有的问题。奇怪的是像他这样有才华的、可爱的人，在大学里竟然没有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一帮人。他推荐给我们的大学生，他的同学（总共只

有两个人[1]），都很一般，对革命工作并不积极，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在戈登贝格带着炸药在伊丽莎白格勒被捕之后，罗曼年科由于曾在敖德萨和他见过面，便急忙办护照到国外去了。他在瑞士遇见莫洛左夫，和他来往密切，和他合写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用塔尔诺夫斯基的笔名）《恐怖斗争》。书中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如果人民沉默，不准备革命，那么革命知识分子也应当在没有人民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有计划的政治恐怖行动进行革命，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入搞恐怖行动。

当小册子传到俄国国内时，执委会曾想在党刊《民意》上发表批驳文章。民意党从来没把自己的任务看得像小册子里所说的那么狭窄，莫洛左夫是民意运动的著名创导人之一，竟然也在这小册子上署名。民意党是相信人民并且愿意依靠人民的。党的活动不是由于对人民群众失望而作出的绝望的姿态。如果要说失望，那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在人民中从事活动的人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确信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下，在人民中不仅不能够进行任何革命工作，甚至不能从事文化工作。在民意党看来，搞政治恐怖只是策略，只是进行广泛鼓动的手段，通过这样的鼓动把人民和社会从停滞状态中拖出来，促使他们提出业已成熟的需要和要求。在这方面，党对当时人民的有生力量的估计超过它的

实有水平，三月一日时没有同时发生任何群众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那是进行了，不仅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只要有民意党组织的地方都进行了，而且这工作并不像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为了吸收从事恐怖活动的力量。民意党人从来不这么狭隘地看问题。在莫洛左夫和罗曼年科的小册子里，把知识分子放在首位，而且是革命思想的唯一载体，没有人民，他们也能完成自由事业。①

斯特凡诺维奇是南方著名的活动家，在土地和自由社分家时，他加入土地平分派，在一八七九年底就离开俄国。谁也不怀疑，他在回国后与阿·布拉诺夫和其他几个土地平分社的人是真诚地转到昔日的对立面——民意党一边来了。然而，和马丁诺夫和列别杰夫一样，不论罗曼年科或斯特凡诺维奇都来不及作为执委会成员开展活动：斯特凡诺维奇住在彼得堡，但一八八二年二月六日在莫斯科布拉诺夫家被捕，而罗曼年科比他更早就在莫斯科落入宪兵之手，当时我还在莫斯科。他是在奥尔加·柳巴托维奇那儿被捕的。她是在莫洛左夫被捕后不久从国外回来的，而莫洛左夫是一八八一年二月间回国时在国境上被捕的。奥尔

① 在党刊上发表反驳文章的想法后来被搁置下来了。——作者

加·柳巴托维奇在一八七九年民意党成立不久就被吸收入执委会。她没有出席土地和自由社的沃罗涅日大会，虽然她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因为当时她在国外——在梅津措夫被刺（一八七八年四月）后，由于朋友们的坚持，她避居国外。她生性活泼，朝气蓬勃，十分能干，是我在苏黎世大学的同学，后来在俄国政府发布那份著名的文件（宣布凡继续在苏黎世学习者不得参加国内资格考试）之后，我们又一同转学到伯尔尼。在巴尔金娜的女学生小组（人们管我们叫"弗里契"）里，她以观点激进、性情急躁著称。但是，当我一八八〇年见到她时，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是那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我想，流放（她在"五十人案"中被判终身流放）使她脱离了生活和革命洪流，走上与她从前走的、她的莫斯科同志们走的不同的路。不过，这大概也跟她的健康不佳有关。

莫洛左夫的被捕和她在国外生下的孩子的夭折使她变了样。她回到俄国，怀着一腔向政府复仇的怒火。当我在莫斯科看望她时，她真像只母老虎。她不与民意党人来往，对我们的组织显然很不喜欢。民意党人对她也不满，因为她准备单独搞恐怖行动，利用过去的关系来为她服务。她的激烈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既不考虑困难，也不想到危险。我不知道她的激情能维

持多久，也许这有点歇斯底里，但是那时候的她，这只母老虎，真有趣，她怒不可遏，同时又很美丽——母性赋予她的美丽。她已经一点也不像一八七九年的那个奥尔加了，那时她是那么蔫不唧唧的，与其他民意党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一个个生气勃勃，洋溢着革新者和胜利者的豪情，尽管新道路上有许多艰难险阻须要克服。奥尔加想都没想到监狱已张开大口在伺候她了，她的一切计划会被监狱吞噬的。

一天晚上，我到她住的旅馆看望她。门口没有阍者，我在楼梯和走廊里都没碰到一个人。我走到她的房间门口敲门，没有回音；我打开门，房里没灯，空空的。我明白，柳巴托维奇被捕了，得赶紧走。我在楼梯和走廊里还是没碰到人。

这一次，和在敖德萨一样，我再次侥幸没遇难。而来访的罗曼年科（他是奥尔加的朋友）却落入宪兵之手，虽然奥尔加可能已把安全标志撤下。也许他是晚上来的，看不见。

看来，警察总署对罗曼年科也和对马丁诺夫和列别杰夫一样，没有掌握什么材料，因此未提交审讯，把他放逐了，但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是到塔什干①。

① 罗曼年科后来赞同反犹主义者克鲁舍万的观点，晚节不好。——作者

奥尔加·柳巴托维奇是十一月六日被捕的，也没提交审讯，而由行政机关遣送到西伯利亚，她在那里嫁给曾在“五十人案”中一同受审的贾巴达里①。

至于捷拉洛夫和斯特凡诺维奇，他们两人都在一八八三年的“十七人案”中受审，被判服苦役，斯特凡诺维奇给送到卡拉矿山，捷拉洛夫被关在特鲁别茨基棱堡，死于体力衰竭。

五、莫斯科小组

在革命文献中，有关捷拉洛夫的记载太少了，我不能不在这里哪怕用不多一点笔墨谈谈他的杰出人品。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素的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出色的演说才能。由于这些品质，他对青年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造就了一大批民意党的追随者，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导师。以前他曾和佩罗夫斯卡娅一同在哈尔科夫活动，在莫斯科时，经常在大学集会上演说，吸引了广大学生。他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威望，与

---

① 柳巴托维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警察总监普列维曾要她去与执行委员会的人谈判停止搞恐怖活动，她拒绝了，但提出让罗曼年科去。他在国外曾用塔尔诺夫斯基的笔名印过一本小册子，热烈为恐怖活动辩护。——作者

他们常来往，因此有可能直接吸收和挑选人才。从莫斯科小组的成员来看，根据我在外省的亲身体验，他挑选的人都是很出色的。在每次学潮之后，总有一些学生被开除，一些转到其它大学去，他们分散到各地，也就同时把捷拉洛夫所播下的种子带到各处。在外省，这样的人中我亲自认识的就有科马尔尼茨基、安年科夫、奥米罗夫。莫斯科小组的成员主要地是由捷拉洛夫在大学青年中挑选来的，而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奥沙尼娜则对他所挑选的人进行教育，把他们团结在革命党里。

在一些回忆文章里引用了热利亚博夫的一句话，那是他在一八八一年一月里我们会议结束、玛·尼·奥沙尼娜要回去时对她说的："你要记住，整个希望全在莫斯科。"热利亚博夫确实会这样说，因为在民意党存在的整个时期里，莫斯科小组无疑是所有地方组织中最优秀的一个：它比其它小组人数多、也活跃得多。这既是由于莫斯科的高等学校数量比其它外省的城市的多，也是由于莫斯科组织的组织者能力强，工作经常化，他们没有跑跑颠颠，没有为恐怖计划的实际事务而分散组织工作的精力，不论捷拉洛夫或奥沙尼娜都从未直接参与恐怖行动。

莫斯科党组织的城市组有成员十一人，曾给中央

输送了好几名委员和代表，在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此外，为了在工厂进行鼓动工作，还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小组和几个分组，每个分组由工作小组成员领导。最早参加这个工作小组工作的有索·博列伊舍和工人费奥凡·克雷洛夫（他就是沃斯克列先斯基），后来先后有许多人参加：大学生科冈-伯恩斯坦（因行刺教育大臣萨布罗夫而闻名）、帕立瓦诺夫的同学迈诺夫、基尔希纳（萨拉托夫人）、女教师亚·奥尔洛娃；再后来有失去合法身份的利索夫斯卡娅、切科伊泽（“五十人案”受审者）和从流放地逃跑回来的斯米尔尼茨卡娅、伊·卡柳日内和瓦·潘克拉季耶夫。一八八一年七月捷拉洛夫调彼得堡之后，哈尔图林当了工作小组的领导人。但是，当时哈尔图林更感兴趣的是搞恐怖活动。捷拉洛夫认为必须把党的全部力量放在宣传工作上，而“北俄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炸冬宫的哈尔图林则认为在现存的专制制度下，俄国不可能有一个广泛的组织，为了摧毁专制制度，必须集中全力继续搞恐怖行动。后来他就是带着这种情绪到敖德萨去参与暗杀斯特列尼科夫的恐怖行动（一八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并在这次行动中牺牲了。

在莫斯科，工厂中的宣传工作开展得相当广泛，但是没有在军人中进行工作。

上面说过，热利亚博夫对之寄予厚望的莫斯科人在老活动家不在时输送了好几名执委会代表(安德列耶夫、弗里坚松、戈尔登斯基)和执委会成员(列别杰夫、马丁诺夫)。他们都是捷拉洛夫和玛·尼·奥沙尼娜辛勤培养出来的。遗憾的是他们创建的集体就其影响而言，始终没有超出地方组织的水平，他们缺乏沃罗涅日大会和利佩茨克会议参加者的那种长期的革命经历，不能成为急速减员的执行委员会的接班人。

第十四章

一、莫斯科会议

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是根据中央迁出彼得堡后的新情况改变彼得堡组织问题。过去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从事一般党的工作的地方组织。不过在执委会里，一方面有不同层次的代表受执委会的委托执行各种任务，另一方面又成立互不联系的各种行业小组，例如，有一个同热利亚博夫和佩罗夫斯卡娅一起在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的小组，有一个由学生组成和我（后来和安·帕·科尔巴）一起负责联系彼得堡各高等学校的小组，有一个以伊沙也夫和基巴利奇奇为首的技术人员小组，等等。现在，由于中央组织转移到莫斯科，有必要在彼得堡建立一个统领各方面人员的地方组织。这个任务便交给捷拉洛夫、马丁诺夫、斯特凡诺维奇和罗曼年科。

接着，执委会想听取委员们对开辟一个新的活动

领域的意见：有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发动旧礼仪教派教徒参加革命运动。这个组织就是“基督教兄弟会”，是一个秘密组织，革命党将号召一切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教会的人参加，而不分其宗教信仰如何；它的主要任务是与现政府斗争并最终推翻它。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谁首先提出来的，但“一百九十三人案”中受审的民粹派宣传员弗兰若利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他是执委会的一个代表，三月一日后和其他人一起转移到莫斯科。他哪儿也没去，因为已经重病卧床一年多了。在他和妻子叶·扎瓦茨卡娅（我在苏黎世大学的同学）住的那幢房子里有一个印刷所，专为兄弟会印东西。这里印的《基督教兄弟会典章》陈述了该会的宗旨和章程，《基督教兄弟会呼吁书》是写给“一切崇拜耶稣的神圣教义的人”的，其中论证了“现存的政府及其一切法律和规章是建立在谎言上的，是建立在压制和迫害自由追求真理的基础上的，因此应视为不合法，是违背上帝的教诲和基督教教义精神的”。这些传单没留给我什么印象，这些举动根本没什么结果，完全是与人民的宗教生活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的空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死胎。

奇怪的是与旧礼仪教派、分裂教派教徒联系，发动他们共同参加反政府斗争这一思想从七十年代起就一

直缠着一些革命者。看来联合是可能的，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保障信教自由的政治自由。一千一百万俄国人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和歧视，他们怎能对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漠不关心呢？在革命者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因此革命运动对分裂派的兴趣历久不衰。在七十年代，每一个革命者除了人民运动史和农民暴动史之外，一定要读当时俄国出版物中一切有关劳动组合和村社问题以及有关分裂教派的材料。但是不论他们在自己的计划里如何表达了与分裂派教徒联系或接近的愿望，愿望始终是愿望，他们微弱的尝试已为生活所击碎。柴科夫斯基团的弗罗林柯和阿诺索夫曾经从莫斯科去乌拉尔寻找逃亡教派教徒①，但一个也没碰到。一八七九年在南方，这个弗罗林柯又和科瓦利斯基一起，努力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接近史敦达教派②的教徒，但据弗罗林柯说：白费劲！一八七八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曾在萨拉托夫省伏尔加河边的一个旧礼仪派教徒聚居的大村庄西年基耶呆了半年，他给自己订下在他们当中培养一个自己人的目的。他作

---

① 十八世纪末俄国旧礼仪教派中的一个分支。

② 俄国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在德国移民村中出现的分裂派教派。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颇有影响，本身又有许多小分支。

为一个志愿教师教孩子们识字，逐户家访，轮流在学生家长家里吃饭，他遵守旧礼仪派教徒的一切习俗和礼仪，他按规定铺摊做祷告用的小地毯，使用皮念珠，跪拜不计其数，总之，在一切方面模仿热心古老的宗教礼仪的人们。他来萨拉托夫时，兴致勃勃而又十分认真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和他自己入乡随俗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从来没说过他已成功地把什么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一边来。他在农民中浪费了半年的生命，半年中自愿坚持与他本人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宗教仪式，为一个理论上的愿望而强制改变自己的天性：戴上假面具，使自己在外表上和周围环境一样，你就会赢得信任，发挥自己的影响，把赞同社会主义的人吸收进革命党。米哈伊洛夫是个执着专注的人，他一旦给自己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便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他住在西年基耶村，狂热相信旧礼仪派教徒，却没发觉自己是在白白浪费自己的才能和时间。土地和自由社在彼得堡所受的惨重打击——他的朋友奥莉加·纳坦森和奥博列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革命者、土地和自由社最老、最活跃的成员和其他许多人被捕，把他从西年基耶村拖了出来，他是怀着没有把事办成的沉重心情离开那里的。应当说，当时我们这些分散在萨拉托夫省的农村的人也没有反对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的扭曲自

已以适应环境的理论，我们也认为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们也和他一样相信心诚金石开，终有一天会收成硕果的。

结果毫无所得，可是必须敲开旧礼仪派和其它分裂派教徒的门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泯灭。民意党派工人沃斯克列先斯基到特维尔省去见著名的分裂派教徒休塔耶夫、莫斯科的兄弟会的尝试，都是源出于同一思想。有一件事也许可以最有力地证明一种思想一旦形成，它会具有多大的生命力。三十年之后，一个最老、最著名的土地和自由社分子、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的纳坦森一九一二——九一三年在国外曾和我谈起这些旧礼仪派教徒和其它分裂派教徒，称他们是革命党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可以依靠的力量。

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宪兵总部和警察总署的档案已经公开。民意党在旧礼仪派教徒中组织革命的“兄弟会”的计划的详细情况，一旦有关档案公开，就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披露。

二、斯特列尼科夫

在莫斯科，我向执委会报告了基辅和敖德萨的囚犯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军事检察官斯特列尼科夫怨声载

道。他们主要控诉他对他们的态度。斯特列尼科夫认为罗织被侦查者的罪名是对付叛逆者的最好手段，因而大肆搜查和逮捕。他滥抓人，一些与革命活动全然无关，或与受侦查者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的人都给抓起来。这都是有计划地、按照他的原则——“宁抓九个无辜者，不可放过一个有罪者”进行的。对被抓者提出最严重的指控，说什么秘密结社、企图暗杀各种各类的官员，等等，并且明白告诉每个被捕者，如果他们不供出某个人或不证实要求他们作证的某件事，那就不放他们出狱。要是被捕者拒绝提供证明，斯特列尼科夫便气得大喊：“过后你就会跪着求我答应让你供认，那时候，我不会答应的！”听说在基辅，他在审讯时当着副检察官科丘科夫的面掐住工人皮罗任科夫的喉咙。在乌尔索夫企图逃跑后，斯特列尼科夫问押送人员：“你们把他毙了吗？”“没有。”“揍了？”“没有。”“真该死！”——这就是这位将军的评语。对于还没有落入他的魔掌的人，他是这样说的：“我真想抓住这个坏蛋！”除了威胁被告本人之外，他还百般恐吓他们的家属。“你的儿子要给绞死！”——这是对前来求情的母亲的一般回答。与犯人见面的要求是很难得到批准的，好像他真是重要的国事犯似的。斯特列尼科夫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例如，他竟然不顾羞耻，对被捕者的父母

说："犹太人淫荡如猫，胆小如鼠。"他告诉另一些人说他想制造有"蒜味"的审讯。诸如此类的卑鄙无耻、以强凌弱的表现，举不胜举，斯特列尼科夫得到"一个狼心狗肺的刽子手"的臭名。我还转告执委会，一般的呼声和要求是把他从作恶多端的地方除掉。我同时还向执委会谈了斯特列尼科夫的一系列行动对党的危害。这危害在于败坏党在公众舆论中的声誉，因为一些被斯特列尼科夫的淫威吓破胆而丧失道德的人，胡乱诽谤和威胁别人。这些诽谤别人的人其实并不是革命者，但是社会却无法辨认出他们，因为他们是被列为政治犯的。我向执委会报告了斯特列尼科夫迄今为止的活动，他在一系列政治案件中竭力给社会主义者抹黑，在社会面前把他们说成是一伙故意打着政治旗号来掩盖自己丑恶的本性、追逐私利的刑事犯罪分子；我还指出我们的同志，从奥辛斯基到帕坡夫都叮嘱我们不要忘记对斯特列尼科夫的仇恨，我坚决请求把暗杀斯特列尼科夫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我还说，在敖德萨比在基辅更容易收集到有关他的生活的一切必要情报，更容易执行暗杀行动，因为在基辅有他的家和许多熟人，由于他早已在这里出了名并了解许多密谋行刺他的计划，所以他会加倍小心。我的提议被通过，斯特列尼科夫的命运决定了。因为执委会同时也同意敖德萨比基

辅成功的机会大，因此必须立即派一个人到那儿去收集执行计划所必需的全部情报。

这个人，最合适的当然是我，因为我熟悉敖德萨，认识一些人，他们可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帮助我研究斯特列尼科夫的全部生活情况。执委会派我带着这个目的会后就去敖德萨，我要在收集好一切必要情报之后通知派出执行人员。我在十二月初抵达敖德萨，两个星期后我通知北方，我已掌握了有关斯特列尼科夫的全部情况。执委会派出两个人，但只来了一个——哈尔图林。这时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把我知道的有关斯特列尼科夫的一切讲给他听以便检验核实，即住处、接见来客的时间和条件、用餐的时间和地点、散步的时间、去五号营房的时间(他到那儿去进行审问)、他走的几条街道、他去的几家人家。当我们获悉哈尔图林的同伴不能如约前来时，便指名派另一个人来，因为已经决定不让当地人参与此事。但是，没等他来到，斯特列尼科夫却不在敖德萨露面了。这时，哈尔图林已见过他了。他大约有一个月没有再来，可能是在基辅。由于我们完全没把握他何时会再来，便决定让我们要的那个人回原地去，更何况执委会写信通知我们派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期间，哈尔图林急得快发疯了，他几次想去基辅，要在那儿行刺。我费了好大努力才说服他

留在原处，等候斯特列尼科夫来，不要在基辅，在情况全然不明的地方下手。我们只是写信到那边要求查明他是否在那儿，如果真在，请调查他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没得到回音。

在二月初或二月中，斯特列尼科夫重新在敖德萨露面，进行新的清洗，已抓走十二—十六人，而且直到他被打死为止，一直在抓人。这时，执委会派来的莫利缅科已经抵达。我们最后决定在斯特列尼科夫饭后在海滨公园散步（大约傍晚五时）时暗杀他，并准备一匹马和一部双轮轻便马车，以便逃跑，还决定打他的头部，尽量靠近射击。但是，执委会没给我们寄钱来，后来才知道寄出的三百卢布没有寄到约定的地址。

鉴于周围不断发生逮捕的事，而且有可能牵扯到参加行动的人，因此事情不宜耽搁。于是我设法弄来六百卢布交给哈尔图林去买马和马车。我继续留在这里已是多余，而且可能坏事，因为已在全城搜捕我，追寻我的行踪；一些不曾与我谋面的人知道并传出消息说正在搜寻我。我的一些朋友，如伊·伊·斯维坚耶夫已被捕，另一些遭到搜查，发现我的照片。还听说在“十七个民意党人案”（与三月一日事件有关）中受审、由于变节而获释的工人梅尔库洛夫①已来到敖德萨，准备出卖自己的工人同志，他在街头出没，以期

遇见我。再说，执委会这次派我来敖德萨是专门执行一件任务的，这件任务我已经完成。这些情况促使我离开，于是我动身去莫斯科，以便与同志们决定我今后的去向。在动身前，我得到消息说执委会派来参与斯特列尼科夫一事的热尔瓦科夫已在途中，我和他途中相左，没能见到他。在斯特列尼科夫被打死之后，他和哈尔图林一同被处绞刑。

三、莫斯科垮了

我在三月十五日左右抵达莫斯科，在安德烈耶娃的简陋的小屋落脚。她和哥哥都是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成员。这一次，我是在不祥时刻闯到同志家里的。屋里的气氛和景象有种不祥的、可怕的味道。女主人是教师，已几天没回家了，只剩下她的老保姆，年老体衰，在炉边不停地嘟囔，有时在房间里来回走，拐杖敲得地板冬冬响。她驼背，鹰钩鼻，一脸皱纹，牙齿全掉光了。她口齿不清地预言道："出事了，我的心感觉到，出事了。"

① 应为"二十人案"，该案的审讯于一八八二年二月九日—十五日进行，梅尔库洛夫亦在受审之列。而"十七人案"是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五日进行的。薇拉·妃格念尔是在一八八一年四月来敖德萨，一八八二年三月离开。

真的是出事了。街上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人来找我，我也无处可去。在莫斯科，二月里和我到达之前，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一切工作都被打断了。三月十日，花园街上的总部（我十一月住过的地方）被破获。主人尤利·波格丹诺维奇被捕，玛·尼·奥沙尼娜比较小心谨慎，刚一发现有相当明显的监视迹象，便及时离开，躲起来。《民意》杂志印刷所（主人是加·切尔尼亚夫斯卡娅和德·苏洛夫柴夫）是不许旁人出入的，此刻奥沙尼娜认为那儿是一个避难处。我不知道谁已暴露，谁被盯梢，谁随时可能被捕。一切都不清楚，彼此的联系暂时中断。听说地方组织中有人招供了。开始四散逃遁，正如后来谈到此事时所说的：谁能逃命就逃命。弗兰若利和扎瓦茨卡娅去萨拉托夫，转赴哈尔科夫。季霍米罗夫和妻子躲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夏天，他们从那儿派奥辛斯卡娅来找我设法弄出国护照。尽管我极力劝阻，他俩还是一有机会就出国侨居了。奥沙尼娜的身体已彻底垮了，她决定出国，不久真的到巴黎去了，并且不打算回俄国了。这些事情和消息让人极为懊丧。只有萨维利·兹拉托波尔斯基来找我，带来刚印好的执行委员会就处死斯特列尼科夫一事（三月十八日）发表的公告，他坚持要我离开莫斯科，不要等着与其他党员见面了，这里大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

决定我最好到哈尔科夫去，那儿有党的地方小组，但没有执委会的代表，因为在那儿工作的玛·亚·热布尼奥娃在丈夫被捕后，决定跟他到西伯利亚去。

两个星期之后，四月十三日，萨·兹拉托波尔斯基也被捕，接着，《民意》杂志印刷厂被封，它的工作人员四散而逃。莫斯科完了。

第十五章

一、在哈尔科夫

在哈尔科夫，我找到一个人数不多的地方党小组，他们个个生气勃勃，十分可爱。这里边有科马尔尼茨基、安年科夫、亚历山大·卡申采夫、涅莫洛夫斯基(后来死于席吕塞尔堡)和利尼茨基(后来脱离革命)。小组的主要活动，可以说唯一的活动就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他们学习。不过，当时哈尔科夫不论在加工工业或文化教育事业方面，都还是一个极不重要的城市。哈尔科夫大学没有什么造反精神，远比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和基辅大学落后。兽医专科学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学校，但是，革命者认为它比哈尔科夫大学强。城里再没有别的高等学校和高等专修班，社交生活具有外省色彩，确切些说，根本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后来享有盛名的扫盲协会那时还没成立，而在教育机构中，阿尔切夫斯卡娅的星期日业余学校也还不

是九十年代的那个样子。加上设在萨布罗娃别墅里的护士学校，这就是可能从中寻找同情革命党的人的全部教育机构了。

和民意党的其它地方组织一样，哈尔科夫小组也有自已的活动地盘和对邻近城市的影响范围：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波尔塔瓦、伊丽莎白格勒等。它在哈尔科夫的大学青年和知识界中的关系不多，因为缺乏得力的中介人，而在学生中，我们与之有交往的也并不是什么好材料。小组没有一点经费。大家凑在一起才只有一卢布二十戈比到一卢布四十戈比。在这种条件下，甚至连最近的地方都去不了，事实上也很少去。

六月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时传来了执委会成员安·科尔巴和格拉切夫斯基在彼得堡被捕的消息，同时被捕的还有当时积极参与彼得堡党的活动的亚·维·布采维奇中尉，民意党的炸药作坊被破获，其主人是亚·瓦·普里贝洛夫和他的妻子，而女仆是尤什科娃；被捕的还有格拉切夫斯基与之有联系的季霍茨基少校，以及与上述人员有密切联系的没有合法身份的利索夫斯卡娅和格林贝格。这个不幸是毁灭执委会的最后一击。在奥沙尼娜和季霍米罗夫出国后，在俄国国内的执委会委员就剩下我一个了。

从那时起，我的活动集中在最大限度地集合起力

量，从中建立一个机构，以尽量顶替被警察的有效活动所彻底消灭的中央组织。情况真是糟透了：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组织被彻底破坏，与它们的联系中断了；在南方，在敖德萨，自从梅尔库洛夫叛变、斯特列尼科夫的扫荡和他被枪杀之后，什么也没剩下了，只有沙罗娃从彼得堡去了那儿，后来她加入乐巴丁的组织；基辅和哈尔科夫的地方组织经验不足。不过有些散居各地的老民意党党员还安然无恙，他们尽管不是执委会的成员，但都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和执委会一道工作过，应当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商讨恢复工作问题。我着手来做这件事。

我已经提到，在莫斯科那场使大家惊慌失措的打击中，印刷党刊的印刷所被查封，房屋被毁，铅字送到仓库封存。与此同时，编辑部也完了，撰稿人都不在了。但是，从前执委会认为有必要除莫斯科印刷所之外，另在西部建立两个印刷所：一个在维捷布斯克，一个在明斯克。它们已经搞起来，有设备，有人员。在莫斯科大逮捕之后，这两个印刷所完全给扼杀了：没有继续办下去的资金，甚至没有目的，因为任务应由莫斯科组织下达，而它自己已在三、四月间给彻底消灭了。印刷所被迫自动停办：铅字藏起来，工作人员各自设法隐蔽起来，他们备尝颠沛流离、贫困匮乏之苦。

当时，他们和我都吃尽苦头，他们来找我——执委会唯一尚存的成员。例如，维捷布斯克印刷所的一个青年妇女来哈尔科夫找我，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办。她一点文化也没有，既不能做脑力劳动的工作，也不适合搞体力劳动，她没有钱，也没有可以供养她的父母，而且她持的是自造的身份证，还加上已经怀孕。这时哈尔科夫的党员一共才只有一卢布二十至四十戈比。后来来了个印刷所的拼版工人，也是没有合法的身份，在哈尔科夫人生地不熟。他们都是党兴旺发达时为某项专门工作而请来的人，对该项工作他们是有用的人才，可是现在，党垮了，他们也就失业了。他们给抛出常轨，无依无靠，成了那些与从前的组织有关系的人，特别是我这个最负有责任（就组织关系而言）的人，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负担。再说，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吸收到维捷布斯克印刷所的，没法得到明确为他们作证的证明，因此我不能充分信任他们，也不愿使用他们，因为确实不了解他们。

莫斯科印刷所的主持人是加·切尔尼亚夫斯卡娅（在莫斯科被毁之后去了高加索）和苏洛夫柴夫（从莫斯科去了沃罗涅日）。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普·伊万诺夫斯卡娅，不久她就到哈尔科夫来找我。在高加索的还有谢尔盖·德加叶夫和他的妻子——我还不认识

她。他们都应该来哈尔科夫，以便和我一起商讨今后怎么办。

这期间，我去了一趟基辅，打算亲自认识当地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有阿·尼·巴赫、卡梅涅茨卡娅、卡梅涅茨基、罗西、克日热明斯基、在彼得堡的高等女校学习过的索·尼基京娜（一八八一年我曾在格·伊·乌斯宾斯基家里见过她）、扎哈林和从敖德萨被驱逐出来的斯播多尼。被派来基辅的莫斯科小组的党员戈尔登斯基已被捕，和他同时被捕的有基辅的乌尔索夫、瓦西里·伊万诺夫和贝奇科夫。基辅小组和其它地方的小组一样，在工人、青年和社会上进行宣传工作，它的活动范围遍及附近的城市，在成员的人数和质量上仅次于莫斯科小组。

在八名成员中，我只认识尼基京娜一人——一个很可爱很活跃的姑娘。其他人中，我这次只见到斯播多尼、罗西、扎哈林和卡梅涅茨卡娅。他们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但我决定只吸收斯播多尼到中央工作，因为他是一个经过考验、阅历丰富的人。经过商谈之后，他同意了，从此常来哈尔科夫，把自己完全交给未来的中央支配。

二、钱

钱的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没有遗留下钱财，而外省组织一向是穷的。可是没有钱，不合法的组织自然是既不能生存，也没法活动的。多亏了斯潘多尼。他在流放期间结识了叶夫根尼亚·苏博京娜（在"五十人案"中被判刑）。她和妹妹、母亲曾向组织捐赠大量财产供作革命活动的经费①。叶夫根尼亚很信任斯潘多尼，表示愿意把她尚存的最后的八千卢布交出来，条件是每月往西伯利亚给她寄二十五卢布。钱存放在她的亲戚薇·沙季洛娃处，她住在奥廖尔。我和她很熟，一八七六年我们是莫斯科小组的同志和好朋友，参加这个小组的多是巴尔金娜和彼得·阿列克谢耶夫案受审的苏黎世的女大学生和高加索人。那时才十八岁的沙季洛娃对革命事业和被捕的朋友都很忠诚。她精明强干、热心，是我所遇见的最可爱的姑娘之一。她长得并不漂亮，但富有同情心，聪明，讲起话来颇有风度，那动人的音调也是她所独具的。她身上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一股淡淡的

① 她们为此变卖了在库尔斯克省的大片田产。——作者

嘲弄劲。她活泼快乐，但又很严肃认真，善于发号施令，必要时也会蒙骗人。在宪兵司令部的卷宗上题有："国事犯薇·安·沙季洛娃。十八岁"。对此她很觉开心，用特别漂亮的声调念这几个字。她在"一百九十三人案"时受到侦讯，但没有抓起来，她和狱中的同志秘密通信，每一步都有风险，但她一点也不在乎，为了朋友，她什么事都愿意做。她终于也给关进铁窗，但在审判时被宣判无罪。苏博京娜的母亲是她的近亲，在此案中也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苏博京娜两姐妹——叶夫根尼亚和纳杰日达被判终身流放，另一个妹妹玛丽亚在流放萨马拉省时死于肺结核。她们三个人都是在"五十人案"中受审判的。一八七八年以后，薇拉·安德列耶芙娜由于要好的朋友都不在了，便在奥廖尔住下来，她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从此中止，虽然她始终保留着对昔日朋友的美好回忆。

斯潘多尼给沙季洛娃写了封信，告诉她叶·苏博京娜决定把钱交他支配，现在我们商定由我到奥廖尔见薇拉·沙季洛娃取钱，然后到沃罗涅日，设法找到苏洛夫柴夫并和曾参加"不胜则死"小组① 的那个地主见

---

① 可能是笔误，作者指的是"不自由毋宁死！"小组，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一节。

一见。尽管他和他的妻子脱离了革命运动(我在前面谈到这个小组时曾提到这一点)，但是在土地和自由社分家之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曾从他们那儿收到一万三千卢布，这是他们早先，当他们赞同未来的民意党人观点时就已答应给的。现在我希望他们不会拒绝在紧急关头再次帮助革命党。

我上路时正值温暖的夏天，然而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彼得堡溃灭了，来找我的普·伊万诺夫斯卡娅对我说，莫斯科也已全军覆没，我试图恢复与北方联系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所有这一切使我心情沉重。我在基辅时曾委托尼基京娜到彼得堡去了解情况，她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就被捕了。于是，我又派去科马尔尼茨基——哈尔科夫小组的优秀党员。他也在那儿失踪了。从北方传来有关苏杰伊金的恶劣行径的传闻，他对所有被捕者都自我介绍说他是社会主义者，说他也赞成进行和平的宣传，只是不同意搞恐怖活动，说他只反对恐怖活动。他向每一个被捕的人都提出给秘密警察当奸细的建议，他说用不着出卖人，只报告党内和青年中的情绪就行。苏杰伊金对他们可能提供的服务出价并不高。科马尔尼茨基尽管很年轻，但一眼就可看出是个聪明、严肃和正直的青年。苏杰伊金不假思索就提议每月付给他二十五卢布，要拉他下水……

人手本来就紧，但连他们也刚一迈步就莫明其妙、一事无成地损失了。脚下没有牢固的基础，周围是捉摸不到的叛变和奸细活动，在这种条件下实在没信心建立起什么稳固的东西。

没有钱，也不知这次到奥廖尔和沃罗涅日去找这些离开革命运动的人，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体会不到损失的惨重，感受不到昔日革命同志所遭受的痛楚。

我坐在半明半暗的车厢里，深深陷入沉思。想到这一切，我心头涌起的是忧伤而不是希望。忽然我觉得有点生机：在一个小站上，上来一对年轻人，大约是新婚夫妇吧。他们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下，后来我听出他俩都是教师。男的真是个阿多尼斯①，一个体格匀称、大眼睛的美男子，虽然脸庞不怎么生动，不那么神采奕奕。女的是个小巧、柔弱的栗发女子，用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看自己的旅伴。他们坐下后，把一只装着馅饼、小白面包和各种食物的大篮子放在中间，吃了起来，互相招呼着，那甜蜜的微笑和闪亮的目光更加刺激了本已很好的食欲。这些日子，我看到的尽是不幸和挫折，对明天失去信心，对被摧残殆尽的革命事业

---

① 古代宗教中死而复生的神之一，丰采绝伦。后世用以比喻美少年。

忧虑重重。周围只有在革命的恶浪中挣扎的人，他们失去位置和联系，没有栖身之地，没有欢乐。除此之外，我还操心钱的事。去哪里弄到钱来重整破败的革命事业、接济各地组织和供养进行必要的革命工作的人呢？

现在突然出现一幅田园诗般的图画：快乐的脸庞，一对生活的宠儿，孩子般无忧无虑地啜饮着成功和幸福的美酒。

在奥廖尔，我直接去找沙季洛娃。她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极其坦诚地相见。这还用说吗！我们的过去有着那么多共同的东西：一八七六年，天天见面，天天为共同的事操心；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爱好——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爱好。热情的接待使我对我为之而来的那件事也满怀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觉得难于启口向沙季洛娃提钱的事，难于谈革命党当前所处的困境。薇拉·安德列耶芙娜不接触与革命有关的一切至少有五年了，她和俄国知识界一样，只知道革命事业的表面。在这种情况下，舌头总也转不到钱的问题上来。我给她写了封信，重复了斯潘多尼写给她的话，请她在收到苏博京娜的文书之前把她答应给斯潘多尼的钱哪怕先给一部分也好。

可是，不，她不能这么做，她必须等收到苏博京娜

的信才行。——这就是答复。

我只得心情沉重地往下走。

在沃罗涅日，我从车站出来，照伊万诺夫斯卡娅在哈尔科夫给我的地址寻去。寂静的、长着青草的外省城市街道，一幢造得很粗糙的小木屋，一座果园顺着平缓的山坡一直伸展到河边。这房子的主人是两个在银行工作的职员，我被告知他们是民意党人。他们不在家，上班去了，接待我的是其中一个的妻子，一个消瘦的女工，样子非常疲倦。我只得和她呆在一起，等候我有接头暗号的人回来。当主人回来时，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把我安排到什么地方住。一个说："绝对不能到旅馆去。在我们沃罗涅日，外来人必须亲自到段警察局登记。您是到处通缉的人，不能到警察局去。"另一个接着说："可是您留在我们这里也是危险的，我们两个都是受监视的人，可能来搜查。"我问："那怎么办呢？立即往回走吗？""不。"他们想了半晌……想出来了："我们带您到一个烤圣饼的老太婆那儿。在她那儿，您在各方面都会很方便。她住在城外，虽然有一些饶舌的女邻居来找她，但也常常有附近村庄里的人来她家做客。您的来到不会引起人家注意。"

说走就走。我们起身到老太婆那儿去。我至今仍然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怀念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位老

太婆。她有自家的小屋，夹杂在其它小屋之间，靠近教堂。她为教堂烤圣饼，工钱不多，却远近闻名。房子旁边也有一座园子一直通到下面荒凉的河岸。我憋着一肚子的气：我气这两个知识分子把接待一个危险女客的风险从自己肩上转嫁到一个普通的贫苦老婆子身上。但是此刻，我笑了，她不但高兴，而且诚心诚意地欢迎我。她的言谈举止是这样温暖和殷勤，使我立即感到轻松和自在，我和她素昧平生，但她始终在日常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好像她早已认识我，我是她的亲人似的。这与我在前面两个主人家所受到的接待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我还获悉，她这里有一个常住的客人，是一个被学校开除、遣送回乡的大学生，显然是受警察监视的人。但是，那两个被作为民意党人介绍给我的人对待苏洛夫柴夫的态度简直使我反感之至。他们还称他是他们的好朋友呢。当他来找我时，我惊讶地听他说他没有家，睡在河边大自然的怀抱里，白天烧篝火煮水、煮土豆，遇上坏天气就躲在一条翻过来的小船里。而且他正害着疟疾……怎么能让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生病的同志这样生活呢？真叫人不敢相信。

几天后我要走时，老太婆动情地和我告别。她对我说："哈尔图林曾经在我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尽管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政府为什么迫害你们，但是我知

道，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

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但是，不论过去多少年，她的形象一直给予我慰藉和欢乐。

苏洛夫柴夫和我约好，不久就来到哈尔科夫。他带来了六百卢布。我问：“这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向烤圣饼的老太婆借来的，我答应一有钱就还给她。”

这是她一生省吃俭用，为她那已成年的女儿积攒的嫁奁。

我生气了：“您怎能借这钱？要知道，我们随时可能被捕，那老太婆的钱就白白丢掉了。”

幸亏苏博京娜很快就寄来沙季洛娃所要的文书，斯潘多尼把钱交给我，于是苏洛夫柴夫立即把钱还给老太婆。

苏洛夫柴夫倒是比我强，我在沃罗涅日没弄到钱，尽管见到了那位阔地主。他借口田间活忙而手头又无现款，拒绝给此时没取得胜利的党提供金钱帮助。

在这座城市里，我还碰到另一桩挫折。有一个大学生，他曾经在彼得堡呆过，是大学工作小组的成员，科洛德凯维奇、我和科尔巴先后领导过这个小组。我在选拔中央机关的人员时，也考虑到他，因为他还小有名气，而且早已与革命事业有关系，在观点上他是个雅各

宾派，和奥沙尼娜很要好——她也是个雅各宾派，好像她还推荐过他。但是，他拒绝了我的邀请，推说他不适合担任这个角色。当时，他的拒绝很使我伤心：我以为情况这么严重，任何人都不应当拒绝。后来我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事：也许他是真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够。事实上这个人后来确也没有什么表现，一直无声无息，要是真有能力，有感情，有意志力，是不至这样的。

三、德加叶夫

九月里，德加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哈尔科夫。他们是从高加索回来的，他们和加·费·切尔尼亚夫斯卡娅一起在那儿过了一个夏天。不久从那儿传来消息说缅格列利斯基团的军官小组被破坏，那还是安·科尔巴在一八八一年秋建立起来的。

我和德加叶夫及其一家是一八八〇年秋在彼得堡认识的，当时，对我的执委会同志们来说，他已是自己人了。他们介绍说他是一个很能干、很聪明的人，对党忠诚，对党很有用。他个子不高，宽宽的肩膀，外表并不漂亮，不过脸上也并没有警方在苏杰伊金被杀后为通缉他而印的照片上那种迟钝和令人讨厌的表情。一般来说，他的脸庞是可爱、善良和生动的，他的动作和声

音都很温和。许多人与他有工作关系：热利亚博夫、科洛德凯维奇、科尔巴、亚·米哈伊洛夫和季霍米罗夫。季霍米罗夫认为德加叶夫的姐姐纳塔莉亚·彼得罗芙娜很有才气，很有趣。德加叶夫不是可以出入我们的寓所的人，也从来不知它们的地址，倒不是由于对他不信任，而是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党有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就是执委会成员本人也只知道、只出入与他工作有关的寓所。这是规矩，更何况德加叶夫是在警察局挂了号的政治不可靠分子，密探们对他去什么地方、与谁来往是会感兴趣的。我们一般是在某个中间人士家里或他自己家里与他碰头的，因为他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一家都同情革命，而且热情接待民意党人。我也去过他家。在彼得堡，我没见到纳塔莉亚·彼得罗芙娜，因为她已和她丈夫马克列措夫到哈尔科夫去了，后来我在那儿才认识她。这一家，除了非常慈祥的母亲之外还有德加叶夫的妹妹丽莎，十九岁，弟弟沃洛佳，十八岁，但在身体发育和性格上还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互相都很赞赏：谢尔盖·德加叶夫很看重姐姐和妹妹，而她们则很夸奖他的才能。他确实很能干：他毕业于交通工程学院，在铁路局供职，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在办公室办公，他还教课（数学）。除此之外，他还进行革命交谊活动，保持与炮兵学院的同学的联系（他本

人因政治不可靠而被该校开除)，执委会委员的一切请求和委托，他都能认真完成。德加叶夫一家生活俭朴，钱刚够用。母亲看来有退休金或有点积蓄，不过肯定不够一家的用度。谢尔盖的各种工资收入是全家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一家人对前景是乐观的。丽莎(我管她叫塔玛拉)是个很美丽的黑发女郎，五官端秀，脸型和家里其他人的不同。她在音乐学院上学，大家希望她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为此，母亲非常关心她的一双手，不让她做家务事，而丽莎在家里也常戴手套，免得手被屋里的寒气冻坏。她的姐姐纳塔莉亚学习朗诵，大概想登台演出。她本人和亲友都期待她戏剧演出成功。但是，在彼得堡某文学团体的晚会上和在哈尔科夫，她的表演并不精彩，她的朗诵矫揉造作，不自然，不受欢迎。出嫁之后她便忙于家庭日常生活了。有人说纳塔莉亚·彼得罗芙娜还是个诗人。她确实写过诗，描写巴黎，描写她与彼·拉·拉夫罗夫的相识。她还对朋友们说，她还在那儿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档案，这个研究激发她写一部这个时代的悲剧的念头。她为我们朗读了剧中的一段，是不押韵的诗作，写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相会的一幕。写这个题目，显然不需要什么档案材料。一般说，他们家喜欢言过其词，为了增强效果而故意拿腔拿调，甚至

乖常古怪。丽莎几次宣称她只嫁给有钱人，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我后来听说，她爱上了自己丈夫的兄弟，那可是个没有钱的人。纳塔莉亚·彼得罗芙娜眉飞色舞地向我们描述有一次在剧院里，她和妹妹刚一在包厢露面就引起一阵轰动：她们俩一个全身雪白，一个一身黑装。

在处决三月一日事件犯人的那一天，丽莎执意要去谢苗诺夫校场，虽然明智的做法是回避这个场面，因为热利亚博夫、佩罗夫斯卡娅和基巴利奇奇她都认识。结果，她真的感到恶心，而第一个来扶住她的却是"穿豆绿色大衣的人"，他还送她回家并从此成了她们家的常客，直到从克列托奇尼科夫的名单上看到他是什么东西之后，才请他不要再来了。

沃洛佳是个善良、温柔的孩子，由于政治不可靠而被海军学校开除。他带着孩子的稚气问我革命什么时候到来。他期待着答案是过三个月，至多不超过半年。当他听说谁也不能确定革命什么时候到来时，感到非常失望。这以后一年，我惊愕地获悉，沃洛佳在兹拉托波尔斯基和谢尔盖·德加耶夫的许可下当了苏杰伊金的密探，假密探：他得欺骗那个聪明、机灵和经验丰富的特务而不出卖革命者，向党提供有关苏杰伊金的活动的情报。

至于谢尔盖·德加叶夫本人，尽管普遍反映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却一点也没发觉。他一眼看去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什么独特的、坚定的和有个性的东西。软弱、随和——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发现的主要特点。此外，就是他对与他有来往的执委会委员毕恭毕敬，这种态度甚至表现得有失分寸，让人生厌，因为当面向你唱赞歌。由于随和，他跟认识他的所有的人关系都很好。我不知道他能给人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建立和保持关系来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在交通工程学院里，他组织了一个小组，后来在波兰的“无产阶级党”中起着突出作用的库尼茨基便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在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组建军事小组时，德加叶夫是军人和执委会之间最得力的中介人之一。

我没有发现德加叶夫有什么自负心和虚荣心，只是后来才听科尔巴说，他曾两次开口要求接收他为执行委员会成员。这在革命者中间是极罕见的事，被认为是不可称道的。

德加叶夫到哈尔科夫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了我们没见面的这一年里他的情况，还顺便告诉我，在三月一日后他也因为参加挖小花园街的坑道而被捕，不过他顺利地摆脱了干系。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惊讶，因为唯

一可能作证控告他的是叛徒梅尔库洛夫，而此人的指认未必可能摆脱得掉。可是德加叶夫却闭口不谈有关此人的重大情况。问题是这样的：一八八二年开春前，苏杰伊金确信沃洛佳·德加叶夫对秘密警察已无用，便拒绝他继续效力。那时在彼得堡的同志想出一条新计策，以便与苏杰伊金保持联系，好跟踪他，干掉他。为此，沃洛佳应当对自己的上司说，他哥哥谢尔盖需要赚钱，他可以做制图的工作。苏杰伊金同意了，谢尔盖从他手里接到活儿。他们碰过几次头，据德加叶夫说，谈的都是工作问题，他已向格拉切夫斯基汇报过。德加叶夫并没给格拉切夫斯基搞到什么需要的情报[1]，接着他便到高加索去了。

---

[1] 是否从此开始了对格拉切夫斯基的三个月的跟踪，终于在六月三日抓到他，查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作者

第十六章

一、必须重建中央

谢尔盖·德加叶夫到哈尔科夫之后，我把他当作一个经过考验的老同志来看待，在格拉切夫斯基、科尔巴、布采维奇、普里贝列夫和其他人于六月三日在彼得堡被捕之后，把他吸收进中央是完全必要的。中央可以多少整顿一下党的工作。他有理由进中央：他参加革命工作已有二、三年，他受到已牺牲的那些同志的信任，他是与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的炮兵军官联系的主要中介人（他曾在军事学院学习过，在喀琅施塔得服役过），他知道海军小组里的许多人——苏哈诺夫的同志们，而且作为加入军事组织的炮兵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参加了军事组织的一切活动。此外，我们新近又遭到损失。普·谢·伊万诺夫斯卡娅去维捷布斯克，打算把那里的印刷所搬到南方，但她刚一到那儿便被捕。弗兰若利和扎瓦茨卡娅一起从萨拉托夫来哈尔科夫，

但却失踪了，而我本是把他作为进中央的最佳人选的。可以集合起来重建执行委员会的人越来越少。对德加叶夫和对斯潘多尼一样，没有必要隐瞒真实情况。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努力重建中央，团结一致，肩负起局势加之于我们的责任，而不管这责任有多么艰巨。德加叶夫默默听完我的话，并同意担任领导全党的中央组织的成员。

但是，如果说我寻找并且希望找到的是强有力的人，他们对如何开展党的工作有独立的见解，他们愿意并且善于捍卫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斯潘多尼和德加叶夫可不是这样的人，对于在当前条件下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他们没有确定的看法。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由于他们过去没在中央呆过，也就是说不曾领导过运动，没有参与领导和决策全党性的问题，而只扮演次要角色；或许是由于个人的素质，那就任何经验也没有用了。反正是后来他们没有表现出什么创造性，没有提出一个计划，而只是被动地服从我，总是赞同我的意见，可是我不喜欢一人专断，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力量不够，我愿意作为集体的一员，在集体里人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是现在，我们建立的不是集体，而只徒具集体的空名。这成了时时折磨我的最苦恼的事之一，更何况没人可以和我分

担这份苦恼。第一届执委会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做出那么多的事，这不仅由于它拥有许多杰出的人物，还由于它是各种类型和各种气质的人的最佳组合。它拥有理论家季霍米罗夫、实干家弗罗林柯、鼓动家热利亚博夫、组织家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和亚·米哈伊洛夫，因此总体上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执行委员会组织的毁灭是这样开始的：一次次的逮捕把人一个个地拉出去，从而破坏了整体的和谐和平衡。

现在，我力求重建一个类似被毁掉的那样的中央。也许我挑选的人不尽理想，但我依凭的是我亲自了解的材料。现在回顾那以后的十年，是否不得不说，这十年是个别人和个别小团体徒然地要重建实际上无法恢复的组织的十年？民意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那个时代的俄国还没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足以在一再的逮捕和秘密警察不断完善的情况下，使一个组织始终保持在民意党成立时所具有的高度水平。但是，民意党已完成自己的任务。它震撼了停滞的、消极的俄国，开创了新潮流，从那以后，这股新潮流的基础已不会消失了，民意党的经验没有白白消失，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识到必须要有政治自由，要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后来所有的革命纲领都写上这一点。在争取自由的国家制度方面，民意党是一支

来自俄国特权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先头部队，这支队伍跑得太前了，至少超前了四分之一世纪，因此显得孤立。民意党期望的是：三月一日既然打倒了皇帝，那就可以解放不满于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人民群众的活力，他们将奋起斗争，同时，社会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三月一日后，人民沉默，社会也沉默。因此，民意党在社会上没有支点，在人民中没有基础，于是重建组织，以便立即继续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积极斗争的尝试，自然也是徒然的了。这些尝试都如昙花一现，新出现的组织还来不及积极开展活动便夭折了。在俄国，农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而完全没有文化，八十年代还没有西欧那样的工业无产阶级；在一个专制警察制的国家里，没有向群众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的可能，——凡此种种都是民意党进行了许多政治行动仍不免陷于孤立的原因。必须建立基础，并在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党，这是未来要做的事。当这个未来露出曙光时，自当会有新党出现。实际上也果真出现了新党的萌芽："劳动解放社"——未来的社会民主党，它面向工人阶级，年复一年地垒筑基础。但是，旧的事物向来不是一下子消失的。参加民意党运动、在执委会活动的光辉时期受到教育、受到

它的斗争榜样鼓舞的那一代人无法放弃立即继续这个斗争、按民意党的精神、用民意党的方式继续斗争的愿望。在过去这个时期里已经形成的一定的情绪、情感，是个人所无法克服的。刚刚逝去的过去在全国、全世界面前以其光辉的积极的活动使人眼花缭乱，一时很难静下心来为未来作单调枯燥、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工作而不给予双手沾满革命领导者的鲜血的政府以有力的反击。未来还很模糊，不会很快做出什么吸引人的成果。

在"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时，情况不也是这样的吗？

摆脱从前的活动形式是缓慢的、逐渐的。一八七五年的下半年和一八七六年全年，在实践上还在重复过去的做法，在理论上，即在制订纲领方面，革命思想还没有新的突破，它还是隐蔽的。一八七六年十至十一月间土地和自由社成立，把这个思想公诸于世，标志着向民意党方向演变的第一阶段。如果说在土地和自由社的民粹主义纲领中已有政治斗争派的萌芽，那么，在充分表达了政治斗争思想的民意党纲领中，正如文献中多次指出的，民粹主义思想成份还是表现得相当清楚的，而在民意党出现之际，在革命队伍里，民粹主义思想还是占着优势的。要战胜这样的成见，即争取

政治自由的斗争会葬送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作很大的努力，要由事实来作宣传。

我向德加叶夫和斯潘多尼介绍了总的情况：执委会人员已被一网打尽，所有出版物都已停刊，印刷所被封，革命的财政状况，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奥廖尔、莫斯科和萨拉托夫的人员情况，彼得堡六月里受到灾难性破坏，与它已失去联系。然后我提议讨论如何恢复革命的中央和革命报刊——党存在的重要标志。

我的恢复党中央的计划是：从军事组织中吸收五个在能力和性格方面最强的人，他们要和我们一道担负起已被摧毁的执委会的责任，领导党的工作；为此他们要放弃军职，离开军事组织，与它只保持过去执委会与该组织的那种关系。

我提出这个计划的理由是：此时此刻，除非从军界，我们无处弄到需要的人；党的状况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不会有希望实现当年成立军事组织时对它定下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一方面，用武装力量支持三月一日或以后类似事件之后自发产生的人民社会运动；另一方面，由党在军队、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准备的力量有组织地举行起义。但是，既然在一八八一年一、二月间执委会在讨论武装起义的可能性时已清楚看到当时有

组织的力量还太小，不足以进行此类尝试，那么，在一八八一年和一八八二年莫斯科和彼得堡多次遭到损失之后，任何要党发动反政府的街垒斗争的想法，都应坚决予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要军事组织做什么呢？它的成员是靠所承担的严肃义务——中央一号召就拿起武器——而结合在一起的。既然无望发出这种号召，那么，纯属口头上的义务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何况承担了这种义务的人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不错，我没提议解散军事组织，这事可由重建的党中央来考虑。也许它可以改变军事组织的纲领，赋予它比较接近于做宣传、准备工作的性质。但是，由于当前党的一般状况，我觉得最恰当的是从军事组织中调出扎瓦利申、罗加乔夫、阿申布伦纳、波希托诺夫和克赖斯基五名军官，与他们一起着手整顿全党的工作。我知道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军事小组是很不活跃的，我也不怀疑在苏哈诺夫和布采维奇被捕后，彼得堡的一切活动都已停止。德加叶夫是彼得堡知名的人，由他去了解彼得堡军界的情况并把我的建议转达给有关的人，是最方便的了。于是我敦请他接受这项任务。

斯潘多尼和德加叶夫赞同我的计划，由德加叶夫去巡视军事组织一事也定了下来，同时，还是根据我的建议，决定在德加叶夫去过彼得堡和南方的敖德萨

和尼古拉耶夫之后，带着妻子住在敖德萨，我将在那里筹建一个印刷所，由他和他的妻子来当老板。

事情就这样办了。与波希托诺夫的见面很顺利，他在波尔塔瓦省科别利亚基赫服役，我们把他叫到哈尔科夫来，但是在第一次见面后，德加叶夫书面向他提出退役参加党中央工作问题时，他拒绝了，他下不了决心走这一步，因为他病得很厉害，医生预言如果他落入监牢那种恶劣环境，会得精神病。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拒绝受命也没使波希托诺夫逃脱被关进席吕塞尔堡的厄运。医生的预言在那儿完全应验了，他神经失常了，在一八九六年转到彼得堡的尼古拉耶夫斯基陆军医院，不久就死在那里。我在《席吕塞尔堡囚徒群像》中写到他①。

我通过波希托诺夫把罗加乔夫从他的驻地叫到波尔塔瓦来，跟他在这里见了面。在几次长谈中我们讨论了所有的问题。罗加乔夫同意退役，全力从事革命活动。

我给了德加叶夫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所有必要的地址和指示。克赖斯基拒绝，阿申布伦纳同意。阿申布伦纳接着便申请为期十一个月的假期，在获准

① 参看《狱中二十年》第109页。

之后就动身去彼得堡。

在彼得堡，德加叶夫会见了军事组织的成员们，并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的活动已完全停止。自从苏哈诺夫被捕后，组织的人员构成没有增加，没有与外省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我现在已记不清扎瓦利申是怎样答复的，大概他的答复不像阿申布伦纳和罗加乔夫那么干脆，否则我会记住的。

二、与米海洛夫斯基会晤

在德加叶夫外出期间，十月十五日，米海洛夫斯基突然来哈尔科夫找我。他说他到处找我，他此次来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定要得到答复。事情是这样的：在彼得堡，著名文学家尼古拉泽来找他，说一位高级人士①请他做政府和民意党的中间人，委托他与执委会进行和解谈判。

米海洛夫斯基转达尼古拉泽的话说，政府已疲于与民意党斗，渴望和解。它已意识到社会活动的范围应当扩大，准备走上业已成熟的改革的道路。但是，它不

① 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宫廷事务与皇室领地部大臣。——作者

能在受革命恐怖活动威胁的情况下着手改革。革命恐怖活动，唯一地只有革命恐怖活动妨碍进行改革。只要民意党停止破坏活动，改革就会实行。如果民意党决定在加冕典礼之前放弃恐怖行动，那么典礼上将发布圣谕，给予 1)全面政治大赦；2)出版自由；3)和平宣传社会主义的自由。为了证实政府的诚意，它将释放某个被判刑的民意党人，比如伊沙也夫。

米海洛夫斯基在听完尼古拉泽的话之后，决定会见执委会的某个成员，由于我是它在国内的唯一的代表，他便把他从尼古拉泽那儿听到的源源本本地转告我。

米海洛夫斯基本人很看重尼古拉泽所肩负的使命。我则认为这是一八七九年检察官多布任斯基诱降戈登贝格的故伎重演。多布任斯基也要戈登贝格相信政府的善意，是执委会的恐怖活动妨碍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要戈登贝格为了祖国的幸福而牺牲朋友和同志，为俄国人民的自由扫清道路。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戈登贝格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尽管他没有向政府供出什么人，但却提供了几处地址，描述了所见过的所有的人的外貌和情况，当他发现他上当之后，在彼得保罗要塞里上吊自杀了。克列托奇尼科夫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我们(一八八〇年

夏)。

我确信这是陷阱，目的在于用谈判来束缚我们的手脚，以保证加冕典礼的安全；要不就是通常的警察侦查诡计，目的在于找到追缉民意党的线索。使我这样确信的理由，在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的《八十年代政治生活中的几件事》一文中读到有关的详细情况。我提出许多反对意见，指出就这事进行任何接触都是轻率的、危险的，对此，米海洛夫斯基提出一个问题："党在现时有可能实际进行什么恐怖行动吗？"

对此，我不得不说真话：革命党的现状使人对此不能抱有希望。

米海洛夫斯基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反而可以赢得一些东西。"

最后，我们这样决定：我断然拒绝在俄国与尼古拉泽就此事进行任何谈判，同时，背着他，我将派人到国外把尼古拉泽的使命和我的态度转告季霍米罗夫和奥沙尼娜，由他们自己决定怎么办，如果他来的话；而且我们在国内的人将不受他们进行的谈判的任何结果所约束；如果形势有利，那我们也可以不受限制采取恐怖行动。米海洛夫斯基答应对尼古拉泽说执委会的成员他一个也没找到，他们都在国外。德加叶夫回来之后，

我把我和米海洛夫斯基会晤的情况告诉他和从基辅专程回来的斯潘多尼。他们完全赞同我对此事的态度和我关于派人到巴黎见季霍米罗夫的建议。执行这项任务的适合人选是沙罗娃。

我把她从敖德萨叫来，对她作了一切必要的交代，并叫她去办出国护照，以便去找季霍米罗夫，把上述的事情转告他。她不加拖延地完成了这件任务①。

在访问了军事小组，弄清阿申布伦纳和罗加乔夫将参加党的中央工作之后，可以着手恢复党的印刷所了。至于写作力量，我们只能从米海洛夫斯基和列谢维奇②那儿寻求支援，我和米海洛夫斯基见面时已和他谈妥了，至于列谢维奇，我在波尔塔瓦时曾拜访过他。这时，苏洛夫柴夫已受我的委托到莫斯科，从仓库里取出铅字，运到敖得萨——我们认为印刷所设在那儿最合适。苏洛夫柴夫要在印刷所工作。至于老板，前面已经说过，德加叶夫夫妇同意担任。剩下的就是找个适合扮女仆的人了。

---

① 我还交代她，如果要求政府为证明其建议的诚意而释放什么人的话，那么，不是释放伊沙也夫，而是涅恰耶夫，这一点，我也向米海洛夫斯基谈了。——作者

② 弗拉基米尔·维克托罗维奇·列谢维奇（一八三七——一九〇五）：俄国作家、实证主义哲学家。

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过被送去服苦役的伊万·卡柳日内的妹妹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她住在阿赫特尔卡，境况很惨，她想摆脱这种状况。我听说她没什么文化，但是善良、快乐、健康，外表和举止都很朴实。我把她叫到哈尔科夫来，见了面之后，我确信，如果她同意到印刷所担任女仆的角色，那就再理想不过了。虽然她没受过理论教育，但完全赞同民意党的革命活动。因此，动员她并不难。我带她去见德加叶夫和他的妻子。我们商定，德加叶夫夫妇先走，等他们找到合适的房子，卡柳日纳亚就去找他们。这是十一月二十几号的事。那时，苏洛夫柴夫也已去敖德萨。斯潘多尼从基辅回到故乡敖德萨，在严加防范的条件下充当印刷所与外界的中间人，就是说为它搞材料和接受要在这里印的东西。

第十七章

一、敖德萨印刷所被破获

十二月二十几日，从敖德萨传来消息，说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在其中工作的五个人（德加叶夫和妻子、卡柳日纳亚、苏洛夫柴夫和斯潘多尼）通通被捕。这样，刚组织起来的印刷所只存在五个来星期，便彻底完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迅速恢复党的机关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政府和社会通常是根据是否存在党报党刊来判断革命事业的状况的。

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忆那段祸不单行的日子。我看到我的一切努力全付之东流，我的全部活动毫无结果，不论我想做什么，结果总是落空，总是使被我动员来参与其事的人遭到不幸。尼基京娜、科马尔尼茨基、伊万诺夫斯卡娅、敖德萨的几个人都被捕了。我顽强地苦斗，但一切都枉然。当年轻人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从远处望着你，寄希望于你的时候，你事实上能

退却吗？我还记得当时收到的一封信。那是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写给我的，她没有合法的身份，受追捕，不知何处藏身。她说在她那昏暗的心中只有一颗星星，那就是我。在我被捕后，她卧轨自杀了。难道我自己不也写信给季霍米罗夫，说他没有权利出国，说我们不应逃避我们业已开始的工作，说他的离去将瓦解革命队伍的士气吗？

在国内，一切都崩溃了，一切都完了，就剩我一个人，象欧仁·苏笔下的永世的漂泊者那样，走着那望不到头的、悲哀的路。①

现在，我比过去几个月更加过着双重生活，外表上是为人而活，内心里忧虑重重。外表上得保持平静和精神抖擞，我确实也打起精神来，而在夜深人静时，我悲哀地想：会有尽头吗？何处是我的尽头呢？第二天早上，我戴上假面具，重新开始佩涅洛佩的工作。当十月里米海洛夫斯基为那件事来看我时，临别之际他问我想做什么，我隐喻地回答说："把拆下的线拣起来，接起来。"②米海洛夫斯基双手捧着我的脸吻了又吻。只是

---

① 欧仁·苏（一八〇四——八五七）：法国作家。这里指他的长篇小说《流浪的犹太人》。

② 荷马《奥德修记》里说，奥德修在献了特洛伊木马计、攻下伊利

在读到他死后发表的有关我的几行记述之后，我方明白为什么他这个从来对我没有过分之举的人当时这么吻我，我想，那是由于我对目标的执着追求。

我不认为在日常的事务接触中，别人会发现或猜出我的情绪。不过比较接近的朋友不止一次问我："你为什么发呆？为什么老望着远方？"这是因为我心里老有一个声音在说："生活真苦啊！"我的目光茫然地投向远方，是因为远方隐藏着"尽头"。

但是，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敖德萨的印刷所被破坏只是不幸的外在表现，它的另一个方面暂时还没显露出来，但后果却是最可怕的。

警察是十二月二十日抓走印刷所的人的。一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我被紧急叫到我的朋友季霍茨基夫妇家。索菲亚·阿多利福芙娜·季霍茨卡娅（娘家姓德莫霍夫斯卡娅）和她丈夫总是多方帮助我，支持我。她的哥哥一八七四年与多尔古申、帕平、普洛特尼科夫等人同一批受审。他和这些人一样，被关在可怕的贝尔戈罗德苦役中心监狱，在这里的单人牢房里关了六

昂城后回国，途中很不顺利，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故乡人一直没有他的音讯，以为他死了。许多贵族都来追求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佩涅洛佩想出种种办法拒绝。她对他们说等她把布织出来后再作选择。她白天织，夜里拆，第二天再开始重头织起。就这样拖着，终于等到奥德修回来。

年，牢房小得连走动的地方都没有。德莫霍夫斯基的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勇敢和能干的人，经过难以想象的顽强的奔走，终于争得当时宪兵总监、凶残的德连捷林的准许和儿子见了面，她的坚强和母爱不仅鼓舞了儿子，还鼓舞了他的同志们。如果能把这位母亲的事迹写下来，那将是俄罗斯女性的优秀典型之一。

二、"逃 跑 者"

我到季霍茨基家时，简直惊呆了：站在我面前的是德加叶夫，在敖德萨被捕的印刷所的老板。"怎么回事？您怎么在这儿？"——我问道。我由于高兴和意外而激动万分。

德加叶夫嗫嚅着说："我逃跑了。"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一副饱受惊吓的样子。他对我说了下面的事。他不知道为什么警察盯上印刷所及其工作人员苏洛夫柴夫和卡柳日纳亚。也许是装铅字的箱子太沉，使挑夫奇怪，引起怀疑而告密的吧。

在被捕后，他想逃跑，便说在来敖德萨之前，他住在基辅，表示愿意在那儿招供。宪兵迟迟不答应，后来决定满足他这个要求。晚上，两个宪兵押着他乘四轮轻便马车去火车站。在经过城关和火车站之间那片

荒地时，他把一撮烟丝撒到宪兵眼睛里，跳下马车，躲进暗处。

他继续说下去："在敖德萨，我躲在上次巡视军事组织时认识的军官那儿。几天以后，其中一个人用马车送我到尼古拉耶夫，去找我上次去过的军官小组。后来，昨天，我到这里来了。我没有接头地址，只好去找古尔斯基，您交代过给您写信要写给他。他一直拒绝，经过我再三再四的请求，他终于说出怎样找到您。"

我怜惜地问："您在哪儿过的夜？难道在街头流浪了一夜？"

"在脏地方，"——德加叶夫难为情地说。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难为情，是因为我把"脏地方"理解为专有所指的那种地方；而德加叶夫，则因为，正如后来所揭露的，不是在神女那儿，而是在另一个地方。

我继续盘问走运的逃跑者："您不抽烟，怎么用烟草撒宪兵的眼睛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荒唐，因为用来撒眼睛的不是抽的烟丝，而是鼻烟丝。

德加叶夫没着慌，而是顺着我的话说："我是不抽烟！"——他解释说："我事先买好了。"

德加叶夫的样子叫我同情。我明白，当他的妻子

还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是不会因自己自由了而高兴的。这一情况足够使人失去平静和自持。我尽力鼓励他打起精神来。我说宪兵很快会弄清他的妻子不是革命党人，只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才干秘密印刷所这种冒险事。我建议立刻派一个人到贝尔戈罗德他母亲和妹妹那儿去，向她们报告发生的事，请他们派人到敖德萨去活动，营救他妻子。我安慰他说："如果交一笔保金，一定会把她放出来的。"我们就这么商定了。后来，当加·费·切尔尼亚夫斯卡娅从叶卡捷琳诺斯克回来（她到妹妹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她和德加叶夫都需要住处，便照我的建议，同住在一个寓所里。

不论我或加琳娜·费奥多罗芙娜都没仔细想过德加叶夫逃跑的事，没分析他得以逃跑的一切情况，因为互相信任一向是同一组织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而德加叶夫又不是新来的人，他已有好几年的活动历史，好几次都处于危险之中，然而他都光荣地经住了考验。诚然，他现在有点反常，但我们因为他的家庭情况而觉得情有可原，并没有产生怀疑。

后来我们回想起一些奇怪的、互不相干的话，要是那时我们多少有点警觉，就可能把这些话看作某种隐隐约约的暗示，也许他是在发出警告。但是我们一点也没警惕，只是一味同情他的不幸。

一次，德加叶夫说："在敖德萨被捕的人中有人叛变出卖了。"

我问："那儿有谁会出卖呢？"

他回答说："某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

"可是那儿除了您妻子、苏洛夫柴夫和卡柳日纳亚，再没有别的人，然而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再说他们并没有必要出卖。"

"不，"——德加叶夫坚持道，"一定是某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出卖的。"

我莫名其妙。①

又有一次，德加叶夫和切尔尼亚夫斯卡娅一起在我这儿。他问：

"您在哈尔科夫安全吗？"

我自信地回答说："安全，十分安全。"

"您很有把握吗？"——他又问。

"当然。除非梅尔库洛夫在街上碰见我！"——我

① 德加叶夫暗示谁呢？我曾以为他在暗示某个不能坚持自己的角色的人，其实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肮脏的勾当。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宪兵把卡柳日纳亚放出来，立即就有风言风语，说是她出卖的。这位正直的姑娘为宪兵蓄意制造的流言所激怒，开枪射击宪兵军官卡唐斯基，以洗刷对自己的污蔑。

卡柳日纳亚为此被判服苦役。在卡拉矿山，当西基达被鞭打致死时，为了对狱方表示抗议，卡柳日纳亚和科瓦列夫斯卡娅、斯米尔尼茨卡娅三个人一起自杀了。——作者

好像在说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似的。

后来，有一次在谈话中，德加叶夫对我出门的时间感到兴趣。

在互相拜访时，这样问并没有什么唐突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一般是八点，那时护士训练班的学员刚好也出门去上课——因为我用的是一个训练班的听课证副本。”

又一次，他在起身离开时问道：

“除了篱笆上的小门，还有别的门可以走吗？”

“有。从房东开的小杂货店走。不过我从来不从那边走，”——我回答说。

这一切都让德加叶夫利用了。

三、被　　捕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二月十日上午，我看了看表：八点，我便出门去。没走出十步，迎面碰上梅尔库洛夫。只看一眼，我们便互相认出来了。他没有立刻抓我，周围既没有宪兵，也没有警察。我继续往前走，一面忖度形势。没处可躲，这附近没有穿堂院，也没有相识的人家。我的口袋里有什么？——我在想。一本笔记本，有两三个人名，不是党里的人。一张寄给罗

斯托夫的A·卡申采夫的汇款单，这必须毁掉。我已走在叶卡捷琳娜大街上。我走到一个半椭圆形的小街心花园，它的一边就是街道。现在在这花园的后面是高楼大厦，而当时只有一座旧的小木屋，那是一个好人，车工H·A·伊瓦绍夫的家，他开着一爿小作坊。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心地纯朴的人。我在《无处栖身》（载于《俄国财富》杂志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号）那篇小故事里曾记述他们。

宪兵大概知道这里住的是我的朋友，因为我脑子里刚闪过“是不是拐进去一下”的念头，也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好几个宪兵，把我团团围住。不过一分钟，我已被两个宪兵夹着坐在雪橇里朝段警察局驶去了。

在那里，在一个单间里进行搜身。我一下子就看出给叫来干这事的妇女不是老手。我从口袋里拿出里面放着汇款单的小钱夹，刹那间那单子已在我的嘴巴里了。妇女们大叫起来，跑进一个宪兵，掐住我的喉咙。我假装大笑，表示他晚了一步。宪兵只好松手。事实上我无论如何是咽不下没有揉皱的干纸的。我是后来咽下的。

一个宪兵军官作简单的记录。问到我的名字时我说：“既然抓人，那你们自己应当知道抓的是谁。”于是梅尔库洛夫走进来，一副无耻嘴脸，像他平常那样说话

很快："怎么，没想到吧？"我冲着他骂道："下流胚！"还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懦夫梅尔库洛夫退到门边……

我给带到监狱，全身换上囚服，还拿来一瓦缸牛奶，一定要我喝下去。长官们担心我的性命：他们以为我吞下的不是纸条，而是毒药。我的钱夹里有一小块黄色钾盐，我当化学墨水用的，他们以为是致命的氰化钾。

第二天早晨，两个宪兵把我押往火车站，转赴彼得堡。

第十八章

一、在警察总署

我们抵达彼得堡，我被关进警察总署大楼的一间囚室里。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六，太阳已经偏西。第二天是星期天，是不办公的。我可以从容想问题。想谁？想什么呢？想母亲，我已经几年没见到她了。我想和她见一面。我也想到等待着她的悲痛。

我在警察总署关了三天。后来我听说，我的被捕在最高层引起一片狂喜。亚历山大三世得到这个消息后叫道："上帝保祐！这个可怕的女人给抓到了！"看来已把我的照片呈送给他了。那是在涅瓦大街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和陶贝照相馆照的——被捕的人通常都带到这里拍照。

当检察官多布任斯基当着我的面看照相馆照的照片时，对在场的尼·瓦·穆拉维约夫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用特别郑重的口气说："选一张好的。您知道给

谁。”他选中了一八八三年的一张，就是后来公众最熟悉的、印在我的书里的那一张。

当时的司法大臣的儿子弗·德·纳博科夫从小就记得他的父亲在收到抓获我的电报时喜形于色的样子。

在警察总署里，当我从囚室出来时，走廊里挤满旁观的官员，我就像穿过队列似地走过他们：前几年的桩桩政治案件审讯里都一再提到我的名字，显然，我已成为众人好奇的对象。

我还被带去给大官们看：警察总长、内务次官和内务大臣本人。三个大人物：普列维、阿尔渊夫斯基和德·安·脱尔斯道伯爵。第一个是无礼的，故意显得无礼的。他随随便便点一点头，不知是打招呼，还是指墙边放着的一排椅子。然后尖声喊道：“拿椅子来！”当我坐下后，他开始挖苦说在青年学生中抓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对我赞不绝口的。“这使您满意吧？”——他耸耸肩膀，脸上露出轻蔑的样子。“也许，”——他讥讽地接着说，“您现在还愿意享有您过去可能享有的那种社会地位吧？”末了，好像看透一个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的内心似的，他说：“也许您太累了，乐得事情终于到头了？”

第二个是优雅的，举止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

社会的人。他态度温和，待人委婉。他想逗我谈政治，但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观点最好在法庭上谈。

第三个是个好心肠的矮胖老头儿。当我走进阿尔溯夫斯基的办公室时，他这样欢迎我："您的样子多么谦恭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接着立刻谈到古典教育，说我们这些革命者是反对这种制度的；说他知道我们也想对他下毒手。然后谈到一般的政治谋杀和谋杀皇帝。他继续说："你们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您看，杀死一个沙皇，不是又有沙皇继位吗？"他说话呆板、无力，就像爷爷对孙女唠叨似的。因此也没有什么好驳斥的。最后，他说："可惜没有时间，要不我可以说服您。"我不想默认最后这句话，便说："我也觉得可惜，我还希望我能把您变成个民意党人呢。"

这句笑话不胫而走。多布任斯基在第一次见到我时，劈头便问："您当真想让脱尔斯道伯爵信奉你们的主义吗？"他想以此来逗我笑。

我微笑地说："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给从警察总署转移到彼得保罗要塞，在那儿关了二十个月才开庭审判。起初，几次把我叫到警察总署提问。我立刻声明，我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前的革命活动，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隐瞒的，我也不准备隐瞒，因为我的供词将涉及的事都已暴露，有关的人都已

被判刑。至于这之后的事，我什么也不会说。

我在上尉多马什涅夫的陪送下去警察总署见检察官多布任斯基和穆拉维约夫，这使我很不痛快，我提议不要把我弄出去，给我纸和墨水，我在牢房里写，我会把我认为可以说的一切通通写出来，每写完一张纸就交给督察长。

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从审讯档案中找到并刊印在《往事》杂志上的东西就是这样写出来的①。

大概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一次，一位高个子的上了年纪的宪兵将军走进我的囚室，他的脸相当漂亮、可爱。"我姓谢列达，"——他自我介绍道。"奉陛下圣旨，我受命调查在帝国军队中进行的政治宣传。"

他拿起我的一只手，不顾我的反抗，吻了一下。"您是好人，"——他说，"您的不幸在于出嫁后没有孩子。"

在这独特的开场白之后，我们坐了下来，我问他打算如何使用他的大权：是像热利霍夫斯基②那样制造一件耸人听闻的大案，来猎取功名呢，还是不扩大事态，只将少数几个人提交法庭。

"不，我不想制造大案，"——谢列达回答说。"只把

① 见《往事》杂志一九一七年第二、三、四辑。——作者

② 热利霍夫斯基是"一百九十三人案"的检察官，此案审判的都是参加"到民间去"运动的民粹派分子。

最活跃的提交法庭。”

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们这一案受审的共十四人，其中军人只六人，而原本是可以牵连几十个的。

后来，将军坦白地说他不是反动分子，他并不赞成现制度，只是天职迫使他继续服役。“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在这里了，”——他说。“我爱自由，但我不赞成搞政治暗杀。我理解的斗争是在街垒进行的，而不是从角落里投匕首。”

这次访问之后，再没人来打搅我了，因为我的供词已写完，在谢列达来访之前已交出，他来找我之前已读过。这份供词是自传性的革命运动简史。①

二、 在彼得保罗要塞

我的生活开始沉寂下来。被捕，陌生的环境，回顾过去，从儿时直到入狱，——这大概是每个落进监狱、认为一生就此了结的人的常事吧。这一切使人处于兴奋状态，在入狱之初，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如今，情绪

---

① 这份供词在宪兵中留下了印象。多马什涅夫上尉对我说：“它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我们都像读小说那样读它。”尼·瓦·穆拉维约夫要走了复制本，几年后拿给我的丈夫阿·维·菲利波夫看——他在司法部供职。——作者

逐渐松弛下来，阴沉、单调的生活开始了，唯一地只靠读书来打发日子了。我整天、整星期不说一句话。母亲和妹妹可以两星期来探望一次，一次只有二十分钟。这是规定。两道相距一俄尺半的铁栅栏把我们隔开。

一次都不让我吻母亲的手。有一次我心情特别不好，我恳求督察长让我吻一吻母亲，我非常需要温存，非常想双唇碰一碰她的温暖的手。可是，不行！狱规不许这样做。

春天里，我想花儿。我希望哪怕有一朵小花也好，那种彼得堡街头卖的种在小盆里的鳞茎类的花。妹妹带一盆风信子到要塞来，她央求把它交给我，哪怕摘下来也行。但是，不行，绝对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督察长任你怎么求也不松口。

夏天，这种会见中止了：母亲到喀山的乡下去，妹妹奥莉加到埃泽尔岛治病。

沉默，永恒的沉默。多年以后我读到彼得拉舍夫分子阿赫沙鲁莫夫的回忆录，他在要塞里也是被单独囚禁的。他说他用了大声朗读的办法才保持声带的活动能力。我没有这样做，没想到这个办法。声带由于不活动而变弱了，萎缩了，嗓音坏了，哑了。我的声音本来是圆润的女低音，现在变得尖细、颤抖，像大病之后似的，咬音吐字都很困难，说起话来断断续续，不能连贯。

除了生理上发音器官的病态之外，心理上也发生变化，不愿意讲话，除了被动的需要之外，就只想沉默，内在的冲动已然消失，在不得已须要动舌头说点什么时，就得靠意志力了。

秋天母亲回来后，我第一次出来和她见面是件很苦的事。而且越往后，这种从孤独、沉默状态走出来的事越叫我难堪。为什么要改变生活的节奏，改变已成自然的作息制度和情绪呢？为什么要用二十分钟来破坏内心的平衡，何况在这二十分钟里，你不知该说什么，问什么，而回到自己的囚室后，又久久平静不下来，又得设法把自己再冷冻两个星期。每当宪兵打开锁说："去见面！"时，我多么想说："我不想去，我不需要见面。"只是怕母亲和妹妹会担心，伤心，我才强迫自己站起来走出去。

过了很久，记不清究竟是什么时候了，单调孤寂被一个激动不安的情况所打破——我被叫到办公室去。为日后的审讯进行侦查工作的十个年轻的检察官助手之一——罗曼诺夫在那儿等我。

他开口说道："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我为一个特殊情况来找您，我来问您是因为我知道您会说真话。"

这个开场白使我惊讶和不安，我问他这话怎么说。

他说道：

“由于瓦西里·伊凡诺夫从基辅监狱逃跑一事，两个狱卒受到审讯，他们被控帮助伊凡诺夫越狱，被判服苦役，并且已经押送到西伯利亚。可是与您同案的军官季霍诺维奇明确无误地供认是他在值班时把伊凡诺夫带出囚室再带出监狱的，没有任何人协助他。负责就伊凡诺夫越狱一事事先与季霍诺维奇磋商的尼基京娜也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个人的供词我都带来了，您可以看。但是伊凡诺夫本人坚持否认季霍诺维奇的证词，说他是从火墙的缺口逃出来的，两个狱卒帮了他。我们需要您的证明，已被判刑的人的命运取决于此。他们的案件将重新审理，他们可能被送回来。请您说说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是符合事实的?”

他摊开随身带来的两个卷宗。我读了季霍诺维奇和尼基京娜的供词，这和伊凡诺夫本人亲口对我说的完全相符：狱方一点也不知道伊凡诺夫的打算，火墙里的裂口很小，根本不可想象伊凡诺夫这样的大个子能从洞里爬出去。那个洞口是特地搞的障眼法，为的是转移对开门的军官的怀疑。为什么伊凡诺夫不顾季霍诺维奇的明确供认，坚持自己的说法，诬赖狱卒，致使他们去服苦役，我实在不理解。我对他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生气。我被迫或是揭穿一个同志（我和他不仅同属一个党，而且有私人友谊）的骗局，或是做他的同谋、让

狱卒听凭命运的摆布。我犹豫起来：两者都使我尴尬。

我请罗曼诺夫让我考虑几分钟，最后，我决定了，我写了一份声明，说我确切知道狱卒绝无参与安排伊凡诺夫的越狱。

后来，我读过罗曼·罗兰的一个写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优秀剧本《狼》，剧中党性与正义感处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牺牲了正义感。我读的时候生动地回忆起伊凡诺夫这件曾使我很是心乱的事情。

这次因伊凡诺夫越狱事把我叫出去，破坏了我的单一的情绪，使我亢奋起来，想起许多事。不过一切终于也过去了，令人窒息的沉寂和缄默一如既往。一八八四年春，又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在那儿见到多布任斯基和谢列达将军。桌上堆着大本大本硬皮封面的卷宗。他们坐在桌旁，显得疲倦、忧心，脸上表情特别严肃。①

多布任斯基把一册没有装订起来的案卷摊在我面前，问道："您认得出这个笔迹吗？"

我不认识这笔迹，便说：

"不认得。"

---

① 我后来猜想，这表示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因为他们并没对我这样说）。——作者

于是他把整个册子翻过来，指着最后的签名。那上面写着：谢尔盖·德加叶夫，×月×日。我记得是十一月二十日。不过，这应该是错了：敖德萨印刷所的人是十八日被捕的，有的人说是十二月二十日被捕的。

接着，多布任斯基一页一页地翻，一面指给我看一些地方，其余的地方则用另一只手遮住。

毫无疑问，我眼前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作者把他所知道的与党有关的一切通通出卖给政府了，不仅连名带姓供出多少有点重要的活动分子，而且连最无关紧要的人、帮手和掩护者，只要是他知道的，通通一个不落地供了出来。北方和南方的军人也被逐个供出，军事组织已荡然无存。

现在，党尚存的力量已完全掌握在他们手心里，与党有关系的人从此就像处在玻璃罩里面了。

我惊呆了。德加叶夫！这是德加叶夫干的！……当谢列达和多布任斯基不作声地翻他们带来的卷宗时，我霍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好几分钟。

当我回到坐位时，多布任斯基开始让我看军官们的供词，有克赖斯基、迈梅斯库洛夫、塔拉平多夫和其他南方军官的。每一份都是以这样可耻的话开头的："我对自己的一时迷误深感痛悔，现谨报告如下……"云云，云云。这些三十五—四十岁的男子后悔了……克

赖斯基后悔了，而我曾经那么相信他，那么想把他吸收入党，把他当作坚强、刚毅、不会退缩的人，我对他曾寄予多大的希望！

这些人都曾经许诺一旦中央号召，就手持武器奋起为人民事业捐躯，而现在却怯懦地背弃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他们"一时迷误"！他们对革命、街垒战和其它问题曾经讨论了多少年！"一时迷误"！这些供词使我觉得他们真可怜，但是，与德加叶夫的所作所为相比，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德加叶夫动摇了生活的根本——对人的信任，而没有对人的信任，革命者就无法行动。德加叶夫撒谎，伪装，欺骗；他不断探问，为的是出卖，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讨好、夸奖。我和他，和他一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许多同志都有密切的联系，他好像和我一样，把这些同志当作亲爱的同志。他不是那种生活在小县城沉闷的环境里、没有经验、不知道警察的厉害的外省军官。他在革命斗争舞台上、在精明的革命同志中已活动了四年，不止一次与宪兵打过交道，冒过失去自由的危险，具有十分肯定的政治声誉。原来，他的逃跑是假的，是警察局把他放出来的，好掩饰他的叛变。自从他叛变以后，就成了一个混在革命者中间的奸细，一面把几十个新人吸收进革命运动，一面秘密将他们送到政府手里。碰上这种叛变就是碰上

无法比拟的不幸，它夺去了人心的美、革命的美和生活的美，我一下子从理想主义的高处被扔进龌龊的泥沼……

在这之后的第一次探监时，亲人们一见到我便看出我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真想死。真想死，但是却必须活下去。我应当活下去，为的是出庭，这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的最后一次战斗。作为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应当说出自己的话——像我之前的同志们那样，完成我的最后一项责任。作为被德加叶夫出卖的那些人的同志，我应当与他们共同把厄运承受到底。

要活下去就只能用某种与革命的不幸无关的东西来填塞自己的头脑，要使自己整天一刻也不停地集中精力于某件事。我开始学英语，全神贯注，因此，两个星期后我已能读原版的麦克莱的英国史了。多年以后我回想此事时觉得，要不是我在女子学校时同那位英国女教师学了几课英语，这事根本是办不到的。可是在女校时我是迫于校长的坚持，好不情愿地学的，成绩很不好。不过看来还是在脑子里留下点印象，十六年之后，印象复活了。

学会英语后我便整天手不释卷，一分钟也不让脑子思考问题。从关进来的头几个月起我就致力读书

了。我生平还从来没像这时读得这么有味道。总的来说，我受的教育是不正规、不系统的。在女子学校，没得可说，那儿看书是要受到追究的，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为学生开放的图书室。在苏黎世上大学时，医学课程占去了太多的时间，没有可能充分利用俄国侨民和青年学生所办的那个出色的图书馆，我得抓紧时间学医——我没钱长期滞留国外。在我离开大学回到俄国后，革命活动环境不容我认真从事脑力活动。我所处的那个革命环境从不轻视科学，不轻视知识，但是条件不允许我们埋头于科学。当我在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的地方自治局里做事时，农村的医疗工作要求我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一八七九年起，我开始过着不受法律保护的生活，精神紧张，生活不正常和危险，不容我想到书本。革命事业要求全力以赴，心思自然地只放在于党有利、有必要的事上面，只想到党所做的和要做的事。越往后，越难把心思用在其它方面，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一点上，脑子里只装着一件事——革命事业的利益。

当党的机关刊物《民意》还在彼得堡出版时，它的主要工作落在我们的理论家季霍米罗夫身上。经过一番试验之后，他对执行委员会说："如果你们要我写东西，那就得解除我的'指挥部'成员的工作，免掉我与有

关人的事务性接触，就是说，解除我的一切实际事务。兼顾写作工作和事务工作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写文章就得读东西，就得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一切，得思考，得集中精力思考，这就要求摆脱其它一切会分散思想和占去时间的工作。”

执委会不能不承认这话是对的，让季霍米罗夫只从事文字工作。

在监狱里，没有其它工作，没有外来的印象和事务。只有在这里，我才可以把精力用在我特别感兴趣的学科——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上。我有可能读斯宾塞的全部生物学和心理学著作了。奥莉加妹妹所保存的我写给母亲和她的信反映了我这时的多方面的阅读。我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写的五十封信，差不多全是谈我对各个作者的主要著作的读后感，向妹妹推荐。我的信也不可能写其它内容，因为它们要经过要塞当局和警察总署的层层审查。只有个别地方，字里行间流露出囚徒的一点心理状态，因此，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份相当珍贵的收藏，广大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

当时，彼得保罗要塞的藏书还是满不错的，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满足。一切严肃读物终于都让我读完了，这时，一向待我很关心的司令官加涅茨基同意把未经

装订、因而未列入图书目录中的书借给我看。督察长列斯尼克说，这样的书有满满一屋子。我便享受起这份财富了。我还谋求用我的钱把这些书装订起来，让大家使用。但是没结果，怎么也没法改变他们对待囚徒利益的冷漠态度。

书帮助我活下去。从入狱起，它们麻痹了社会性质的不幸所造成的痛楚，它们还帮助我经受住德加叶夫事件对我的灾难性精神打击。此外，纯生理性的疼痛也多少转移了精神上的痛苦。我的一个手指头痛——小指头得了骨膜炎，痛得要命。当我把手指头伸给医生维尔姆斯看时，他直摇头，说："必须作深层开刀。"开刀后，他说："我担心可别得破伤风。"这是一个冷漠的老头儿，彼得保罗各棱堡和阿列克赛半月堡里的非人勾当已经把他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了。这时，他第一次环视我这间长着绿霉、蒙着灰尘的囚室，说：必须把您搬到一间明亮一点的房间去。我在这间虽然大，然而阴暗、潮湿和肮脏的囚室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第二天真的把我搬到另一条走廊的一个囚室里。这房间不大，但显然舒适得多，大约是朝向西南的，尽管窗对面是要塞的高墙，中午时分，永远见不到的太阳会射进几道斜向的光线，墙与窗的距离较我迄今所住的四十三号囚室略远。在新房间里，铁床的旁边有一张

钉在墙上的铁桌，为了看看周围，我爬上桌子，看到墙上一个小壁龛的侧壁上长着一棵柔弱的小树。这是长在石缝里的一棵接骨木，是随风飘来的种子发芽长起来的。接骨木对外界条件要求不高：有一段残垣断壁，有垃圾杂土，就够滋养它了。春天来后，每天中午我就爬上桌子，看看变绿的树叶，我把这棵树叫做我的树，因为除我之外，没有人能看到它，也没有人看它。

在席吕塞尔堡里，在旧堡的高墙和塞堡外墙相接的那个犄角上，在离地数俄丈、人不可及的高处，每年夏天都长出一丛圆叶子的风铃草，它孤零零地长着，开着花儿。在那堵把我们和整个生命世界隔开的灰色的石灰石板墙上，它那漂亮的淡紫色花冠像一只只倒挂的锯齿形小花瓶，煞是好看。风铃草柔弱的细根伸进风化的岩石，雨点滋润它，几缕阳光照着它的叶子，保障它的生存。对我来说，长在高处的彼得保罗要塞里的接骨木和席吕塞尔堡里的风铃草就是一幅雅罗申科① 的油画《生命无处不在》。它们好像在说："尽管周围是冰冷坚硬的石头，我们还是活着，而且还要活下去，好让能看到我们的人快乐。"

---

①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雅罗申科(一八四六——一八九八)，俄国画家。

一八八四年九月十六日或十八日，给我送来了起诉书。我和其他十三个人一起提交军事法庭审判。一个指定的辩护人也来见我。我表示抱歉说不能接受他的效劳。当他独自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时，低声告诉我："苏杰伊金已被打死，是德加叶夫打死的。他打死他之后就不见了。"①

刹那间，我心头的阴云舒展了，消失了。一股埋在深处的、复杂的、矛盾的感情像电流一样使我震颤了一下：闪电亮了一下，然后，一切又暗下来了。

① 一八八三年夏，谢·德加叶夫到国外向执行委员会成员季霍米罗夫和奥沙尼娜忏悔，他们答应保存他的性命，条件是无条件予以驱逐出党和杀死彼得堡秘密警察头子苏杰伊金——雇佣德加叶夫的人。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德加叶夫参与下，苏杰伊金被杀死了。之后，德加叶夫逃离俄国。

第十九章

一、审　讯

那是星期六，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时，宪兵突然给我送来大衣和帽子：要把我从彼得保罗要塞带到拘留所去。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要在这么晚，当人家要上床睡觉时打搅他，我不知道。不过从我在审判前和审判后的亲身体会来看，整个监狱制度就是有意无意地要使人神经失调，或通过死一般的沉寂，或用种种突然袭击来使人的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这一夜，我自然整夜没阖眼。他们把我放在囚室里正好对着值班女看守坐的地方。不知出于什么防范考虑，门上的大气窗整夜都朝着走廊开着。两个值班的女看守凑到一起聊天，她们就坐在门对面，聊了一夜，不让人有一分钟的安静。第二天，当我给带去和母亲、妹妹奥莉加见面时，人飘飘浮浮的，几乎站不稳。这一

次，我们之间没有隔着两道相距一个半俄尺的铁栅栏，在监禁二十个月之后，我第一次能够亲吻母亲的手。我们可以坐着谈话，不受时间限制。但是，我已习惯于沉默和两星期一次的二十分钟的见面，因此我很快就感到异常疲倦，竟主动要求离开：明天军事法庭就要开始审讯我了。

星期一上午九时，我给领着走过错综复杂的过道、楼梯和走廊，来到了一间房间，与我同案受审的十三个同志[①]都已到齐了。每两个人之间站着一个宪兵，军刀都已出鞘。不许我们互相拥抱和握手。这也好，单是外表上的一个动作就足以使人放声痛哭了。眼望着那些原是那么明朗、生气勃勃的脸，如今一张张变得苍白焦黄，眼望着一个个虚弱的躯体，有的还显然十分抑郁，心情怎能平静！[②]眼望着他们，不由痛心地想到在这次审讯中，联结着我们的不只是共同的革命活动，我们之所以给押上被告席，是由于一个朋友变节，背信弃义地出卖。在整个审讯期间，在审讯的一切细节上，

---

① 他们是伏尔鑁席太因、聂马罗夫斯基、苏洛夫槼夫、斯潘多尼、丘伊科夫、伊凡诺夫、阿申布伦纳、波希托诺夫、尼·罗加乔夫、施特龙贝格、季霍诺维奇、尤瓦切夫、切莫达诺娃。

② 进席吕塞尔堡不久，军官季霍诺维奇就死了（一说是自杀的），接着，聂马罗夫斯基因害肺病死去。——作者

都有声无声地让人感觉到德加叶夫的手所留下的可耻印记，它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头。

证人都不是被告一方的，而是起诉机关召来的老油子，还没完没了地宣读揭发材料。

几乎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切莫达诺娃（她曾被行政流放过）絮絮叨叨地要法官相信她是无辜的。她说得这么认真和头头是道，连我这个亲自把她找来的人都不禁要相信她到哈尔科夫来真的完全是为了办私事，完全是偶然走进民意党的秘密印刷所的。

其他同志都很镇静，想着心事，没说话。只有伏尔铿席太因满不在乎，一再受到主席的申斥："被告伏尔铿席太因，不要与邻人说话……被告伏尔铿席太因！告诉你——不要嘀嘀咕咕……到最边上去！"等等。

至于我，我是一声不吭的。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死寂和独处之后，神经由于环境变化而紧张得几乎要崩溃。同志们的样子使我惊愕，处在人间，人们的声音使我激动，还有，晚上巨大的吊灯的灯光，这一切都刺激我。我没有一次审讯会是坚持到底的，每次都提前回到囚室，好让疲惫不堪的神经得以缓过来。

在中间休息时，母亲和妹妹走过来，神经又受另一种负担，后来我不得不伤心地说："你们走吧！我再也没有力气了……"

在审讯前的侦查中，我丝毫不想在现行法律前掩盖我的责任，我书面供认了我个人参加的一切革命活动的情况，在法庭上，我也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因此我并不需要辩护。不过，二日我还是请来了律师列昂季耶夫，我对他解释说，我请他来的唯一目的是可以单独和人谈话，因为我应当作一些最后的安排，而在和母亲见面时是没法做这个的，因为总有一个看守坐在我们跟前。

在判决前的羁押期间，妹妹知道我爱花，曾经不止一次请求准许给我送花，但是彼得保罗要塞当局断然不许送东西进来。现在，在审讯的最后一天，她带给我一束非常美丽的玫瑰。这美丽的玫瑰花给了我最温柔的回忆，我带着这温柔的回忆进了席吕塞尔堡。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另一件令我感动的事是喀山罗季奥诺夫女子学校的法国女教师[1]对我的致意。这真是出乎意料。她认识的我还是一个坐在课堂板凳上的十二岁小女孩，而现在的我却是坐在被告席上。她居然记得她的小学生并且向她热忱致意。

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法庭上最动人的一刻：主席用特别庄重的声音说："被告！

① 马特罗索娃女士，本姓瓦尔东。——作者

现在给你最后的发言机会。”

最后发言！短短的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意思，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啊！给被告一次机会，在特殊的、悲惨的环境中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也许是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机会——表明自己的道德风貌，对自己的言行作道德辩护，大声说出自己想说的、应当说的、可以说的一切。只消几分钟，这个机会，这个最后的机会就会溜走，一去不返，永不再来。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受审的人即将被宣判，就不可能说话了，没有人会听他的，他的声音或者将埋葬在苦役监牢里，或者将随着他本人死在断头台上。

在囚室的孤独中，为了等待这一天，这一刻，我忍受了多少痛苦和不安！

由于种种情况，我是这次审讯的中心人物，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责任者。从一八七九年开始到一八八四年为止所进行过的历次审讯——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案、亚历山大·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案、三月一日案、二十人案和十七人案，都多次提到我，给我这个最后被捕的人造成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这个地位责成我这个执委会最后一名委员、民意党最后一个代表应当在法庭上讲话。

可是就情绪而言，我哪有心情演说！我的祖国的

一般状况使我情绪十分低落。毫无疑问，斗争、反抗已经结束，黑暗的反动统治已经开始，而且将要持续多年，精神上将更加压抑，因为人们期待的不是它，而是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的彻底更新变革。斗争以空前残酷的手段进行，革命者抛头颅，洒鲜血，怀着信心、希望和期待。但是人民没有说话，他们不理解。社会虽然理解，但是没有说话。历史的车轮不理睬我们：我们比历史进程——社会和人民的政治要求普遍高涨——早走了二十五年，① 成了孤家寡人。一支精选的有组织的力量，尽管人数不多，却勇敢无畏，如今，他们已被撵出生活舞台，被粉碎，被消灭了。我的执委会的同志们已先于我被捕、判刑，有的牺牲在断头台上，有的正在亚历克赛半月堡的高墙里受折磨，慢慢死去。

民意党的整个组织要是说还没被彻底摧毁，也是受到重创了；在这片废墟上，谢·德加叶夫又进行了道德沦丧的扫荡。他在民意党创始人牺牲之后，在狱中变节，在假装逃跑出狱后，继续进行出卖和奸细活动。

这样一来，到了一八八四年这一次我也因德加叶夫的出卖而受控的审讯时，曾致力于摧毁专制制度，曾以自己的活动震撼了祖国，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秘密

① 作者指的是一九〇五——九〇七年的革命运动高潮。"二十五年"是求说个整数。

团体已被打倒，而且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重振旗鼓。

我的身体由于审判前拘羁在要塞里而变得极度虚弱；我的心由于极度悲痛而破碎，空虚。正在这个时候，向被打倒的党、向牺牲的同志们履行我的最后职责的一刻来到了。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履行这一职责。我要在法庭上阐述我的信仰，阐述指导我们的活动的道德动机，阐述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

主席又说话了，叫到我的名字。鸦雀无声。在场的人——自己人和敌人的眼睛都望着我。大家都已在听我，虽然我还没吐出一个字。

真可怕：要是在我想好的演说中，在这些决定的日子里常常搅扰我的那个暗影突然遮蔽我的思想，那该怎么办？

在众人屏息静气、全神贯注的沉寂中，我以强压下激动的声音，做我最后的发言：

"我一八七九年以来的行动，目前正受到法庭的追究。检察官在他的起诉书中对我的这些行动的性质和数量都表示惊讶。但是，这些罪行和其它任何罪行一样，都有其历史渊源。它们与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在审判前的关押期间，我常常

想：我的生活是否可能走别的道路？它是否可能有别的结局，而不致坐在被告席上？每一次，我的答案都是：不可能！

我降生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里。就教养来说，我不需要向导，不需要人牵着我走。我的家庭是开明、仁爱的，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常有的那种冲突。我也没有尝到物质匮乏的苦，不需要为面包或求经济独立而操心。当我十七岁走出女子学校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有这么优越的条件。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属于有文化的少数，这使我产生了对其他的没有文化的群众的责任感，我的地位赋予我这样的责任。他们一天捱过一天，忙于劳作，却没有通常称之为文明福利的一切。对比我和我周围的人的状况，我第一次感到需要给自己的生活确立一个目标，为周围这些人谋福利。

对于我的这种需要，那个时代的俄国期刊和七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妇女运动给我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向我指出医生的工作是一项可以满足我的从事福利事业的意向的活动。

那时，在彼得堡已开办女子学校，但它从一开始就很虚弱，始终在死亡线上挣扎，至今仍然如此。由于我已下定决心，我不愿由于偶然的意外而离开业已选定

的道路，于是我便决定到国外去。

这样，在我对我的生活作了重大的改变之后，到苏黎世去，进了大学。国外的生活与俄国的生活大不一样。我在那里碰到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我过去的阅历使我对这些新事物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我所碰到的一切。起初，我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我觉得它就是我原先的那种博爱思想的扩展。让人相信将会有平等、博爱和全人类的幸福的学说，自然给了我极为强烈的印象。我的视野扩大了。现在，我看到的不是几个大娘大婶，而是人民，是人类。此外，我到国外的时间正是巴黎刚刚发生的事件和西班牙正在进行的革命① 在整个西方工人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这时，我接触了国际② 的学说和组织。只是后来我才能判断，我当时所看到的有许多是表面现象。此外，我没有把我所了解的工人运动看作是西欧生活的产物，而认为那种学说对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

在国外，我迷上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我妹妹莉吉亚所参加的第一个革命小组。这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组

① 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和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 指第一国际。

织：每个成员可以在随便什么时候以随便什么方式参加活动，而所谓活动不外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抱着彩虹般美丽的希望，以为人民由于贫困和社会地位的关系，天然是社会主义者，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那时所说的社会革命毋宁说更具有和平改革的性质，就是说，敌视社会主义的少数看到斗争无可能，迫于不得已，会向已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大多数让步，因此，谈不上会有流血的事。

我在国外呆了差不多四年。我向来是有点保守的，就是说，我不轻易做决定，但是一旦做出决定，那就很难改变。因此，当一八七四年春，差不多整个小组的人都回俄国时，我仍然留在国外，继续我的医学学业。

我的妹妹和其他组员们刚一出师就受到挫折。在工厂才当了两三个月的工人却招致两、三年的审判前的关押，接着是审讯，他们有的被判服苦役，有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他们在狱中发出呼吁，建议我回国，支持小组的事业。由于我已获得足够的医学知识，并且我认为获得医学博士的头衔只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事，所以也就启程回国了。

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遇上危机："到民间去"的运动已经失败，但是，我认识了相当多的人，我觉得他们

很可爱，我信任他们，我和他们成了朋友，和他们一起参与制订纲领，即民粹派纲领。

我去了农村。民粹派纲领，正如法庭所知道的，它的目标自然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因为它提出要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村社。但是在达到这一点之前，一切生活在民间的革命者所应当起的作用是搞文化活动——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我纯粹是带着革命任务到农村去的。但是，我想，根据我对农民的态度、我在农村的所作所为，除了在俄国，在任何其它国家里都不会对我进行任何追究，反而还会把我看作是一个于社会不无用处的社会成员。

我作为医士参加县自治局的工作。

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一个反对我的同盟，为首的是首席贵族和县警察局长，而警察、乡文书等等则是他们的爪牙。针对我散布了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说我是没有身份证的人，其实我持的是自己的身份证；说我的医师证书是伪造的，等等。当农民不愿与地主做吃亏的交易时，他们便说是我支使的；当乡会议减少文书的薪俸时，他们便断言，又是我出的主意。

警察明里暗里进行调查，县警察局长甚至亲自出马，几个农民被捕，在审问时提到我，还向省长送了密告，多亏县地方自治局主席的奔走，我才得以平安无

事。我被警察、密探所包围，农民开始怕和我接近。他们来我家找我得绕道走偏僻的地方……

这种种情况使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我能够做什么？

坦白地说，我去农村时已是到了不会不知轻重犯愚蠢的错误的年纪，已到了比较有耐性、比较能听别人的意见的年纪。我想研究基础，想知道农民到底想什么、希望什么。我看出那些人抓不住我的把柄，我之所以受迫害，实质是因为精神，因为方向，他们觉得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不为某种可怕的目的而呆在农村。

这样一来，我连和人民一同生活的可能性都没有，不但不可能做什么事，连日常生活联系都不可能。

于是我开始思索：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要是我换个地方、再试一试，是否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放弃我原来的打算是很难受的。我学了四年医学，打定主意要在农民中工作。

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收集其他人的情况，我终于确信：问题不在我个人，也不在这个地方的条件，而在于一般的条件，确切些说，在于俄国没有政治自由。

迄今为止，我的任务都是社会利他主义的，它们都不涉及我个人的利益。现在，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我

们的统治方式的欠缺。

早在这之前，我已不止一次接到请我参加土地和自由社、在知识界活动的建议。但是由于我坚持已经作出的决定，没有接受这些建议。我一直在农村坚持到最后。

可见不是一时的轻率，而是痛苦的必然迫使我放弃原来的观点，走上另一条路。

那时，个别人开始表示这样一种观点：政治因素应在革命党的任务中起一定的作用。在土地和自由社中形成观点不同的两派。在我结束农村工作后，我对土地和自由社说，我认为现在我是自由的。

那时我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后退一步，到国外去，当医生，不过那就不是为农民，而是为富人服务了，那是我所不愿意的；或者是把精力用在摧毁阻碍我实现我的愿望的障碍上，——我情愿这么做。我加入土地和自由社之后，便受邀出席沃罗涅日大会。在这个会上，党还没有分裂，不过多少可以明确地看出谁是持什么观点了。一些人说应当像过去那样，在农村活动，在某个地方组织人民起义；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在城市开展反政府的活动。

我从沃罗涅日来到彼得堡。不久，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了。向我提出了参加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我接

受了。我的生活经历使我确信，能够改变现存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暴力斗争。我不能走和平的道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出版自由，因此，想通过出版物传播思想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哪一个团体的机关刊向我提出某种暴力以外的道路，我可能会选择它，至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论在地方自治局里，在法庭上或在任何一个社团里，我都没看到反抗，也没看到出版物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因此，我认为，摆脱我们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暴力活动。

既然我已接受这条道路，那我就要走到底。我一贯要求人——既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要始终如一，言行一致。我认为，既然我在理论上已经承认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够有所作为，那么我就责无旁贷，应当参加我的党所要组织的暴力行动。许多理由都迫使我这样做。我不能心安理得地叫别人参加暴力行动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只有我亲身参加，我才有权利敦请别人参加。说实在的，民意党宁愿把我用在其它方面——在知识界作宣传工作，但是，我希望的，我给自己争取的是另一种角色。我知道，法庭总是要注意我是否直接参与作案，唯一被允许自由表示的那一种社会舆论也总是最起劲地攻击直接参加暴力行动的人，因此，我认为把别人推上那条路而自己却并不准备走，那简直卑

鄙透顶。

这就是我对显得这么可怕、这么不可理解的所谓'杀人成性'的解释。而表现它的那些行动，其动机在我看来至少不能说是可耻的,否则的话,只要一提这类行动,法庭也会认为是卑鄙的。

在我所据以行动的纲领中，对我最有意义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消灭专制的统治方式。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纲领中提出的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实践意义。我想，不妨向往共和制。但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只有社会已作好准备的那种政体，因此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出现让人有可能全面施展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来为社会造福的条件。我认为,在我们现存的秩序下不存在这种条件。"

当我讲完时,主席温和地问我:

"您想说的都说了吗?"

我回答道:"是的。"

没有任何尘世的力量能帮我再说下去,——我太激动,太疲倦了。

在我讲完话和随后的休息时，同志们和辩护人的同情的目光、握手和致意，证明我的话给人留下了印象。司法大臣纳博科夫出席这次审判会，他看到律师

列昂季耶夫把我的话作了速记，会后向他要了一份抄件。

最后一项职责完成了，我的心安下来了。听说人在临死之前都有这种豁然怡然的状态。过去，描绘了社会理想和目标的美丽图画，描绘出来了，又毁掉了，给了人撕心裂肺的痛苦；过去，有过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典型，有的英勇得令人敬佩，有的怯懦得叫人失望。在生活的万花筒里见到的一切，高尚的，丑恶的，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消失在远方。悲剧已演到最后一幕，大幕已经降下，再不会拉开了。是的！过去已经过去了，而未来，可怕的未来，远离生活，远离人间的未来还没到来。现在是一个间歇，多事、动荡的生活期已经结束，死一般的未来还未展开，甚至连预感也没有。我感到呼吸轻松了。为思想服务以及有关的回忆，这一个圆圈已经闭合，就像对垂死的人来说，生命的圆圈已经闭合一样。难道我不是要死的人吗？对于一个献身社会活动的人，公民生活的结束难道不就等于为个人而生活的人的肉体死亡吗？正如这样的人临死时可以感到幸福恬静一样，我回顾往事，意识到我已作出一切努力，凡是可以做的都做了；如果说我曾向社会和生活索取了什么的话，那么我也已给了社会和生活我所能给的一切。因此，我也感到幸福和恬静。

我的体力和精神力量都已耗尽，什么也没剩下了，甚至连生的意志都消逝了。我感到我已从对祖国、对社会、对党的义务中解脱出来，现在，我只是一个凡人，是我母亲的女儿，妹妹的姐姐，在我那个被毁掉的社会里，她们是仅存的两个人了。

我觉得自己是个重伤员。外科大夫的手术刀早就为他准备了。现在，手术做了，结束了，他给抬下手术台，麻药的效力消失了，他躺在洁净、凉爽的白色病床上休息。

他给切去一只胳臂，一只腿，但是，一切担心和危险都已过去，现在不疼了，他是幸福的，因为还没有意识到不幸的深度。然而，不幸已经快来了，瞧，已经要来敲他的门了。

宣布判决：我和另外七个同志——其中六名军官，他们与我一同受审——被判处绞刑。

审判之后，发生了下面一件事。

拘留所的督察长，一个退役海军军官，到我囚室来。

他说："被判处死刑的军人决定上书请求宽恕。但是，施特龙贝格男爵还在犹豫，他希望知道您的意见，您认为他该怎么办。他是否应当由于同志们的希望也上书求饶，还是不与他们合伙，放弃这样做？"

我回答道："请告诉施特龙贝格，我永远不会劝其他人做我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的事。"

督察长含着责备的目光望着我的脸。

"您多残忍啊！"——他嘟囔道。①

二、十　天

星期天审讯结束后，母亲和妹妹来看我。我不怀疑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们了。

"母亲怀着再次见面的希望
走了，……没有回头。
妹妹在门边停下来
再次投来永别的一瞥。"

这种哀痛凝神的目光真叫人肝肠寸断。她是否已经知道或只是预感到这是最后的一面呢？……只要再拖长一分钟，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还好门关上了，永远地关上了。

星期一，一点左右，我吃完饭——给我送来了松

---

① 被判处死刑的有：妃格念尔、阿申布伦纳、帕希托诺夫、罗加乔夫、施特龙贝格、季霍诺维奇、尤瓦切夫、伏尔镂席太因。后来，施特龙贝格和罗加乔夫被处决，其余的改判终身监禁，关进席吕塞尔堡。详见本书第二卷，即《狱中二十年》。

鸡、梨（大鸭梨）和一盒糖果。这时女看守跑进来说：“来带您啦！”十分钟内一切收拾停当，一辆马车把我送回彼得保罗要塞。

我又回到四十三号囚室。很想喝一点东西。

我对值班的说：“请煮一点茶。把那盒糖果拿出来。”

走廊里静下来了。宪兵没有回来，我在床上躺下来等，却睡着了。睡得很死，很香。自从进狱以来好像还从没睡得这么死，这么香。

也许我做了梦，梦见母亲，向她撒娇，像从前不只一次对她说过的那样说“妈妈！您真有趣！真的，人家会爱上您的！”也许我梦见妹妹来，给我带来一束香水月季，比上次的更可爱，更香？……

响起了开锁的声音，没等我下床，那个粗鲁的胖军官雅科夫列夫已在一个宪兵和一名要塞士兵的陪同下走进囚室。他不等我缓过神来就开始念他手里拿的一份文件。

我什么也没听懂，无法听懂：我睡得浑身酥软，稀里糊涂。这是怎么回事？几个字，奇怪的，互不相干的东西：“女棉鞋，一尺二的粗麻布头巾，……铁皮杯……三千长鞭① ……”我一点也不明白！

“请稍等一下，”——我用手遮住眼睛说。“我睡着

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请等一会儿再来吧。”

过了一刻钟，一个军官又来了，重新读了那份文件。这一次，我听懂了。

“请到另一间囚室去，”——宪兵说道。

这是隔壁的一间空房间，通常有一个妇女在这里对我搜身，她是特地给叫来干这事的。现在，她已在那儿等我了。

我穿着一件做工考究的蓝色细呢长袍，是审讯时母亲带给我的。我脱下长袍和身上的所有衣服，也解下小圣像——那是母亲给我祝福用的。床上堆着一堆破衣裳。那女人给我套上一件还没有下过水的灰色粗麻布农民式的大褂，一块同样布料的一尺二寸的头巾；给我的脚裹上粗麻布包脚布，套上粗笨的、其大无比的棉鞋，又给了我一条灰色粗呢裙子。我惊讶地望着这条裙子：它已给蛀得不像样，不是网衣蛾咬的，是贪吃不饱的大毛毛虫咬的，已经咬出几十道长长的半圆形小道。然后，她又给我一件灰色粗呢长衫，背上有个黄色的方块A，长衫里子脏得要命，满是污迹、油斑和汗斑，看来从前有人长期穿过。长衫的肩膀搭拉下来，袖子

---

① 旧俄的一种酷刑。士兵面对面排成两行，手里拿着树条做的长鞭鞭笞由队列中走过的受刑者。

长过手指头。要是我反对穿这件衣服，可能会换一件新的。但是我没反对：我已捏在人家手里，我宁可不吭声。

丑化变形告成。我变成“灰姑娘”回到四十三号。变化是如此之大，对比是如此之强烈，我差一点没有野性地、变态地大笑一阵。笑自已，笑蓝呢长袍，笑松鸡，笑大鸭梨。

囚室也变了：虽然不是金鱼的宫殿变成破泥棚和木盆[①]，却也会对视觉起点作用的。

原来一直放在床上的两个褥垫不见了，换成塞着麦秸的布袋；两个枕头剩下一个，被子换成一块旧绒布；桌上的瓷杯换成铁皮杯，它凹凸不平，好像特意弄坏似的。它锈得很厉害，杯口成了锯齿形。早晨不再给茶，而给开水和黑面包，我喝水时得特别小心，提防杯口划伤嘴唇。

随着环境的改变，前几天曾让我那么高兴的恬静也结束了。思想不停地驰骋，开始兴奋起来。现在我想的不是自己，也不是眼前；既不想亲人，也不想等待

---

① 见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金鱼为报答渔夫放生之恩，一再满足他的妻子的要求，直至使她当上女皇。贪婪的老婆子还要当海上女皇，让金鱼侍候她。于是金鱼让他们重新过原来的贫穷的打渔生活。

着我的事。不知为什么，会想到革命运动，西欧的，我国的革命运动的一般命运；想到思想的继承性，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早已过去的事，早已作古的人重又浮现在脑际，想象力从来没有这么强。手头没有书，再说这些天我也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它事上。只给我福音书。从前，童年时，我曾对它们感到兴趣，但是现在，它们不合我的情绪。头几天，我一页也没翻，后来，当我把自己的事全部想过之后，不再那么兴奋了。我口里念着词儿、句子，但是不明白它们的意思，只是机械地念着——我不过是在翻译，先是译成法文，后来是译成德文。

在彼得保罗要塞，每到星期六，维尔姆斯医生通常来巡视所有的囚犯。现在，他仍是星期六来。他和督察长列斯尼克一起从走廊里走过来，有说有笑。他的低沉的笑声在空荡的长廊里回响。当宪兵打开我的房门时，笑声还在回响。可是当他看到我时，笑声嘎然而止。他那张冷漠、苍老的脸拉长了：他来看我差不多有两年了，这是第一次看到变形后的我。

他微微转过脸问道："身体怎样？"

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提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

"还好，"——我回答说。

第八天的晚上，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开门、关门

的声音。显然有人来巡视。我的门也给打开了。老将军，要塞司令官在督察长（也是军官）和其他随从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他举起手中的文件，故意大声地、一板一眼地说："皇帝陛下恩准，着将你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我是否想过，等待过把我处死呢？我对此作好准备了吗？不，我没想过。

三月一日之后，他们绞死了佩罗夫斯卡娅。看来，处死一个女人使大家都心情沉重。那时，处死妇女还没有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佩罗夫斯卡娅就义已三年了。

如果判决仍然有效的话，我会十分从容地去死，就情绪而言，我已作好死的准备。我未必感到什么鼓舞，我的力量已通通耗尽了。我宁愿痛痛快快地死在断头台上，而不愿慢慢地死去——我那时已经清楚意识到我一定会慢慢死去。

这样过了十天，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我给带走了，——我不知要给带到哪里。

原来是去席吕塞尔堡。在那儿，在席吕塞尔堡，我的阴间生活开始了，那是我还不曾体验过的一个失去公民权，也可以说，失去人权的人的生活。

附：

薇·尼·妃格念尔生平大事记

一八五二年七月七日	出生于喀山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
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八年	在喀山省马马德什县林区度过童年
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二年	举家迁回喀山省捷秋希县克利斯托弗洛夫加村
一八六三年	迁居捷秋希县尼基佛洛夫加村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在喀山市罗季奥诺夫女子学校学习
一八七〇年十月	与阿历克谢·维克托罗维奇·菲利波夫结婚
一八七一年	在喀山大学旁听
一八七二年春	到瑞士，进苏黎世大学学医 参加女学生的“弗里契”读书会
一八七三年暑期	加入社会主义革命小组，它是后来的民粹派组织全俄社会革命

组织（即“莫斯科人小组”）的核心

秋	转学到伯尔尼大学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	离开瑞士回国
	在莫斯科进行革命活动
一八七六年春	在雅罗斯拉夫尔通过医士资格考试
夏	与阿·维·菲利波夫离婚
秋	在彼得堡通过彼得堡医科大学产科医师资格考试
	土地和自由社成立
	参加民粹派小组，在彼得堡进行革命活动
一八七七年秋	在萨马拉省萨马拉县斯图坚采村担任医士，实践民粹派的“在民间活动”的纲领
	三个月后为逃避警察的搜捕，前往沃罗涅日，转赴彼得堡
一八七八年春	参加重新恢复的柴科夫斯基团
三月	到萨拉托夫，随后在彼得罗夫斯克县维亚兹米诺村担任医士，同时进行文化、宣传工作

一八七九年 四月二日	同小组的亚·康·索洛维约夫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捕
	为逃避搜捕，逃到坦波夫
六月	加入土地和自由社，出席该组织的沃罗涅日大会
	到彼得堡。从此开始地下革命活动
八月	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民意党成立。加入民意党，为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九月	到敖德萨，组织暗杀沙皇的准备工作，主持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十一月十九日	民意党人在莫斯科近郊炸沙皇专列
一八八〇年 二月五日	民意党人炸冬宫
七月	回彼得堡，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秋	担任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书记，负责对外联系和报导

	参与组建民意党军事组织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	民意党人在彼得堡炸死沙皇
四月三日	逃离彼得堡
一八八一年四月至一八八二年三月	在敖德萨进行革命活动
一八八一年秋	民意党中央转移到莫斯科
一八八二年三月	回莫斯科
一八八二年三月至一八八三年二月	在哈尔科夫等地从事重建党中央的工作
一八八三年二月十日	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哈尔科夫被捕
一八八三年二月至一八八四年十月	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
一八八四年九月	彼得堡军事法庭开庭审讯
二十四日	被判处绞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十月十二日	解送席吕塞尔堡
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离开席吕塞尔堡
十月	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尼奥诺克萨村
一九〇五年六月	回故乡捷秋希县居住，受警察监

视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五年	侨居瑞士 在西欧各地举行演讲会、出版小册子，揭露沙俄对革命者的迫害
一九一〇年	在巴黎组织援助俄国政治苦役犯委员会
一九一三年	开始写作回忆录
一九一五年二月	回国，在国境上被捕 定居下诺伏哥罗德，受警察监视
一九二一年	回忆录《刻骨铭心》第一卷出版
一九二二年	回忆录《刻骨铭心》第二卷出版
一九二四年	回忆录《刻骨铭心》第三卷出版
一九三二年	著作全集（共七卷）出版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病逝于莫斯科